

“八五”国家社会科学
青年基金项目

德意志道路

——现代化进程研究

李工真摇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摇摇言

《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作者携稿索序，热诚感人。德国史非我本行，何敢着手写序？但读后深受教益，又忝为现代化研究队伍中之一员，不能不略抒己见。

据我所知，~~19~~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德国史研究虽有长足发展，但多数学者由于语言的阻隔与资讯的匮乏，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两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本书作者曾到德国访问与研究，并且得到德意志研究基金会（~~1988~~）的大量赠书，因而可以及时阅读到近期出版的西文书籍，仅撰写本书所参阅的西方著作即达~~150~~种之多（其中德文~~100~~种）。因此，作者能够占有大量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取精用宏，厚积薄发，使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呈现新的风貌。

过去对于德意志发展道路的研究，大多限于某一时段或某一侧面。本书则把两个多世纪的德国历史贯通，从德意志现代化的前提与开端、普鲁士改革与“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希特勒纳粹暴力的现代化，一直讲到二战后东、西德的分治与重归统一。这样就有助于对“德意志道路”作完整的宏观把握，更为确切地认

识其特点和规律，而不至于以偏概全，产生误解。

作者没有着意刻画少数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精心勾画若干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如容克贵族、官僚集团、知识精英、独立经营者集团及稍后的职员集团、公职人员集团等等，包括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和沉浮荣枯。而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集团不是抽象的类型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动的特殊社会实体。因此，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绚丽画卷，也体现出作者初步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风格。

作者没有孤立地陈述德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把这一进程与欧洲乃至世界在这两个世纪中的历次政治格局变化的大态势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又力求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各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这就不仅使本书具有宏大的气势，而且还能给人以深层的哲理启发，如传统与现代、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现代化困境衍生的暴力现代化，暴力现代化造成的世界大灾难，而其失败又比较彻底地清理了德国现代化的地基，从而使当今德国现代化进程呈现新的势头与特点等等。本书虽然以德国为研究对象，但这些思路和方法可为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留下了许许多多深刻的历史经验，包括正面与负面的。作为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我，印象至深的是德意志历届政府（不包括纳粹时期）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威廉三世曾对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对此，国防大臣格尔哈特·沙恩霍斯特也深表赞同，他说：“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威廉三世还有一句可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我想，德意志能够从一个落

后、分裂的农业国逐步走向统一与现代化，迅速赶上先进的工业大国并争霸世界，虽经彻底溃败而犹能重新复苏，这些都与政府重视教育、国民素质较高有密切关联。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现今正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后起发展中国家，应该给以高度重视。

德国是哲学的故乡，德国早期的现代化以“哲学革命”著称于世，因此德国的学术佳著大多富于哲理且逻辑严密。但如何把德文著作翻译成为信、达、雅的中文，几乎成为近百年来几代中国学人共同面临的难题。我没有学过德文，但在阅读德国学术著作中译本时也经常感到佶屈聱牙，艰涩难解。而有些前辈学者由于长期受这种译文的影响，竟使自己的中文著作亦逐渐形成信、雅兼备唯缺通达的风格。本书作者的学术生涯正处于辉煌的发端，希望他能够接受前人的教训，在这方面也能走出一条新路。

“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学者多半是寂寞的，学术生涯是一条平凡而又艰难的道路，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更多的倒是崇山峻岭、荆棘丛生。但学者与学术又是每一个民族都不可缺少的，正如水与空气之于人类。整个人类历史文化长河源远流长，其中也包括着一代又一代学者薪火相传的辛勤劳绩。愿所有真正有志献身于学术的人们，都能像春草那样年复一年以自己的新绿铺满大地、装点锦绣河山吧！

章开沅

1997年元月于桂子山

序摇摇言

承蒙李工真的信任，约我为他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写序。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德国史的人，但当我想到如今是拜金主义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许多青年人坐不住冷板凳，弃学逐浪，而李工真却用他风华正茂的整整八个年头，孜孜不倦地经营此书，实在令人感动，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读了这本著作以后，我有以下一些体会。

首先，这是一本在艰苦、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恕我直言，现在有些从事世界史、外国史研究工作的人，往往“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不仅不能运用外文资料或者运用外文资料能力很有限，而且又急于求成，所以只好从有限的中文和中译本著作中吸取营养，甚至辗转抄袭，读起他们的书、文来，总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李工真此书摆脱了这个俗套。作者在研究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时参考了德文书籍和资料员翻种、英文著作员翻种和外文书籍中译本员翻种。

其二，德意志从一个传统、分裂、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高度

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数百年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写这段历史如果面面俱到，就不能显示出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鲜明轮廓，而要从其中选择一些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来论证，就必须对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李工真选择 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和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为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选择法国大革命冲击下 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大改革和英国工业革命冲击下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作为德意志向现代化社会的突进；他论述了德意志 1918年革命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19世纪 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则是以传统权威和正统性为基础的改造，是容克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所领导的，而他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必然导致他们政治对手力量的强大和社会的更加多元化，这种现代化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分析了魏玛共和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激烈冲突所酿成的德意志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以及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面对这种全面危机无能为力时，纳粹势力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实际上运用种族主义夺取了德意志的统治权；他论证了纳粹政权向远古退却的极端反动性与激进性，同时也论证了纳粹政权在追求这种反动目标时必须运用暴力，而且这种暴力一方面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有力地破坏了德意志社会由容克统治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旧有传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变得更为容易了；最后作者论述了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国际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这样，作者就清楚地描绘出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特点。

其三，这本书的写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它是夹叙夹议的。要“叙”、“议”得好，就必须有充分的史实作根据，必须有敏锐的分析能力，亦即史学与史识。从书中的“叙”、“议”来看，李工真是掌握了充分的史实（当然由于篇幅的关系，他不可能将所掌握的史实全部摆出来），并经过认真而仔细的思考的，所以他的书可以说是“学”、“识”兼备。读者只要仔细阅读作者对德意志容克

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发展、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反复演变的过程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的精彩叙述与议论，就可以知道这种评价并非过誉。

其四，德意志位居欧洲的中心，而现代化进程又与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同步，因此，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从书中作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国际背景的充分论述，及其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说明作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

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在艰苦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

其次，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论专著和论文，最忌人云亦云，对学术毫无新贡献，没有一点开创性。关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据我所知，在我国史学界虽然有论文涉及它的某些方面和某些问题，但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是没有的。据作者告诉我，在国外，他的德国导师库尔特·迪威尔（~~孕援阅则 运规则增策~~教授就因为尚未见到一本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德意志现代化全过程的书，而对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高兴，并予以热情的鼓励和帮助；而我从作者所列的 ~~员~~ 种外文参考书中，也没有发现一本这方面的著作。李工真这本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从 ~~员~~ 世纪直到 ~~员~~ 年德意志现代化的全过程，读了以后，使人对德意志现代化的前提、开端一直到未来的展望，有了系统的了解，还可以多少从中窥见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再次，这本书提出和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某些规律。

其一，作者认为，“固然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发展结果，现代化总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但是，从实践上讲，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不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正因为如此，历史总是不断地选择那些凡是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传统，并根据发展的需要来使这种传统得到某种程度的保留，也是根据这种发展的需要来抛弃那些已经过了时的、并正在阻止现代化进程的传统”。这就是作者所说的“重叠发展论”。作者还指出：“不同国家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

化因素的不同重叠性导致了不同发展模式和道路，而不同模式和道路的碰撞，才构成一部世界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完整历史。”

其二，作者认为现代化进程一经启动，便是不能阻止的。他称之为“一次性进程”。这有两层意义：一是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启动后，就逐步加速发展，具有横扫世界之规模，任何国家或地区要拒绝或排斥它都是徒劳的，也都是会落后和挨打的；二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启动时，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可能暂时不一定配套，但是，如果长期不配套，就会酿成现代化危机，影响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社会旧有的统治阶级要想用阻止现代化的方法抑制新生力量的成长以维护其既得利益，虽能得逞一时，最终总是会失败的。

其三，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大体是同步发展的，适当利用民族主义有利于促进现代化进程，但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甚至将民族主义扭曲为种族主义，则是反现代化的，在现代化进程仍滚滚向前的当代世界，最终必然是走进死胡同的，这就是第三帝国的命运，这就是欧洲联盟虽然困难重重，仍在不断发展的原因。

其四，现代化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也有负面效应。像魏玛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批判“美国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那样，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可以批判的，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但决不能像魏玛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者那样，企图用返回前现代化社会的办法来对付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那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被希特勒之流所利用，酿成人类浩劫。看来，“返本”可能得逞一时，但不能“开新”，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最后，这本书中论述的德意志现代化的一些经验，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可以借鉴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从书中发现这样的事例，我在这里只想举出两个例子。

其一，在 1806 年开始的普鲁士“自上而下的”大改革中，除了强调国家管理机构的现代化外，还特别强调教育、科学研究和大学的现代化。当时普鲁士刚被拿破仑打败，割地赔款，由强国变成

贫弱之国。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认为，正是由于贫困，所以才要办教育；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到 1810 年普鲁士文盲只占总人口的 1/10，英、法则占总人口的 1/3 和 1/4。普鲁士的“教育之父”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大学是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机构，是研究者的共同体，是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大学教授的最高道德义务就是：不断地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地向真理接近；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人不能成为大学教授。大学教授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绝不容许从事第二职业，但终身享受着中上层生活待遇。大学教授和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精神上的内心自由，以便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但不一定健康的东西。大学生不能仅为谋生而学习，应有学习上的充分自由，应接受全面的教育，以便培养自己的全面鉴别力，使自己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在科学研究方面，威廉三世和洪堡都认为，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国家必须保护学术自由。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现代化经验，的确大大促进了普鲁士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对此，作者在他的书中从 远个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读者可以参阅，我这里只引证其中第 缘个方面的一段话供参考。这段话是：“普鲁士以及全德意志的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为全人类造就出如此之多饮誉世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这恰恰是这个一向被视为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大学贯彻‘思想自由，科学自由，科学无权威’，以及‘远离实际经济利益’等原则的结果（注：下面作者引了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自 1810 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意志大学就已产生了 怨名获奖者，而数学家还不包括在内。1810 年以前的德意志，无疑是全世界上拥有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德意志能够在 19 世纪末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德意志的、尤其是普鲁士的现代化大学体制。”

其二，~~19~~世纪后半叶俾斯麦创建的德帝国，以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使德意志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突进。但是，由于这场强有力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讲是由传统的“前工业化”权力精英们所领导的，他们为了保护 and 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就运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来阻止政治的现代化，抑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然而，他们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愈有成绩，就愈是增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引起对政治现代化更强烈的要求。所以这种用经济现代化来阻止政治现代化的内政政策，最终必然是没有出路的。

李工真的《德意志道路》一书的确是一本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是，新生的事物总是难以十全十美的。这本书的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简明扼要些、更精确些；书中的个别论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最好还编制一个索引，以便更多的读者可以更便利地运用。

我希望李工真能坚持这种“不为稻粱谋”的坐冷板凳精神，将来一定还会写出更优秀的史学著作。

刘绪贻

~~1988~~年 猿月 远日于珞珈山

目摇摇录

序摇摇言	章开沅 员
序摇摇言	刘绪贻 源
导论摇“现代化”的概念与世界历史	员
第一章摇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与开端	苑
摇第一节摇欧洲中央的德意志	苑
摇摇一、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与德意志历史发展 的负担	苑
摇摇二、大陆经济中心的西移与德意志工商业 的衰落	员圆
摇第二节摇德意志现代化的因素	员源
摇摇一、宗教改革的现代性	员源
摇摇二、多元格局与现代化	员愿
摇第三节摇普鲁士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崛起 ...	员圆
摇摇一、中央集权化专制国家的性质	员圆
摇摇二、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	员猿
摇摇三、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	员苑
第二章摇向现代化社会的突进	猿缘

摇第一节摇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与普鲁士的改革	猿缘
摇摇一、冲击与反应——“自上而下”的改革	猿远
摇摇二、国家管理机构的现代化	源园
摇摇三、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源源
摇摇四、军事改革的推行	源愿
摇摇五、教育体制的现代化	缘园
摇摇六、现代化大学的发展	缘猿
摇摇七、对普鲁士改革的评价	远猿
摇第二节摇从德意志同盟到关税同盟	远缘
摇摇一、“维也纳和平”与德意志同盟	远缘
摇摇二、关税同盟的建立	苑园
摇第三节摇德意志的工业化进程	苑源
摇摇一、德意志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苑源
摇摇二、工业化发展的第一阶段（ 愿缘 ~ 愿 年）	苑苑
摇摇三、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 愿 ~ 愿 年）	愿源
摇第四节摇“未完成的革命”	愿怨
摇摇一、革命前夕的德意志	愿怨
摇摇二、 愿 年德意志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者	怨园
摇摇三、“小人物们”的群众革命	怨远
摇摇四、“未完成的革命”	员园
摇第五节摇“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员远
摇摇一、向“新时代”的转折	员远
摇摇二、自由资产阶级向妥协政策的转变	员园
摇摇三、保守主义的现代化与“政治强人”俾斯麦	员远
摇摇四、“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员猿
第三章摇现代化的成就与困境	员圆
摇第一节摇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成就	员圆
摇摇一、工业的繁荣与农业的危机	员猿
摇摇二、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员怨

摇第二节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	155
摇摇一、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155
摇摇二、关税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	156
摇摇三、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	158
摇摇四、“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	158
摇第三节摇现代化进程的压力	159
摇摇一、工人运动的壮大	159
摇摇二、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出笼	160
摇摇三、容克贵族阶级的败落	160
摇摇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	161
摇第四节摇发展的困境与战争的选择	161
摇摇一、俾斯麦时代的德帝国外交	161
摇摇二、俾斯麦以后的德帝国外交	162
摇摇三、“联盟战略”的失败与战争的选择	162
摇第五节摇对德帝国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163
第四章摇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163
摇第一节摇向民主制的艰难转轨	163
摇摇一、1918~1919年的德意志革命	163
摇摇二、公开妥协下的魏玛立法	164
摇摇三、难以接受的“凡尔赛和平”	165
摇第二节摇1919~1924年的战后危机	165
摇摇一、“履行条约政策”与“灾难政策”	165
摇摇二、通货膨胀的十年	166
摇摇三、防御中的共和国	166
摇第三节摇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	167
摇摇一、几代人的经历与妇女的解放斗争	167
摇摇二、病态经济结构与“合理化运动”	168
摇摇三、“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	168
摇摇四、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政治组织的新集合化	168

摇摇五、“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猿圆
摇摇第四节摇摇虚假的稳定	猿苑
摇摇一、斯特莱泽曼的对外政策	猿苑
摇摇二、议会政党制的潜在危机	猿缘
摇摇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	猿猿
摇摇四、行省居民的反叛	猿愿
摇摇第五节摇摇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猿员
摇摇一、经济危机的爆发	猿圆
摇摇二、纳粹运动的动力	猿远
摇摇三、独裁统治的转变	猿猿
摇摇第六节摇摇对魏玛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猿怨
第五章摇摇暴力的现代化	猿愿
摇摇第一节摇摇反现代主义的纳粹主义	猿愿
摇摇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	猿园
摇摇二、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猿园
摇摇三、现代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	猿园
摇摇四、“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猿怨
摇摇第二节摇摇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造就	猿愿
摇摇一、寻求“卡里斯玛式”领袖的社会心理	猿愿
摇摇二、新宗教的现代化宣传	源缘
摇摇三、权力的最后征服	源圆
摇摇第三节摇摇暴力的现代化	源员
摇摇一、反传统的“一体化”运动	源圆
摇摇二、暴力的现代化	源圆
摇摇三、传统权力精英们的“抵抗运动”	源园
摇摇第四节摇摇对纳粹运动的总结	源远
第六章摇摇现代化进程的新起步	源源
摇摇第一节摇摇从“非纳粹化”到“民主化”	源源

摇摇一、新起步的前提	源源
摇摇二、盟国的对德改造政策	源源
摇摇三、“非纳粹化”运动及其意义	源源
摇摇第二节摇摇从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源源
摇摇一、“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源源
摇摇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源源
摇摇第三节摇摇从“军事工业化”到“和平工业化”	源源
摇摇一、“第二次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源源
摇摇二、“和平工业化”与“经济奇迹”	源源
摇摇第四节摇摇结束语：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源源
主要参考文献	源源
后摇摇记	源源

“现代化”的概念与世界历史

“现代化”这个概念，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在一些文学家和时事评论家们的作品与文章中零星地出现了，但是，作为一种被学术界通用的概念，还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学领域里才最后得到公认的。今天，它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一个世界历史中的关键性概念，因为它表达和描述了一场巨大的有关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变动的一次性进程，一场无与伦比的、具有横扫世界之规模的、也是不断加速发展的进程。所谓“一次性”，就是指自它启动以来就具有的那种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性。

人类现代化进程最先的起点，无疑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直至宗教改革时代，但它所带来的更为显著的物质化进程，至今也不过 150 多年的时间。这个物质化的进程，尽管首先发生于欧洲—大西洋领域，但自从 18 世纪晚期发生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场革命以来，便开始加速度地席卷整个欧洲，继而是整个世界。过去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诸如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等等概念，实际上都不过是人们

试图用来自某一领域的概念来表达、描绘同一个历史进程罢了。然而，这个综合性的、相互关联和彼此依赖的、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越来越难甚至不再可能仅仅只用来自经济、技术、宗教、思想、文化史中的或是政治领域中的单独的概念来包含和概括了，因此，人们宁可选择“现代化”这个更无色彩的，然而却是更为普遍、一般和广泛的概念来对它进行表达和描述了。而且，当人们一旦选择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显然也是能够更好地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进程的。

“现代化”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也往往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过程。它既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价值观念的更新。但这种变迁也是首先反映在国家体制的变化上，反映在政治、社会、文化体系中个人的角色和作用的变化上的。

对于这个已经席卷全球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个任何民族已经、正在、将要经历的历史命运，人们总是要去为它的一系列特征来一次完整的、也是系列式的取名的，其目的就是要将现代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每种比较加以澄清。在这方面，世界各国的学者近年来也的确从理论上作了不少工作。归纳起来，与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化社会主要表现为有以下这些特点：

统计学上呈现出来的人口革命化，它是医学革命化与婚姻制度革命化的一种混合结果，首先反映为死亡率的下降，继而又反映为出生率的下降，与之并行的则是传统大家庭的瓦解和灵活的现代小家庭的发展。

工业革命带来的取代原始手工劳动的机械化，经济生活的全面商品化，劳动分工中日益复杂的协作化。

农业面积日益减少，乡村社会日益都市化，普遍的工业化与今天的第三产业化。

财产的动产化与资产化，以及随之带来的持续性社会财富增

长，不断的技术革新化，大众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字母排列化，科学化，世俗化，今天更有电子信息革命化。

国家由君主一人统治的人治组织变成一种机构化组织，并配以严格的法律制度和高效能的官僚制度，同时日益扩展它福利国家化的社会活动功能。

臣民变成公民，公民则通过兵役——纳税——受教育这三大义务而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

不再根据遗产、世袭特权和财产原则，而是根据成就、效率原则来招募社会精英和骨干，它清楚地反映在世袭庄园的瓦解之中，反映在现代经理阶层的出现之中。

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化，更多的人口被吸收到政治活动之中，同时还有在政治运行中的意见表决化和立法程序化，并用民主制取代君主制。

由地方团体性的“集体”向社会的过渡，由分散、狭窄，预先规定的、直接的、私人性的组织和联系向普遍的、自我选择的、抽象的、客观的非私人性组织和联系的过渡，从非专门化向专门化的过渡，从静态体系向动态体系的过渡，从纯一性向非纯一性的过渡，从简单化向复杂化的过渡。

与那种地方分裂化的统一单位相反，出现的是民族国家的统一化，甚至是更大区域空间中的趋同化。

个人生活的传统导向转变为内或外的导向，众多的自我选择和自相矛盾的角色取代了较少选择的或是传统规定性的角色。

理智取代感情，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灵活性取代固定性，这种灵活性是三维空间性的，它不仅涉及到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性，而且也涉及到在社会地位上的上升与下降。同时，对能动性变化的信仰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对静止和稳定的信仰。

生活环境的多元化，个性主义的生活塑造；价值观念的转变，它表现为对个性、工作成就、效率、消费、进步和创造能力的追求与赞扬；与此同时，还有唯理智论，相对主义，还有异化以及工业污染的形成，以及对它们进行克服的努力。

当然，仅仅这样来理解现代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此首先要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这个现代化特点的密集体还缺乏一种真正能得到证实的内在联系，缺乏对它们相互关系的一种理性上的澄清，因此对于具体问题来讲，仍然是很难运用的。仅仅凭此，人们是找不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的答案的。

第二，如果用一种特定的标准来作为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标尺，那么这种标准显然会陷于解释上的困境。这是因为，不仅这种做法本身有违现代性的原则，而且本身就不是现代性的，因而也是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因素的。例如，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少人拿美国社会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标尺，便立即遭到了首先是来自美国的更多学者的批评。人们不仅指出了美国社会种种的非现代化现象，而且还特别指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自从 19 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连同中国在内的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便全部成为例外了，那么倒过来，美国倒成为了真正的例外了，因而也就不具有任何标尺上的意义了。”^①

第三，仅用这种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社会的两分法，显然不能说明，也难以解释当历史上的真实性是由过渡性和混合性的重叠所组成的时候，各个社会各不相同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而且就是传统的世界，实际上也并不是简单静止的；现代化的世界，也并不是简单动态性的。在过去的 19 百年历史中，传统与现代化，这两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是简单分离和简单对立的，可以说，到处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性，到处都有一种不平衡的平衡，尽管重叠点与平衡点总是在不断向前移动的。

第四，翻开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会发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都是带着这个社会的传统影响因素去开始他们的现代化进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69 年版，第 22 页。

程的。也就是说，现代化不仅不可能与传统毫无关联，而且现代化的起点也恰恰正是传统。固然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发展结果，现代化总是以传统为代价，但是，从实践上讲，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不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在历史中，人们总能看到：相当多的传统，在通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恰恰能够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上，从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促进这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总是不断地选择那些凡是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传统，并根据发展的需要来使这些传统得到某种程度的保留，也是根据这种发展的需要抛弃那些已经过时的、并正在阻止现代化进程的传统。

第五，人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之中的现代化因素，也同样能体现为一种新形成的“传统”。这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传统”，不仅本身与传统有关，而且与那些还能够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因而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保留的老的传统一起，恰恰是作为更为古老的传统社会与更加现代化社会之间的一种中介物来出现的。在这两种性质不大相同的传统与“传统”的混合与重叠中，其重叠点与混合点同样也是不断向前移动的。至少人们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社会，是真正的、完全彻底的不带任何传统痕迹的。因此，人们也有理由说，正是不同国家和社会中不同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的不同程度的重叠性，才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

第六，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之间本身有着一种密切相联的互动关系。每个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都是受它外部世界环境的影响的，但是，早起的现代化国家面临的外部局势与条件不同于、甚至是完全不同于后起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局势与条件，这就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种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同时性。这种同时性以及这些模式与道路之间的彼此碰撞，本身就极大地影响了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对各自社会内部传统的取舍和改造，也影响了它们各自社会内部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的混合与重叠，在特别的情况下，甚至能给某些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内部发展的某一阶段带来猛然的加速、断裂、聚变和更新，尽管对所有的社会来

说，渐进、平稳、有连续性的发展总是值得想往的。

虽然有以上几点，人们还是能够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和标准的，因为它涉及到现代化社会最起码的发展指标，这些指标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精确地去涉及和阐明现实，因为现代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毕竟是明显的。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前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模式、不同的道路来对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区别，仍然可以避免这种传统与现代化两分法的缺陷，而且当我们对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历史上的比较，并归纳它们之间的遭遇、合作、挑战、应战、冲突、碰撞所产生出来的联系时，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也恰恰正是一部世界不断走向更加现代化的完整历史。

在本书中，我的研究对象是德意志，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是因为它由一个分裂、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统一、高度发达的工业现代化社会，经历过漫长而曲折多变的现代化历程。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发展，曾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大起大落，而它的每一次起落又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开展对这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进程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现代化的整体性进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章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与开端

第一节 欧洲中央的德意志

摇摇一、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与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负担

摇摇任何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的。正如德意志著名学者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置于特定地理中的运动。”^①对于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历史性空间的历史来说，了解有关它地理上的基本知识，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在德意志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进程中，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位将德意志的历史与它的地理位置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这样写道：“在欧洲所有的文化民族当中，德意志

^① 沃尔夫·冈·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从1806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53年版，第105页。

人，由于他们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地理上的负担，造就了他们历史上的一种特别有负担的传统。”^①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位于欧洲大陆的的心脏地带。由于这种欧洲中央位置，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与其他的欧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这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文化的交汇地，而且也为其造就了一种精神传播上有利的出发点。然而，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给德意志的发展既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劣势。弗朗茨·施纳贝尔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优势与劣势之间的关联：

欧洲文化上的多样性构成了欧洲人的生活财富，欧洲文化中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员也是由于中欧的吸引力才联合成一个地理和精神上的统一单位的。然而，正如处于北部磅礴阴雾与南部明媚阳光之间那幅有魅力的德意志风光一样，在海岸地区与阿尔卑斯地区之间的这个核心地带里，大陆地貌上的多样性也完全重复地表现出来了。从巴黎盆地抽身而出的低地和中部山区，在将自己拉向东方后，又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之中。这种地貌成分既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井然有序的。而且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一再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欧洲大陆的所有地理形态。对德意志来说，这个事实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它空间上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提供一种地理上的优势，来确保它完整的政治统一和来自某一点上的统治。^②

这一点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在欧洲，对一个文化民族

① 弗朗茨·施纳贝尔：《19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 1997年版，第 509页。

② 弗朗茨·施纳贝尔：《19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 1997年版，第 509页。

来说，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是告别中世纪，迈进现代化社会门槛，维持稳定统治的唯一有效的过渡性政治方式”^①。因此，能否或何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就成为了这个时代衡量欧洲各民族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

从地貌局势与民族政治发展的关联中，施纳贝尔将法兰西与德意志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在法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发挥了一种中心点作用的。而在德意志空间里，由于重心向东的转移，莱茵河却并没有能发挥这种历史作用。显然，错综复杂的山脉体系和杂乱无章的河流也助长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②

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同时也使德意志人成为了罗马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自然中间人，这种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史。这三大人口集团，即德意志集团、罗马人及其后裔的拉丁化集团和斯拉夫化集团，为争夺定居地的边界展开了上千年的斗争。各方都肆无忌惮地利用历史提供给他们每一次机会进行扩张，因此，三大集团的边界是经常发生变动的。

这种国家造型上的强制性尤其给处于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带来了更大影响。当它力量强大的时候，其边缘地区便不断地向外扩展，在这里，人们可以回想起奥托—斯陶芬王朝所建立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老帝国曾有过何等辽阔的疆土，又曾将何其之多的其他民族包括在内。当然，这也使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带有民族烙印的社会，而是构成了一种跨民族的社会。人们也同样不会忘记，操德语的德意志诸集群是如何越过易北河向东突进的，又是如何注定了它们与斯拉夫化集团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的。但是，当它力量衰落的时候，外来的冲击便给其边缘地区带来了一种长期的脱落，使得这些地区能从这个德意志人的国家联合体中分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48 年版，第 103 页。

② 弗朗茨·施纳贝尔：《19 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 1929 年版，第 152 页。

离出来，甚至将自己作为独立国家来创建。在这里，人们只要想想瑞士与荷兰分离的例子就够了。与法国的对比中，德意志国界的非稳定性显得尤其突出。众所周知，法国在 1576 年已拥有 5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 1595 年也仅仅增加到 56 万平方公里，这种变动不过是它与德意志之间的那场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拉锯战的反映罢了。而在德意志历史的各个不同时代里，其版图的大小则迥然不同，它代表着一种对外边界稳定性的缺乏，一部几乎是非连续性的历史，一种领土分裂的传统。总之，这一点可以肯定：德意志空间在民族边界上有着比其他欧洲民族更大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这种特点将给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特殊的难题。

处于欧洲中央的德意志空间既没有构成一个岛，也没有构成一个半岛，这种说法相对于南欧、西欧和北欧的大多数民族来说都是正确的。在中世纪后期，岛与半岛的地理局势不仅有助于民族边界的肯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在防范外来冲击方面，向国家政权提出了远比内陆国家少得多的任务。这是因为它们或是不与邻国接壤，或是只与很少的邻国接壤，因而也就只有很少的边界需要防守。对这些国家来说，同样规模的军事力量往往能在对内巩固中央权力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更大的效能。法国、英国、瑞典、俄国，这些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国家，能在稳定得多的版图框架内连续性地对它们的人口进行集合化，与这种地理上的局势不无关系。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已于中世纪后期在欧洲的这些空间里纷纷建立起来。

而在德意志空间里，随着帝国的军事力量在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廷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中日益受到削弱，内陆国家中间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便立即呈现出来。这个四面受敌的老帝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权力的重心便从皇帝的手中滑落到邦国诸侯们的手中，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只可能发生在少数个别的区域里。因此，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方式朝着小邦割据的地方分裂化方向发展。这些邦主们的势力竟发展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自 15 世纪以来，历代德意志的皇帝企图通过中央权威来确保内部和平，阻止分裂，并对国家进行有

效组织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自从德皇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以来，连皇帝也得由七大选侯来选举产生。而在二百多个小诸侯国和二千多个独立的帝国骑士领地中生活的居民身上，那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对邦君的忠诚，也由于这个老帝国自从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被宗教派别所分裂的国家，而变得更为巩固了。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化相反，对这个老帝国的权力中心来说，它经历的恰恰是一场中央权力的瓦解过程。

一旦这个老帝国中央权力的软弱被它周围已变得更为强大的邻国们所看到的时候，德意志空间里这种政治上松散集合的弱点也就成为了袭击的邀请。这是因为：这些邻国们对这个老帝国辉煌的过去是恐惧的，对这个人口集团的潜力又是记忆犹新的，只要一有机会，这些邻国便坚决地反击它昔日的霸权，并力图继续保持它的分散、软弱状态。因此，“在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室之间发生内部争端后，在内部的宗教战争之后，这个处于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们包围之中的德意志空间，终于在16世纪成为了内、外各种势力实现各自野心的竞技场”^①。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不仅给德意志的人口带来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而且在经济上造成了二百年的倒退。而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又给它带来了将近两个邦国的地方分裂固定化。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德意志空间政治上的分裂化，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化。

总之，德意志空间的这种无天然边界性注定要负担它政治上的沉重命运。自从15世纪以来，这个处于欧洲中央而又门户洞开的空间，始终都能对它的邻居们产生一种无法估量的漩涡式的影响：要想使邻居们不去对它感兴趣，它又太强大了；要想使邻居们不为利益上的诱惑所动，它又太软弱了。因此，中欧成为了欧洲强权政治利益争夺的焦点，而这一点又将给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独立化解决带来进一步的困难。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58年版，第19页。

二、大陆经济中心的西移与德意志工商业的衰落

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也曾给德意志空间带来过经济上的发展优势，因为这个空间恰恰处于欧洲东西与南北经济联系的交汇点上，因而也使它变成了贸易和交通上最重要的通道。当中世纪的整个欧洲都还处在一种由封建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的时候，拥有发达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经济中心与靠近圈外边缘地带之间的地区性差异是被固着化了的。而中欧德意志空间中的奥格斯堡、纽伦堡，以及下莱茵地区，正是这个老欧洲的经济中心。这种欧洲大陆中央与欧洲经济中心的自然叠合，相对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群岛等地区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正是这些处于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上的德意志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才体现着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进步与经济上的繁荣，也正是在这里，才普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点使德国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①这也正是1517年开始的那场欧洲伟大的思想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会发生在德意志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自从15世纪以来，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突进，欧洲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陆上古老通道或是部分地、或是全面地遭到封锁。为了将收益颇丰的对亚洲贸易的控制权继续保持在欧洲人手中，欧洲的冒险家们寻找着通往中国和印度财富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探索和努力中，导致了新航道的开辟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向海外扩张的结果，使得西欧大陆沿岸由过去的世界贸易的边缘地带移到了中心位置上。与之平行发生的却是，从地中海越过阿尔卑斯山、高地德意志工商业城市、河流和道路通向欧洲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南北贸易却因此萎缩了。^②经济

^①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7页。

^②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517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53年版，第197页。

上的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但地理上的中央位置却无法移动。尽管奥格斯堡最大的商家，也是当时德意志最大的商家——维尔塞家族也曾试图在南美开展殖民活动，但很快就证明，奥格斯堡在这方面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地理上的出发点。^①由此可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给德意志工商业城市带来过优越地位的欧洲大陆中央位置，已经成为中欧德意志空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德意志工商业城市也显然无法像英格兰的伦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样，依靠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去开展有利可图的殖民贸易。

当中央集权化的邻国对德意志事务的干预使得老帝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更加严重和紧张，并在具有惊人毁灭力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城市中产阶级的光芒再度熄灭了。《威斯特法伦和约》凝固了邦国的分裂，贸易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列指出：

靠贸易为生的城市如科隆以及汉萨城市的区域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甚至是第一次看到了农奴制的设立，城市的行会再度巩固了对手工业的统治，要发展任何大规模的企业都是困难而罕见的。在这片德意志内陆空间里，自给自足的农业统治着经济生活，以至于在许多地方，¹⁶世纪甚至比¹⁵世纪实际上更为封建。^②

对于西欧的荷兰等国来说，¹⁷世纪代表了它们发展的最为辉煌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形成，乡村工业迅速崛起，城乡贸易逐步扩大，海外殖民活动早已开展，市民资产阶级革命也已完成。在他们的手中，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世界已经开始从欧洲西北角孕育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¹⁵世纪-¹⁸世纪》，斯图加特¹⁹⁸⁹年版，第¹⁴⁰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¹⁹⁵⁸年版，第¹⁰⁰页。

出来，它将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毫不留情地横扫整个欧亚大陆。然而，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合谋，德意志人已经为它们历史性的延误支付了沉重的代价。在这里，仍然是一个以封建农本经济为基础的世界，城市工商业的衰落和市民阶层政治上的软弱显而易见，国家政治上的地方分裂化顽固地阻碍着统一的民族经济空间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的发展，然而，来自于欧亚大陆西北角现代化新兴工业世界的这场冲击又是无可回避的。

第二节 摇德意志现代化的因素

一、宗教改革的现代性

仅仅只注意到德意志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的生活空间里，仍然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这个德意志老帝国，确切地说，德意志的北方诸邦国，正是首先进行宗教改革的地方。这场发生于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所体现的也正是一场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思想革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加尔文教是具有现代性的，而且路德新教也是具有现代性的，尽管它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而恩格斯更是将之誉为“第一次市民资产阶级革命”。

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能否被称为“德意志现代化之父”，到现在还是有所争议的，但是，在 1520 年开始的批判罗马教廷的斗争中，他对中世纪晚期那场政治和精神危机的回答，则是崭新的。在他所开创的路德新教中，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当其他的经济上、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环境出现的时候，这种精神气质和伦理道德便会强烈地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韦伯这样评价新教的意义：

现代世界，这个科学、经济、劳动、效率、能动和民主的

世界，更强地打上的是新教主义的烙印，而不是天主教主义的烙印。正是宗教最强烈地造就了人的原动力和行为方式，它给人们的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并直接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去发出清晰的声响。而新教使这个世界失去了魔力，并将人们的生活引向了理性化。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①

新教主义中隐藏的现代化潜力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马丁·路德在基督教世界中头一个提出了“个人人格至上”的要求。他指出：“个体是单独面对上帝的，无需传统和教会制度的保障，因此，个体不再相信教会所相信的那种东西，而只相信自己。”他要求一种完全的“内心生活化”，“因为生命是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的，这种良心是个体的良心，它决定着个体的行动，行动是受内心引导的”^②。在这种“人格至上”的良心面前，传统社会的准则和习俗，这些中世纪的判断标准失去了分量。个体从现在起处于一种与《圣经》的直接联系之中，每次都能对它作出新的解释。教会千篇一律的解释已不再中听，甚至连教会这种机构也只具有相对性了，它也不再是一个领导、统治、负载和保护个体的机构和场所了。因此，这种“内心生活化”的自由能给予个体长久的自由，去贯彻依靠个体内心引导的现代化生活原则。

路德新教的教会是一个语言的教会，一个读着、讲着、祈祷着、歌唱着的语言性教会，而不再是一个圣礼和礼拜仪式的教会了。生活是要靠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来解释的，这种语言传递的不再是直观上的形象，而是意识方面的信息。因此，新教文化创造的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82 年版，第 282 页。

② 赫尔穆特·馥·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 1982 年版，第 282 页。

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一种人与人之间能进行思想意识交流的语言文化。这种对语言的专注，训练了人们智慧的灵便和反复的思考，教会了人们远比那些变成了礼仪式的忏悔要多得多的东西，使人们懂得了“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我”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并使人们在传统与习俗面前变得更为独立。“内心生活化”原则使得写与读也不再仅仅只是布道士们的需要，而是全体新教徒们的需要了，从而也就会在新教徒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写、读能力的解放圈子。正是这个解放圈子给德意志的世俗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成果，并注定了新教邦国中教育的成长与飞跃。所有这些，都为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打下了烙印。

路德新教使大学（尽管当时实际上还是神学院）与科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它将良心与知识联系起来，将受到震动的信仰与对《圣经》所不断作出的新解释联系起来，因此，也就将信仰与当时作为科学的神学联系了起来。由于信仰与求知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了，怀疑人们是否正确解释了来自基督那有权威的《圣经》原文。这样，对传统的批评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推动力，推动着人们去进行科学的反思。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上的现代化倾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德意志新教现象。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救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分离，信仰与知识的分离，对传统的批评，信仰的自由，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所有这些，都特别为科学地解释世界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新教的世界里，好奇心的自由被合法化了，再也没有捍卫一成不变的宗教传统、判决伽利略的教会了。相反，正是新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重新评价了职业和劳动，他抛弃了僧侣阶层以及他们的虔诚、禁欲、苦行主义和对彼岸空泛的寄托。信仰新教的人们，其生活不再是遁世的，而是面向现世的。路德指出：“宗教上的禁欲是内心世界的禁欲。日常的劳动、成就、效率正是上帝要求我们去做。劳动就是一种世俗的礼拜，也是对上帝的最大忠诚。”“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的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

的价值。”^① “贫穷不是宗教的本质，不劳而获才是最可耻的，劳动才有权获取，无论是贵族、修士还是乞丐，游手好闲都同样是罪恶和祸害。”^② 总之，不是修道士的生活，而是世俗劳动以及在职业中履行义务，才在新教中获得了一种极高的、得到认可的价值。这样，路德的宗教改革便将欧洲人，首先是德意志新教徒的价值实现和生活意义与劳动和职业联系起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纪律、勤奋和对义务的忠诚。

新教徒之所以能比天主教徒更加积极地加入到这场现代化运动推动者的行列之中，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存在着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新教骚动”的精神结构。自马丁·路德以来，新教徒对所有关于信仰的见解都持怀疑态度。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什么东西都不能与上帝一致起来，《圣经》也一再地被作新的解释。天主教徒首先是那个靠命令句来生活的：“就是这样的！”而新教徒则是靠这样的疑问句为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就是这样的吗？”新教徒已不再被束缚在一座稳固的宗教观念大厦之中了，人们一再突破观念的界限，而这种不肯定性、不确定性正是内心骚动和良心不安的根源。正是由于这种骚动和不安，天主教徒的那种天真朴质、知足长乐式的自我理解，被新教徒的严肃认真以及永久性的自我反思所突破，有罪的平时与通过忏悔而得到宽恕的星期日之间的区别已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徒的一生都生活在紧张和冲突中。生活是一副重担、一项任务、一场大胆的试验和冒险，因而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为孤独地面对上帝。也正因为如此，新教徒能比天主教徒更为强烈、更为努力地参与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正是怀着这种内心的骚动，他们能更快地走进这个现代化的世界。

新教的产生使这个世界变得无神化、世俗化了。它粉碎了神秘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5 页。

^② 赫尔穆特·馥·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 1985 年版，第 205 页。

的解释，使人们能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对世界事物井然有序的要求了，世界开始变得非教会化了。路德从根本上解开了教会与国家、宗教统治与国家秩序永恒不变的联系。他勇敢地反对加尔文教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上帝帝国的神权统治的倾向。他认为：“每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督教的标准化，都会使这种看不见的信仰变成一种固定的法则，从而使它变得反常和伪善。人们是不可能将这个世界带入到一种十全十美的状态中去的。”^①这就导致了两个帝国，或者说两种统治——宗教与世俗统治之间的最终脱离。世界不再被委托给教会，而是委托给人的自然理智。这是一种对教权主义和神权统治的拒绝，从而也导致了一种较为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自1545年以后，就连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再到罗马去接受加冕礼。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能使基督教的信仰与一种政治纲领一致起来，也不再有任何一种真正的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拯救理论了，仅仅只有政治中的基督徒，仅仅只有基督徒对非绝对性和基督教博爱的需要。这也正是在与世界的实际交往中，理性的德意志人成熟的根源之一。

总之，新教的伦理道德，作为现代化起步阶段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必要条件，在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各邦中已经具备。唯有当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已为人人所共知的时候，这种宗教上的动机才会退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二、多元格局与现代化

在基督教文明的欧洲，世俗统治与宗教权力，并没有像在东正教、伊斯兰教或亚洲诸宗教领域中那样，或是凌驾于对方之上，或是臣服于对方之下，而是彼此独立地对峙着。自公元15世纪以来，宗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争端一直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特点。在这场历经数百年的争端中，它们彼此都将自身保存了下来。因此，欧洲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65年版，第140页。

的文明体系成为了一种双重权力的体系。与此同时，这个权力体系又是通过独立的力量，诸如国王、贵族、教会机构、彼此竞争着的封建国家这些权力载体来体现的，也是由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来决定的，因此，欧洲的体系又是一种复杂的多元体系。从这种多元体系以及多元平衡中也产生出其他独立的构造物，如工商业城市和大学。因此，它既造就了自由的空间，也造就了一种特别的压力和能动力。正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种由独立权力所构成的多元格局中，以及它的内部冲突中，宗教改革、世俗化社会的生活原则才得以贯彻。所以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条通向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道路。

宗教改革从根本上使欧洲政治的多元性和对立性变得更为尖锐了。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分裂的、彼此竞争的教会或教派，如新教与天主教，作为一个乘数，也加入到这种多元格局中来了。这就导致了宗教的帝国与世俗的帝国更为尖锐的对峙，以及宗教与世俗机构混合的最终瓦解。世俗的世界终于摆脱了宗教的监护，最高当局也让位给了理智。因此，它本身意味着世俗化和理性主义的开端，从而也就构成了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进步的能动性方面的又一个基础。

德意志社会是分享了这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因为宗教改革在政治上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德意志社会地方分裂化的加剧，而这一点对德意志通往现代化之路产生了中心性的意义。“自 15 世纪中叶以来，德意志成为了一个被宗教教派分裂的帝国，《奥古斯塔拉宣言》的原则——邦君的宗教也就是臣民们的宗教——成为它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有关人的等级是按政治统治、宗教、社会、种族上的顺序来排列的。宗教信仰上的联系具有了更大的分量。”^① 多教派的事实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到了承认，德国多个邦国是分属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不同教派的。

^① 沃尔夫·冈·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5 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7 页。

这就为德意志老帝国造就了在欧洲多元体系中的一种独特形势。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所指出的那样：

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领土的对峙与合作原则，政治上的组织形式，从未像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松垮的屋檐下体现得那么鲜明。如此之多的邦国在彼此共处和对峙着，这引起了围绕着效率和版图展开的竞争，并产生出某种变革的压力，同时也弱化了旧制度对个体的压力。因为这种德意志的地方分裂主义，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是允许个人去选择国家、教会或大学的。^①

因此，比较起欧洲那些中央集权化的、有更高集合化程度的国家来，在德意志空间的政治环境里，那种对民族统一来说是严重障碍的局势，使德意志人具有了一种更为充分的应付变化的准备和灵活性。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人们还必须将宗教与区域割据的多样性作为德意志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来作进一步的考虑。邦国间的竞争，本身对各邦国的国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15世纪以来，诸多的邦国，尤其是新教的北方诸邦国，已形成了一种以典型的官僚治国为特征的发展方向。这种官僚机器是由受过良好大学教育、具有强烈市民阶级色彩、根据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原则招募的官员们组成的，它着眼于邦国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同时也为了竞争的需要，积极推行“开明专制”式的改革。

这是一种宗教—理性上的以及政治—经济上的形势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向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但是，这种改革政策已来到了18世纪的大门口，也实际上在宣告旧欧洲的结束，因为这种改革行动本身就在重新塑造着德意志的版图。而那个曾包括了全部德意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69年版，第155页。

志人的居住空间、造就过统一和整体的老帝国，那个似乎还拥有主权的跨邦国的联盟，已经日益虚弱并被它的那些真正拥有主权的区域性邦国掏空了身子，并像一个退了休的老人一样日益隐居起来了。谁能继承这份遗产呢？这是一个似乎已有答案的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还难以作出最后回答的问题。

第三节 摇普鲁士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崛起

一、中央集权化专制国家的性质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时代里，最有希望继承德意志老帝国遗产的邦国必须是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王国。这种中央集权往往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专制主义”的。但是，这种对专制型国家的笼统概念，很容易造成一种混乱，因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地理区域里，各种专制主义的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尤其在欧洲和德意志的这个过渡时代里，专制主义的本质已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立国之初大相径庭。尽管这种专制主义性质在不考虑贵族精英的条件下是不能加以概括的，但它已不单单只是完全封建性质的君主专制。它“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①。因此，对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在各国普遍得到发展的这种专制主义，使用“前现代化”的概念，或许能更鲜明地概括它的特点，尽管实施这种“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统治的仍然是“传统的权力精英”。

德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逊指出：“这种贵族权力的新形式，在这个早期现代化时代的社会过渡秩序中，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

^①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43 页。

交换的扩展来决定其特征的。”^① 这是因为：这种在大空间范围内的统一秩序的发展是与商品经济流通形式的拓宽相联系的，也正是靠了这种商品经济流通形式的拓宽，才为这种统治的实施提供了自由支配的手段。当然，这种统治的实施首先需要一种中央集权性质的纳税机构才能发挥功能，因为唯有依靠中央权力对税务的垄断才有可能先是建立一支雇佣兵，后是建立一种从实物报酬的联系中摆脱出来的常备军的，也才有可能扩建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在这个过渡期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大空间范围里拥有中央纳税垄断权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巩固、扩展，也是处于一种彼此相互依赖和促进的进程之中的。在通过日益强烈的分工化所组合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联系也被不断地复杂化，从而也使得两者必须互相配合和依赖，才能确保更为广泛的经济交换并使之良性地循环。

由此可见，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统治便成为无源之水。同时，一个稳定的、具有广泛有效的干预和保护功能的中央权力的存在，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也唯有它，才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密不可分，这对处于过渡时期的所有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有效的。

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里阿斯，通过对英国、法国的中央集权化国家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种向着中央纳税国家以及统治机器的发展，唯有当它作为一个受到具体的社会集团和具体的个人影响的社会过程时，才可能真实地进行。处于大小集团紧张关系中央的人——国王——总是在行使着平衡功能，而那些集团，既作为独立的对

^① 佩里·安德逊：《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法兰克福 1976年版，第 100页。

手，也作为行动的伙伴，在彼此牵制着。所谓中央集权化的“国王机制”，正是与这样一种形势相联系的，在这种形势中，既不是传统的领导集团（贵族），也不是市民出身的功能性集团（资产阶级），能决定政治统治争端的结局。也正是从这种僵局中，才产生了一种中央权力的发展余地，这种中央权力要贯彻的目标就是平稳各社会力量对比。它也恰恰构成了向中央集权化更发达阶段中那种充当贵族与市民阶级之间仲裁人的专制主义国家角色发展的基础。^①

但是，在德意志空间里，这种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已经不可能像荷兰、英国、法国那样，首先从贸易和工商业领域中获得它的冲击力了，因为德意志的那些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经由于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三十年战争的破坏而衰落了。因此，这种冲击力只可能来自农业领域，只可能来自农业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然而，当不是由城市工商业的市民阶级，而是由农业领域中旧有贵族阶级来领导和推动这场转变的时候，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不同于荷兰、英国、法国的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这一点将决定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尤其是始终代表着这条道路的那个区域——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侯国的发展，成为了我们必须给予特别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

令历史学家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新生工业世界的冲击面前，为什么在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在打着农业社会关系烙印的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能建立起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化国

^① 罗伯特·埃里阿斯：《关于文明化的进程》第 9 卷，法兰克福 1980 年版，第 104 页。

家呢？普鲁士容克贵族，这个曾经统治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向新社会形态过渡的时代中，使自己不仅保住了过去的政治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而且还将这种地位带进了这个新时代，并充分利用这种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稳定性，造就出了一种工业世界中发展的新模式呢？

回答这些问题的真实起点在于：在整个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参与了对欧洲大陆西北角上的那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因而也就跟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当然，容克贵族不是用向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市场输入手工工场产品，而是用输入农产品的方式来参与的。要了解这一点，回顾老欧洲经济中心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在 15 世纪以前，当德意志工商业城市还占据着欧洲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时，不仅英国和欧洲西海岸地区，而且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靠近这一地区的普鲁士农业区，都是处于欧洲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的。在这个地区里，已出现了专为那些老欧洲的城市化中心提供基本食品的粮食供应商。自从 15 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海外殖民贸易的扩展，不仅未使这一地区向新经济中心的工商业城市提供食品的粮食贸易变得更为艰难，反而使它变得更为容易了。

在过去，勃兰登堡—普鲁士若要进行粮食贸易，必须通过多如牛毛的诸侯国林立的关卡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现在，只需利用那条波罗的海沿岸的北德“黄金海岸线”以及日新月异的航海技术，就能将易北河以东农业区盈余的粮食与欧亚大陆西北角上正在兴起的新生工业世界连接起来。因此，当近代工业化在荷兰、英国悄然兴起的时候，当古老的汉萨城市因德意志工商业的凋零而无法参与这些新兴国家的竞争时，尤其当这些国家因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而日益由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的时候，普鲁士容克则抓住时机，利用这条辽阔的海岸线，穿过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海道，向这个工业世界输入越来越多的粮食。这不仅是其他德意志中欧内陆诸侯国困守在旧有的农本世界中想干也干不成的，而且也是后来遭受革

命打击的法兰西土地贵族在当时所无法想象的。^①如果说普鲁士的重商主义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么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使得普鲁士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经济开始向其自身的反面发生着转化。由于通过海外粮食贸易来换取货币有利可图，为了能将更多的粮食盈余投入到贸易中去，并利用良好的农业经济形势获得更高的利润，容克们不断扩大自营地，并逐渐将自己的庄园改造成农业企业。从容克由过去那种仅靠坐收地租致富的地主，逐步变成经营粮食产品的“农业企业家”的这一进程中，我们已能找到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的起点。

但是，由于普鲁士容克贵族能比过去更好地发展他们的粮食贸易，并能在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经济结构中保持他们的经济功能，自然他们也就无需去对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而是采取了“再版农奴制”的形式。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父长制”传统中的主人地位来对付仍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通过对依附农民的负担能进行任意加减的权力，他们制造着农民负担上的区别，使农民中产生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彼此争夺。其结果，农民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体。^②与此同时，农民的世袭臣服性，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所服的徭役以及向庄园主缴纳的实物地租，所有这些都扩大着容克地主的盈余，而这些盈余也是能进入到远程粮食贸易中去的。总之，农民承担着这种市场经济的生产代价，而庄园贵族却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基础。

这些在经济上成为暴发户、政治上又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容克贵族是能造就一种中央权力的，只要他们认为有这种必要。当瑞典人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页码见前，斯图加特版，第 107 页。

^② 汉斯—于尔根·普勒、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回顾中的普鲁士》，哥廷根版，第 107 页。

在 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几乎不受阻碍地侵犯勃兰登堡—普鲁士，并封锁波罗的海上的那条“黄金海道”时，一直处于贵族宗派集团争夺之中的威廉大选侯却形同傀儡，因而无法顾及贵族们的贸易与特权。这一结果终于使容克贵族们认识到：“在现代大国激烈争夺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并能确保贵族自身利益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绝对必要的。”^①于是，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作为各贵族宗派集团妥协的产物，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政治行动组织的形式，开始被建立起来。它以全国最大的贵族地主霍亨索伦王室为核心，拥有了一种无需其他各等级同意就能行使的中央征税权。但是，它同时也规定了贵族的免税权，他们在庄园区域中的管理和司法权，以及农民的世袭臣属地位的不可动摇性。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力措施还并不能直接贯彻到这些庄园区域的人口那里，尤其当这些措施触及到贵族们的经济利益的时候。例如，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禁止吞并农民土地来扩大庄园土地的禁令，在下达了数十年之后也几乎无效。可见国王尽管行使着职能上的权威，实际上只有一种有限的活动余地；而贵族们在直接利益领域里依然保持了大部分的政治上的自治权。

贵族与中央统治秩序的联系更主要是通过一支常备军的建立来体现的。在这种体制中，贵族子弟被有目的地纳入到国家任务之中，纳入到国家的最高功能之中，更确切地讲，纳入到军官生涯之中了。这种军官生涯，不仅对于那些更年轻的、没有土地继承权的贵族世家的老二、老三们来说，往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对于他们作为庄园主的父兄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它代表了一份不小的附加收入；另一方面，军官的岗位也能对庄园区域中贵族统治的巩固有好处。这种军事体制规定了军官只能由容克子弟来担任，农民子弟也只能在他所属的庄园区域作为士兵参军。尽管军队归国王调动，但它得以庄园区域为单位进行调动。这

^① 佩里·安德森：《专制国家的形成》，法兰克福 1973 年版，第 100 页。

就使得即使在服兵役期间，农民子弟也不可能摆脱对主人的依附关系。军队内部也仍然是容克贵族们的天下，而容克们也只是在为这种军队提供着军费。由此可见，这种军事体制在欧洲是惟一性的。

这种打上了“父长制”烙印的庄园主自治与军事制度，为这个现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双重保险：一方面，一种中央权力得到了确保，但它首先是作为贵族们的一种专制主义而被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普鲁士体制”，又将容克贵族作为负载国家功能的阶级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秩序结合在一起。^①因此，容克贵族在这个社会中扮演起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企业家，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独裁专制的社会权力以及由他们所确保的政治统治关系的载体。

总之，由于以从事远程粮食贸易的方式参加了工业世界的经济大循环，勃兰登堡—普鲁士容克贵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并建立起德意志空间中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经过霍亨索伦家族从弗里德利希·威廉大选侯到腓特烈大帝三代君主近一个半世纪（1688—1740年）的励精图治，东征西讨，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击败瑞典、波兰，夺得了从易北河口远至柯尼斯堡的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不断向中欧内陆地区伸展，因而使18世纪成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这个牢牢掌握着通往新兴工业世界的辽阔海岸线的德意志邦国，在这个新世界向德意志空间发动直接而猛烈的冲击以前，已开始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

三、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

在我们能对普鲁士—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作更合理的解释以前，必须注意到另一份普鲁士“特产”——普鲁士国家官僚集团。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国际间有历史意义的区别：在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里，中

^① 奥托·比希：《老普鲁士中的军事体系与社会生活，1688—1740》，柏林1969年版，第236页。

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是依靠王室与市民资产阶级的联盟才建立、扩展起来的，这些君主政府能够将它们所支持的市民阶级的新社会力量作为一种平衡手段来抗衡贵族。而在普鲁士，中央集权政府则相反，它是依靠王室与容克贵族的联盟才建立起来的。由于没有出现那种能作为平衡手段的市民阶级的社会集团，因而与英、法等国相比，普鲁士的中央权力又是相对软弱的。为了中央权力的强化，国王必须首先发展起一种能与土地贵族以及军队相平衡的政治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体现着普鲁士中央集权化政府管理机制的核心力量——文官集团。普鲁士城市经济生活的新萌芽以及市民资产阶级的成长，也首先是这个文官集团自身发展需要的产物。因此，研究普鲁士国家官僚集团的成长，对于研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提和开端，也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普鲁士官僚集团的成长和发展，首先是与普鲁士军队近一个半世纪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随着这个邦国的版图连续性的扩展，超出容克庄园领地之外的王室领地日益扩大，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代表国家的官僚去进行管理。到腓特烈大帝时代，这种王室领地已达到普鲁士领土的二分之一，因而也就逐渐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形成了一个从事国家管理、充满专家治国气味的集团。^① 这个集团组织范围的广泛性，管理行动的连续性，专家型的垄断性，以及特别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恰恰为它自身权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腓特烈大帝的严格训练下，这个以建立一种现代理性的领导行动机制为目标的集团，培养出一种具有普鲁士特色的管理风格，并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的作风而闻名于世^②，因而成为了不仅是德意志空间里，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工作效率的管理机器。

① 汉斯·罗森堡：《官僚、贵族、独裁专制，普鲁士的经历，1713~1806》，剑桥 1968 年版，第 512 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713~1806》，斯图加特 1968 年版，第 101 页。

从威廉大选侯时代开始，这支官僚队伍，也是按照军事上的“普鲁士体制”的模式，从贵族世家中的老二、老三们中进行筛选的。甚至在历经数代人以后，这个集团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它的最高层，也几乎清一色地来自容克贵族世家，这说明了他们与土地贵族血缘上的联系。然而由于长子继承制的关系，这些贵族家庭中的老二、老三们已与家族的土地占有权分离了。这一点似乎与军事官僚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人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这种区别：“这是一批定居于城市中的人们，他们已通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和候补文官训练，通过效率上的成就感，通过普鲁士国家哲学的熏陶，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作为庄园占有者的父兄们，与其他职业者们区别开来。”^①而且它的中下层成员，显然也不能由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来担任。因为文官系统毕竟与军队系统不同，在军队中对士兵往往只需要纪律、服从和勇敢，而在文官系统里，即使是最下层官员也需要管理上的知识、技能和办事效率，因而只能由受过教育的人来担任。国家管辖范围的扩大迫使着官僚来源的扩大，但是这种受过教育的人，除了能来自贵族家庭外，就只能来自其他财产占有者家庭，正是在这里，那套“普鲁士体制”被突破了。

王室领地的日益扩大，也同样需要人去经营。自从威廉大选侯以来的各代君主，为了平衡土地贵族和军方的势力、增加国库收入需要，都根据中央权力行动自由的原则，有意识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王室领地只委托给非贵族出身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承租人。正是王室的这种首创精神，才导致了一种真正的乡村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且也正是从这些人的子弟中，以及从那些投资于工商贸易业的、当时数量还极为有限的市民家庭的子弟中，筛选出官僚集团的补充力量。尽管这些人的数量最初还是有限的，即使在占据官僚集团中下层的全部岗位上，也还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从突破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75 年版，第 104 页。

“普鲁士体制”上讲，意义是重大的，它说明普鲁士的文官集团毕竟开始与新兴市民资产者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了。而且由于这些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也终于获得了国家公职人员资格，并能免服兵役和减免纳税款。这种出身、经历和特权，不仅使他们与现存统治秩序达成了和解，同时也将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些培养他们成长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们，从感情上带入与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的一种“利益共同体”之中。而这些市民阶级的子弟代表着受过启蒙的普鲁士市民社会最早的公众，这支公众的队伍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补充新的力量。

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文官们的经济待遇得到了法律上的终身保障，这一点来源于腓特烈大帝“开明专制”中吸引其他邦国精英人才的动机。因此，普鲁士的文官们不至于因提出了不同意见或是反对国王的某项主张便导致衣食无着或杀身之祸，这不同于军队中那种对命令只有服从、不允许讨论的气氛。这不仅使他们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而且使他们有了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一种普遍进行政治讨论的气氛，甚至使国家官僚的圈子具有了一种“替代性国会”的功能。^①这个集团在君主专制主义政府的表象下运转着，并日益企图限制君主个人的活动余地。

总的说来，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都是贵族利益的体现，但是除了成分、气质上的区别外，还有着功能上的极大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它能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土地贵族大地产以及军队相平衡的政治因素的主要原因。军队与武官集团的建立对中央权力的巩固，当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贵族们建立中央权力的目的，只是希望这个中央权力能在对外问题上保证他们更好的商业机会，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依赖于远程贸易的，而不是为了制造出一种中央权力来限制自身的地方性权力。因此，他们更多体现着的还是地方性的封建统治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前现代化”的统治关系。这一点已经从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871》，斯图加特，1982年版，第120页。

庄园主自治与军事体制的联系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文官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央权力的体现。“官员是国家的公仆”，是腓特烈大帝的一句名言。而且这位国王也将自己标榜为“国家第一公仆”和“公益的保护者”。^①而黑格尔则是这样为普鲁士官僚集团下定义的：

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它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②

这种国家和社会普遍利益保护人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不仅代表着贵族的整体利益，而且也是要反对地方贵族的局部和特别利益的。他们宣称自己有权取代那些完全陷于腐败之中的土地贵族的代表，而且也的确在超出王室领地以外的省一级区域里采取这种行动。他们坚信社会关系的可塑性，相信现存国家通过有目标、有效率的干预，能够控制和操纵社会发展方向，能够造就一种对社会结构转变必不可少的适应能力，因而也就无需去改变国家和社会传统的权力分配。因此，他们不仅能在政治调节的实践中不断地伴随这场社会转变，而且也经常“率先地采取行动”。这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的独立性，也恰恰使他们成为了这个新兴强国能对时局作出有效反应，并能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发动机。

这个集团积极主张进行“开明专制”的改革，采取宽容政策，实行相对的法律平等，剪除封建弊端，发展工商业经济、福利和教育。但这种“开明专制”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不仅是为了邦国间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围绕着内政上两个彼此相关的目的进行的：

^① 赫尔穆特·馥·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 1984年版，第 540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科隆 1984年版，第 523页。

其一，使王室能分享经济上的繁荣，从而为中央权力的强化以及这个官僚集团的发展获得新的财政来源，因为这部管理机器的费用相当部分此时还必须由王室自己来支付（贵族们提供的仅仅只是军费）；其二，扶植、培养一支市民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对宗教上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宽容政策以及对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萨尔茨堡路德教徒的接纳、安置政策的背后，也有着这种动机：想培植一个具有专门知识和企业家经历的、有能力的资产阶级，来发展一种具有平衡功能的社会力量，以便能抵消地方贵族对中央的独立性，并强化中央政权。”^①

当然，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代中，这种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中央集权化的官僚集团自身的发展和巩固服务的，为现存统治关系的稳定服务的。腓特烈大帝十分清楚，中央集权的强化仍然取决于贵族能否从这种强化中获得更好的利益分配。因此，他在 1763 年所制定的“基本原则”中（这些原则在 1764 年成为了他的政治遗嘱），关于贵族仍作了这样的规定：“国家主权的政策目标在于维护它的贵族。”而关于资产阶级则规定：“他们能够在工商贸易上投入他们的资本，但不允许他们获得贵族的庄园和地产。”^②

但是，这种对贵族利益的维护，并不意味着这个官僚集团只着眼于父兄庄园的狭小利益。远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他们便已提出这样的口号：“唯有通过改革才能避免革命，才能保证国家的前途，也才能真正保证贵族的未来！”与此同时，他们又拒绝农民按自己的要求来进行“农民解放”，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很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763—1764》，斯图加特 1963 年版，第 171 页。

② 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格尔默尔林 1963 年版，第 130 页。

容易引起政治上的骚乱。”^① 而当农民起义发生的时候，这个官僚机器总是毫不犹豫地采用军事手段来镇压。总之，在努力将自己变成一支独立的解放力量的同时，这支官僚队伍又是反对其他的力量成为独立和解放力量的。

在普鲁士，与德意志各邦国一样，未能出现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诸如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的分裂，以及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同法国市民资产阶级相比，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在政治上也不够自觉等原因外，也要归因于官僚机器的效率、廉洁、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治理作风，以及开明专制主义的成就。因为这不仅使这里的王朝比法兰西王朝更少腐败和无能，而且也使得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权力受攻击面较之波旁王朝的旧制度要更小些。

在结束这一章节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德意志理性的现代化是进步的，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官僚制度也是相当现代化的，甚至是具有开创性的。但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工业化技术方面，在市民资产阶级的发展方面，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方面，整个德意志空间都是落后的。因此，不是经济上占有财产的市民，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成为了德意志的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又是与官僚集团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政治上面对着的封建传统力量则是强大的。因此，尽管有一种普鲁士官僚主义的、部分也是反封建的改革，但是在这里也与其他德意志诸邦国里一样，整个社会仍然是以对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封建贵族——的服从为基础的。贵族，首先是容克土地贵族，却是一支在中央具有军事功能并在地方上行使着政治统治功能的强大的“前现代化”力量。社会能动性的力量，不仅从法律上讲，而且从事实上讲，都是很小的，而顽固的分裂力量则是强大的。这样，在整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页54~55页，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55页。

个德意志空间里，既没有出现像法国那样的民主革命形势，也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工业革命形势，倒是出现了一种哲学革命形势。而那个受过严格教育的、有市民成分参与的普鲁士官僚集团，不仅在为权威的君主专制国家履行义务，而且也在为正在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履行义务，它的改革与固守，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双重性，使它处在一种矛盾的位置上。在这个时代里，它倒向何方，以及它的现代化改革倾向的强弱，都首先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因此，只是当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席卷欧洲大陆的时候，普鲁士才终于在这个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实现了向新兴工业世界现代化社会的突进。



第二章

向现代化社会的突进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与普鲁士的改革

德意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尽管可以从宗教改革的社会影响以及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道路中找到起点，但是，向现代化社会突进的根本推动力，不是来自这个社会本身，而是来自它的外部。面临法国政治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冲击，普鲁士以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封建社会和专制国家的深刻变革作出了回答。

这场改革需要完成的任务是艰巨的：第一，集中和加强国家机器的贯彻力，使国家权力在反对封建性地方分裂统治方面更有理性，更有效率，从而能从内部真正开创直到每个居民那里的国家主权。第二，将它充满地方政治独立性的空间合并成一个统一体，并使之一体化。第三，用法律平等的市民社会来取代旧有的封建等级社会，并根据整体利益的原则，将个体的力量从封

建团体性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同时也从国家的监护下解放出来。这也涉及到将臣民变成公民，克服国家、社会、政府和民族的分裂，从而为造就一个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民族国家准备基本条件。

这场革命性改革的能动力量不是广大群众，也不是市民资产阶级，而是官僚改革派，他们是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将自己作为反对所有分裂性利益的“普遍阶层”来感受，也正是他们在履行着权力、理性、“公益”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义务。总之，他们想造就这个市民社会的新国家，想用彻底的官僚统治来取代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

一、冲击与反应——“自上而下”的改革

欧洲政治决定着德意志民族的命运。革命与改造，战争与征服，剥削与压迫，帝国与新秩序，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的新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主义世界的政治原则，也正是通过法国大革命才得以确立的。对德意志空间来说，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无论愿意与否，都被打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烙印。德意志旧秩序的彻底崩溃，也正是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在这种外来强权政治的压迫下，在这种军事帝国主义的局势中，才成为了真正的经历。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老帝国，曾经稳定过欧洲的现状和均势，维持过德意志地方分裂势力的共存，调节过、阻止过它们的冲突，也稳定过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老式的、早已没有什么真实权力的、分崩离析的帝国，因而已不可能在欧洲政治关系的这场革命化中死里逃生了。法国革命军队的强大攻势，德意志内部对立的瓦解力，普、奥“二元主义”以及各诸侯国对主权的追求，帝国教会、帝国贵族、帝国城市的分裂式统治组织——所有这些，都毁灭着它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征服，扫荡了那些版图狭小、自成体系、不受外部影响和感染而又具有独立自律性的地方分离主义的小诸侯世

界，并在这些地方贯彻起一种国家的理性主权和一种社会上合法关系的均一化。自 1791 年以来，莱茵河左岸地区已处于法国的统治下。1796 年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便开始了对德意志整个版图的全面新塑造，数百个邦国复杂的政治地图被简化了。它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第一，一系列的小诸侯国被剥夺了帝国直辖地位，僧侣贵族领地也在“教产还俗”的运动中被世俗化，总之，它们作为政治上的实体被废除了，因而也带来了老帝国旧秩序的瓦解；第二，在德意志南部和西南部，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则通过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而得到了巩固，如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以及拿骚等 150 多个诸侯国成为这种新秩序的巨大获利者。但是，这些中等国家的“主权”是依赖于法国的，也是按法国利益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因此，只是法国霸权的工具。

拿破仑于 1795 年 10 月 1 日在奥斯特里茨击败奥地利，并于 1797 年 10 月 17 日建立起由他本人为最高保护者的欧洲攻守同盟——“莱茵同盟”。这个同盟将拿破仑法国的霸权，德意志中等邦国的“主权”，老帝国最终的瓦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798 年 10 月 1 日，最后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弗里茨二世放下了他的皇冠，这个千年帝国终于寿终正寝。因此，从拿破仑战争的一个效果来看，法国革命军队粉碎的正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占主导地位的“神圣罗马帝国”。

普鲁士尽管也曾在 1793 年到 1795 年间的拿破仑战争中火中取栗，扩大过疆土，但是，在 1797 年 10 月的耶拿大战中，拿破仑的军队粉碎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致使这个新兴的德意志强国也陷于崩溃。通过 1797 年 10 月 1 日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尽管作为国家仍被保存下来，但易北河以西的威斯特法伦被强行并入了由法国统治的“莱茵同盟”之中，并失去了它在最后一次瓜分波兰中的所得。这个欧洲以及德意志的大国下降为一个三等国家。

拿破仑帝国的“大陆体系”实际上将德意志人居住的空间划分成了四个部分：普鲁士，奥地利，以及组织在“莱茵同盟”之中的、由那些中等国家组成的“第三德国”，至于莱茵河左岸地区

已经成为了法国的领土。拿破仑推行的反英“大陆封锁”政策，更是给这些不同的德意志区域的经济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影响。归并到法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通过与法国领土的联结而获了利。“第三德国”地区，尤其是莱茵河右岸与萨克森地区，由于借助这场封锁摆脱了英国的竞争，因而在纺织业中出现了强烈的上升势头，莱比锡甚至成为了中、东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奥地利由于农本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所受的影响无论从哪个方向上讲都是不大的。而“大陆封锁”政策却对普鲁士造成了致命性的威胁，因为容克地主以及霍亨索伦王室赖以生存的远程粮食出口贸易遭到封锁，致使普鲁士的财政陷入了危机，但普鲁士还得向法国缴纳沉重的军税。总之，这个农业社会过去那种“再版农奴制”的新旧杂糅的运行方式，终于在新生工业世界引发的历史性冲击面前失灵了。整个普鲁士官僚集团上层都普遍意识到：“旧世界已失去了魔力，它已不再适合我们了，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用类似的方式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更新。”^①

时代的新要求就是：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必须根据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原则，剥夺封建等级体系的合法性，必须用高效率的工业化社会去取代低效率的农业社会，必须将德意志民族从异族占领下解放出来，完成统一大业，并跻身于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强国之列。正如官僚改革家冯·哈登堡在 1807 年的《里加备忘录》中所讲的那样：

这些原则的力量如此巨大，它表明：还没有采纳这些原则的国家，要么走向没落，要么必须使自己强制性地接受这些原则，若要反对这种时代的基本趋势，那就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②

① 维尔勒·魏登菲尔德：《德意志道路》，柏林 1964 年版，第 106 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 1988 年版，第 106 页。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横向冲击使德意志空间的落后性充分暴露出来，并推动着德意志历史的纵向发展，外来现代化的强制性已动员起普鲁士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志，并给予了它根本的贯彻力。

拿破仑法国显示出一个步入了工业世界的民族所能达到的强权国家的水平。这一点固然在普鲁士引起了对法国现代化效率的钦佩，但它的胜利也在德意志唤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要求与作为侵略者的法国、也是革命的法国作明确的划界。这就为普鲁士—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事先扳好了道岔。改革家卡尔·冯·斯泰因首相这样写道：

我们无需去摧毁所有的老传统，而是必须对它们作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我们不仅反对那些民主的空想家，而且也反对那些诸侯专横权利的捍卫者。从现状中，我们能发展起这样一种局势，它既不会砸毁一切，又能超出原有结构的气氛不断上演新的剧目。上帝将保佑德意志民族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诸侯专横，反对异族侵略！^①

因此，毫不奇怪，与“莱茵同盟”的国家不同，在那里，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法国式的民主思想为指导的，也是作为异族占领者的思想意志来强行贯彻的。而在普鲁士，改革运动是以康德哲学伦理道德的“自由”观念为指导的，这种“自由”观念是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观念有区别的。

康德哲学中对自由的政治理解，有着比法国的自由概念更多的含义，康德认为：

自由不仅仅是摆脱封建团体性强权的个人自由，追求自我

^① 米歇尔·萨勒夫斯基：《德意志人与革命》，哥廷根 1959 年版，第 156 页。

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国民不应只是官僚机构救济、关照、帮助的简单对象。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而不是个体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①

因此，在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中，首先在政治上导致了与法国模式的一种明显距离。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正义、义务、秩序”，成为了普鲁士—德意志现代化道路的口号。

但是，在经济思想上，普鲁士改革运动却导致了一种对英国模式的倾斜，但同样具有强烈的与德意志历史传统相联系的特点。官僚改革家们尽管也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承认“个人经济积极性的发挥和竞争是使生产率不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但他们同时也强调：“释放个人利己主义潜力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公益’的发展。”^②在这里，“公益”，是只能作为巩固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的利益，而不能作为人口大众个人利益的总和来理解的。

无论怎样，1807年开始的斯泰因—哈登堡改革成为德意志走进新兴工业世界的关键所在，因为它标志着普鲁士在秩序与进化的轨道上，通过君主制—官僚国家的强大权威，已开始彻底废除封建农本经济的生产关系，发展现代工商业经济，并直接跻身于这个新兴工业世界之中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成败决定着德意志未来历史的走向。

二、国家管理机构的现代化

当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被粉碎，容克贵族的经济基础受到致命性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 1989年版，第 384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 1989年版，第 384页。

威胁的时候，一个普鲁士官僚们进行大改革的时代也就到来了。这不仅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且也是因为因为在普鲁士内部，那支过去与官僚集团相平衡的，由土地贵族大地产、军方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战争的失败中和战后的封锁中受到了削弱，甚至连君主个人的权威也受到了损害，因而也就为官僚集团贯彻自己的方案提供了必要的、也是更大的活动余地。

全面的改革措施是与国家政治结构的新秩序、与权力分配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要依靠国家管理机构才能推行的，因此，对国家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改革获得了优先权。

在1806年以前的普鲁士，并没有一种真正能贯彻到底的、统一的国家统治，也没有共同的国家组织体系和通讯体系，更没有共同的国家财政制度，有的只是各省、各地区自己的实际统治者。在首都柏林，除了中央政府的大臣班子外，国王还有他自己的枢密院，它是由国王私人顾问班子组成的委员会。这个枢密院班子的作用在于，防止具有独立化倾向的官僚集团摆脱君主个人的控制。特别在腓特烈大帝去世以后，国王威廉三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上也是通过这个班子来行使他真正的决定权的。长期以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非理性的、君主私人的专制独裁体制一直引起了高级官员们的不满和抗议。

1807年改革开始以后，斯泰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废止了这种枢密院与中央官僚机构的并立统治，并用一个根据部门管辖原则划分了不同职能的、并由各部组成的中央政府来取而代之。这是一个由内政、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部的专职大臣组成的领导集体。^①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中，各部门不受平行机构的干扰，直接对国王负责。这种“内阁大臣责任制”使这个君主独裁专制国家彻底变成了官僚专制国家。国王只有与大臣一起，并通过他

^①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7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0页。

们，才能进行统治。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已不再是君主的私人组织，它奉行着“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并力图通过兵役义务、纳税义务和受教育义务，将国民与国家联系起来。

全国被划分成不同的行省，它们由分别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根据管辖权限划分了职能的官员们组成的地方委员会（政府）来管理。这些来自中央的官员，不是根据法国样板隶属于一个拥有全权的省长领导，而是在一种同事友好的气氛中通过讨论来寻找一致意见。地方行政长官仅仅只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联系的桥梁，他并不拥有全权。因此，行政与司法自然形成某种程度的分离，对地方财政的支配也需要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内部讨论来自我决定，这成为普鲁士地方管理上的一个特点。

这样一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县一级的贯彻，只是在王室领地上获得了成功，从而使这个区域内的管理机构国家化了。但是，在容克贵族的传统统治区域里，这种国家化的管理，仅仅贯彻了四年，就因贵族的抵抗而告失败。迫于来自容克地方势力的压力，哈登堡被迫于 1791 年作出新规定：这些区域的县长候选人得从地主庄园占有者中产生。因此，容克土地贵族的地方权力得到了巩固，他们反抗这个官僚主义国家和这个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基地得到了保留。

但是，斯泰因于 1791 年 1 月 13 日颁布的《城市管理条例》带来了城市自我管理的新秩序。它体现了斯泰因的“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民族联系起来，在市民自由的基础上建造国家”的改革思想。斯泰因的助手、《城市管理条例》的起草人约翰·戈特弗里德这样写道：

人们必须使这个民族习惯于自己领导自己的事务，并从孩提状态中走出来。随着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人们对公益的兴趣，以及公共活动的吸引力便会发展起来，这将会提高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政治秩序并不是以国家与个体的简单的相对地位为基础的，而是以大量的中间性权力力量为基础的，这种权

力力量的基础就是城市。^①

因此，《城市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上标志着普鲁士现代市民社会形成的开端。它表明城市已开始从国家的监护下，从军方的干预下解放出来。它自身已拥有完整的自我管理权：它能自行决定对市民的纳税，决定市民对公共事业的出资，并在警察事务方面成为了国家委托的机构。同时，这种城市自治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城市内部秩序的基础上的，城市的市民不再根据出身来判断等级身份，城市议会也不再以行会团体为单位，而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来自由选举产生了。议会的任务是任命市政府成员，监督行政管理，因此，城市管理也是建立在分权制原则上的。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城市管理的现代性。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也并非每个居民都是市民。人们必须申请市民权，这种市民权尽管不再根据出身和是不是行会会员来决定，但它与在城市里居住时间的长短，有无家庭住房，是否从事工商业活动，是否受过教育等条件相联系。因此，不仅传统社会的等级残余依然存在，而且一种新的阶级划分又开始了。市民参与权也是首先与中间等级、私有财产占有者以及受过教育的阶层联系在一起。

但是，正是在这种对市民自由参与权承认的基础上，随着1808年10月10日《工商敕令》的颁布，行会的垄断与特权被彻底废除，人人都有权经营工商业了。1808年11月1日的《税务令》又宣布：企业的开办只需要以获得“抽税许可证”为前提。所有这些都为“善变的冒险者”提供了成为市民的机会，也使市民们具有了更强烈的发展工商业经济的动机。这也正是官僚改革派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国家财源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代表中央权力的官僚机构力量的增强。与此同时，城市在普鲁士也开始发展成市民资产阶级自由运动的家乡。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1988年版，第387页。

《城市管理条例》在二千居民以下的乡镇中贯彻，由于遇到老贵族们的顽强抵抗而失败。尽管人人有权经商这一点在城市与乡村不再有区别，但是，城市与乡村管理上的区别仍然作为 19 世纪普鲁士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被保留下来。

三、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无疑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也是涉及面最广泛的改革，因而也是一场真正的社会改革。这场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法令和措施，使广大农民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从封建徭役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改革运动，在德意志历史上也被称之为“农民解放”运动。

这场“解放”运动有着它多重的目的：从政治上讲，国家官僚机构力图通过这场“解放”运动，来贯彻一种能直接到达每个臣民那里的国家干预，以反对封建性的中间权力——地方容克势力。从道义上讲，正如斯泰因所云：“只有在农民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完善国家和社会，并使之真正成为道德的国家和社会。”从经济上讲，“唯有让农民成为土地和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率，因为徭役制度比起自由的雇佣劳动来讲，是既缓慢又不经济的”^①。但贵族家长式的“农民保护”阻碍着企业统一体的形成，主人的“教养责任”妨碍着更合理的劳动组织方式的贯彻，而且这种“保护”、“教养责任”，也因为需要救济受到拿破仑战争损害的农民，已大大加重了负担。总之，官僚改革派不仅想使农民摆脱封建负担，成为国家的纳税力量，而且也想使土地贵族从过去那种非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自由和所有权”、“理性的农业经济”成为了这场社会现代化改革的口号。

实际上，在 1807 年改革前，普鲁士的农村关系早已处于变动之中。在国家官僚机器能直接施加影响的王室领地上，不仅那些资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7—1848》，斯图加特 1982 年版，第 230 页。

本主义性质的承租人早已成为了真正的乡村资产阶级，而且封建的徭役制度也在 1806 年被取消。这意味着东普鲁士的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的 萨克森的农民已获得了解放。^① 而在庄园自治区域里，尽管容克大农庄已在资本主义化，庄园贸易已在瓦解着家长式的关系，实物地租也在变成货币地租，但是，只有很少的地主愿放弃封建徭役制度和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这些问题上，绝大部分地主仍然还在作前资本主义的思考：“投资是一种损失，徭役是一种不花钱的赢利手段。”^② 因此，只是当 1806 年的崩溃完全改变了局势后，官僚改革派们领导的“农民解放”才真正获得了机会。

两位首相任期中颁布的法令构成了这场改革法律上的内容。首先，在斯泰因首相任期内（1806 年 12 月至 1808 年 1 月），通过 1806 年 10 月 29 日颁布的《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规定了自 1806 年圣马丁节起必须废止一切人身隶属关系，货物交易完全自由以及职业自由。任何人，无论是贵族、市民还是农民，都能自由划分、抵押、买卖土地。因此，从原则上讲，“农民保护”已被取消，对小农土地的归并也成为了可能，尽管需经国家批准。这个著名的《十月敕令》标志着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开端。随后斯泰因又颁布了多项有关“农民解放”的法令，如 1806 年 10 月 28 日颁布的《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1808 年 1 月 1 日颁布的关于限制容克贵族随意侵吞农民土地的所谓《二月法令》等。但是，斯泰因因外交事件而倒台，对这场“农民解放”运动是一个不幸事件，因为他与他的助手们所追求的“使一个强大的农民等级兴起”的目标能否达到，是取决于这些法令的坚决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06—1815》，慕尼黑 1952 年版，第 109 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 1952 年版，第 109 页。

彻的。^①

而在哈登堡任期（1794年6月至1798年6月）内，容克土地贵族反对派的力量已经集合起来。这个集团出于利己主义动机，顽固地捍卫着现状。他们将封建土地所有权、徭役制度以及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都解释为“私有财产”，并要求每一种让步都必须让农民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现代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原则现在却首先给封建权利带来了好处。这种利益上的要求，通过地方等级机构，通过他们个人和家庭上的关系，迅速地组织起来，也自然地渗透到政府官僚阶层中。因此，哈登堡尽管在继续着斯泰因的改革路线，但是，他现在必须考虑到这个迄今为止一直是最强有力集团的抵抗。1797年9月9日颁布的《调整敕令》，表明哈登堡向容克贵族反对派的一种屈服，因为这个敕令提出的所谓以“赎买方式”来解决农民封建义务的规定，是明显有利于贵族的。根据这个规定，农民们必须用土地转让或缴纳现金的方式来补偿庄园主。因此，《调整敕令》的出台，阻止了一种法国式的快速、简单的解决方案，并最终决定了普鲁士对渐进式方案的选择，同时也使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这种处理程序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了。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而也将这场“农民解放”运动的历程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具体结果是清楚的：

其一，这场全面农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使普鲁士在瓦解封建农业秩序方面成为了全德意志（且不谈被法国吞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先锋。正是这个德意志邦国的国家机器，最先贯彻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原则，来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千年传统，因此，这不仅从政治上增强了国家中央权力的力量，而且也从经济上使这个国家中央成为了这场改革的最大得利者。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资本主义的胜利，给全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①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7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1页。

其二，容克地主成为了这场改革最为直接的获利者，因为他们从农民那里获取了大量为自由而必须缴纳的赎金，甚至在“田亩归并”措施中，趁机扩大地产，建立起完全采取雇佣劳动制的资本主义农业大企业。因此，普鲁士既没有形成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由自由农民占统治地位的乡村社会，也没有形成一种像英国那样的完全由大地产所组成的乡村社会，而是形成了一种由自由农民与容克大地产并存的乡村社会。与此同时，也与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愿望相左，容克大地产们在直接利益领域中仍能长期保持诸如世袭司法权、警察权、打猎权、免税权等社会和政治特权。因此，在这场经济秩序的全面转型中，这个传统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未真正动摇。这也正是官僚与贵族之间一场政治妥协的产物，并将给普鲁士以至整个德意志未来的政治局势的发展，带来特别深远的影响。

其三，这场“农民解放”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以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为方向的，这也是普鲁士这场大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释放所有的生产创造力和个人力量正是改革者的首要目的。从法律上讲，它反对所有封建财产所有制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取代这些束缚的是经济自由。对于被解放者来说，每个人都得根据“个人自由行动原则”来发挥他个人的潜力，以便能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他自身的位置，并尽力填充它。竞争是属于这种自由的，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推动个体发挥效能的手段和条件，同时也是对社会整体产生实用性的手段和条件。随着行会制度的彻底废除和工商业自由的宣布，当农民能通过“赎买”封建义务的方式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后，也就同时获得了人身自由、结婚自由、买卖自由、择居自由、择业自由。这种种自由，以及所带来的胆量、能力、成效、流动灵活性，开始了一个逐渐取代那个由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世袭等级社会的进程。当然，这在普鲁士，还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艰难的进程，但它的冲击方向无疑已被确定了。随着农民被放逐到市场上，普鲁士也开始被导向了一个讲究效率的职业化社会。

固然，在这个时代里，在普鲁士，就像在所有其他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那样，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不一样的，经济上占有

的不平等更是构成了新阶级、阶层形成的法则，成效也是依赖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机会的。因此，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机会均等，而是使普鲁士开始走向一个现代阶级的社会，并且由于国家对容克贵族封建传统特权的维护和捍卫，这个现代阶级社会与封建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残余还要长期重叠在一起。但是，随着 1806 年就已开始进行准备的税制改革的开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普鲁士就废除了境内的所有关卡和关税，一个邦国内部统一的商品和雇佣劳动市场，以及一种相对自由的竞争局面已开始形成。所有这些，在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中，都是都市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的基础。

四、军事改革的推行

军事改革的出发点是 1806 年“耶拿之战”中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导致这场失败的原因在于它的内部结构。按照“普鲁士体制”建立起来的这支旧式的职业常备军是容克贵族军官们的天下，而士兵们，即农家子弟们，只是作为无意志的主体而存在的。这个有着自己内部的警察、司法、教会机构的“国中之国”，也是完全孤立于社会的，在上下级关系上，体现的也完全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而它的对手，法兰西军队的成员已不再是臣民而是公民了，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作战动机，因而也是一支充满民族爱国主义战斗热情的军队。

普鲁士的战败表明，要完成“解放战争”胜利的任务，普鲁士就需要一支新型的、现代化军队，需要一支处于新的精神、新的组织和新的政治状态之中的军队。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等人的核心思想就是：“将军队建立在民族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动机上。”这就要求改革国家与臣民的关系，将臣民变成公民，使他们变成有人身自由、独立性和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正如格奈泽瑙所指出的那样：“普鲁士必须建立在武装、科学、宪法三个优先条件之上。”^① 因此，农民解放、废除等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15》，慕尼黑 1988 年版，第 261 页。

级特权、自我管理、教育改革与军事改革都是彼此相联系的。

1794年开始的军事改革首先从根本上取消了军队中的鞭打体罚制度，同时也废除了普鲁士军队中唯有贵族子弟才能担任军官的特权，并规定了平时选拔军官的“知识、教育、实际能力、成就、考核”的原则。常备军军官的选拔开始对市民开放了，然而这种开放，由于保守主义贵族反对派们的抵抗，在实践中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老容克军官团，作为一个集团，获得了对常备军候补军官的挑选权，他们仍然是按旧有的贵族准则来行事的。因此，老军官团仍然得到了保留，而市民因素的有限渗入，并没有能迅速造就新的常备军军官团。

1793年设立了国防部，同时，一个作为它的分部的总参谋部也被创立出来。这个部门的创立，它的效率，成为了普鲁士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贡献。1794年12月还引入了现代的《普遍兵役制》，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建立战时后备军（实为一种地方自卫队）。按规定，成年男子18岁后皆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役期为三年，但两年在战时后备军中服役，一旦国情紧急，16岁以下的男子需应征入伍。受过教育者可自愿入伍，只需在战时后备军中服役一年，便可成为战时后备军的军官。这样，能否成为战时后备军军官便与是否受过教育、是否上过专门学校联系起来。因此，除贵族军官学校外，候补军官学校也作为培养军官的基地随之建立起来。

通过这场军事改革，对群众而言，当兵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服兵役成为个人活动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也就是说，每个成年男子都通过服兵役这种国家的军事要求而与国家联系起来。服兵役，从原则上讲，如同纳税和受教育一样也成为了现代化的一种体现，这是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由于官僚改革派立宪运动的失败，军事改革派们下野，作为普鲁士军队核心力量的容克军官团仍然是老式保守主义的，也仍然是只忠于君主个人而不是忠于国家的，因而也就将这种现代普遍兵役制与君主独裁的权威联系在一起了。它使得普鲁士的君主不仅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这样一支军队去反对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运

动，而且也能通过这种兵役制，甚至比法国的雅客宾政权和拿破仑政权更充分地使这个社会军事化。因此，普鲁士军事的局部现代化，恰恰成为了普鲁士—德意志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沉重负担。

五、教育体制的现代化

《堤尔西特和约》后不久，普鲁士政府便举行了关于经济困境与发展教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对刚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这样讲道：

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国防大臣格尔哈特·沙恩霍斯特也表示支持：“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①

国家与社会的革新，为教育与科学在这场大改革中赢得了中心性的价值地位。为这场教育现代化作出特别贡献的是哲学家费希特和新上任的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教育家洪堡。费希特将康德的哲学体系运用于教育领域，他首先指出：

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59年版，第 140 页。

无法预料到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被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则指出：“教育是个人状况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人的个性、特性的一种整体发展。教育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结束的过程。因此，接受教育是人的自身目的，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① 因此，一种崭新的教育和科学的观念——“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得到了贯彻，整个普鲁士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这场普鲁士教育体制现代化的实践中，改革家们在高等教育中是将大学与专门学院区分开来的，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又是将国民学校与人文中学区分开来的，也是将普遍教育与职业教育区分开来的；在教育方法上，则是将教师授课（~~灾~~普鲁士）与大学生研究式的学习（~~灾~~普鲁士）区分开来的。唯有一点是没有区别的，那就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在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国民教育的承办者和资助者的情况下开办的。^② 在“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的口号下，一种既复杂而又具有德意志特点的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它对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在启蒙教育学思想的指导下，为贯彻普遍教育的原则，一个遍布全国的公立学校网建立起来。这种公立学校（~~灾~~普鲁士）是公共性质的学校，但从机构管理上讲是属于地方性的。它在财政方面要由地方政府负担 ~~灾~~普鲁士 的费用，此外，才是国家财政提供的资助和父母为子女缴纳的学费。国家规定的学费之低，实为世界罕见。在乡村，平均学费每人每年为 ~~灾~~普鲁士 马克；在城市，每人每年为 ~~灾~~普鲁士 马克。它最初只是八年一贯制的学校，以后又分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灾~~普鲁士~~~灾~~普鲁士》，慕尼黑 ~~灾~~普鲁士 年版，第 ~~灾~~普鲁士 页。

② 托马斯·埃尔温：《德意志的大学，从中世纪到当代》，柯尼斯泰因 ~~灾~~普鲁士 年版，第 ~~灾~~普鲁士 页。

为一种四年制的国民小学（*国民学校*）与五年制的普通中学（*国民学校*）。一位儿童在 10 岁读完小学后，至少得在这种五年制中学里受完教育，才算完成了受教育的最基本义务。当然，若有条件，他也可以选择学制更长、更正规的人文中学或实验中学就读。

九年制的人文中学（*人文中学*）是根据新人文主义的教育纲领，在旧有的拉丁学校（以教授拉丁文为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新建起来的。国家任命校长，并负责向这种中学提供全部财政上的资助。但学费高昂，每人每年高达 150 马克，因而往往是富家子弟才能就读的学校。这种学校的教师由国家进行考核和聘任，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国家官员（*国家官员*）。唯有这种正规的国立中学毕业考试的合格生，方能进入大学。在普鲁士，这种中学已由 18 世纪的 1780 年所发展到 19 世纪的 1850 年所。

强调技术实用性的六年制实验中学（*技术实验中学*），则是交由城市市镇当局来筹办和管理的。由于学费上的特别要求，也首先成为了商人和企业家子弟们的一种学校。它集中开办技术、建筑等专业，并为技术高等学校提供生源。但这种实验中学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才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内的。

从 18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半个世纪里，整个德意志，首先是普鲁士，已经完全形成了一种互有区别的、三分轨制的中学教育体制。据统计，1850 年普鲁士 10 岁以上的青少年已有 1/3 在读，而到 1870 年这个比率已上升到 1/2 左右。1870 年，全国文盲仅占总人口的 1/3，其中大多数属居住在乡村中的老年妇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甚至与英、法相比（英国人口中此时还有 1/3 的文盲，而法国人口中还有 1/3 的文盲），德意志在国民普遍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领先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①

自改革以来，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国家还大力开办成人职业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9~1871》，慕尼黑黑 1983 年版，第 100 页。

学校。涉及各行各业的成人技校（大都属夜校性质）在 1818 年的普鲁士已达 1000 家。同时，为着眼于未来工业化的发展，国家在 1818 年开始兴办起三年制的综合型技术中等学校和商业学校。普通中学和实验中学毕业生能在这类学校继续深造，这类学校到 1825 年已有 100 余所。也正是在这类学校的基础上才建立起一批技术高等学校和商学院，这些高等性质的学院主要吸收的是实验中学的毕业生。总之，这是一场根本性的革新，它对于德意志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德意志工程师的职业化与组织化的形成，正是这种发展的结果。

六、现代化大学的发展

为普鲁士赢得更高国际声誉的是它的大学。大学的发展是更为紧密地与普鲁士的政治结构和“普鲁士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认为：

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①

大学在改革派官僚的意识中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原因如下：

其一，人们可以在 18 世纪“开明专制”时代中找到它的根源。官僚集团的成长本身就是与教育知识界的先锋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教育知识界普遍传播的是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即不是个人的出身、家族和等级，而是受教育的程度，应成为他社会存在的依据。因此，应根据成绩、才能和天赋来决定人们通向所有社会地位的入口，这种教育思想不仅与市民阶级的理想相一致，具有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825 年版，第 100 页。

鲜明的现代主义的性质，而且也影响了改革派官僚。

其二，这同时也是与一个“前工业化”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很少得到发展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的。由于没有一支强大的“占有财产的市民”的力量，因此，这个由官员、教育知识界的先锋们组成的所谓“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逐渐发展成能与土地贵族、军方相平衡的惟一社会集团。在文化分化和教会思想垄断瓦解的过程中，他们中的部分人赢得了传播启蒙主义新思想的知识界的意义。加之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德意志与传统世界的分离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而也带来了一批新的领袖人物，他们寻求通过普遍的原则、科学引导的理性来改造这个世界。这正是一个新型官僚阶层、一种崭新的科学观念、一种新型大学能够崛起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其三，在战败的普鲁士，局势显得特别严峻，贵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战败、贫困的国家在理性管理中对特别成就与效率的需要。因此，大学，由于其对官僚体系中接班人培养的特别功能，其地位自然变得更为突出，同时也使得对于教育精英阶层的需要变得更为突出。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教育的现代化和现代化大学的产生。

这种现代化大学的塑造显然必须与一种反对地方分裂化的理性国家的现代性要求相一致。这是因为“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普遍性，要求国家官员必须首先与传统国家的私人性、与经济上的市民性相分离，并摆脱地区观念的局限。因此，这就必须要求现代化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首先摆脱对出身的依赖和对工商职业利益上的兴趣，并根据科学的自我目的的普遍主义原则，根据科学的整体发展方向来支配行动。这样培养出来的受过教育的官员，才可能去创造现代干预型的、社会和文化管理型的国家。

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其功劳不仅在于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给出了有关现代世界中科学的定义，这就是著名的“洪堡五原则”：

(一) 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得出完全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找到的东西，完全性的结论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二) 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的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别开来。

(三) 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也仅仅只是第二位的。当然，对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可能导致最为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四) 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唯有通过对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交道，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生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个性，然后他们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五) 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孤独与寂寞~~）与自由（~~平等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①

不仅是洪堡，就连国王威廉三世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②

自 1810 年柏林大学开办以来，现代化大学随后在德意志 18 个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10—1848》，慕尼黑 1984 年版，第 207 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10—1848》，慕尼黑 1984 年版，第 207 页。

个邦国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普鲁士大学的模式已成为了全德意志，继而也是全世界大学仿效的样板。归结起来，德意志的大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洪堡建立的不是英、法式的专业高等学校（~~运动与竞赛~~），而是大学（~~战士的成就~~）。这个词本身来源于德语中的“~~战士的成就~~”，就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万有的、广博的意思。在德国，大学就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它与工科、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科学知识的推广和运用才是这些学院的任务，因而其地位和级别也是低于大学的。在这种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大学成为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正是从这里开始，人文科学才摆脱了神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对世界进行各种解释的自然科学新体系，才最后确立了它们真正的独立地位。

第二，在大学教授那里，形成了一种对自我角色的新理解。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去进行思考了，因为规定思考模式的学说，正是一种神学的特点。而现在，科学研究与学术探讨成为了教授们新的伦理道德和最高原则。不断地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向真理逼近，增长人类的新知识，这种对永恒的参与，成为了他们最高的道德义务，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一位优秀的研究者，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而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人在德意志的大学中是当不了教授的。总之，科学研究工作被职业化了，大学变成了研究者的共同体，从而开创了严格的成就原则。在大学的人事选择上，不是出于地方因素上的考虑，不是出于对同事的好恶，不是家庭地位和社会背景，甚至也不是口才上、写作能力上和教育学上的技巧（这些都属工科、师范教师的资格，而不是大学教师的资格），而是研究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成果，决定着大学教授位置的占有。

第三，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现代化制度和措施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只有教授才是国家公职人员（~~月亮与太阳~~，也即官员），同时大学设有编外讲师和额外教授，这些资格也必须经国家的考试来决

定。国家为这些年轻人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他们要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必须向已形成的舆论和权威挑战，必须冒着与他在学术上冲突的危险，必须要有科学研究上的真正突破。科学自由的精神大大促进了科学中的竞争与创新，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突破都是由年轻学者们完成的。而任何大学讲师和教授都不允许在同一所大学里升等，任何一所大学中的教师队伍，都不是主要由同一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人组成的，而是由来自各大学的佼佼者组成的。这不仅扫除了门户之见，而且也严肃了成果鉴定和职称评定上的科学性，因为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允许没有真才实学者取得与他们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同样地位，这是德意志人最先作出的防止近亲繁殖、裙带关系的现代化措施，后来也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大学中普遍推广开来。

第四，各邦国之间展开了艰苦的人才战，因此，凡不是因为学术水平而遭到驱逐的教授，在别的邦国总是大受欢迎的。柏林大学的著名学者舍恩莱因·奥肯因反对普鲁士专制而遭到了驱逐，便立即受到了巴伐利亚国王的热烈欢迎，并被聘为慕尼黑大学教授。普鲁士国王害怕有了这种样板后，会造成柏林大学的人才外流，便不惜重金将他重新请回柏林大学。柏林大学著名的神学教授路德维希·费尔巴赫，在这个神学失去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大反神学，普鲁士教育部曾想开除他。但身为国教教主的威廉三世犹豫再三，最后的决定是：“他既然已经不信神了，那就干脆将他调到哲学系去吧。”这样一来，又有更多的“青年黑格尔派”弟子们也都调到了哲学系。总之，德意志各邦大学之间的人才战，反过来使各邦的学者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更好的生活待遇，因而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学者们的能动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第五，这种现代化大学成为了德意志人才的收容所。大学里人才济济不仅是由于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了，而且也是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相联系的。通向其他社会领导岗位如管理、军事、政治的入口，由于事实上向贵族子弟优先权倾斜而强烈地受到了限制（尽管贵族子弟能否当官也首先取决于成绩），所以

对一般市民子弟来说，政治上发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因此，在科学上取得成就，并在大学中占据岗位，成为了对受歧视的市民的一种重要补偿。

第六，大学成为了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组织，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的文化代表。国家取代了教会对教育的作用，并对大学施加着决定性的影响。它负责对大学财政上的资助，并通过考试制度决定教师的任免。但大学内部的事务，如研究、教学、科研成果的鉴定等由大学自我管理。校长由学校内部自行产生但需经国家批准。教授的工资完全由国家支付，并享受着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因为聪明的国家统治者懂得：“经济上的压迫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思考的，虽然从事任何有价值的活动都是可以得到内心的满足的，但内心的满足不能当作工资，教授们是不能用他内心的满足来填饱他妻儿的肚皮的。”同时，大学里实行严格的退休制，不管你是什么院士，也不管你是什么奖的得主，到 70 岁的退休年龄，都得将位置让给年轻人，但退休后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作为对大学建设的支持，历来德意志国家的法律都作出过这样的规定：任何企业家若想减税，必须向大学提供资助。同时大学教师绝不容许从事第二职业。这些无疑都是英明的举措。德意志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可以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一位国家乐团的指挥家，若是在他 30 岁生日时，能得到国家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的头衔，那么他的一生就等于走到了光辉的顶点。^① 总之，社会分工化，这一现代化的标准和原则，在普鲁士，后来也在全德意志的大学中体现得最为鲜明。“一切都井井有条（*alles ist geordnet*）”成为了德意志文化和精神的重要内涵。

第七，现代化的大学本身要求大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的动机，接受教育是作为普鲁士国民，后来也是德意志国民的一种义务来强调的。“为谋生而学习（*lernen zum leben*）”在大学里是受人鄙视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民主与社会》，慕尼黑 1970 年版，第 100 页。

的，爱因斯坦认为：“这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我想得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会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的。”因此，他强调：“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①

第八，大学生的学习也有充分的自由。一名德意志青年，只要成为了大学生，他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学去学习，只要那所大学还有名额可以注册。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一年级在波恩大学，二年级在柏林大学，三年级到了耶拿大学，并最后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大学中既没有什么教学大纲，也没有什么“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分。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就可以去学什么。知识与科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没有什么界限。这种流动性和学习项目的选择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学生都有权，或有机会与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科学家讨论问题。大学实行的主要是讨论课（~~讲座式~~）教学法。大学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工作，自由进入图书馆，进行同学结伴式的自由讨论。使自己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这就是德意志大学生的惟一义务，而不是其他什么追求。爱因斯坦曾高度评价过这种学习的自由：“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名逐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啊！”^②

这种现代化大学的创立对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在此有必要做一个总结：

其一，普鲁士现代化大学的发展构成了普鲁士—德意志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通过连贵族子弟也不能逃避的严格的考

① 《科技导报》~~1980~~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第 1 页。

② 《科技导报》~~1980~~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第 1 页。

试制度，筛选出包括大量市民子弟在内的一批批管理国家的高质量人才，从而使普鲁士的官僚，这支因离乡背井而失去社会关系上直接血缘依靠的队伍，成为了一种既能灵活调动，同时又能用冷静的理性来引导的特权阶层，因而也为普鲁士向一种现代干预型、社会和文化管理型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二，普鲁士大学对“远离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强调，使教授与学者们发展成为一支与“占有财产的市民”相分离的特殊社会力量，这支力量的存在正是官僚改革派教育家洪堡精心设计的结果。洪堡认为：

教授与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科学的自由，作为精神上的内心自由，正是这种彼岸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但并不一定健康的东西。^①

这表明，国家是指望学者们能够发挥他们在对人的和谐发展的关注中、在科学研究中所蕴藏的那种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的。当然，对这支力量的过分理想化，自然是一种空想。这不仅因为大学并不是象牙塔，教授和学者们本身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因而也是各持不同观点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校正能否真正作为现实力量存在，最终也仍然要取决于他们的校正方案是否符合政治领导者的利益。因此，这支力量的存在，恰恰说明了知识界与国家官僚这两个被黑格尔称之为“普遍阶层”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立与合作。这种分立与合作对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大学教授们不仅为普鲁士的官僚机器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而且还在 1848 年革命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8—1849》，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337 页。

其三，在民族事务方面，以普鲁士的大学为模式的整个德意志大学体制，具有一种特别的现代化功能。由于各邦国和大学的多样性、虚荣心与竞争本身弱化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对个人的压力，由于科学本身的跨地区、跨国家的普遍性质，也由于各邦国之间并无语言障碍，因而从根本上促进了教授与大学生的独立性、能动性、灵活性和自由流动。因此，现代化大学恰恰削弱了德意志地方分裂的传统，并为德意志社会的民族统一准备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其四，科学与教育强有力的崛起，已成为改造生活与世界的最为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德意志人人为此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以下的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在生理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中，从1854年至1883年，德意志人取得了12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取得了9项。从1883年至1909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5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有8项。到1909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8项，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取得了11项。在热力学、电学、电磁学、光学的发现方面，1854年至1883年，德意志人取得了18项，英国与法国共取得了15项。但是从1883年至1893年，德意志人取得了16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只取得了14项。到1893年，德意志又取得了18项，而英、法总共只取得了14项。在医学领域的发现上，1854年至1883年，德意志人取得了12项，英国与法国总共取得了10项，而到1883年，德意志又取得了14项，已超过了同期英、法总和的10项。^①

其五，普鲁士以及全德意志的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为全人类造就出如此之多饮誉世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这恰恰是这个一向被视为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大学里贯彻“思想自由，科学自由，科学无权威”以及“远离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等原则的结果。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赫、叔本华、尼采、卡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54~1893》，慕尼黑黑1893年版，第123页。

西尔；历史学家兰克、莫姆森、斯本格勒；文学家哥德、席勒、海涅、格林兄弟；经济学家马克思、米勒、李斯特、罗舍尔、瓦格纳、佐姆巴特、艾哈德；社会学家韦伯、霍克海默、弗罗姆、曼海姆；数学家高斯、普吕克、雅可比、狄利克雷、黎曼、施瓦茨、康托比、克莱因、希尔伯特、闵科夫斯基、兰道、库朗；物理学家欧姆、韦伯、赫姆霍尔茨、克劳修斯、维德曼、布劳恩、伦琴、维恩、斯塔克、普朗克、爱因斯坦、劳厄、弗兰克、赫茨、博特、玛依尔、海森堡、泡利、玻恩；化学家李毕希、本生、费林、科尔贝、霍夫曼、迈耶尔、拜耳、瓦拉赫、费歇尔、奥斯瓦尔德、毕希纳、席格蒙迪、能斯特、哈伯、哈维尔、博施、威尔斯塔特、狄尔斯、温道斯、维兰德、汉恩、朗缪尔、施道丁格、瓦尔堡；生物学家奥肯、弥勒、韦伯、雷蒙、科赫、埃尔利希；医学家亨勒、朗格贝格、翁德利希、培腾利斐、比尔罗特、克莱布斯；天文学家弗劳霍费、阿格兰德尔、史瓦西；地理学家洪堡、赫特纳，所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与德意志的大学联系在一起。自1854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意志大学中就已产生出200多名获奖者，而数学家还不包括在内。1936年以前的德意志，无疑是全世界拥有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德意志能够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德意志的尤其是普鲁士的现代化大学体制。

其六，德意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更是与它大学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分不开的，它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而且是更重要的生产力”这个朴素的真理。甚至连法国科学家帕舍尔也认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科学上的失败。”他说道：“德国增设大学，在大学之间培植有益的竞争心理，尊重大学教授和博士，并给予他们极高的荣誉，为他们设立宽敞的实验室，配备精良的实验仪器，而法国则只顾革命，沉醉于理想政体的无益争论中，对高等教育只给予了偶尔的注意。”这种分析当然不无道理。而德国教育史专家埃尔温是这样对普鲁士的教育体制和大学作出评价的：“自那时以来，19世纪的普鲁士教育制度，已成为了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这

个世纪下半期跳跃式的德意志工业化发展重要的、也是后来经常被人们仿效的前提。而德意志的大学表达了这种教育体制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为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跨世纪的开端，它用‘科学’这个思想模式造就了它自己，并形成了它自己的基准点。”^①

总之，普鲁士—德意志现代化教育体系的确立，现代化大学的发展，不仅标志着德意志已成为了一个“教育的民族”，而且也为其迟到的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这场教育的现代化优化了它的国民，达到了提高生产率和纳税能力，带来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的目的。

七、对普鲁士改革的评价

1807年开始的由斯泰因—哈登堡领导的普鲁士改革运动是一场对传统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运动，它意味着普鲁士在现代国家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因而也是一场决定德意志历史命运的现代化运动。与“莱茵同盟”诸国家的改革相比，普鲁士的改革运动首先在民族道义上占据了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它不是异族统治下的产物，而是德意志人自身主动运动的结果，从而使普鲁士的改革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经济改革方面，普鲁士在促进经济自由竞争上也要比这些国家走得远得多，这些国家的农业改革还远没有走出开端期。而与那个对改革就像对革命同样感到恐惧的奥地利相比，普鲁士的先进性更是不言而喻，尽管一个不断崛起的普鲁士与一个事实上在不断沉沦的奥地利之间围绕着德意志空间的霸权斗争仍然是长期的。

普鲁士的这场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主义的预定性的现代化运动。一方面，它完全拥有经济自由主义的目标，国家决不想独揽所有的或是绝大多数的事务，而是想释放个人的积极性，并为社会经济的独立发展助产；但另一方面，它自然是以权威原则为基础

^① 托马斯·埃尔温：《德意志的大学，从中世纪到当代》，柯尼斯泰因1952年版，第151页。

的，更确切地讲，不是以一种革命的权威，而是以一种传统的权威和正统性为基础的。尽管这场现代化具有某种革命性和反封建传统性，但是从形式上讲，它仍然保持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特点。由于国家权威与强大的贵族之间的传统联系，使得这场现代化尤其在内容上受到了保守主义的影响。那些“前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以及那些“前现代化的”精英们——大地产与军队——不应受到损伤，“前现代化的”权力分配也不应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些都是官僚改革派们事先规定好了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场局部性的现代化。官僚改革派提高经济效率和国家管理效率的最终目的，也恰恰是为了在这个欧洲以及世界大变动的时代中能维持住那种“前现代化的”政治、社会的统治秩序，并将这场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不过它采取的不是传统的手段，而恰恰是现代化的方法。总之，对普鲁士官僚改革派来说，现代化只是一种自我维护的手段和确保国家主权的手段。

当这个现代化进程刚刚启动的时候，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普鲁士现代化目标与现代化手段上的这种矛盾对这个社会来说还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场现代化的头一阶段登场得竟是如此之早，以至于普鲁士连同整个德意志空间都不同于西欧，它是在还没有出现强大的市民资产阶级—工业化力量的情况下登场的。这种局势一方面使保守主义的权力因素从中获得了社会政治统治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这种权力因素从中获得了种种具体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由于官僚集团上层变革的主动性，使得在普鲁士，不是市民资产阶级，而是官僚改革派们成为了现代化改革的发动机、经济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民族统一的领导者。官僚制度专家治国的现代化、废除农奴制的社会改革、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及现代化大学的建立、军事体制的改造，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效率，从而也使德意志逃避一场英、法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成为了可能。

但是，现代化一旦被启动便不可阻挡，因为现代化的社会自律性决定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种一次性的历史进程。它将产生新的社

会压力、新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新的社会危机，它将迫使着这个国家必须继续不断地现代化，必须有更好的士兵、更好的学校、更发达的经济……而所有这些，都将必然会松散它的“前现代化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总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因此，当这个阶段一旦被启动，它实际上也就将启动者本身置于这样一种运动之中了：他得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压力下奔波忙碌，他得不断地采取革新措施，不断地现代化。一旦启动者——这个国家的官僚集团——丧失了学习功能、创新功能和改革功能，他就将被这个由他自己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怪物”——现代化——所吞没，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第二节 摇从德意志同盟到关税同盟

一、“维也纳和平”与德意志同盟

经过革命与战争震荡了 15 年以后，随着拿破仑法帝国的崩溃，欧洲老君主与贵族们弹冠相庆，欢呼他们排除革命威胁的胜利。然而，建立欧洲新秩序成为当务之急，1815 年 6 月至 1815 年 9 月，反法同盟的“四足兽”——英、俄、普、奥与战败的法国之间在

^①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06 页。

维也纳举行了长达八个月漫长的会谈。会谈的目标是在平衡政治的基础上重建一个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稳定、持久的欧洲和平。但这种和平不是以民族自由和自决，而是以国家和王朝的正统合法性为基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恢复革命前的“现状”，因为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欧洲国家关系的革命化已成为既成事实，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倒退回去的。但是，所有已获得政治上继续存在的国家，现在必须通过一个欧洲国际共同体，从国际法上取得合法性。

维也纳会议给欧洲政治关系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首先，它使英、俄、普、奥四大战胜国的联盟得到了更新，以确保欧洲不受法国的新冲击；为保证欧洲和平，它同时规定用召开欧洲会议的方式来澄清现存的国际问题。其次，欧洲大陆上的大国们结成了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设计中，谈论的是“一个全欧洲统一的基督教民族”，并将“君主之间的兄弟情谊”，而不是各民族的友好置于中心地位。^① 尽管“神圣同盟”并没有成为欧洲大国真正的政治工具，但它变成了保守主义、反革命复辟和稳定化政策的象征。

要对“维也纳秩序”进行历史评价，有必要突出以下几点：

第一，这是一种新的大国局势。在法国的霸权崩溃以后，这个时代的真正胜利者是英国，它的世界和海上权力通过这个欧洲平衡得到了巩固。同时它也是对这个平衡进行保障的大国，它拥有在大陆上的前沿地位，并统治了欧洲的销售市场。俄国已将它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河畔，并在欧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地位，但并未获得大陆上的霸权。法国尽管行动受到了限制，但其大国地位得到了恢复。奥地利尽管内部结构未能因现代化改革而得到强化，但在欧洲政治中仍拥有极大的分量，并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欧洲联合中都掌握着这个平衡体系。它在欧洲阻止着俄国，在德意志空间阻止着普鲁士，从而至少在原则上保证着这些大国彼此之间不发生对抗。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9-1871》，慕尼黑黑 1988 年版，第 144 页。

由于这个体系使它的影响以及它自身内部的跨民族国家的秩序得到了保障，因而它也是特别地靠这个平衡体系为生的。普鲁士则加强了它在德意志空间中的地位，但并没有达到它所想要达到的所有领土上的目标，因而仍然处于奥地利和俄国的阴影之下。

第二，这个欧洲新秩序也是一种复辟的秩序，一种诸侯和君主国家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运动、反对民族自决权的新秩序。由于这些国家现存的权力秩序、王朝的正统合法性从国际法上得到了巩固，因而也使每一种未来的改变都将与这个秩序相冲突。

第三，这个新秩序的任务及其结果带来了欧洲的长期稳定。在法国大革命使欧洲的国际关系革命化以后，欧洲的秩序是以各国之间的条约、义务、一致赞同和承认为基础的。它抑制着各国的权力野心和帝国主义要求，同时也抑制着现代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各种动力。总之，直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讲直到 1871 年，它都限制着欧洲的各种冲突。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阅·格鲁勒指出：“在这整整一百年里，欧洲是比它前一个时期与它后一个时期都有着更多的平衡、更多的和解、更多的稳定、更长久的和平的。因此它也为这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国际环境上的保障。”^①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秩序也是不应被轻易地评价为一场欧洲反动派的完全胜利的。

对德意志空间政治新秩序的设计是与欧洲新秩序以及各欧洲大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将德意志作为一个整体，并以某种国家制度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观点在维也纳会议上也得到了普遍一致的赞同。因为欧洲各大国政治家们担心：中欧若是出现一种权力真空，便会再度使这个地区成为欧洲和德意志各种势力解决利益冲突的舞台，从而导致持久的干预并破坏和平。然而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机会在 1871 年却并不存在。因为欧洲各大国的政治家们又反过来担心：这种方案会使德意志的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871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290 页。

力量团结起来并充满活力，继而同样会发展成为一种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一个民族统一的德意志大国出现在欧洲正中央。不仅英、俄、法等国，甚至连奥地利也反对民族统一的国家方案，因为一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将意味着对这个本身就是多民族的奥地利的一种肢解，而内部的跨民族国家体系正是哈布斯堡王朝生存的权力基础。而且所有以前的“莱茵同盟国家”，即中、小德意志国家也不愿意为这个民族国家式的统一去牺牲它们各自的主权。普鲁士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赞同这一方案，那就是由它来领导这个统一国家，而这一点对于其本身就是依靠外部盟国才能获得解放的普鲁士来说，尤其对它的政治家来说，还仅仅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没有提到政治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尽管这里的民族运动比其他德意志国家有更为激烈的发展。

为了让这种德意志的潜力能安静地呆在一个平衡体系内，就必须设计一种“德意志内部均势”。在这种设计中，两个德意志大国——普鲁士与奥地利——必须被纳入到一个联盟之内，成为这个联盟体系的“脊骨”，但又不允许它们或是单独、或是一起谋取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以达到让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牵制的目的，并利用这个稳定的中欧联盟来充当整个欧洲安全与稳定的“拱顶石”。同时，各大国都有义务保证这个联盟体系的边界。

因此，1815年10月21日，“德意志同盟”——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组织——成为了维也纳会议的产物。这是一个由39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和城市所组成的联盟。普鲁士与奥地利也只是带着它以前的帝国部分属于这个联盟。联盟惟一的组织机构是联盟会议（1815年10月21日），最大的国家普、奥也只能有2票，总共为12票。另外，还设立了一个拥有17票的联盟理事会，其中5个较大国家每国一票，一个简单多数就能通过决议。但是，关于各国事务以及宗教问题方面的根本性决断则需联盟会议全体成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因此，这只是一个相当软弱、很少有行动能力的同盟，严格地讲，只是一个具有某些联邦因素的邦联。由于它并没有行政、司法和宪法上的保护，而且在它的内部实

实际上贯彻着各国各自的平等主权，因此，它的存在，对于民族统一国家，哪怕是它的某种联邦形式来说，都是一种明确拒绝。

这个包括了“德意志同盟”在内的欧洲新秩序对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果：

首先，这个中欧“德意志同盟”是与国际秩序的利益形势相一致的，并确保德意志空间与整个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在德意志空间里，与一种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不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两级统治格局，即“德意志同盟”名义下各邦国君主的实际统治。在这个邦联式松散的民族集群中，尽管各邦君主能以同盟的名义联合众多邦国去干预某一个邦国的革命进程，但各自为政的邦国为了自己的存在又必须与其他邦国去围绕效率展开竞争。因此，某一邦国的现代化措施一旦出台，便立即会被邻近邦国所仿效。加之各邦国之间既无语言障碍，又无天险可据，人才流动得以加速，闭塞状态进一步被打破，这就导致了在没有外部国际环境负担的情况下，处于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各个邦国之间的一个逐渐相互适应的过程。因此，从客观上讲，同盟的存在不仅促进了一种进化式的现代化改革进程，而且也逐渐带来了整个德意志空间现代化改革与发展“均衡化”的奇特效应。

其二，奥地利作为这个同盟的主导国，在“维也纳和平秩序”中被分派了意大利保护国的角色以防止法国染指。这项维护欧洲安全和国际秩序的任务，造成了奥地利从德意志空间的退却，因而对奥地利履行同盟义务产生了消极影响，抑制了奥地利中讲德语人口的因素，而有利于其他少数民族，并因此也使它难以发挥进行现代化改革的灵活性。

其三，普鲁士必须在西南部承担起抑制法国的欧洲安全体系的主要责任。它领土上的西移也使它那种“自然的利益”挪动了位置。因为在1806年的这场欧洲版图的新划分中，普鲁士获得了波森大公国以及包括托恩斯在内的整个西普鲁士地区，并在对萨克森的分割中获得了该国一半领土和五分之二的人口。因此，它已由一个欧洲中东部的大国变成了一个欧洲中央部的大国。更为重要的

是，普鲁士还获得了德意志城市工商业最为发达的莱茵河畔地区，包括它原已失去的威斯特法伦和并入法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而所有这些地区都处于欧洲内陆主要的贸易通道、交通便利的港口和枢纽的特别位置上，并拥有丰富的、也是工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煤、铁资源。这样，恰恰新设立的莱茵省使普鲁士转眼间就成为了最大的德意志经济强国，因而也追加性地给它打上了一种更为独特的现代性烙印。通过防范法国、“守卫莱茵河”的这项欧洲任务，以及与军事强国俄国领土的接壤，普鲁士便将它的安全利益与整个德意志空间的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使它寻求自强的现代化努力获得了一种新的驱动力，而且也使它的军国主义重新得到了巩固并合法化了。另外，由于在安排这项防守任务的同时，并未为它的东部核心地带与它新设的莱茵省之间提供一座“陆桥”，因此，两地是分裂开来的。这种分裂比它以前的东部与威斯特法伦之间的分裂更为显眼，因而克服这种分裂，也就成为了普鲁士强权政治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并不断地促进着它向德意志空间内部进行扩张的倾向。

总之，从长远来看，这个欧洲新秩序的安排以及所谓“复辟时代”的到来，不仅未能真正阻止德意志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还给德意志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某些良好的国际条件。尤其是它使普鲁士成为了最大获利者，使它获得了一种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正是由于拥有这种优势地位，这个改革步步在前的普鲁士，其先锋作用也变得更为突出了。

二、关税同盟的建立

在“复辟时代”（~~1814~~—~~1815~~年）的狭~~窄~~多年间，在整个德意志空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就是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它对德意志工业化的发展、现代民族的形成以及普奥二元性霸权斗争的结局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有着分工不断进步，区域经济之间联系不断加强，市场领域不断扩大的倾向，而且也依赖于关税、交

通、货币区域的统一化。然而，各个拥有独立主权的邦国与城市区域之间的关税界限，造成了德意志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使成长中的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在英、法等国统一国民经济的存在和国际竞争的压力面前，深感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同时也推动着他们去组织自己统一的国民经济。

蒂宾根大学国政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成为了这个成长中的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最早代言人，也正是他，第一个指出了统一国民经济体系与民族统一之间的密切关系。1818年他以德意志所有地区五千多名商人和工场主的名义，起草了《致德意志同盟议会请愿书》。在这份请愿书中，他提出了“在德意志内部废除各种关税，并对邻近国家实行建立在报复原则基础上的全德关税制度”的要求。^① 这位关税同盟思想的早期宣传家在由他本人创办的《德意志商工界机关报》中还这样写道：“不在德意志各邦国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② 正是在李斯特的推动下，1818年11月，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图林根达成了一个关税预备性条约。但1818年至1834年的长期谈判，主要由于巴伐利亚的地区霸权意识，以及它维持全面主权的的要求而告失败。

这样，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中能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就只有普鲁士了。这个国家尽管在1818年颁布了新的关税法，并力图从关税上达到本国的一体化，但是，由于它西部莱茵省与东部核心地带之间地理上的分离以及众多的“飞地”，导致了它竟然拥有约1000公里长的关税边界。这当然使普鲁士对建立一个更大的关税空间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长期以来也一直使它在追求一个

① 京特·法比翁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

② 京特·法比翁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

关税同盟，一个至少是北德和中德的关税同盟。在这样的同盟计划中，这个已成为德意志空间中最大的经济强国的普鲁士，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并绝对排除奥地利影响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一进程中，普鲁士自由改革派官员、外交部关税司司长弗里德里希·冯·莫茨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 1818 年强调指出：

这个共同政策是前途无量的。小国无力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因此，一点也不浪漫，德意志必须结成一个强大的、幅员广阔的国家。奥地利由于已陷于内部的麻烦和欧洲事务之中，因而是不能解决德意志问题的，这个国家必须从德意志开除出去。必须由普鲁士来统一德国，关税联合正是这种国家统一的前提。当多国关税只是不同的国家政治分裂之结果的这种观点，成为国家学说上的真理的时候，那么，认为这些国家统一成为一个关税和贸易联合组织就会导致一个同样的政治体制的联合体的观点，就必然也是真理！^①

而且，这位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的追随者，充分相信国际分工与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并认定普鲁士的经济局势能够承受自由贸易的冲击，因为它的剩余农产品能用于出口，而它的莱茵省、萨克森省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工商业产品在德意志空间里是最有竞争力的。

1818 年普鲁士对关税政策的强化，立即引发了与汉诺威、库尔黑森之间紧张的关税战，因为这两个中等邦国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它们拥有通往北海的出海口，而且也使它们将普鲁士的东部与它的西部分割开来。这就迫使普鲁士首先与安哈特，随后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结成关税同盟，而汉诺威、库尔黑森、拿骚、萨克森、不伦瑞克、不来梅以及两个图林根国家也结成了一个中德关税同盟。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14—1848》，慕尼黑 1988 年版，第 383 页。

在这场关税战的对峙中，争取图林根国家成为普鲁士成功的关键，因为只要图林根国家加入普鲁士一方，便可以从背后断绝中德关税同盟与南德国家之间的联系，并能对南德国家造成压力，从而使南德国家失去它们过去那种能在两个处于它们北部的同盟之间灵活选择并坐收渔利的优势。1833年普鲁士成功地通过帮助修筑道路和提供关税管理费的条件，赢得了这两个图林根国家，从而也迫使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南德国家与之订立贸易条约，这就导致了中德同盟的崩溃。1834年库尔黑森也加入到普鲁士一方，终于使普鲁士的东西两部完全连接起来了。1835年11月普鲁士领导的这个同盟与南德国家最后结成关税同盟，这又导致了萨克森等国的加入。诸国决定在1835年新年之夜撤除所有关税壁垒，这标志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诞生。1835年至1836年巴登、拿骚、法兰克福也加入进来。到1836年，13个国家中已有10个加入，而在北方，只有三个拥有自己出海口的小国汉诺威、不伦瑞克和奥尔登堡还暂时发展着自己的组织。

毫无疑问，关税同盟的建立突破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创立的德意志同盟体系。正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担忧的那样：“这个关税同盟是一个诸国中的国家，它使普鲁士的‘预备性优势地位’成为了可能，并得到了巩固；它动摇了德意志的均势，促进了德意志统一的最危险的理论。”^①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税同盟使民族的组合与普鲁士的霸权联系起来，它是以后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一场预演，而且从客观发展的长远影响上讲，也必然促进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形成。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经济上的联合并不是、也不会是自动地朝着政治联合的方向发展的。对于这些中、小邦国政府来讲，它们不是出于民族利益，也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出于各邦国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才去缔结这个关税同盟的。这些中、小邦国由于害怕普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15—1848》，慕尼黑黑1984年版，第135页。

鲁士的霸权倾向，在加入了关税同盟以后，在政治上反而有意识地仍然还在关税同盟之外的大国奥地利靠拢。因为这能为它们的主权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障，并因此也确保了德意志同盟的那种邦联结构又继续存在了 100 年。

特别在 19 世纪 40 年代革命后的岁月里，这些中、小邦国甚至多次想将奥地利也拉入到这个关税同盟中来，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其原因也是简单的：谁掌握了工业原料和通往世界的通道，谁就掌握了德意志空间工商业发展与扩张的命运。特别当普鲁士与汉诺威等国订立关税条约以后，普鲁士实际上已将德意志整个北海和波罗的海这条黄金海岸线全部掌握在手中了。尽管关税同盟国家是可以自由退出这个同盟的，但各邦国若背叛普鲁士，投靠奥地利，也是不可能为自己获得出海口的；各邦国要想通过陆路独立与法国交往，也已由于普鲁士获得了整个西德意志边界，并建立起庞大的莱茵省而绝无可能了。总之，一个内陆国的奥地利能为它们提供的经济上的好处，实在是太少了。因此，为了替自身的工业发展寻找原材料以及为自身的工业品或农产品寻找出海口，各邦国便不得不听命于最终控制了德意志空间通往新兴工业世界所有通道的，并拥有鲁尔煤、铁的普鲁士。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普鲁士能于 1806 年创建关税同盟，从相当程度上讲，正是要归结于它手中的这两张王牌，而在这个同盟建立以后，它也正是靠着这两张王牌，才将这个德意志经济一体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性机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 19 世纪 40 年代普鲁士实现了工业化的全面突破时，实际上也就为它在未来统一德意志空间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第三节 德意志的工业化进程

一、德意志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19 世纪下半叶从大英帝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急风暴雨般地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转变。工业化，即从手工生产方式向机

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给人类的生活条件、社会联系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也由于工厂体系的引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英国工厂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得到明证的效率”已成为欧洲邻邦国家一百年间富有成果的仿效物，法国与比利时首先成为了欧洲大陆上工业革命的先行者。

而在德意志空间里，工业化的发展此时还是相当落后的。尽管在莱茵河流域以及个别地区，~~1799~~1799年已开始接受英国的新技术，人们在杜塞尔多夫建起了一家运用蒸汽机的棉纺织厂，而且有人甚至于 ~~1799~~1801年在上西里西亚还建起了一家炼焦厂，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一种还处于从根本上讲由农业决定的环境中的斑晶而已。^①这些成就并不足以引起一场技术革命，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开端。

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社会准则决定着生产资料的投入和使用能否形成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规范决定着现代化技术和工厂生产制度能否贯彻实施，决定着技术改良的基础能否产生一种潜在的革命性影响。所有这一切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发展起来，而这种环境则取决于：政治统治是否允许企业成为纯粹经济上从事职业努力的场所；是否已作好了准备，以便能将经验上、手工生产上已获得的知识或是科学上的创新成果长期地转化为技术性的生产力；是否允许招雇产业工人，并用适应于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方式和纪律来对他们进行约束。总之，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造就一支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内部和外部市场的扩张，对资本积累的促进，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进程都不可能离开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的帮助而顺利地得到发展。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就不难理解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冲击下德意志空间里新局势的意义了，不难理解那些改革，尤其是普

^① 卡罗·馥·吉波拉：《工业社会的出现》第Ⅱ卷，伦敦 ~~1966~~1966年版，第 ~~185~~185页。

鲁士“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德意志工业化发展的意义了，因为正是这种新局势与这场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改善了德意志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尽管莱茵河左岸地区（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下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特别的促进）、“莱茵同盟”国家以及普鲁士三者之间的发展是有区别的，也尽管普鲁士对种种旧制度限制的突破并不是立即发生的，但是，在这里，与封建性地方分裂化的权力发展趋势相反，国家主权和国家公民权已部分开始得到贯彻，中央集权化国家已变成了官僚主义的理性国家，新的法律秩序以确保经济自由和私人财产为方向，至少从原则上讲，已在瓦解旧有的等级社会，“择居自由”与“择业自由”已在开创一个具有个人能动性和灵活性的职业化社会。不仅普鲁士的经济政策上有着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普鲁士的“农民解放”导致了一场农业的革命化，它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着食品；它平衡着工商业上的贸易逆差，并开始逐渐强化着对工业品的需求；它通过对外粮食贸易上的赢利，从金融上资助了工业技术上的革新；它在传播英国新技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也为工业化的发展释放了劳动力。

而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德意志领土的新划分，至少将小空间结构归并到更大的统一体中。这种种经历，持续性地改变着传统的成员身份与忠诚，动员起种种期望，并长久地侵蚀着传统主义。正是在这种种政治局势、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持续变换中，财产占有上的关系与经济上的机会被猛烈地搅乱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圈”以及它的失败，为那些经济上的“善变者们”造就了种种崛起的特别机会。新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状态是能特别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因而也一再地动员起人们在经济上的冒险精神。

普鲁士与原属于“莱茵同盟”的由中、小邦国组成的所谓“第三德国”的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权大多起先并没有去发动、促进工业化，而是容忍了工业化。而在普鲁士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哈登堡首相就在给普鲁士国王的呈文中明确写道：

陛下，法国人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工业化的，而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进行。^①

普鲁士政府对工业化的促进不仅体现在扩建交通体系，如公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铁路建设等直接投资上，而且更主要体现在为工业化的发展积极创造框架条件上。除了我们在上面分析和表述过的那些条件（如废除行会制度，城市自治管理，农民解放，教育体制的现代化，以及一系列促进经济能动性的自由主义的政策），还包括由政府出面组织年轻官员、技术员、工程师去外国，尤其是去英国和美国访问学习，组织定期性的工业博览会，发行科技杂志，协助工商业部门组织职业联合会，如“德意志工程师联合会”、“德意志工商联合会”等。正是这些半国家性质的联合会在传递信息、介绍新知识、分派奖学金、加强生产实践上的技术人员与理论家之间的联系方面所做出的大量促进性工作，才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当然，普鲁士国家为德意志工业化进程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当数在它的领导下于 1806 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因为它在民族没有达到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已事先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这个关税同盟组织，由于其不断上升的收入和不断下降的管理费用，很快变成了一个在金融上慷慨大方的“企业”。它通过货币协议和一种新的贸易权，促进了法权与货币上的平衡；它缔结了大量有利的合同，达到了对外关税的保护，内河航运的免税，以及内部市场的减税，^②因而也为整个德意志空间的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工业化发展的第一阶段（1806—1848 年）

就整个德意志空间而言，工业化开端于 18 世纪 70 年代中期，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5 年版，第 154 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06—1848》，哥廷根 1955 年版，第 103 页。

它是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才真正开始的。与英国相比，德意志的这场工业化进程中有它不同的特点。

在英国，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明显进步，这三者是同步发生的，并为工业化所需要的购买力做好了准备。而在德意志，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率没有很快提高，因而农村群众的购买力没有相应增加。因此，德意志的工业化与英国相比，较少地受到农业的推动。1850年以后，也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德意志农业资本投资于机械与其他技术设备上，^①因此，推动工业化前进的主要需求只能来自其他的方向。

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崛起于纺织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个部门里最先组织起大机器生产。而在1850年至1860年这个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中，尽管德意志也首先在棉纺织业中有类似的发展，如纱锭数量有很快的增长，蒸汽动力机得到了运用，原棉消费在关税同盟区域内增长了四倍，但绝大多数的企业还是小型化的，其纺织工厂的数量也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更不能与英国相比。同时，纺织机械化也还没有广泛运用到编织业上。织布机的数量尽管在上升，但1850年在普鲁士也只有三分之一的织布机是机械化的。在呢绒工业方面，正经历着从手工工场向小型工厂的过渡，直到1860年也只达到了三分之一的机械化。而在绒线工业中，手工作业式的企业和家庭手工企业仍然占统治地位，1850年只达到了四分之一的机械化。亚麻工业则更为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化。而没有机械化，正是造成西里西亚家庭手工企业织工生活困苦的重要经济原因。

德意志纺织业机械化的落后，要归因于英国纺织工业在世界上的垄断统治地位，以及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贵族在谷物出口上的利益。由于关税同盟的领导者普鲁士，为了容克的利益，在与英国的谈判中进行了一场交易：在英国向容克打开谷物市场的同时，作为交换条件，关税同盟区域也得向英国工业品打开市场。这就使德意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50—1860》，慕尼黑1959年版，第157页。

志的纺织业，在英国的纺织品占压倒优势的竞争压力之下，陷入一场危及生存的危机之中。1840~1846年，纺织品的价格仅及1840~1845年的半数，致使纺织企业本身也很难通过提高对机器的购买力来扩大企业规模。^① 总之，英国在纺织业中的世界先锋角色，以及容克贵族地主的利益，从根本上阻碍了在德意志走出一条类似于英国式的道路，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

这样，在德意志，铁路业替代纺织业成为了工业化先锋。它是钢铁的人造通道——钢轨与新的动力源——蒸汽机和火车头的结合，它甚至能比纺织业更迅速地带动工业化的全面发展。自从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以来，首先看到它对德意志工业化的意义并进行宣传的，正是那位曾遭受迫害而被迫流亡美国、取得美国国籍后又从美国归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以及鲁尔炼铁厂和机械厂主弗里茨·哈尔科特。尤其是李斯特，他首先从经济理论上论证了这场“新交通革命”的重要性：“这种便宜、快速和有规律的大规模运动具有分工上、地点选择上和提高销售额上无法比拟的优点。”1838年他还亲手为一个连接德意志所有重要区域的铁路系统设计了一个规划，以后的德意志铁路系统正是按照他的这个规划发展的。^② 正是在他的推动下，1835年从纽伦堡到菲尔特的长达远公里的德意志第一条铁路修筑成功，1838年开工的从莱比锡到德累斯顿的第一条带有隧道的铁路线也于1842年顺利完工。

普鲁士政府在这场交通革命中是目光远大的。它首先认识到，要想发展一个从西部省份到东普鲁士的“东方铁路网”，是不能仅仅依靠私人经济力量来完成的。这不仅由于私人难以有如此巨大的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40~1846》，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374页。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30~1848》，慕尼黑1989年版，第374页。

金融实力来完成更长距离的铁路修筑，而且国家也必须将如此有前途的事业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与其他国家不同，普鲁士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将自身与铁路建设联系在一起：其一，所有私人对铁路修筑的参与，必须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优先颁发给股份公司，同时股份公司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甚至在股份公司的人事上也需接受国家的安排，以确保国家铁路系统计划的贯彻实施；其二，国家也通过贷款形式直接投资铁路建设。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或是纯粹私营性，或是纯粹国营性的铁路系统不同，普鲁士形成了私人与国家联合经营的铁路系统。^①这不仅加快了铁路网的建设，而且也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时代的铁路国有化事先作好了准备。

铁路建设也是冒着船夫、马车夫、手工业者们的反对、担忧和不信任进行的。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进行抵制，有些甚至是可笑的。例如，他们在作这种宣传：“这种‘喷火巨兽’的火焰会点燃田野与森林，这位‘噪音英雄’会使房屋无人敢去居住。”由此可见，若是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秩序中，当时的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建成的。当然，与这种普遍的情绪相对立的还有另一种要求，它是由正在成长中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哈尔科特这样讲道：“铁路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是一种为整体利益克服局部利益的团结精神的开路先锋。”^②总之，这种连接空间、缩短距离的铁路开始逐步地将整个德意志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德意志统一的基础。因此，当德意志第一条铁路经受住考验后，在普鲁士，一个申请许可证的浪潮席卷而来。1835年在除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空间里，已有1000公里长的铁路修筑成功，而到1845年，这个数字已上升为2000公里。正如李斯特所说的那样：“铁轨是这场民族统一的‘婚带和结婚戒指’，它将促进自由的思想交流，产生并扩大民主的影响。”^③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35—1845》，慕尼黑1969年版，第100页。

②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967年中文版，第100页。

③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35—1845》，慕尼黑1969年版，第100页。

因而铁路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象征。

从短期来看，铁路建设最重要的影响是，它产生出对机器、铁轨、铁、煤的巨大需求，从而也首先强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工业的现代化和扩张。从中、长期来看，这场交通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运输量的极大增长，运输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但首先是这个事实：原材料和能源，矿石与煤，已能普遍地独立于自然的现有地点，并能为那些经过选择的生产场所所支配和掌握。对煤的支配，蒸汽机的推广，企业内生产的集中，地方与地区性的分工，冶金工业与煤的紧密结合，工厂在铁路枢纽点上的集中现在都已成为了可能。因此，铁路提高了劳动力的灵活性，使他们的集中化变得大为容易了；它使得工业品的销售变便宜了，也因此使得大规模的销售成为了可能；它造就出一个德意志真正的统一市场，继而也造就出一个欧洲大陆上的大市场；它促进了大批量的生产与竞争，而这些生产和竞争又反过来将技术工艺上的现代化推向了前进。

从更长远来看，铁路的发展也对德意志都市化的发展及其特点产生了重大影响。铁路交通的发展，使得工业化所急需的劳动力无需全部定居于城市，他们能够近则每天，远则每周乘火车到达劳动地点。这种工业建设与铁路网建设的同步化，大大限制了城市居住人口的数量，从而也大大限制了发展中的城市规模，但是却并没有限制工业人口数量。那些大量仍然定居于乡村的工业人口，对本地的乡村都市化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因为他们在工业中的收入，对于乡村的商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德意志城市普遍小型化的特点，而德意志的所谓大工业中心，正是一种由众多的小工业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带的汇集点。因此，德意志的都市化问题，如城市中的住房短缺、交通拥挤、自来水和排水工程以及学校设施建设上的特别负担等等，固然也像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那样毫无例外地发生着，但它所引起的震动远远不如英国那样强烈。与此同时，德意志的小城镇化的特点，也在不少人心目中培养起一种对乡村文化的依恋，以及对大城市文明的反感。

固然，铁路修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经济的繁荣，但是，不要

忘记，正是那些首先参与了铁路建设的人才首先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和发展，这首先反映在德意志冶金工业的发展上。^① 由于对铁路建设的积极参与，冶金钢铁部门发明了新的铁轨辗压技术，埃森的克虏伯已能用新的处理方法生产二吨重的钢块，因而成为 1851 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德意志少有的工业成就之一。萨尔的斯图姆，通过采用来自英国的新搅炼处理程序和对焦炭高炉的改进，不仅使钢铁生产翻了一番，而且还完成了莱茵钢铁生产上第一流的集中。

采矿的发展提供了又一个例证。由于铁路建设对钢铁需求的不断增长，从而也刺激了钢铁生产者对煤的更大需求。在这个进程中，煤的采掘在鲁尔掀起了向深井开采的浪潮，因而对蒸汽机的需求也不断上升。1840 年在普鲁士的采矿业中有 100 台蒸汽机共 1000 匹马力，1850 年已达 1000 台共 10000 匹马力。随着埃森合并进鲁尔区内，焦化生产在这里发展起来。杜伊斯堡成为了煤的船运中心，而煤商哈尼尔和斯汀纽斯的经营不断扩大。在除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空间里，1850 年至 1860 年，煤的生产只缓慢地上升了 10%，而到 1870 年就又上升了 30%，1880 年则比 1850 年上升了 50%，就业者的数量至 1880 年增加了 3 倍。因此，不再是纺织工业，而是冶金、钢铁工业在鲁尔成为了领导性的部门。

在火车头的制造中，奥古斯特·波希成为了最著名的人物，1850 年德意志生产的 100 个火车头中就有 100 个出自他的企业，仅 1850 年，这个最大的火车头生产企业就生产了 100 个火车头。而且由于蒸汽机需求的扩大，迅速推动了机器制造工业以及精密机床业的发展，1850 年在关税同盟中已有 100 家机器制造工厂，共雇有 10000 名工人。正是机器制造业的大发展才使得机器的价格回落，从而也才使纺织行业最后也能从中受益。煤气工业也作为采掘冶炼业的副产品出现了。在关税同盟区域内，1850 年已有 100 家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50—1870》，慕尼黑 1950 年版，第 100 页。

煤气生产企业，它提供了街道夜间照明，并使工厂能够独立于自然的时间而在夜晚开班。化学药剂工业也应运而生，它已开始为纺织工业提供苏打、氯和硫酸。

总之，机械化，向新技术的过渡，工厂的建立，使手工纺织业受到排挤；采矿与冶金工业的现代化，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已得到不断的强化和加速。工业生产估计在1850年至1870年期间增长了7倍。蒸汽机的数量和马力匹数先在采矿和冶金工业，最后也在纺织工业中不断上升。1870年在关税同盟区域里，除铁路和航运业外，已有17万台蒸汽机共140万匹马力，仅普鲁士就有10万台共100万匹马力，其中10万台在纺织部门，10万台在采矿、冶金、生铁与机械工业中。1870年在普鲁士，除纺织、采矿、冶金三个部门外，就有14万国家工厂共16万工人。在关税同盟区域内，19世纪中叶的就业人口总数的10%在农业中，10%在工商业中，10%在服务业中，其他为退休者、短工、家庭雇工和受救济者。城市手工业和工业中心里的就业人口的增长率已超过了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而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国萨克森，1870年仅有10%的人口在农业中就业。^①

但是，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很少的，德意志仍然是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空间。在工业中，新、老技术并存；不可靠的增长，赢利上的强烈摇晃，资本的匮乏，削弱了投资；劳动关系也强烈地打上了“父长制”和非经济的特点。19世纪70年代的这场工业繁荣，首先由于一场来自农业的饥饉危机，继而也由于一场来自英国的工业衰退，事实上在1870年就已结束了，这表明德意志经济仍然还是多么强烈地受着农业部门的摆布。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制度上、生产技术上、社会结构上的革新与改造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们已为德意志工业化的突破和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50~1870》，慕尼黑黑1978年版，第100页。

三、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1846~1871年）

1846年后，德意志关税同盟区域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突破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煤、钢、蒸汽锤与齿轮构成了工业生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工业由边缘领域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性部门，工厂、工人阶级和工业城市成为了新的、给社会打上烙印的现实，一个对德意志产生深远影响的现实。

采矿与冶金钢铁工业成为了领导性的工业部门。在关税同盟区域内，1846年至1871年期间，石煤采掘量由300万吨上升到1000万吨，褐煤采掘量则从100万吨上升到400万吨。铁矿采掘量在10年间增长了3倍，生铁产量从100万吨上升到1000万吨。整个钢铁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5%。鲁尔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重工业集中地和最大的工业人口稠密区之一，它的煤已开始出口到英国。^① 一个煤钢时代已经到来。

机械工业也获得了迅猛发展，金属加工业增长了3倍。手工工场变成使用机器的工厂之速度也加快了3倍。到1871年，已有10%的企业属于有20~100名工人的中型企业，15%的工人在这种规模的工厂中就业。煤气工业继续得到发展，1871年已有100家煤气生产企业，与之相配套的管道工业也应运而生。电器工业开端于1871年西门子公司开辟的从来梅到委格萨克的德意志第一条公共电报线路。在这个高工业化阶段里，西门子又成功地利用古塔橡胶使电线绝缘，并在1871年铺设了第一条陆地电报线。几年以后，不仅关税同盟区域中所有中心地区都被这种陆地电报线彼此连接起来，而且海底电缆也把欧洲同北美连接起来了。^② 这场通讯革命通过信息的传播不仅使这个世界同时化了，而且还推动了电缆业

^① 弗里德里希·吕特格：《德意志社会经济史》，海德堡1871年版，第100页。

^②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871年中文版，第100页。

和橡胶工业的发展。在化学工业方面，由于苯环的发现和有机化学的发展，一批新型化学工厂建立起来，最著名的有 1865 年在巴门建立的焦油与苯胺染料工厂，1868 年在荷尔斯特、1872 年在曼海姆建立的苯胺染料—苏打工厂等，这些新型的化工厂为纺织业开发了大量极为重要的化工产品。

在纺织工业中，棉纺业已经全面实现了机械化。原棉消费量从 1861 万吨上升到 1871 万吨，纱锭数量由 1861 万个上升到 1871 万个。整个毛纺织业（包括呢绒工业与绒线工业）的机械化程度均在 1871 年超过 50%，但亚麻业的机械化在 1871 年仅为 10%。因此，比较起英国来，德意志整个纺织业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相对缓慢的。

这场工业化的突破通过铁路建设被进一步向前推进着。铁路网从 1835 年的 1000 公里增加到 1871 年的 15000 公里。与此同时，普鲁士国家对铁路的影响在不断上升，通过对铁路股份公司有系统的收购，1871 年已有 1/3 的铁路为国家所有。

总之，从 1835 年至 1871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业在投资中所占的份额由 19 世纪 40 年代的 30% 下降到 70 年代的 15%，工业与交通的投资份额上升到 30%，其余为住房和外贸业方面的投资。农业中就业人数的份额在继续下降，在工业、商业、交通、服务业中的就业人数则相应上升。它们之间的比例，1835 年为农业 30%，工业与商业 15%，交通与服务业 15%；而 1871 年则分别为 15%、30%、15%。在净国内生产总值中各部门的份额也发生了变化：在 1835 年，农业占 30%，工业和手工业占 15%，交通占 15%，贸易占 15%；而在 1871 年则分别为 15%、30%、15%、15%，其余为服务业。^①正是在这种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德意志走上了通往现代工业国家的道路。

在这场工业化的突破中，各种推动性和促进性因素是汇集在一起发挥影响的：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8—1871》，慕尼黑黑 1983 年版，第 100 页。

其一，19世纪 40年代技术与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效果在继续发挥着影响。正是在铁路这种新的交通工具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一个能发挥功能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市场上，低效率的手工生产方式必须屈服于价格竞争，在这方面，1846年的现代化危机是作为扫除式的危机直接发挥影响的。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在 19世纪 50~ 60年代也开始真正有了成果。就整个社会而言，工业化此时还没有导致人们所担心的工作位置的减少，而是导致了工作位置的结构变动和增多，它仍然能够收容人口的增长和农村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购买力的普遍提高，已通过纺织品消费和农业对机器和化肥的新需求表现出来。总之，一种更大的需求，更多的生产，更高的赢利，更高的投资，更大的消费的循环已经形成。因此，在 1846年短暂的危机过后，出现的是一场长达 15年的（1846~ 1861）经济繁荣。

其二，对阻碍竞争、市场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法规进行修改，也属于这种推动性的因素。例如，在 1846年以前的普鲁士，采矿业一直是根据国家的所谓《领导监督原则》来行事的。它规定了企业经营管理政策，规定了价格和工资，就连私营矿的企业也不例外，因为它们财政和管理上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国家矿业机关手里。这就使得在新技术上的资本投入上，对于这些私营企业来说不那么有吸引力。自从 1846年颁布《矿山法新条例》以来，矿山法规被自由主义化了，它将企业经营管理权、更大的赢利机会连同更大的风险一并转让给私人所有者。而国家只保持着对生产安全、矿工的社会权利以及他们在企业内部享受的福利待遇的最后监督权。总之，同“农民解放”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形成时一样，经济自由——这种革命的“人权”——也成为采矿业的规章。在这里，自由根本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国家表面上只放弃了经济主动权，但实际上完全放弃了按照其要求指导经济的权力。当然国家还能通过大量的矿山产业继续施加很大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政治

影响，如同它在农业和林业上利用国有地所做的那样。^① 1807年的《全德意志贸易法典》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该法典事实上是 1807年普鲁士的股份法在全关税同盟区域中的推广和运用，它从根本上使全区域中的股份公司的形成和扩展变得更容易了。1818年关税同盟区域内的货币统一化，以及 19世纪 20年代一系列新的自由贸易条约都促进了这场高工业化。

其三，普鲁士新型银行的出现也属于促进这种强有力的工业扩张的因素。这种新型银行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重工业和铁路已成为工业化与投资的领导性部门，因而需要大量的投资；二是由于私人手中的财富，用传统的方式已不足以资助工业中昂贵的生产资料，因此，1850年以后，在普鲁士政府的允许下，一场“金融革命”开始了。人们首先在股份制基础上建立起储蓄银行，这种银行能扩大以小的股票购买者和持有者为基础的顾客范围，并能将集合起来的储蓄金迅速动产化。它致力于全新的业务，如在工业中进行长期的投资、建立股份公司、在市场上销售股票、对企业进行贷款资助等。总之，这种多功能的银行成为了金钱的汲桶，它既资助了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它所负载的对股份公司的组织成为了可能。^② 因此，一场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的浪潮到来了。1850年以前，普鲁士的 1000 个企业是用一笔总额为 100 亿塔勒（1 塔勒 = 1/3 马克）的资本建立起来的，而从 1850 年到 1860 年，1000 个企业是由一笔总额为 1000 亿塔勒的资本建立起来的。因此，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始成为德意志工业经济的一个特征。

这场工业化的突破给整个德意志空间与社会带来的结果是多方面的：

第一，工业化在不同区域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地理上讲，

①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 3 卷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76 页。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50~1860》，慕尼黑 1980 年版，第 376 页。

西部与北部的发展明显地快于东部与南部；从政治上讲，奥地利的落后变得更加明显，而且早在 1850 年以前，它在工业生产方面就已远远落在关税同盟后面了。在生铁产量方面，1850 年，奥地利为 15 万吨，关税同盟为 10 万吨；而在 1860 年，前者为 25 万吨，后者则为 18 万吨。在石煤产量方面，1850 年，奥地利为 15 万吨，关税同盟为 10 万吨；而在 1860 年，前者为 25 万吨，后者则为 18 万吨。在蒸汽机总能力方面，1850 年，奥地利为 10 万马力，关税同盟为 8 万马力；而在 1860 年前者为 15 万马力，后者则为 12 万马力。在铁路长度方面，1850 年，奥地利为 1500 公里，关税同盟为 1000 公里；而在 1860 年，前者为 2500 公里，后者则为 1800 公里。在棉纺纱锭方面，1850 年，奥地利为 15 万个，关税同盟为 10 万个；而在 1860 年，前者为 25 万个，后者则为 18 万个。^① 这种经济实力上的差异本身正是普鲁士最终能建立起帝国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第二，工业化、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平行发生的，个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社会各阶层也并不是均匀地受到震动，只有越来越少的胜利者和越来越多的失败者、牺牲者、落后者。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安全感的丧失以及种种紧张不安的因素，因而也引起了种种对这样一个“新世界文明”的拒绝与反抗。不同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性和重叠性在进一步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极为重要了。

第三，工业化、跨地区的市场、与外部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得不再是农业与饥馑危机（正如 1847 年那样），而是工业经济的繁荣、衰退、危机（正如 1858 年那样）成为了决定整个社会命运的因素。^② 个人的存在、社会的稳定都已开始受到这种衰退、危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50~1860》，慕尼黑 1968 年版，第 100 页。

^② 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 1980 年版，第 120 页。

机的威胁。

总之，在对这场工业化进程进行总结时，必须辩证地看待它在德意志所引起的后果。一方面，它改造了这个旧有的社会，并开始造就出一个现代主义的新社会；它扫除了人们对农业天然条件的依赖性，并不断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能；另一方面，它带来了失业与贫困化，带来了“异化”与危机，带来了工业无产者与他们的困苦，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与新的压迫统治，带来了现代阶级的形成与它们之间的斗争。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普鲁士的官僚集团来说，能否维持这个社会内部和平的关键，取决于这种统治能否在确保商品生产与交换不受阻碍地得到扩展的同时，还能确保人口大众“合乎人的尊严的”、也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四节 摇“未完成的革命”

一、革命前夕的德意志

在“复辟时代”政治反动的特殊背景下，尽管从政治和法律上讲，德意志人的处境远比1848年以前要好，但是，由于工业化进程给德意志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加速作用，社会观念的标尺也随之改变，人口大众的自我意识已经增强，它开始转过来反对这个旧的政治制度，因而也使一场社会紧张与冲突的强化，一场政治争端的尖锐化变得不可避免。

自1848年11月德意志同盟通过反动的《卡斯巴德决议》以来，对这个同盟统治结构的不满，成为了德意志空间里人口大众共同的基本情绪。人们不满这种由官僚监控和管制的专制国家，不满这种官僚、军官、税吏、宪兵拥有特权的国家，不满这种建立在禁令与许可证基础上的国家，不满这种只有极少权利、实际上只能履行义务的国家，不满这种阻止人们在社会上自由交谈、实施严厉的新闻检查、用审判和驱逐出境来威胁对现状持批评态度的人民大众

代言人、压迫正义感的国家。

这是一种长期积累并经过长期发酵而成熟的不满。人们需要一种更自由的、更具有大众性的政治秩序，一个集“自由”与“统一”于一身的民族国家。而这个同盟从政治上讲是复辟势力的压迫工具，也恰恰是阻碍“自由”与“统一”的。因此，当人们想在自己的国家中发展宪法秩序的时候，就必须打碎德意志同盟的封锁，而“宪法”与“参与”也就作为与专制对立的新秩序的象征性口号提出来了。

经济与社会上的困境推动了这一方向的发展。在这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中，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以不同的影响力作用于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人口阶层的。首先在乡村，农业改革尽管已经导入，但在贵族庄园主特别强烈的抵抗下，“农民解放”只能缓慢进行，甚至在不少地方，从相当大程度上讲，处于几近停顿的状态，封建劳役负担长期拖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城市里，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冲击下，出现了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无产阶级化”问题，工人队伍的贫困化问题，人口增长与劳动力需求停滞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没有工作、没有居所的城市流动人口问题，~~1845~~年至~~1846~~年的农业欠收所引起的饥馑问题，食品价格上涨与购买力下降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工商行业的销售和生下降、失业率上升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为社会的不安定奠定了基础，并给广大民众的抗议染上了政治色彩，并加强着它，也赋予了它强大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崛起。它包括与之伴随的在科学、教育和美学领域中市民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家庭、劳作与社交生活中市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在这个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发展。它正逐渐地将老的、传统意义上的市民世界接纳进这个新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并反过来影响着非市民阶层：贵族、农民和工人（~~1848~~年革命年代的选举中，这个市民资产阶级能得到人口大多数的支持是一个证明）。这个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还不是

一个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而是由根据财产和教育的准则范畴划分的等级所组成的世界，一个由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世界。这个市民资产阶级尽管还没有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决定了社会的风格和发展的方向，它的价值观念和准则，如独立自主与个性化、效率与竞争、财产占有与劳动、才能与教育、讨论与公众、私有与自由，已开始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准则，它的力量基础还在不断拓宽。

这个新阶级提出了进行政治统治或是参与统治的要求，它反对贵族和军方，反对处于复辟背景之下的保守派官僚和君主独裁专制，它要求国家和社会的公民化，要求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保守、复辟的国家机器限制了这个新阶级的现代化活动，对抗着它的政治要求。对 1918 年“七月革命”的回顾和对革命危机再度爆发的担忧，决定着国家机器的行为，并形成了对这个市民资产阶级发展的预防性阻碍。而且德意志同盟在巩固着这种国家政治体制，阻止着每一种政治运动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德意志，尽管停滞与冲击的压力都变得更大了，也尽管所有的人口大众都盼望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既没有出现一种自由的公共政治制度下的生活，也没有形成一个自由民主运动的中心和一个民族运动的中心。

当然，在市民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特权阶层，渴望建立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思潮的表象背后，政党化已开始出现。社会多元主义，无论从思想政治上讲，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并且也首先是通过敢于自由思考、勇于批判政治现状的知识分子们的活动才成为现实的。仅在这个市民资产阶级的阵营内部，就已分化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天主教主义者等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这个市民资产阶级的崛起，它也同时分焕出非市民资产者因素，这种因素正在朝现代无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向发展。因此，不仅市民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政治派别的要求是不相同的，而且他们与开始成长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要求也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思想政治上的多元性也反复出现在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紧张关系中，并在 1918 年革命中成

为向宪法国家突破时的负担。

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者

德意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紧张与所有期望都汇集到 1848 年革命的爆发中。但是，这场革命并不是经过政治活动家们的谋划而爆发的，导火线是发生在法国的 1848 年“二月革命”。对巴黎焚烧路易·菲利普王冠事件的报道，点燃了德意志大众对旧制度不满的干柴，德意志同盟各邦国的首都纷纷爆发革命。制定自由主义的宪法，实现市民社会的权利平等、舆论自由、政治参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这场被称之为市民资产阶级的“三月革命”的目标。但是，人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共和制国家，而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自由的、德意志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在绝大多数邦国中，只要王侯全部或是部分承认这些要求，骚乱和暴力就停止下来，继而是建立起由热衷于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们领导的“三月政府”，就连普鲁士、奥地利也不例外。因此，这场德意志革命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领导这场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本身并不想要这场革命。著名的莱茵省企业主哈尔科特在巴黎发生革命时这样讲道：

我们去革命？在我们普鲁士？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普鲁士，我们想有和平的、大众性的改革和自由主义的宪法，但绝不是革命。^①

事实上，德意志大工业中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占压倒多数的是根据机会主义的考虑来决定他们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的。对他们来说，是成为一个赞成共和国的民主主义者，还是成为一个君主立宪主义的追随者，这至少是一个原则问题。他们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48—1849》，斯图加特 1989 年版，第 290 页。

更多是通过实用主义的观点，确切地讲，也是根据经济形势，来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的，这种经济形势对他们的决断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在自由主义者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德意志的这场革命中认为，那场由他们竭尽全力来推动的工业化是与社会普遍进步的目标相一致的。绝大多数却是这种人，正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所指出的那样：

他们是经济上的中间阶层，还不如说，他们是以一种冷淡的观望态度来面对经济上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扩张的。他们担心社会的动荡可能会损害他们所追求的这种秩序，这种秩序既不是英国式的，也根本不是法国式的，而是瑞士式的。瑞士，由于它强烈的传统上的稳定性，由于它的几乎没有挣脱传统生活关系的中间层工业家，是被工业化早期阶段中的西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们当作一种发展方向上的模式来仿效的。^①

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汉也概括性地指出：

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并不是将一个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工业化社会作为理想的。还不如说，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断繁荣的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共同体，通过这个共同体来避免那种在文化上起破坏作用的工厂制度，并使得一种社会秩序的发展成为可能。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中间等级的独立经营者的广泛基础上的，这些独立经营者中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导一个自己的企业。^②

① 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柯尼施泰因 1984 年版，第 55 页。

② 詹姆斯·希汉：《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从 18 世纪的开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64 年，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121 页。

除了不满现存国家政治上的压迫与反动，反对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这些共同特点以外，在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上，还有着一种对没有受过教育和无财产的人民大众的蔑视和反感。他们认为：“只有财产才能造就自由，只有受过教育才会有判断力，也才会对整体幸福承担责任，因此教育与财产是政治上候选人的前提条件。”^①而这一点也决定了他们反对“普选权制度”，尽管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通过革命初期的普选，才成为“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的。

在革命初期的沸腾中，在谁成为议员候选人的问题上，社会声望比政治方向更为重要。在第一个德意志议会“法兰克福议会”的 400 名议员中，受过教育者达 250 名，仅教师与教授就达 100 名；而来自工商业界的仅有 100 名，其中 50 人是手工业者；来自农业的仅 50 人，其中小农 30 人；有贵族头衔的共 50 人，以至于人们将它称之为“教育界绅士们的议会”。这个称号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它说明了这个领导革命的机构，恰恰是一个由自由主义者们控制的机构。

当然，“法兰克福议会”的建立表明，这种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已开始与改革派官僚们的自由主义运动发生了分离，市民资产阶级的社会参与和自决的现代化已开始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发生了分离。尽管前者与后者在根源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个由改革派官僚们培育起来的市民资产阶级，现在已不想被解放，而是想自我解放了。它同时说明，当“复辟时代”极大地削弱了官僚改革派的力量后，当社会问题的压力已极大地损耗掉官僚机构的现代化威望后，自由主义者们更迫切的要求是要有一部宪法，而不是要有一种更好的国家官僚管理。这就是说，他们想将官僚机构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了。但是人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不再可能与官僚的自由主义运动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06—1848》，慕尼黑黑 1983 年版，第 100 页。

进行合作了，而是说，仅有这种合作已不够了。而且反贵族特权，对这些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反对具有权威的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伙伴，而且也是反社会骚乱的堡垒。在革命前，当下层的社会抗议似乎要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思想倾向也表现得越来越强烈。

在“法兰克福议会”与各邦国的“三月内阁”中，自由主义政治家们的这种虽然不是反革命（运动别集卷四）的，而是反对革命方式（运动别集卷四）的态度，成为了这场德意志革命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种反对革命方式的态度还可以从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对 1793—1794 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令人担忧的回顾中找到一种解释。那场革命在推翻王室后，在公民投票中造就过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的这场革命是一场标有历史知识上负担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晚生的革命。^① 但仅有这种解释是不够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还可以从他们对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和早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恐惧中找到解释。尽管马克思主义才刚刚开始流亡者们的圈子里传播，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还没有真实地波及到整个德意志，但是，自由主义者们已开始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的“继续革命”与一种“红色幽灵式的”剥夺剥夺者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因此，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越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统一的共和国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们就越是主张与旧势力进行妥协。这同时也使得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特点。

因此，从根本上讲，在 1848 年的德意志存在着两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打上了社会烙印的群众革命，它打开了突破口；另一场是占有者与教育界的社会名流们的革命，但他们并不喜欢这场革命，正是群众的暴力，才将他们送到了领导岗位上，也正是群众的革命，才为他们现在的政治存在找到基础的。尽管他们的合法性是依

^① 米歇尔·萨勒夫斯基：《德意志人与革命》，哥廷根 1959 年版，第 107 页。

赖于这场群众革命的，然而他们不想有进一步的革命了。他们想要的是秩序与改革，并想通过秩序与改革的成就来证明“革命有罪”。他们力图利用已占据的领导者地位，利用现在这些已经存在的革命力量，来迫使王室旧势力推行他们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和方针，以便达到疏浚和阻止这场革命，重建秩序，防止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目的。“改革万岁”——这正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战略，也是他们妥协政策的战略。这种妥协政策对革命的阻碍性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尽管从他们当中也分化出一小部分反对这种妥协政策、主张继续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三、“小人物们”的群众革命

这场德意志革命首先是一场“小人物们”——农民、小手工业者、工人——的群众革命。他们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是出于社会上的动机来进行这场革命的，但是，他们是革命暴力的载体。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中不同人口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暴力行动的相似性中，有着各地区、各领域、各阶层之间不同的、有的甚至是相反的愿望和理想。

首先在不同的政治区域里，革命暴力的运用就有着不同的目标。例如，对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变换了君主的地区来说，如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法兰肯，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和莱茵兰，这些工商业发展程度超过了新属国家一般发展程度的地区，人们的暴力行动往往是针对新君主和他们的代表的，因为这些新统治者或是废除了、或是修改了，因而也损害了过去那些更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在这些地方的居民们看来，官僚政治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这些地区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例如，萨克森省的手工业师傅们，在暴力行动中，不仅要求取消普鲁士国家“固执死板和不切实际的官僚统治”，而且还要求萨克森省在自治管理上有一种更强烈的扩展。类似的局势也发生在莱茵兰。但是，这种态度恰恰与东普鲁士的工商业地区手工业者们对国家贯彻“过分的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的报怨刚好相反。^① 而普法尔茨的人们拒绝再度引入严厉的巴伐利亚的行会制度，他们怀念过去法国统治下的自由主义法律秩序。

在农村也并没有出现一场统一行动的农民起义。自从“农民解放”以来，乡村下层人口已发生了利益局势上的区别，这也就决定了大农、小农、乡村帮工、农业工人在革命中不同的态度和愿望，后三者才是通过采取暴力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愿望的。由于向庄园贵族、修道院、城市和国家当局所缴纳的沉重捐税造成了他们特别的负担，也威胁到他们经济上的生存，因此，小农和无地的农民要求重新恢复传统的对森林、牧场的使用权，乡村帮工要求无偿免除封建债务，农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些要求尽管各不相同，但是要求废除所有封建负担和贵族特权，罢免并替换无能的官员，彻底引入一种国家的、非地方独立性的司法权，获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则是乡村下层民众一致的要求。

农民构成了一个与城市小资产者阶级一样的无助的阶级。尽管他们有更大的勇气采取暴力行动，因而与城市小资产者阶级有所区别，但是，在提出历史性的倡议方面，他们又是无能的，需要市民资产阶级的帮助来贯彻他们的要求。^② 由于市民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与他们的一致要求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1848年春天，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他们是拥护自由主义纲领的。但是，农民同时也用他们具体的、地方上的、乡村上的眼界来思考他们的问题，而不按城市人口的、国家的、民族的视野来思考极为复杂的政治和法律争端问题。因此，当他们在革命初期一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以后，便退出了革命。

工业化尽管导致了大量工厂的建立并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

^① 法伊特·瓦伦丁：《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史》第4卷，科隆1964年版，第547页。

^② 米歇尔·萨勒夫斯基：《德意志人与革命》，哥廷根1965年版，第122页。

明显差别，但是，德意志具有统一风格的现代工人阶级的成长，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根据德国经济史专家吕特格的统计，1850年真正在使用机械的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其数量仅为150万人，它们又是分别属于1500家工厂的，也就是说，这些工厂平均只拥有100名工人。而与他们相对的是仍在采用手工作业方式的工人，其数量则为150万人^①。由此可见，构成城市工人队伍大多数的仍然是小工商业界的手工业工人。属于这个范畴的，包括手工业的伙计、个体手工师傅以及因为手工业的超员而变穷了的、被迫在公路和铁路建设上充当季节工人的手工业伙计和小师傅，他们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贯彻中，经历着一种社会地位上的损失，因而他们的暴力行动往往具有传统的民众骚乱的特点。^②

工厂工人、手工业伙计与手工业师傅这些特别阶层在暴力行动中所表达的要求，尽管有着共同性，即努力达到或维持他们与这个逐渐发展着的工业化社会之间的平衡，但在这里面，各自的要求在具体内容上的区别，却相当可观。

首先在工厂工人的要求中表达了一种特别的问题。他们是一个在传统的手工业中再也找不到位置的集团，这个集团正在经历着一种具有严厉、专横特点的现代工厂管理秩序的形成过程。恰恰在进步的工业化中心和机械化的工商业中心，他们面临着从手工业向工业的经济转变问题。因此，他们要求赶走女工和非熟练工人，引入“提前通知解约制度”，建立手工业式的互助储蓄（合作社），总之，使老的行会制度的优点能在工厂制度中保存下来。同时他们还要求固定工时，稳定工资，对加班进行明确规定。特别在与失业者状况的比较中，工厂劳动也并不是被他们无条件地作为社会地位的恶化来感受的。这些在大工业中还占据着工作位置的工厂工人，希

① 弗里德里希·吕特格：《德意志社会经济史》，海德堡1959年版，第150页。

② 米歇尔·萨勒夫斯基：《德意志人与革命》，哥廷根1959年版，第150页。

望能在与城市和国家当局的合作中看到一种新的劳动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贯彻，因此，来自这个集团的暴力行动也相对较少。失了业的工人才是更多地通过革命的暴力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愤慨的。

对于手工业工场中的伙计来讲，由于各手工行业的超员，他们已经不再能成为师傅了，在他们的要求中，也不再是恢复老的行会制度了。他们已将自己作为特别的、有熟练技能者的集团来感受，并认为这个集团也能够在工厂式的管理制度中存活下来，只要这个社会还需要他们的技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这种自我价值观念使他们往往通过暴力来反对新技术的引入。至于袭击成衣、家具仓库和更大的生产场所和轮船，可以肯定是铁匠、制钉匠、裁缝、木工、木筏工等特别职业者们所为。^① 这些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徒劳地控诉和请愿失败了多年以后，为达到扫除新生产形式或是促使国家加强对新生产形式的控制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他们现在过渡到用暴力手段干扰机器竞争上来了。

而小个体工商手工业的师傅们则体现出一种更为突出的经济保守主义观念，他们希望能再度引入老的行会制度，废除工商业自由。他们的目标就是贯彻一种由国家调节和保证的、按照严格的行为规则来运行的经济体制，以有利于手工业去抵抗来自工业化的新竞争。然而那种反对臆想的或是真实的引起他们没落原因的暴力活动，毕竟又与他们的等级身份不相符合，因而他们更多还是通过手工业者代表大会来表达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工业化、不正当竞争和市场经济的。然而，手工业中伙计与师傅的分离，正如这种分离在革命中很快就形成的那样，意味着一种向前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回归已无可能。^②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政治自由与市民自由之间密不可分的联

① 鲁道夫·施塔尔曼：《1848年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史》，慕尼黑 1949 年版，第 141 页。

② 米歇尔·萨勒夫斯基：《德意志人与革命》，哥廷根 1959 年版，第 145 页。

系，但这些自由并不考虑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的物质利益，因此，手工业者和手工工人不可能从赞成工商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法兰克福议会”身上，找到对他们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由于这种利益上的非一致性使得手工业者失去了对自由主义革命的兴趣，因此，尽管手工业者为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民主协会的集团，但是，它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并没有找到政治上的共同方案。

总之，“小人物”的群众革命意味着对革命前体制的清算，它一方面证明了这场革命是这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危机中的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个体制在解决存在着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无能，从而才导致了几乎所有阶层起来，以各种手段修改这个迄今一直存在着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些特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或是并行的，或是不同的，或是相反的，这一局势成为了革命的真正难题。参与这场革命的所有阶层缺乏观念和目标上的协调，也与自由主义的自身特点一样，成为了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未完成的革命”

如何评价这场德意志革命及其失败，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从现代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德意志历史发展的问题。

毫无疑问，作为历史的具体事实，几乎没有人不承认这场德意志革命的失败。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这样评价道：“~~1848年~~的市民资产阶级革命，在他们夺取政治上的共同参与权方面，遭到了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惨败。”^①

失败的原因显然是多种多样的。迪特尔·朗格威色强调了这场革命运动内部的软弱：

~~1848年~~~~~1849年~~德意志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革命的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48年~~~~~1849年~~》，哥廷根~~1988年~~版，第~~104~~页。

年代里，一部分市民资产阶级提前脱离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解放运动。他们害怕一场继续向前推动的政治转变将会直接引起一场社会革命。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面临了一场在革命年代中得到猛烈加速的政治现代化，在对这场政治现代化究竟是采取抵抗还是采取容忍的原则性争论中，这个阶级使自己丧失了活力。它的失败是由于这个阶级的自由主义部分，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民主主义的种种计划中，看到了对私有财产进行社会革命式的重新分配的开端。^①

然而，人们不能将革命失败的原因仅仅归于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中间派，而不是左派，也不想成为左派。他们是“非暴力主义的改革派”，而不是用暴力手段镇压革命的反革命右派。他们也没有使自己沦为反动的右派。但他们与左派的冲突和分裂，是有利于反动的右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反动旧势力的抵抗与镇压，以及革命一方所面临的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又太多地彼此重叠在一起了。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席德这样谈道：

首先，革命是在旧王朝以及忠于王室的军官和官僚的抵抗和镇压面前失败的，这些力量在贵族中有他们的社会基础。其次，革命也是在农民群众的冷淡面前失败的，而农民群众在1848年的德意志还一直占据着人口的主要份额。其三，革命也失败于这场革命运动内部的软弱。德意志市民社会内部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不能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②

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中的这些原因以外，人们还必须看

① 迪特尔·朗格威色：《1848—1849年的德意志革命》，达姆施塔特1982年版，第140页。

②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德意志历史的转折点，1848—1849》，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140页。

到“在自由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意志人的民族统一国家”的理想在实现上的困难。仅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就包括边界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新的大国地位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建立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与欧洲各大国的利益、各民族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冲突。

例如，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必须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统一在内，因而引起了与丹麦民族运动之间的一场冲突，而这场冲突势必引起俄国和英国的干涉。又如，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目标，也引起了法国对一种扩张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担忧，因为就连在 1917 年“二月革命”中上台的法国革命政府，也是将莱茵河作为未来法国的民族边界来设计的。与此同时，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对波兰自由运动的支持，则与现存的德意志国家，特别是普鲁士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的出现有着某种必然性，因为德意志的民族民主主义者，如同丹麦、波兰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一样，都不愿放弃他们各自的要求，而各大国也同样不愿放弃他们在欧洲均势中的利益。

毫无疑问，德意志人若是能建立一个将整个奥地利连同它所统治的少数民族全部包括在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即使是自由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民族统一国家，也会立即遭到周边大国们的无情干预。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德国，通过奥地利能使它赢得地中海地区和下多瑙河流域，通过普鲁士能使它赢得波罗的海地区和下莱茵河流域，通过其余的国家成员能使这两个力量的主体联合成一个紧密坚固的整体。这样一个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统一起来的大德国，这样一个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组织起来的、因而也是一个对内对外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大德国，必然成为欧洲新的引力中心，而不是过去那种欧洲冲突的缓冲地带了，因而也必然导致与英国、俄国、法国在强权政治上的冲突。

总之，恰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里，欧洲已容纳不下一个如此巨大的中欧民族国家力量的整体了。然而，这样的方案却恰恰是在奥地利作为统治民族的德意志人可能赞成民族统一国家的惟一方

案。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哈根·舒尔茨所说的那样：

一边是德意志人的民族期望，另一边是欧洲的现实，而每一种想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欧洲和平体系的代价上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企图，都遭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断然反对。^①

同样，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也与德意志新、老联邦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发生了冲突，因为各邦国以及普、奥二元主义的政治现实，是与自由主义者们打算建立的这个整体国家的目标彼此对立的。而且，仅在“法兰克福议会”提出的统一国家的方案中，就有“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之争。“大德意志方案”仅仅意味着将奥地利中的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纳入到统一民族国家中来，这就势必导致哈布斯堡帝国在诸多的继承国家中崩溃，因而也势必遭到那些在奥地利作为统治民族的德意志人的反对。而那个将整个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方案”，此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并不能将所有的德意志人统一在一起，而且在一个没有奥地利在内的统一的德国中，普鲁士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是那些不愿放弃各邦国自身权力的地方分裂主义力量，以及联邦主义者们、西南德意志天主教徒们、民主主义者们和共和主义者们的大多数难以接受的，它仅仅只是一种救急性的出路。因此，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理想与地方分裂性邦国的利益，与跨民族的奥地利的利益，与那些毗邻的、革命的各民族的利益，也与欧洲各民族大国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

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的边界，德意志的自由，以及社会公正，这已经有四个问题了，它们同时出现了。这些问题在那些更幸运的民族（如英、法）里能够一个一个地出现，一个一个地来解决，而在德意志则要同时解决，否则就一个也难以解决，而同时解

^① 哈根·舒尔茨：《通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从 19 世纪到帝国建立的德意志民族运动》，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29 页。

决的努力又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紧张。因此这并不偶然：在德意志这个时代里，没有民族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有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也不可能有民族真正、彻底的统一。

正是众多的问题以及它的不可解决性，最后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失败。正是这些问题：“大”、“小”德意志问题，奥地利的跨民族国家问题，以及欧洲范围内的民族冲突问题，使得 1848 年夏季的一场快速的政治决断成为了不可能，同时却使得奥地利反革命的头一场反扑取得胜利成为了可能，因而也使政治决断尖锐化地取决于普鲁士了。最后，这些问题带着“小德意志方案”，将革命带进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中，而革命却没有能赢得它。当 1849 年春普鲁士国王拒绝出任“小德意志君主立宪国家”的皇帝时，便导致了革命阵线的最后崩溃。

当然，人们还必须看到革命的另一结果，这种结果一直到 1871 年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建立年代都证明是存在的。这场革命结束了“复辟时代”，并对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了又一次扫荡，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市民资产阶级的时代在德意志毕竟已经开始了，因为这场革命给全民族的联系提供了一份收益，因而也对新的政治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它的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德意志工人运动在它的历史中开始第一次地构造了自己，而且是在全民族的范围上，因而成为了唯一具有全德意志意义的民主主义群众组织。正是这个群众组织的发展，为后来的共和国造就了一个社会改革的前提。^①

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米夏尔·斯迪麦尔则指出的：“在这场革命的遗产中，给德意志社会留下了‘基本权利’、‘宪法国家’、‘普遍

^①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德意志历史的转折点，1848~1849》，法兰克福 1962 年版，第 105 页。

国民’的概念，特别也给成长中的德意志工人运动留下了一种从自由主义转向革命的民主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①

对于这场未能成功的革命，两位英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布莱克本与杰弗·埃利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是否将市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太局限于一种一次性的暴力变革的行动上了，并从这种有问题的观点出发，也太多地期待这种一次性的行动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事实上都没有这种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市民资产阶级革命事件的东西，一种一次性地就能包括从封建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完整过程的东西。”他们反对那种关于市民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解释，反对那种认为每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须经历一种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的、自动性地与自由主义相应的必然发展阶段的解释，因而也提出了一种对市民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更宽的概括：

将这些变化看作是市民资产阶级时代的根本性革命才是恰当的，这些变化就是：对于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受阻碍的再生产来说是必需的那些变化，以及对于与之相应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框架来说是必需的那些变化。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这种过渡时期的具体的政治环境很可能呈现出相当可观的差别，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况是能够通过仔细的历史分析来确定的。^②

同时，在对英、法、德三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行比较后，这两位英国历史学家，从更广义上的市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理解这些条件的形成，并指出：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见*《德意志历史》第 1 卷，斯图加特 1984 年版，第 284 页。

② 戴维·布莱克本、杰弗·埃利：《德意志历史描写的神话》，法兰克福 1984 年版，第 104 页。

这不是用一次性的对政治权力英勇征服性的行动，而是以一种漫长的对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统治关系进行结构性的改变来进行的。当然，这个过程若是能够顺利地进行，那么对于贯彻、实施和扩张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财产关系来说，可能才是最理想的。^①

当然，在这场革命失败之后，在德意志，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再也不是，也不会是由市民资产阶级来独立领导，并在每一个阶段中都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去承担了，更不会仅仅只在“自由主义”的记号之下去承担了。因为对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是经济上的解放，至于政治统治的形式，以及由谁来行使这种统治，谁来赋予这个市民社会以准则和行为模式，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仍然是第二位的。^②

如果人们这样来认识市民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 1918 年的德意志革命不应简单地被作为一场完全失败的革命来看待，而应作为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来看待的。对于市民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来说，它的结果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失败。人们很容易从 19 世纪 80 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面突破中，从 1918 年“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完成中，认识到这一点。

第五节 摇“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一、向“新时代”的转折

1918 年革命后，德意志各邦国政府在镇压基础上推行的政策，

① 戴维·布莱克本、杰弗·埃利：《德意志历史描写的神话》，法兰克福 1964 年版，第 514 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关于法西斯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斯图加特 1969 年版，第 27 页。

都是复辟保守主义—官僚专制与重建秩序国家的政策。这种反革命与反动虽然能一时依赖军队和警察，依赖再度纪律化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统治，但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统治。这是因为，在 1848 年至 1849 年间的德意志，统治者是不能依靠反社会来进行统治的，也不能依靠恐怖来提高税收和期待忠诚。连一般的反动派政治家们都知道：革命失败的震动是不可能长期瘫痪市民资产阶级的运动党的。聪明的政治家们更是懂得：统治的贯彻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因为政治是特别依赖于社会局势和社会变化的。这种复辟与反动在 1849 年未经激烈的社会斗争而结束，以及向“新时代”的过渡，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19 世纪的 30—40 年代，是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繁荣发展的伟大时代，一个工业革命的突破时代，一个得到加速发展和增长的景气时代，它对所有的经济部门和所有的社会阶层，因此也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贫困化危机得到了抑制，人口增长与停滞的劳动市场之间的剪刀差缩小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尽管在 19 世纪 40 年代才明显有所改善，但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之后还是稳定的，因此，社会革命的危机变小了，农民与小农的经济形势也得到了改善，手工业的危机退潮了，而且通过新的“合作社”组织形式开始了局部的现代化，并部分地与现代社会达成了和解。

总的来说，那个日益崛起的市民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已变得更为富有，而且从社会地位上讲，它的内部也发生着分化。一个由工业界企业主组成的工业资产阶级，已开始从过去那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市民社会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是根据他们所面临的不同局势，所拥有的不同能力、技能、收入、利益和价值观念来进行的，也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度来加速度地进行的。这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通过财产占有上的有利局势，通过股份制的扩展，通过建筑业和铁路业的繁荣，通过投机，赢得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在他们当中，一个大资产者的阶层已在形成之中。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过去同样属于市民社会中间层的小手工业者成员，却越来越多地落入到工人队伍的行列中。由小手工业者的这种成分

组成的工人队伍，与来自老的乡村和城市的下层人口一起，向着现代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大农业的非市民资产阶级力量，作为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农业现代化及其在经济上的成功，恰恰给容克阶级带来了好处，因为这种成功为他们在这个不断现代化的世界中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物质上的支持。总之，这是一场快速、拥挤，因而也是不断受到压缩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德意志社会正在变得更现代化、更都市化、更工业化、更商业化，同时也显得更具有理性，更具有灵活性，更具有活力了。但是，人们不可忽视传统的强大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期的漫长和曲折。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德意志仍然是一个乡村和小城市的社会，大工业生产的份额在国民经济中还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社会心理状态比经济关系缓慢得多地变化着，手工业工人仍然将自己看作与企业主一样地属于这个市民社会。但是，敏感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观察已经发现：这个现代主义的世界已变得更无安全感，更无归宿感了。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还有现代化的损失和现代化的危机，这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恰恰出现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现代化局势与传统的心理状态和制度并存的时期里，从而也加剧着德意志特有的、受到压缩的现代化局势。这种局势从19世纪7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直到1914年，将会成为德意志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但在1890年至1914年的这24年中，这种局势还被阻止着。从根本上讲，这还是一个繁荣的阶段，因为危机还没有出现，对现代性的抵抗在减少，对它的信任还在增加。

尽管有大农业经济上的成功，但与那些传统的、贵族的、官僚政治中的权力精英相比，资产阶级的世界以及现代主义的工业经济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了。当这些资产阶级的力量变成这个现代化经济社会领导性的或是参与领导的载体时，他们与那个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传统的、“前工业化的”、“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之间的紧张也在增长。但这种社会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一种简单而明显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紧张并不具有革命

性，它被日益增长的、尽管也是不均匀地分配的经济上的富裕所阻止着；另一方面，这种紧张也由于市民资产者阶层内部的分化，由于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的非同一性，由于工业资产者与产业工人之间的鲜明对立而有所削弱。而且，农民和工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和贵族世界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简而言之，这个社会力量的平行四边形是不稳定的，同时也是彼此矛盾的。

就这方面而言，社会力量的分配最终取决于政治上的进程与决断。但这种进程与决断开始具有一种新特点，也就是说，它比以前更为紧密地与这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联系在一起了。

政治特点上的这种变化，首先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贯彻自由主义的方案变得更为困难。无论在哪里，当利益的对立尖锐化地变成危机的时候，那种力图通过讨论和妥协来平衡利益，形成一致意见或是通过多数来决断的思想，就在那里失去分量。“公益”则可能成为某种与资产者自由主义的个人和集团利益总和完全相反的东西，从而使老的国家，新的民族，或是社会主义的方案和理想，都显得比自由主义方案更适合解决时代的问题。无论怎样，运动与固守，王室与人民代表之间的简单对比的概念，已不再足以使人明了社会的真相，这一点，对当时几乎所有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欧洲国家与社会来说，都是有效的。

在德意志，关于政治新形式的选择还是敞开着，因而也是未作结论的。凯撒—波拿巴主义、公民投票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已成为同时并存的、左右政治方向的不同解决方案，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又是交叉重叠的。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民族问题，如何解决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与教会的冲突问题，这些都对阶级战线的构成提出了挑战。无论是权力公正的理想，还是坚持传统关系稳定性的理想，都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

而且，就连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当政治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政治取决于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反对政治对手的时候，各种政治力量便开始采取阶级政策的政治路线。而且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各种政治力量既可

能为了保守主义的目标而采取“革命性”的手段，也可能为了革命性的目标而采取一种类似于“保守主义的”手段。总之，那种迄今为止的政党派别形式以及它们的对立，都已变得陈旧了。因此，出现了新的联系与新的表达方式，首先是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以及一种与容克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俾斯麦相关的新保守主义。

最后属于这种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的还有一种精神—心理氛围上的巨大变化，一种对生活和世界解释以及生活感受上的巨大变化：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经验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繁荣，历史科学的统治，已剪断了与古典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相连的脐带，并坚持着经历、事实和试验原则以及行动主义；在新教的领导者和学者阶层中，教会宗教性的削弱，不可知论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渗入，已经使得对家庭、工作、艺术、民族、未来社会的信仰，作为“替代性宗教”出现了；而在艺术向着“现实性”以及现实主义的转折中，进步的信仰与异化的感受，导致了对生活意义解释上的分裂，形成了以乐观主义的发展信仰为一方，与以悲观主义、世界悲哀论和生活意志丧失论为另一方的对峙。对于前者，人们已不再能简单地用“平庸主义”去测量它们，而要用科学上、技术上、经济上的知识，用更为深刻的世界理解才能估量它们。对于后者，叔本华哲学的大众化和里查德·瓦格纳的“拯救音乐”，显得更重要了。尽管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倾向和对生活的解释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平行化，因为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德意志特殊现象，但是，对于政治发展的方向来说，它们都变得与物质上的发展同样重要了。

二、自由资产阶级向妥协政策的转变

自1858年元月以来，随着普鲁士王太子威廉接替患精神病的威廉四世，出任“摄政王”并推行“社会和解政策”的新方针，一个对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时代”开始了。在政治高压下沉默了几乎十年之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

又卷土重来，但这个政治运动在它的政治战略上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自由主义者们尽管仍然以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国家为目标，但是，与 1848 年“三月革命”不同，他们不再强调政府与议会的二元主义中后者的特别地位，而是强调使政府体制本身自由主义化，并使之逐渐地向自由主义政府过渡，强调使现存君主专制国家公民化，以达到粉碎贵族、容克和军方压倒优势的影响，最终结束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的目的。在这里，英国的君主立宪进化模式具有了特别的吸引力，而法国的革命样板已失去了仿效的价值。

同时，国家的意义得到了强调，早期自由主义左翼强调的人民代表与专制政府之间，自由与权威之间对立的二分法思想退潮，而革命前的右翼自由主义者的力量，在整个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了上风。这些右翼自由主义者现在大多认为：“国家并非必然就是一种恶，并非仅仅只是针对个人利益的苍白手段。国家也有它自身的目的。在国际权力斗争的秩序中，在对社会进程的操纵和把握中，在国民教育的组织中，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这本身也赋予了国家相对于个体而言的自身的权利。总之，国家也是能够成为自由的代理人和保证的。”^① 因此，他们现在转而强调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的必要性，并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存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强大仅仅只有通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才有可能，国家需要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而这部宪法不是要限制国家的力量，而恰恰是为了加强国家的力量。

更加保守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开始怀疑，议会作为利益平衡或多数利益形成的场所，是否也是一个社会利益冲突的场所。这种怀疑的背后显然有 1848 年革命中“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影子。总之，既有对无产者革命的恐惧，也有对无政府主义的担忧，更有对多数决断的疑虑，以及对公民投票式民主的厌恶。那位转而拥护普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8—1849》，慕尼黑黑 1983 年版，第 208 页。

鲁士王权的右翼自由主义者、柏林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契克这样写道：

人们不会弄错，不满的群众对君主政体的依赖是超过对议会的信赖的。这种社会状况在德意志完全是健康的。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维护和巩固内部和平，无偏见的解决由于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所引起的暴力问题，一个强大的、超越社会对立之上的王权（君主政体）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考虑到普鲁士王权的这种力量，考虑到唯有借助它的帮助，才可能解决和完成德意志民族的那些重大问题和伟大任务的时候，我们自由主义者必须降低我们某些最好的、也是与一个活生生的君主权力不协调的愿望。属于这种愿望的首先有要求一种政党政府，以及一种不受限制的纳税上的否决权。君主政府事实上具有比一种政党政府在政治上更大的连续性，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种关于它阻碍了进步的说法，并没有被经历所证实。^①

在“统一”与“自由”二者不能兼得的巨大困境中，自由主义者们也开始向民族政策上的重心移动，他们提出了“统一优先于自由，统一必须被看作自由的前提”的口号。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现在都认为：“没有统一的民族安全，自由就不能存在。没有统一的社会公共生活和承担更大责任的大国家组织，自由也就不能摆脱邦国化结构阴影下的地方分裂化和各邦兵营化的存在。”而且他们普遍地将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因为，若是在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最大的、也最有可能成为统一中心的德意志邦国之间进行比较的话，至少从目前经济发展趋势上看来，普鲁士是更加自由主义的。不少人甚至这样设想：“先有一个统一的普鲁士—德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48—1871》，斯图加特，1982年版，第225页。

国，然后让它摆脱普鲁士的军事专制，这或许是一条建立自由主义的统一德国更近的道路。”^①

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明显地与传统专制政权达成妥协与合作的政治战略，究竟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

首先，德意志的自由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主张革命运动的阶级，也从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进行革命运动的阶级。这一点早在 1848 年的革命中就表现出来了。尤其在 19 世纪 50~70 年年代的工业化繁荣中，这个变得更为富裕的阶级更不认为有再进行一次革命运动的必要了。自 1871 年以来，俾斯麦的一系列成就，包括使关税同盟国家与法国、继而也与英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在内，并不是没有给资产阶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那种反对这位有成就的政治家的立场，这一点在自由主义者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议。不少人看出，直接的对抗不仅没有获胜的前景，而且只会带来两种可能的结局：或是带来一场来自容克军方极端保守派推翻俾斯麦的政变；或是导致俾斯麦采取一种沙皇式的专政。因此，与传统的政治秩序进行妥协，并不意味着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打算放弃他们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确保资产阶级社会继续发展的目标，而是意味着他们打算通过参与政权来接近他们的目标。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个专制国家投降，这种与专制政权的妥协议同样也是对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的一种维护。他们与俾斯麦进行妥协，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与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分工的联盟”。一方应不受干扰地进行经济上的经营；另一方也能够特定的前提下继续统治。德意志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赫尔曼·鲍姆加滕在 1871 年将这种野心清楚地表露出来：

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里，市民资产阶级都是把自己提升到一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8~1871》，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462 页。

种极高的经济意义的权力上的，一种高傲的科学和工业知识的权力上的。所有的现代国家，从根本上讲也是建立在这种市民资产阶级活动的基础上的。因此必须在政治生活中赋予市民资产阶级力量以一种有意义的影响。但是这个资产阶级是为了他们的上述活动才被造就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统治而被创造出来的，统治是政治家们的根本任务。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发生着：我们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苦难，而我们的失败却给我们带来了溢于言表的幸运。这里并不存在着贵族与市民资产阶级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分工。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即只有当那个根本的政治阶层能派出了它最优秀的代表的情况下，这个资产阶级才能将最高的国家领导地位留给贵族，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也只能建立在这种明智的、进行国家合作的诸因素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无论怎样，这种与我们的贵族进行妥协的转变是一种猛然醒悟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义务。^①

当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变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在 1848 年到 1849 年的这个新时代里，与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相平行的，还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正面阶级斗争的开端。无论是拉萨尔于 1848 年组织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还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组织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都标志着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已开始从市民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政党了。1848 年建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已成为欧洲各工业化国家中最早的工人政党。早期的自由主义运动，连同它“建立一个没有特权的，没有阶级的市民社会”的理想蓝图已经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德意志的工人运动和政党在继承早期自由主义中的某些解放因素和民主成分，而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已

^① 阿道夫·馥·比尔克：《1848 年十月的决断》，法兰克福 1848 年版，第 140 页。

经蜕变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质利益的代表。

德国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尖锐地指出：“那种早期自由主义进步的、以整个社会的政治解放和民主化为目标的理想模式，由于工业化进程中那些没有为它的代表们所预见到的经济变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变化，实际上已蜕变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运动党本身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① 总之，德意志自由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来得及从贵族手中夺取到政权的情况下，已面临了另一个现代阶级在政治上有组织的挑战，这种局面是其他现代化国家如英、法、美等国中的资产阶级都未曾遇到过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然不愿使自己陷入到政治上两头受夹攻的境地，因而寻求与它的政治对手中的一方达成妥协来解除困境。它选择专制国家作为妥协的对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这个阶级经济上的成长与发展，与现存统治秩序本身有着紧密的联系，或着说，正是这个现存统治秩序扶植的结果。

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图默则进一步指出了德意志资产阶级与容克专制国家妥协合作的物质基础：

通过普鲁士所形成的权力保障，通过与那个由英国领导的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体系所达成的贸易条约，这个巨大的内部市场以及它的潜力，对于莱茵和南德的企业家和占有者市民的大多数来说，已变成了与普鲁士联合的决定性理由。由此而带来的民族氛围是重要的，~~1871~~年的军事决定也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即在阿尔卑斯山与北海之间，这个民族巨大的经济空间，显然为中欧日益扩大的工业化经济提供了最佳的形式。在这里存在着工业家、大地产以及国家当局之间紧密结合的联盟基础。专制国家承担了建立帝国的任务，并经

^① 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柯尼施泰因 ~~1871~~年版，第 ~~187~~页。

受住了内部所有的政治冲突。^①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转向清楚地说明：德意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是能够在资产阶级不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情况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即使没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力，也同样能获得经济上的发展。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埃利所讲的那样：“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用另外的方式，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手段，也是能够获得与确保的。当然，这必须以这个国家事实上与合法的资产阶级利益的相应实现相一致为条件。1871年至1890年间的那个德意志帝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优先的必要性，即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正在追求的利益创造有利条件，才用暴力方式创建起来的。”^②

总之，人们必须承认，并非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1871年以前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已证实了这一点。当然，德意志的历史还将证明：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若是有一种能成功发挥功能的民主制度的宪法框架的话，则是可能更为有效地控制那种既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又具有侵略性和毁灭性的倾向和趋势的。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才产生了从内容和形式上学会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进行区别的任务。

三、保守主义的现代化与“政治强人”俾斯麦

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对手是保守主义运动。对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转折和特点来说，没有比保守主义的政党，尤其是政府中的保守主义阵营的强大更为重要的了。自从1871年后在“复辟时代”陆续清除自由派官员以来，各邦国政府几乎都成为了保守主义官僚们的一统天下。

① 米夏埃尔·施图默：《帝国建立，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与欧洲平衡》，慕尼黑1989年版，第254页。

② 戴维·布莱克本、杰弗·埃利：《德意志历史描写的神话》，法兰克福1984年版，第254页。

从根源上讲，保守主义是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封建贵族阶级对现代化发展进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一种回答。这个贵族阶级不仅从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中收取他们的利益，而且也从参与贸易和交易所中的投机上获取利润，因而从经济上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与新的资本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但是，在不得不承认市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同时，他们又不想承认新生产方式给封建贵族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因而顽强地利用还没有被打碎的自我权力意识与这种政治上的后果作斗争，并极力维护他们封建性的统治特权和传统的政治制度。就这种立场而言，英国的贵族与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然而，这种欧洲保守主义原则根源上的同一性，在各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丧失掉了。到 19 世纪，从政治上讲，英国的贵族已是在用不同于普鲁士的另一种形式进行统治了，而且从社会上讲，也已“资产阶级化”了。而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仍然将自己作为一个既能充分利用、维护他们的封建特权，又能以新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来看待。从经济上讲，与市民资产阶级一样，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同样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从政治与社会上讲，却与前者不同，他们仍然是“前资本主义化”和“前现代化”的主要代表。因此，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简单地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作逻辑上的归类，就如同将经济上的封建主义简单地与政治上的保守、专制主义作逻辑上的归类一样是不科学的。而且从历史的真实性上讲，这种归类也并不具有必然的强制性。正如德国历史学家黑尔加·格雷宾所指出的那样：

保守主义也是同样能够作为实施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由而得到辩护的，而且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还能够变得更加强大，特别是当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解放、民主的革命因素被一个新的社会解放力量——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所接受，并被用来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19 世纪

缘~ 远年代以来，出现在德意志社会中的正是这种局面。^①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德意志保守主义者是处于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自由主义运动的老政治轨道之中的，特别是那些容克军界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们，更是坚持传统的教条和理论，他们在策划着一场国家政变，力图达到改变现状、重新恢复等级体制的目的。而那些官僚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则与之不同，他们倒是现实得多。他们认为在宪法问题上应采取宽容、让步的态度，应运用对议会选举的操纵，才可能达到建立新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目的。

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为这种保守主义的转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他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完全能够有利于保守主义者，因为它尤其能通过上院和王室，比以前强烈得多地将老精英们的、首先也是贵族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将他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能反过来通过上院、选举权和宪法的保障，来巩固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与角色。”^② 这是一种议会主义的保守主义，它寻求利用新的政治体制来巩固自身的影响，并力图阻止反王室、反贵族的市民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每一种扩展。正是根据施塔尔理论上的设计，普鲁士于革命后的缘缘年远月开始推行“三级选举制”。它所体现的已经不再是老式的保守主义了，因为选民不是根据封建世袭等级制的原则，而是根据纳税能力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投票的。但是，与普选权意义上的自由选举相比，它显得仍然不符合时代精神，因为它仍然在造就一种新的特权秩序，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平等的秩序，这种秩序体现的只是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根据纳税能力的划分，在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缘缘~ 缘缘》，斯图加特缘缘年版，第缘缘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缘缘~ 缘缘》，慕尼黑缘缘年版，第缘缘页。

1808年，选民中只有莱茵省是属于第一等级的，西普鲁省属于第二等级，而其余省份都是属于第三等级的。

这个通过“三级选举制”形成的普鲁士新体制，突出的是国王的权威和容克贵族的利益，而且也只具有貌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国王仍然是国家权力的占有者，是行政权力、法律程序、军事权力的主人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通过他指派的政府起着政治中心的作用。军队与官僚机构是这种统治的支柱。总之，这个国家仍然是国王、官僚、军方的国家，而贵族的政治特权，也通过由国王提名组成的上院得到了巩固。

但是另一方面，普鲁士也开始变成了一个法治国家。从法律上讲，它已不再是一个君主私人的专制主义国家了，它有确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基本权利，有分权制，有一种作为民众代表的代议制机构——下院。尽管这个机构是通过三级选举制产生的，但它已不是一种封建等级集团利益的代表了，而是以全体国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的名义来出现的，并且已获得了对立法的参与权和国家财政预算上的否决权。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尽管没有一种议会主义的内阁，而是一种责任内阁制，但是，从长远看来，独立于议会的政府的独立性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了。保守主义的力量虽然再度占据了国家的权力，但与革命前不同，普鲁士已有了一部宪法。在1850年，这部宪法代表着国王的权威与市民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运动之间达成的一场妥协，也是保守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之间的一场妥协，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它恰恰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容克贵族保守主义者“宪法冲突”的基础。

在保守主义者当中，那些更机敏、更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理论家和时事评论家们，已认识到了每一种现实主义政策与社会力量对比之间，以及这种对比的移动之间的关联，并开始寻求在这种关联上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保守主义政治。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海因里希·里尔、洛伦兹·斯泰因，以及那位后来积极主张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具有“社会王国”思想的柏林大学经济系教授阿道夫·瓦格纳。他们代表着一些力量强大的以保守主义为方向的社会

集团，如城市、地方、工业、大专院校中的市民资产阶级反对派，也是现代化和市场社会的反对派。他们认识到保守主义必须动员起传统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利益，首先是老的阶层与等级，尤其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那些受到自由主义威胁的教会正统主义者及其家属。正如这些理论家们所云：“德意志世界尽管还不是一个群众和群众政治的社会，但是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再能仅仅依靠君主和国家机器，依靠贵族和教会的家长式权威来维持统治了。”^①

在这些理论家的推动下，普鲁士政府开始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经济上的安抚政策。例如，通过设立针对农民的贷款银行，以完成“农民解放”；通过对工商业自由进行限制或拖延的法律，以阻止手工业者的骚乱；不顾自由主义工场主们的反对，向工厂派遣政府的监察员，以实施限制童工劳动、确保工人健康、防止工伤事故等“工人保护措施”。同时，普鲁士政府也采取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和非官僚化的政策来迎合工业资产阶级，例如，促进股份公司的建立，采矿业中的经济自由化等。所有这些不仅完全符合国家利益，而且也具有一种内政上的功能。它能使现存统治秩序避开或削弱社会诸种力量的压力，并通过一场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来巩固这种保守主义的政治体制，因而也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国家智慧。

对保守主义政治进行更大幅度的现代化改造的决定性人物是奥托·冯·俾斯麦，此人是在 1871 年 1 月“宪法冲突”的最高潮中登上普鲁士总理大臣的宝座的。这场冲突的焦点在于一场有关国家军事改革方案的争端上。军方坚持军队必须保持在宪法约束之外，它只听命于国王，而不听命于议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议员们的想法则相反，他们想要一支服从宪法，不听命于国王，只听命于议会的军队。在这场冲突中，军方的武器是通过国王来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进行重新选举，直到选出一个能与行政当局合作的议会。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9—1871》，慕尼黑黑 1983 年版，第 303 页。

但是，在重新选出的议会中，自由主义进步党成员仍然占据着多数，而运用这种议会多数在国家财政预算上的否决权正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武器。他们相信，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国王的政府就不能进行统治，在议会重新选举中保守党人仍得不到多数的情况下，国王最终总得任命一个力图与议会取得一致意见的政府才能行使统治，这就会导致一种政府体制的改变，从而出现一种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式的温和的议会民主的政府形式。因此，这场冲突的僵局，本身意味着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政治强人”俾斯麦的登场决定了这场历史的决断。在国王甚至准备退位的情况下，他成为能维持和挽救这种君主制传统地位的惟一人物。这位容克阶级中最具现代化头脑的代表、闻名于世的“铁血宰相”、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命运来说，无疑是具有悲剧性的。这位 1848 年革命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在革命之后，在几乎所有的政治领域里都开始摆脱保守主义旧的思想束缚。他认识到了政治上的现代主义条件，看到了一种公民投票式的议会主义的必要性，也承认了民主主义动员和社会现代化的不可抗拒性，并认识到了民族运动和民族问题的不可逾越性。从思想政治上，他不再拒绝社会和政治中的现代主义运动，也不否定它们，而是将它们作为现实性来接受了。因此，他尝试着采纳它们，并利用它们来贯彻他的保守主义，以达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强大政府的目的。在与现代力量部分的联盟中，他不再害怕采用完全是非保守主义的、也是现代主义的手段了。这就必然使过去的老保守主义发生现代化的改造。面对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他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保守主义原则，最终确立了“国家权力至上主义”的优先权。这种向权力现实主义的转变，使得俾斯麦这位保守主义的政治家，先是变成了一位处于他的政党边缘上的人物，后是变成了一位貌似处于各条政治战线之间的人物。

上台后的俾斯麦首先拒绝了极端保守主义者全面废除宪法的反动政变计划。在他看来，“一场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施镇压的专制

主义征服，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出路的”。与此同时，他也必须消除国王周围的极端保守派们对他要与自由主义达成妥协和谅解的怀疑。为此，他极力将自己作为王室坚定的捍卫者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硬对手来表现，从而也巩固了自己在保守主义阵营中政治领导者的地位。

在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三角斗争的复杂局势中，俾斯麦力图利用菲迪南·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来使容克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织之间结成一条战线，以达到对抗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目的。1867年12月，他已打算引入民主主义的政治手段——普选权，这也正是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强烈要求的。为此，他甚至与拉萨尔举行了谈判，从而使自由资产阶级大为震惊，因为在欧洲，当时还没有哪一位“正常的”保守主义者敢于作这样的政治思考和举动。俾斯麦的这种政治举动对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具有一种明显的恫吓作用。

在民族政治上，俾斯麦提出的“在普选权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德议会”的要求，与其说是一种与民族民主主义者联盟的提案，还不如说是一种使普鲁士国家与自由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运动结成联盟的引诱性尝试。因为在俾斯麦看来，自由主义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是惟一符合时代潮流和有未来前途的纲领，他的德国统一政策也只有与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运动结合起来才有成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巧妙地自由主义者那里夺走了这个纲领。正如洛塔尔·加尔深刻指出的那样：“与1848年奥地利的改革计划相反，俾斯麦所赞成的这个目标，也正是自由主义进步党——这个普鲁士内部决定性的反对派们——的目标。”^①

俾斯麦相信，通过民族政策和对外政治上的成功，通过普鲁士国家去实现自由资产阶级民族统一的理想，就能打破内政上的僵局，并驯服自由资产阶级，因为民族统一正是德意志自由资产阶级

^① 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柯尼施泰因1964年版，第154页。

在 1848 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1849 年德丹战争的胜利已明显动摇了自由资产阶级的阵线，因为它表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不是在自由主义的轨道上，而是在别的轨道上获得成功的。连最坚定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特奥多尔·莫姆森在 1850 年也这样说道：“对于德意志的自由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选择就是：或是臣属于这个不受人欢迎的德意志大国普鲁士之下，或是民族的没落。”^① 这样，“自由”与“统一”目标之间的僵局被打破了。

对于这个由普鲁士当局来领导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方案的最终实现，这位半生从事外交生涯，先后做过普鲁士驻德意志同盟特使、驻俄大使、驻法大使，因而熟谙外交事务、目光锐利、富于想像力、手腕高超的普鲁士总理大臣是信心十足的。这不仅因为他坚信“铁与血”的力量，而且也因为他已在欧洲局势的变化中看到，对德意志统一来说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已经来临。

四、“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众所周知，俾斯麦先是通过 1849 年德丹战争，后又通过 1850 年普奥战争和 1850~1851 年普法战争才成功地使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成为现实的。鉴于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长期面临的特殊困境，理解这个“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理想的实现与欧洲以至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联，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人们必须看到，由俾斯麦领导的这场暴力式的民族统一运动是在一种变化了的、因而也是完全不同于 1848 年的“维也纳秩序”的国际框架中进行的。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1848 年建立的国际体系规定了欧洲中部的政治格局，然而 1850 年至 1851 年的北美军事冲突已经说明：国际秩序全球化阶段已经开始。国际秩序已需要越来越多地估计到“外欧洲角色”的分量了，或者说，“外欧洲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8~1849》，慕尼黑黑 1988 年版，第 342 页。

因素”也已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这个欧洲体系的特点与发展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跨民族关系及其运动的形成和加强，与独立的海外统一单位贸易上的接触，已经使欧洲的国家体系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这种全球化正是工业化世界不断向外扩展的结果。自从西欧国家在海外为他们不断扩张的工业化经济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来，这种全球化倾向便在不断加强。向亚洲和美洲空间的扩张，构成了首先是德意志同盟周围的那些统一大国们冲突的新基础。

1806年~1812年的那场围绕着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圣地”而打响的克里米亚战争，正是作为那些统一大国们的头一场新冲突而出现的。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五个大国中就有三个互为敌国的事实，对欧洲未来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由欧洲大国统治的国际秩序要和平地处理冲突看来是越来越困难了，或着说，这些大国对此已越来越不愿意了。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也向彼此的对手们提出了更高的现代化要求。俄国的战败不仅给它在欧洲和近东的大国地位带来了严重挫折，而且也迫使它从长计议，去进行它自身的现代化改革。这位“欧洲宪兵”向国内领域的退缩，给欧洲的大国关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也使欧洲政治地图的变化成为了可能。因此，1815年在维也纳上演的那部“欧洲协奏曲”开始被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大规模“混乱时代”所取代。

这种新形势对普鲁士来说产生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必须迅速地将德意志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组织起来，以适应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因此，民族统一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了；另一方面，那些统一大国们的新冲突也恰恰为德意志在一定范围内的统一创造了良机，因为那些过去一直防范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出现的东、西方大国们，或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中欧了，或是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普鲁士在欧洲来扮演一种角色了。正是这种“克里米亚效应”，才容忍了在中欧出现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作为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惟一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有限

解决方案。^①

当然，要理解西方大国对这个“小德意志民族国家”方案的容忍态度，人们还必须再度回顾这个历史发展的事实：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普鲁士与其他关税同盟的成员们，在一种受到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已迈出了走向工业化集体社会的步伐。对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它们的投资者来说，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关税同盟——作为市场是越来越令人感兴趣了。尽管像西欧国家一样，普鲁士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开始努力寻求欧洲以外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然而，“大农场主阶级”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他们仍然是按“大陆概念”来思考和行动的。由于他们的影响，普鲁士的德意志政策和欧洲政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中欧，关税同盟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也仍然主要局限于中欧的范围内。更有意义的是，通过1834年与法国的贸易条约，普鲁士加入了那个通过1834年《科伯登条约》才形成的西欧自由贸易区，因而也就从客观上为西方大国造就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市場，并终于使西方大国所企盼的关税同盟贸易政策上的自由化成为了现实。在德意志同盟中的两大国与西方大国的交往关系上，普鲁士已经赢得了关键性的一分。

作为这个关税同盟的主导国，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运用外交上的技巧和压力，始终坚持将奥地利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并迫使他的关税同盟伙伴们接受条约上的义务：“拒不给那个已在外交、金融、经济政策上遭到打击的奥地利所盼望的支持。”普鲁士这种“贸易政策上的霸道”，迫使奥地利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继续采取保护性贸易的经济政策，因而也使得它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日益丧失了信用。由于奥地利在德意志同盟中主导国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因其在1859年意大利冲突中的败北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因此，这种信用的丧失只能造成它财政上的更大困难，并使它在欧洲政治舞台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48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53年版，第285页。

上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现在，西方大国在对普、奥二强的态度上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西方大国看来，与那个欧洲大国奥地利相反，普鲁士在中欧更强的军事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德意志同盟和欧洲体系稳定的危险，因为这个加入了自由贸易区的普鲁士“将始终都是一个依靠必需品的大国”，因而对西方来说也是相对可控的。如果说在没有德意志同盟的情况下欧洲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么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以及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地位，也不失为一种能发挥功能的替代品，并且也是能为中欧和平的更大巩固和政治稳定作出贡献的。

除了普奥“二元平衡”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外，人们还有必要对各欧洲大国容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更具体的原因，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作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大英帝国，其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反对潜在的世界大国——俄国和美国，确保它的全球性地位上的。英、美关系自从1894年以来由于两国在中美洲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对抗而紧张化了，而内政上的种种困难（如政府倒台，选举权改革，军事改革，经济问题，爱尔兰问题等），却使英国的海外行动能力受到了削弱。为了提高这种能力，大英帝国迫切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欧洲国家体系。因此，在英国看来，对欧洲国家体系作稳固化的修改是值得向往的。一个通过战争而得到加强的普鲁士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因为它能作为稳定因素对俄、法之间的权力均势发挥影响，特别是在这种俄、法之间的权力均势中再也看不到一个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同盟的时候。这样，英国，作为德意志统一的潜在反对派，已被悄然排除了，这是1871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①

俄国是最能直接对德意志空间的统一前景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在俄国的传统思想中，德意志空间，这个处于俄国西部边境的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德意志史，1849—1871》，慕尼黑黑1984年版，第299页。

直接邻邦，在地缘战略上是扮演了一种中心角色的。从权力格局上考虑，这个德意志空间正是东欧政治和军事的前沿地带，因而也是一个提高了安全敏感性的地区。每届俄国政府，无论是从防御上去理解它的安全，还是从进攻中寻找它的安全，都始终具有这种安全上的敏感性。然而在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心进行内部改革，改善经济结构，扩建现代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这种“对未来的考虑”与一笔庞大的金融负担联系在一起，本身就减少了对外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而且俄国改革中的经济，本身也存在着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经济空间的强烈依赖性，一场军事干预显然会反过来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上的困境。加之，到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通过它的不继扩张已变成了一个太平洋上的大国。在与西方大国和美国的竞争中，它必须将有限的军事能力首先用于确保和扩大它在未来有着重大意义的国际大空间——远东——的经济、政治、领土利益上。因此，俄国人现在认为，只要德意志空间政治格局的变化不改变俄国在欧洲和国际上的现存地位，那么无论是德意志同盟的瓦解，还是北德联盟，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俄国转而对这个西方邻邦采取“外交上亲善的中立态度”了，在大陆政治局势中，这是自从俄国扮演传统的“欧洲宪兵”以来的又一个百年未遇的现象。

与其他的欧洲大国不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政治局势的混乱之中，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实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政治地图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法国是支持每一种对 1815 年“维也纳体系”的修改的，只要这种修改能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并能给法国带来利益上的好处。为此，拿破仑三世甚至不惜举起支持民族统一运动的旗帜。在理解法国这种立场的同时，人们不应忘记，“维也纳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以拿破仑一世疆域广阔的法兰西帝国的失败为基础的。因此，比较起其他大国来，法国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尽管拿破仑三世懂得，德意志同盟的解体意味着“永恒时代”的结束，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抵制。在他看来，“为

法兰克福而死”丝毫不符合法国内政外交上的利益。尤其是，如果在一场中欧的强权政治的转手倒卖中能使法国获得领土上的补偿的话，这样的转手倒卖倒值得欢迎，因为这种领土上的补偿，是能被这位“民选出来的皇帝”作为处理内政上冲突的工具来使用的。

这样，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法国将自己的目标限于这一点上：确保南德意志国家的一种独立，这些南德意志国家应组成一个南部联盟，并与普鲁士所领导的北部德意志形成一种松散的国家法律上的关系，同时法国应使自己获得对南德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出于强权政治和安全政策上的需要，法国也应将南德造就成一个北德联盟与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地。尽管法国在 1866 年 7 月向普鲁士领导的北德联盟宣战，但这种宣战的背后，阻止一个“小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意图，是少于恢复受到损害的国家政治荣誉的企图的。例如，在这场普法战争的准备阶段，巴黎的自由主义新闻出版界和政府圈子里的观点，丝毫没有表明法国是将这个“小德意志统一国家”的建立看作战争原因的。波拿巴主义的战争宣传机器是这样进行宣传的：“我们是一直希望德意志统一的，但那是真正向往自由的统一，而不是这种野蛮的，暴力式的，采用不体面手段强迫进行的统一！”^①

因此，对德意志人来说，一种新的欧洲局势出现了。自从那个老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后的数百年以来，德意志人还是头一次面临如此有利的欧洲局势，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终于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解决的可能性条件，而这种条件，也正是这个地处欧洲中央的民族实现统一的关键。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连续展开三场战争来完成民族统一的任务，无疑证明了俾斯麦这个欧洲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的眼界。

当然，俾斯麦是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利用战争手段，将奥地利“永远开除出德意志大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848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52 页。

家庭”，并按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方案”来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在实现这一目标上，俾斯麦更表现出他那欧洲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大家手笔，也正是靠了他那高超的外交手腕，才使可能变成了现实。

首先，他利用俄、法、奥的三角矛盾，赢得了俄国的亲善，不受干预地取得了 1866 年德丹战争的胜利，从而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回归了德意志大家庭。随后，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拒绝了奥地利的以普鲁士的西里西亚区换取由奥方新统治的荷尔斯泰因的建议，迫使奥地利或是放弃荷尔斯泰因，或是进行战争，从而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了奥地利的头上。继而他利用法、奥的矛盾，赢得了法国的中立，并通过 1871 年普奥战争的胜利，将奥地利赶出德意志大家庭，建立起北德联盟。最后，他又利用英、法的矛盾，赢得了英国的支持，并借助“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利用《埃姆斯电报》诱使法国首先向德方宣战，从而将南德联邦诸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因为俾斯麦知道：“唯有在一种有威胁性的国际危机的外部压力之下，也就是说，唯有当危及到它们自身的民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导致那些德意志中、小国家放弃它们的主权，从而有利于联盟的一种更紧密的组织形式。”^① 整套战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令人眼花缭乱！

总之，无论是 1866 年的普奥战争，还是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其结果是清楚的：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不仅最后完成了“小德意志统一”大业，而且还将对工业化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并入了这个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之内。一部从现代意义上讲能称之为民族国家——“德国”——的历史开始了。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新的现代民族产生的同时，并行发生的则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头一场现代分裂。奥地利，这个过去的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866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28 页。

多民族的邦国，从德意志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了，这成为了这个新德意志国家宪法关系上的一个无情的结论。因此，德意志民族过去的那种只有作为一个跨民族的中欧国家集合体，才能从政治上存在下去的结论，终于被推翻了！而这又正是德意志民族历史道路悲剧式的体现，这种悲剧直到今天还能被德意志人所感受到。

在开除了奥地利的这个新的德帝国中，这个古老的文化民族分裂的伤口在 1867 年以后似乎很快就愈合了，而且似乎在奥地利那里也慢慢愈合了，但是，奥地利的伤口随后在它自身内部的与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的民族冲突中又再度完全裂开了。1867 年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奥地利与德国，这两个都是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已分裂的事实，又再度成为了所有德意志人存在的伤心事，并无休止地推动着德意志人的共同历史。而那位在 1874 年以后出生的先是奥地利人、后是德国人的阿道夫·希特勒，则在半个世纪以后，又将这个分裂的伤口再度暴露在德意志人、欧洲人以及整个人类的面前。在这种历史并没有真正医治好的文化民族分裂创伤的阴影之下，人们不禁感到：在民族关系上，作出一项重大的历史决定相反倒是容易的，而要真正完成一场悲剧式的转折，却是多么的不容易！

尽管由于奥地利被开除出民族大家庭，因而在俾斯麦战略胜利的背后，有着对普鲁士人、对“小德意志人”的控诉。但是，即使在 1871 年出现一场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也仅仅只能产生一种对德意志现状的维持和继续，而这样的大德意志的中欧邦联体制，由于它较少的内部稳定，微小的一体化力量，由于它没有强大的顶尖领导，也没有真正的议会，是不可能解决这个庞大的跨民族的中欧集合体内部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的，因而也只能较少地满足这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这是因为：19 世纪已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纪了，它反对着欧洲各国的多元民族结构。对民族国家秩序的最终克服，显然只有在这样的秩序已经存在并已取得了巩固的地方才有可能。这也正是在欧洲今后的历史中所要证实

的东西。因此，当关税同盟伙伴国中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的时候，“小德意志方案”才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可能性上的逻辑。

第三章

现代化的成就与困境

第一节 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 发展成就

1871年德帝国的建立，使一个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在“开明专制”之下取得了长达30余年内外和平的发展。相对于1806年以前的德意志其他各发展阶段来说，帝国的建立无疑为这个民族国家提供了最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及最好的内部发展条件。盛产煤、铁的阿尔萨斯、洛林和5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的获得，更使这个刚刚统一的民族国家如虎添翼，一个以新型重工业装备起来的大国，开始屹立于新兴工业世界之中。

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突破之后，统一的德帝国经济已进入到它高度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也正是通过这场高度工业化，德意志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个进程尽管构成了德帝国时代经济发展趋势的根本内容，然而这30年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经历了从1871

年到 1873 年的漫长萧条期，也经历了从 1873 年到 1896 年的又一次大发展时期。无论这种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于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帝国当局内外政策的选择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性的。

一、工业的繁荣与农业的危机

国际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用“来得迟，来得快，来得彻底”以及“跳跃式发展”之类的语言，来形容德帝国时代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确，按当时的标准看来，德帝国时代的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德意志工业化社会已经崛起，以下的各类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问题：

帝国人口从 1816 年的 2500 万上升到 1896 年的 4200 万，这里还不包括 1000 多万向海外的移民。这种人口的增长首先应归因于医学革命化与婚姻制度革命化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它们不仅能降低因疾病带来的死亡率，延长人们的寿命，而且能通过更早甚至是“更经常的结婚”（因为不仅结婚是自由的，而且连离婚也是自由的）带来更多的子女。当然它同时也要归因于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更丰富的食品供应，交通革命所带来的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其他涉及广泛的现代化进步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前现代化社会”中所没有的，因而也是革命性的。

通过与法国的比较，便能显示出德意志快速的都市化倾向。例如，从 1816 年到 1896 年的这一百年中，法国的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 30% 上升为 50%；而在德意志，1816 年还有 7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仅有 10% 的人口居住在 5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但到 1896 年，已有 50% 以上的人口成为了城市居民，而且 10% 的人口生活在 5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① 这种人口生活的都市化趋势，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表明大多数的德意志人已经得通过

^① 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纽约 1896 年版，第 100 页。

一种不受阻碍的工业出口和农业进口来谋求生计，获取利益了。

人口就业结构提供了又一个工业化进步的标尺。农业中的就业人数由 1871 年的 220 万人上升到 1890 年的 240 万人，但在工业、交通业、贸易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的就业者数量则由 1871 年 100 万人上升到 1890 年 200 万人。与此平行的是在大企业中就业者数量上的发展，它表明了生产与资本的集中程度。在 1872 年，在拥有 100 名职工的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占当时总计为 240 万受雇者的 1/3，而在 1890 年，在这种规模企业中的就业者减少到总计为 150 万受雇者的 1/4。与此同时，在拥有 100~200 名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 1/3，在拥有 200~500 名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 1/4，在拥有 500 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 1/5。拥有 100 名以上职工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大工业中的企业，也正是在这些更大的工业企业中，职员阶层的比例得到了最迅猛的增加。作为一种新型的受雇者阶层，这个“白领阶层”已由 1870 年受雇者中的 1/5 上升为 1890 年的 1/3，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它还将以比产业工人的上升率快得多的速度继续增长。^①

平均劳动时间已由 1870 年每周 48 小时下降到 1890 年每周 45 小时，而劳动生产率还在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大部分德意志人较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 1870 年至 1890 年之间翻了一番。人口的平均寿命由 1870 年的 38 岁上升到 1890 年的 42 岁，这本身也是与工作位置的获得、工作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减弱、劳动收入的提高、居住空间的改善、医疗保险的提供、老年救济的保证等密切相联系的。总之，是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和进步密切相联系的。

帝国时代的 20 多年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即使是在长达 10 年的萧条期间，也仅仅是增长率放慢了些而已。若是将 1870 年至 1890 年这 20 年的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计算，国民生产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890》，哥廷根 1955 年版，第 103 页。

总值每年平均净增长 1.9%。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的 1.5% 和法国的 1.4%。187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是 1849 年的 1.5 倍，达到 100 亿马克。工业总产量的指数从 1849 年的 100 上升到 1871 年的 150，又从 1871 年的 150 上升到 1890 年的 250。在 1871 年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德国占 1.5%，超过了英国的 1.4% 和法国的 1.3%，成为仅次于美国（1.8%）而居第二位的国家。在净投资方面也增长了 1.5 倍。工业与农业的净投资比值 1850 年为 1:1，1871 年为 1.5:1，1890 年为 2.5:1。①

具体工业部门的增长数字表现得更为可观。煤产量从 1849 年的 100 万吨上升到 1871 年的 150 万吨，在这个领域里只有英国能与德国竞争。到 1871 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均大幅度地超过了英国：在生铁方面，英国为 100 万吨，德国为 150 万吨；在钢产量方面，英国为 50 万吨，德国则为 100 万吨。而到 1890 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已达 200 万吨，钢产量已上升到 100 万吨，这两项生产均超过了英、法的总和，唯有美国能与之匹敌。铁路自从 1849 年实行“国有化”以后，1871 年间其长度由 1000 公里增加到 2000 公里。② 德国的机械制造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增长，在世界上已无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若用数字来表示，分别为：1850 年 100 台，1871 年 150 台，1890 年 250 台。③

工业经济的成功更是特别体现在三个新兴发展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和光学工业——之中。德国人后来居上，在化学工业中向英国、在电气工业中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到 1871 年，德国的化学工业已雇用了 100 万工人，其染料产量占世界工业染料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890》，哥廷根 1955 年版，第 100 页。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50—1890》，慕尼黑 1950 年版，第 100 页。

③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895 年版，第 100 页。

的**怨**，同时，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雇用了**员**万工人，生产出了占世界电气产品**缘**的产品。而光学工业中的优质产品几乎百分之百地来自德国。“**配**”（即“德国制造”）已成为产品质量的代名词！^①

由于德国缺乏一种像英、法那样的海外投资市场，因此，除非与国内公司的贸易利益相关，否则大银行对于向海外投资是不太感兴趣的。加之德国工业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德国人一般又相当缺乏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一般是集中性地流向国内工业，而不是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对外租借的。德国于**员**年统计的国外投资为**猿**亿马克，与英、法相比，自然显示出德国相当低的海外投资。但是这种对外投资上的冷淡并不涉及对外贸易方面。仅在**员**年至**员**年之间，德国的进口就增长近三倍，由**猿**亿马克上升到**员**亿马克，这也使得德国成为了欧洲国家中最大的原料进口者。德国的进口已经慢慢转向世界原料产地，特别是美国和拉丁美洲。然而，直到**员**年，欧洲仍然是德国工业原料最重要的源泉。另一方面，由于直接的生产过剩强制性地提高了向外销售的要求，因而形成了德意志不断向整个世界市场出口工业品的驱动力。在出口方面，德国也极为成功，在**员**年至**员**年期间，德国的出口也同样增长了三倍，从**猿**亿马克上升到**员**亿马克。^②整个德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员**，仅次于英国的**员**而居世界第二位。

德国贸易的平衡在**员**世纪**怨**年代以后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这种贸易赤字是与它的农业命运紧密相联系的。尽管有可观的工业化，农业仍然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帝国建立之初，德国仍然能被描述为一个自由占有土地的农民和大地产的国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员**~**员**》，汉堡**员**年版，第**缘**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源**卷下册，商务印书馆**员**年版，第**猿**页。

家。农业中土地占有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巴伐利亚和梅克伦堡的“大农所有制”，有莱茵兰的小地产所有权，直到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产。标准的大地产所有者一般占有 4000 公亩以上的土地，大约帝国农业土地的四分之一属于这种地产。但是，到 1914 年后，这个比例在慢慢下降。正如工业化的欧洲普遍存在着的现象一样，由于工业经济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农业中劳动力已普遍受到“逃向工业储备的内部移动道路”的吸引，又由于在德意志乡村中公民权贯彻上的困难，因而农业劳动力流失的趋势在德国内部显得更为强烈。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工业还并没有比农业雇用更多的男工，但到 1906 年，与农业、林业、渔业有关的家庭仅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1/5 强，而且农、林业也成为了主要雇用女工的生产部门。^①

当然，德意志的农业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经济部门。直到 19 世纪 80~90 年代，德意志的容克地主以及农民的处境，在欧洲一直都是最好的。农产品生产在不断扩大，加之马铃薯和甜菜的种植，德意志一直没有出现过全面的农业赤字，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出口者。就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德意志的农业还进入了一个技术进步的显著时期。众所周知，德国是发明和使用化肥，尤其是磷肥的开拓者，这种磷肥是托马斯炼钢法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由于容克是首先使用化肥的，也是最有条件使用化肥的，因而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由容克大地产领导的农业稳定增长的时期。

在 1914 年后，尽管农业商品化仍在急速进行，尽管德意志农业进行了令人难忘的艰苦努力，但在不断加速增长的人口面前，农业要想提供充足的谷物供应，已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德国的谷物生产问题，就技术上的意义而言，与效率几乎完全无关。很清楚，德国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它在国际上的任何竞争者都高得多。1914 年各国每公顷农作物产量的统计表明德国是高居榜首的：德国每公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38 年版，第 127 页。

顷产出 4500 公磅（1 公磅等于 2.2 英磅）小麦、1500 公磅裸麦、1500 公磅大麦、1500 公磅燕麦，而俄国则分别为小麦 1500 公磅、裸麦 1500 公磅、大麦 1500 公磅、燕麦 1500 公磅；美国分别为小麦 1500 公磅、裸麦 1500 公磅、大麦 1500 公磅、燕麦 1500 公磅；法国分别为小麦 1500 公磅、裸麦 1500 公磅、大麦 1500 公磅、燕麦 1500 公磅；加拿大分别为小麦 1500 公磅、裸麦 1500 公磅、大麦 1500 公磅、燕麦 1500 公磅。^①

但是，当国际交通运输的日益现代化使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变得更为便宜时，德国则由于其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在农产品上已经不能与美国丰富的、也是在几乎不用精耕细作的广阔农田上的出产物进行竞争了，甚至连沙皇俄国为换取外汇需要，不顾本国粮食供应上的紧张，而采取的强制粮食出口战略，也对德国的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威胁。因此，不仅容克传统的谷物出口利益日益受到损害，而且到 1914 年，连德国国内居民所需小麦的 1/3 和其他谷物的 1/2 都不得不依靠进口了，这也正是造成德意志自 1871 年以来贸易赤字不断的根本原因。^② 俾斯麦时代制定的《农业关税法》，固然有助于减慢农业下滑及其收入紧缩的速度，但同时也拖延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生产的增长。固然在 1914 年，德国仍能达到在热卡量和菜蔬食品方面 1/3 的自给自足，但是，如果它在谷物生产方面的投入更小些，在牲畜饲养方面的投入更大些，它的农业本来是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的。

当德意志的工业化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它那高质量的工业品正在咄咄逼人地打入世界工业市场，从而使德国坐上“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交椅时，它的农业却在不断萎缩，谷物产品这个具有德意志传统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已经陷入一场与世界农业市场有关的结构性危机之中了。这充分说明德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

① 卡尔·赫尔弗里希：《德国的经济进步与民族富裕，1871—1914》，纽约 1914 年版，第 150 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14 年版，第 120 页。

生活中已占据了完全的统治地位，而它的大地产，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农庄，由于日益丧失了国际食品出口者的地位，已逐渐被挤出世界农业市场。这自然使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加速度地受到侵蚀，同时也使它在国内经济中的分量和意义大为减弱和降低。早在 1905 年，马克斯·韦伯就已经断言：“容克们现在不过是在经济上作临死前的挣扎，从长远来看，当一个经济上日益没落的阶级仍将政治统治权掌握在手中的时候，这是与这个民族的利益不一致的。”^①当然，在这种经济局势面前，容克贵族阶级要想继续维持传统的统治权力，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二、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德帝国的建立，为普鲁士容克贵族阶级受到挑战的统治地位的继续存在再度提供了合法性。传统独裁的专制国家机器甚至在许多领域里，就像在军事领域里一样，还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它已超出了过去普鲁士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统一的德帝国。容克贵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无疑在影响着这个社会。不少历史学家从大资产者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模仿中，从企业主“家中主人”的“父长制”立场中，从他们对工人严格实行的纪律化中，从对“下属们”的所有自我决定尝试进行的强硬抵抗中，得出了“这个社会正在封建臣民化”的结论。

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显然值得怀疑。不可否认，威廉帝国的那种打上“前现代化”和“前工业化”烙印的社会—政治体系，从长远来看，是与这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处于矛盾的位置上的。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也正是在这个专制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下，这种经济结构在继续不断地现代化、技术化和组织化，也就是说，这 100 多年间的德意志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而是一个带有传统、现代与未来三者强烈重叠性的社会。历史是一种过渡，它很少有明确的分界线。恰恰在德帝国时代中，这种变化和过渡的因素

^① 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蒂宾根 1956 年版，第 153 页。

是强烈的，因而关于这个社会在“封建化”和“臣民化”的观点仅仅具有部分的真实性。当人们将 1870 年的社会与 1810 年的社会进行比较时，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社会本身在经历着它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个进程是通过复杂的多层面、多元化来体现的。

其一，在德帝国时代，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

随着资产阶级个人财产权力的实施，以及法制化原则在越来越广阔的生活领域中贯彻，德帝国的社会已经开始从“等级国家”向法制国家、从“等级社会”向国民社会过渡了。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日益崛起，为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在社会上逐渐赢得优势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过渡时代的种种变化，使得帝国最高官僚机构在他们的政府行为中必须考虑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知识”、“能力”、“才干”和“成就”原则，已经在这个社会的职业中，在政治、司法、教育、科学、医学、城市建筑、新闻业中，通过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开始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在帝国主义“大海军时代”里出尽风头的海军上将提尔皮茨以及在后来的帝国政治中主宰过全局的陆军上将鲁登道夫，这些人物尽管给德帝国的结局带来了灾难，但他们出身于一般市民家庭，这一点则说明，在帝国时代，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成功者尽管极少，但仍然是存在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机会进入政治、军事的最高决策层。

与此同时，职员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现代阶层已经出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量在不断增加。到 1870 年，帝国社会中已有很多大学生不是来自传统的贵族上层，而是来自中、下层家庭，他们是小官员、职员和独立经营者的子女。这个比例比英、法高得多。^①另外，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里都出现了一种由资产阶级组织的社会团体，他们在为大城市面貌的改造以及城市文化设施（如博物馆、美术馆、歌舞厅、音乐厅、实验中学、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建设，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59 年版，第 140 页。

时装展览会的举办和酒馆饭店的兴建出资。总之，不是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在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公众的行为方式。当时的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利希·迈内克回忆说：“~~1913~~1913年之际，在整个德国，不仅能感觉到某些政治上的新事物，而且也已经能感觉到某些精神上的新事物了。”^①

不仅如此，就连在权力精英那里，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容克贵族在行为方式上也在资产阶级化。著名的评论家特奥多尔·冯塔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的“普鲁士美德”及其载体——容克贵族——的热情赞美者，在 ~~1913~~1913年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我越来越对那些我过去所崇尊的贵族们感到完全的失望了。这些可悲的人物，现在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群不可理解的、目光短浅的、有辱盛名的、不配受到尊重的自私自利鬼！这种人，我现在要用缺乏理智、愚昧无知与作为残酷的“上帝秩序”的利己主义之间的混合物来加以形容。他们必须全部受到地狱的煎熬。所有的东西都过时了！毕罗夫和阿尔宁家族是两个最优秀的家族，但是当他们的明天从这种画面上消失掉的时候，这不仅对于这个世界，而且对于普鲁士和普鲁士的军队来说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米内和苏尔兹家族则早已坠入一种被掏空的位置上了。看来，人总归还是人！^②

而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德布鲁克的一家》更是一篇对贵族生活方式所作的悼文，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化过程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3-1918~~1913-1918》，斯图加特 ~~1913~~1913年版，第 ~~191~~191页。

② 彼德·勃兰特、雷勒·齐克纳特：《普鲁士，一个读本》，柏林 ~~1913~~1913年版，第 ~~191~~191页。

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与资产阶级的“封建化”相平行的，还发生着一场社会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化。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布莱克本认为：“与其谈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封建化，还不如说德意志社会在市民资产阶级化，这可能是普遍恰当的。”^①这个过程尽管还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转到了政治方面，但是，它已能说明，关于德意志社会在“封建化”的一维性发展方向的结论，必须作适当地修改。

其二，德帝国的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碎片化”所导致的多元化。

毫无疑问，比较起西欧其他民族国家来，这个国家的居民更多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道德的传统和环境之中。在这个由大普鲁士和众多的邦国组成的新帝国里，它的工业经济发达的西部地区、政治独立性更强的南部地区，显然要比北部和东部更具有资本主义性，更具有自由主义性，也更少臣民性。通过 1807 年德丹战争才归并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汉诺威，这些老式的自由主义区域和城市，也从未停止过反对保守主义邦政府的斗争。

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碎片化”。天主教徒占据了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有农民、工人、市民和贵族，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并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建立起自己的联合团体：从手工业联合会、合唱队直到医院。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在“天主教中央党”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家乡。这些天主教徒并不是特别现代主义的，也不是特别自由主义的，甚至也根本不是共和主义的，而是“家长制主义”、市民资本主义、“宗教社会主义”三者兼而有之。他们拥护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是德皇或新教教会，而是天主教教会。尽管在社会压力之下有着许多朝着适应方向上的调整，但他们的思想情绪首先是处于这个国

^① 戴维·布莱克本、杰弗·埃利：《德意志历史描写的神话》，法兰克福 1984 年版，第 183 页。

家、这个德意志帝国、这个新教主义的普鲁士官僚机器和统治集团的反面的。他们是群众，也是“普选权”的捍卫者，就这方面来说，他们倒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顺民和奴才。他们既不适合“封建臣民”的公式，也不适合“现代公民”的公式。严格地讲，他们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属于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

不仅有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裂，而且在新教内部，也存在着老的社会因素与现代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那些老的社会因素仍然喊着拥护“王冠与圣坛联盟”这种专制国家口号，而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教徒们却在日益非教会化，对于他们来讲，要获取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也不必再依赖于造访教会了。因此，这个社会已不再可能去追求用专制国家来维持对宗教的那份期望了。在这个问题上，连统治集团自身也不再是意见一致的了，“民族与圣坛”的新口号并不能提供一种真正的替代物。

总之，德帝国社会碎裂成各种不同的、也是多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的这个事实，对于以后德意志历史的发展来说，远比人们通常谈论的“封建化”和“臣民化”更为重要。当然，这种碎片化还应首先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碎片化包括在内，而这是我们要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门探讨的问题。

其三，德帝国的时代，尤其是 1918 年以来，也是一个“文化觉醒”的时代，一个向现代主义突破的时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给予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向往着用奇特的革命性抛弃限制和现存事物的时代，一个向往用无限制的革命性来为现代主义奠定基础的时代。”^① 它决定了文化运动的情绪和人们的精神气质，决定了文化、哲学、知识界的气氛。

艺术的方向不仅表达着人们的生活感情，而且也与自然主义、表现主义、青年风格彼此发生着影响。首先，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43 页。

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开端和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对“父长制”环境的传统和习俗反叛的爆发。绘画艺术中的德意志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已开始形成，并强烈地影响到文学和戏剧。现代建筑风格更以“反威廉主义”的名声相当快地体现着自身。这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要数伟大的文学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两兄弟，以及自然主义者格哈特·豪普特曼、戏剧家马克斯·莱因哈德和奥托·布拉姆、造型艺术家布劳·莱特、政治评论家马克西米连·哈尔登和建筑师彼特·伯伦。他们用作品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并直接开始了对威廉时代的批评。而哲学家尼采更是毁灭了意识形态上的道德哲学，并喊着“对所有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的口号，发动了他好战性的冲击。这不仅开辟了哲学和精神历史中的一个新方向，而且也推动了生活哲学、新康德主义以及存在哲学的开端。所有这些，几乎涉及了现代化生活的所有领域。

尽管在德意志大学的基本结构中奉行着保守主义和等级制的原则，青年人、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妇女在这里很难获得职业机会。但是，专制国家在这里还留有一片相对自由的空间，因而大学还在继续证明：它们仍然能够为这个新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世界培养有效率、有活力的人才，也能够为这个社会在管理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作出贡献。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及其在技术上的运用，正如化学、电学、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新兴工业技术上的运用所表现的那样，已经为德意志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医学上的进步是划时代的，现代社会研究的开端以及以社会史为方向的历史编辑学的发展也极具进步意义。甚至有不少的观察家将此称为“第二次启蒙运动”或“第二次自由主义化阶段”^①。

正是在这场“文化觉醒”中，过去的保守主义者、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和神学家恩斯特·特洛奇变成了共和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如著名的医生鲁道夫·维可夫和罗马史专家特奥多尔·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50—1918》，斯图加特，1989年版，第140页。

莫莫森成为了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更年轻的一些人物，如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后来在 1918 年成为第一届联邦共和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都是在这个时代成为民主主义者的。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德帝国的整个社会才出现了新的青年运动、教育学上的改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个性解放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这些现代化社会运动的新开端。

当然，这场“文化觉醒运动”所涉及的还仅仅是文化思想、生活观念、精神气质上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就连这些改革运动，此时也仍然是远离公民社会的理想的。它们仅仅只是在反对政治，反对政治上的肮脏交易，因而也仍然是“不问政治的”。这种“不问政治”的态度正是沉重的德意志历史的一个结果，而且从客观上讲，也并不能直接而真实地损害到专制国家的现存统治。但是，人们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运动并不是一种“臣民式”的对传统专制主义现存政治的顺从和适应，不是向这种统治要求的一种校准和看齐，而是完全与这个君主制的贵族—军方特权阶层的要求相左的。

总之，无论是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化、碎片化、多元化，还是“文化觉醒”运动，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地产生出来的，尽管它们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这种结构之上的传统独裁专制的统治形式，但它们对改变这个等级森严的旧有社会的气氛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总之，它们在推动着这个社会不断的文明化、多元化和现代化。

第二节 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也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合作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的总称。它所描绘的是在“自由竞争”阶段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和国家当局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些变化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的法制国家向干预型国家的转化，国家机器通过采取有目的的经济景气政策、结构优化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强化手段，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发展。

第二，企业通过兼并联合成包括从原料收购到终极产品的所有经济分支部门的巨型企业。

第三，通过卡特化、托拉斯化等经济联合形式来削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作用。

第四，力图在工会与企业主联合会的基础上组成经济上的总联合会，以避免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

帝国时代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为全面的发展起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因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冲刺中，德意志农业部门的传统优势，以其他国家难以比较的高速度，过渡给了工业部门；经济上小独立经营者的社会优势因而也迅速地让位给了强大的工人集团和职员集团；加之内部市场的狭窄，产品与销售等方面的矛盾等因素，迫使处于内外各种压力之下的、也是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室和容克国家官僚机器——不断运用现存的、也是传统的政治权威，鼓励“合作精神”，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控，以维持现存统治地位的稳定性。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及其特点，也是决定德帝国发展命运及其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自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德帝国的工业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性，它以人们未曾预见的规模，不仅损害到特别经济集团的利益，而且也损害到所有德意志人的生活。到1933年，它对帝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那种被称之为大企业“自动行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加速；另一方面，现代干预型国家的早期形式，先是犹豫、摸索，后是目标坚定而强有力地发展起来。

德意志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形成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在大企业和资本集中化过程影响下的那种无规律的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上的推动，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所作的动员，导致了对经济领域强有力的干预。这种动员的必要性恰恰在于，若没有国家权力的帮助，这种动员就不可能形成；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力精英、官僚机构，完全出于维持统治稳定和统治合法性的自身动机，也必须越来越深入地对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政策进行干预。

这种德意志干预型国家，是不能轻易地被降低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代理人”的角色位置上来认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机器早在过去那个“自由贸易时代”里，就曾借助于贸易条约、领事馆、战舰、利息保障、资助和外交上的行动，为那些经济利益提供过帮助。但是，在实现了工业革命的突破后，这场工业化进程的不均衡性、摇摆性以及由于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无法估量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地提高了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需要。因而在有了 1873 年到 1896 年的萧条经历以后，立即采取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控制措施，被帝国当局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了。

由于这种发展，这部国家机器对经济领域开始了比以前更为直接的干预。例如，实行关税保护，贯彻进口申报单制度，对铁路业和海运业实行有利于出口的收费标准，对有市场前途的行业以及内河航运业实行减税、提供国家资助，以及在海外增设领事馆，购买殖民地等。简而言之，帝国政府通过一整套措施来努力贯彻它的经济景气政策。正如 1893 年 10 月 1 日俾斯麦对威廉一世所讲的那样：

这种干预主义并没有被统治体系外的东西所嫁接，而是体系内在自我捍卫的反映。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释辩证法上的这种概念：不仅这个体系的学习能力和抵抗力，而且还有它间接地走向虚脱的倾向（如果它仅仅还只是完全采取市场机

制的话)，都被这种干预主义所证实了。^①

人们在这里完全可以看到当今西方社会种种现象之起源的发展过程。在当今由国家来调节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统治也是首先通过这一点来取得合法性的，即各国政府必须通过有目的的干预来尽可能地扫除发展上的障碍，并以此来努力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之中的这种“合法性要求”，只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最终导致了用一种替代性纲领来完全取代过去古典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地位。但是，这种替代性纲领，这种在国家主导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纲领最早起源于德意志。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斯图尔姆指出：

早在这个德意志帝国时代，政治领导精英们以及所有与此相联系的利益集团，便以维持现存体系优先权的名义，承担了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条件和预防发生风险的义务，但也因此承担了一种确保靠工资为生的大众忠诚的义务。为了确保这种忠诚，他们也就必须推行一种对大众的补偿性政策，确切地讲，一种避免社会冲突政策。因此，这种持续而尽可能均衡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统治合法性的功能。^②

人们是不可能仅从排他性的经济动机中导出这种政策的。它的开始阶段在德意志，首先与“俾斯麦时代”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这个正在不断崛起的干预型国家的大量行动，也是必须被作为帝国的国家领导以及负载它的社会集团的努力来理解的。它的确相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9年版，第276页。

② 米夏埃尔·斯图尔姆：《皇帝的德国》，杜尔塞尔多夫1989年版，第100页。

当有效地为这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创造了稳定的条件，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发展机会，而且也缓和了围绕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争夺通向权力入口的内部冲突。因此，尽管有着日益强烈的对传统权威的批评，这个权威的国家领导和那些特权化阶级的统治仍然得到了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当人们对这种“统治上的合法性功能”加以理解时，才能揭示 1913 年以来的德意志关税保护体系、德意志经济帝国主义和社会福利帝国主义、政府垄断化计划、铁路国有化，以及大量外贸、税收和金融政策上的种种措施的真实意义。

在这种干预型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中，无论是从当时占优势的同时代人的经济理论状况上讲，还是从法律和利益政策可能提供的活动空间的范围上讲，帝国政府的行动自由都是相当有限的。它的发展进程通常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向前摸索的过程，一个经历过多次反弹、不断进行大量试验、直到一种成套的工具化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成功希望的过程。

在种种的国家干预政策中，那种保护主义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在国家进行经济控制的三根现代支柱，即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仅靠头二根支柱已不足以支撑这个帝国政府了。因为当帝国银行遵循金本位规则，还不能推行一种现代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时候，这个德帝国政府就不能支配一种对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来说是适当的杠杆。同样，由于德帝国政府缺乏这样一个中心机构，也就不可能通过柏林的金融政策去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这样，根据当时理论上和机构上的可能性，也就只剩下对外经济来作为早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领域了。因此，在这里，国家提供的关税保护是首先作为杠杆来使用的。当国家为了对付世界经济的波动，尽管提高了税率，而这种保护主义也仍然未能提供所希望的保护时，有利于出口的促进性措施就日益增多。而这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也就走上了真正有未来前途的行军路线。因此，人们显然不应该因为帝国议会中的斗争，报刊上的敌对，以及同时代人的争端等等，而

忽视了干预型国家崛起的必要性和条件。

干预型国家的崛起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快速或无摩擦的进程。但是，从历史上看，在德意志，这种干预型国家崛起得特别早，并且也特别清楚地显示出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经济上的盲目运动，由于它本身能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因而本身需要进行合乎目标的控制。从这个意义讲，未来是属于不断进步的高度工业化的干预型国家的。而且也只有进行社会上的控制，才能对工业化世界中致命性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逐渐缓解的保证。但另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对谁有利，用什么样的社会代价，为了什么目标而进行干预。而德帝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已事先排除了一种有利于大多数国民幸福的社会平等的经济政策，这一点人们必须果断地指出来。容克大地主，工业界的经济巨头们，但首先是这个具有传统权威的国家领导及其机构，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是这种国家干预的最大得利者。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关税保护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生活费用的提高，在大众宣传上成为了一种有影响的工具，也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工具，社会民主党人才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① 摇摇摇

直到 1918 年，这个德意志干预型国家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反自由主义、反民主主义、反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特点。它所推行的经济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稳定政策，也经常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给那些具有特权的经济集团、给那些反民主的社会权力载体带来了好处，而且也一再为德意志帝国的权威统治提供了合法性。

二、关税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

在帝国建立后的早期年代里，俾斯麦在经济上一直是比较坚定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对内政策的优先权》，柏林 1949 年版，第 129 页。

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摇摇摇摇

首先，这种政策很容易与他所宣称的“德意志在领土要求上已心满意足”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因为不仅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能为德意志内部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业提供销路，而且只要自由贸易原则能得到工业化各国的遵守，那么对殖民地或是对更多欧洲领土上的要求就是多余的，甚至也无需政府在帝国内部采取过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干预性行动，因而也是值得俾斯麦去追求的。

其次，奉行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内政上的需要。因为那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工业界以及大学人士组成的政党，即民族自由党，起先还并不是非常感谢俾斯麦给德意志人带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因此，作为新帝国宰相，俾斯麦不仅需要，而且也能够通过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来取悦、拉拢他以前的这个政敌，并通过工商业的发展来壮大国家的财力，巩固帝国政权。正是在此基础上，俾斯麦才建立起他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政治联盟。

这个政治联盟的牢固性取决于经济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然而，从1873年开始的大萧条却损毁了这个联盟的物质基础。这场大萧条首先导致的是六年的经济停顿，它带来的先是价格紧缩，后是引起了一些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增长率减半，甚至几近停滞的局面，从而将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都拖进了苦难之中。从1873年12月到1875年1月，固然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恢复，但这既没有在客观上，也没有在经济主体意识中产生复苏性的影响，而是很快又开始了第二次萧条，并一直持续到1876年1月。在俾斯麦以后的执政岁月中，也只出现过从1876年秋到1879年初的这四年经济景气时期。而在1879年1月到1883年期间，出现了又一次几近停滞的缓慢增长期。在此之后，才出现了从1883年到1890年的世界经济与民族经济的高度繁荣，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在广泛战线上的突破。

这种特别漫长的增长发展故障，其原因必须到诸如投资过量、

设备过剩、开工不足等生产能力过剩中去寻找。它所带来的长期生产过剩，显示出一种经济不景气的工业化现象。市场透明度的缺乏，固定资本的固定性，以及社会需求上的不明确性，这三者总是导致投资过多和对危机缺乏抵抗力。因此，在工业化深刻的周期性波动面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是无能为力的，从而也就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三个基本愿望：增长进程的稳定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可预测性，以及最高利润获取的规律性。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这个特别阶段里，德帝国还由于以下的三个因素而使这些普遍问题更为尖锐化了：

第一，德意志工业革命中传统的主导部门，如钢铁工业、采矿业已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活力，而铁路建筑业已完全丧失了它的主导作用。例如，在德意志国民经济每年的净投资中，铁路建筑业从1894年所占的10%减少到1903年的5%，到1913年又减少到3%。^① 铁路建筑业的衰退对冶金工业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交通车辆业的消极性后果都是可想而知的。至于电气工程、摩托车制造业、大化学工业，只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与日益扩展的服务业一起，作为“周期领导者”逐渐成为了新的工业主导部门，从而再度较为持久地将经济上的繁荣推向了前进。

第二，工业增长的长期受阻一次性地增加了发展方向上的种种困难。对这个时代来说，德意志的工业经济，在必须用它所有可变的规模去对准那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性世界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去熟悉一个内部市场。然而这个内部市场，不仅正在日益与那个世界市场纠缠在一起，而且还没有通过一项合乎追求目标的景气政策，更别提通过一项充满活力的劳资政策，来扩展消费的期望。

第三，帝国人口的迅猛增长给工作岗位的增加造成了巨大压力。仅从1871年到1913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000万，达到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65年版，第104页。

缘四万人，这还不算在这四多年间移出的四四万人。如果整个国民经济能够顺利而迅速的持续增长，仅仅由于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是不会给这个社会造成致命性危害的。然而，自从一八七〇年以来，在世界农业市场分娩的阵痛之中，德意志的农业由于自身陷入一场结构性危机，已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吸收新劳动力作出贡献了，这就要求德意志的工业必须至少承担新增加的帝国人口中的四分之三的就业任务。^①但是，自从一八七〇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工业经济中，也只有那些发展增长长度得到加强的工业部门，才能成功地吸收劳动力。因此，在这个过去的农业国已迅速迈进了工业国门槛的时代里，影响达四余年的这三场工业经济的萧条和缓慢增长，对这个帝国提出了足够大的问题。

与工业增长的长期受阻重叠在一起的这场长期的农业结构性危机，为德意志传统的统治阶级——容克——经济观念上的转向提供了理由。强有力的海外竞争，特别是北美新农业区的竞争，是这场农业危机的首要原因。自从一八七〇年以来，价廉的美国小麦利用生产和运输费用的持续下降趋势，已顺利地压低了中欧农业市场的价格。与此同时，俄国也正处于现代化的强制命令之下，这种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必须依赖于农业上的出口，因而这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沙皇国家，强制性地提高了谷物的出口。不仅如此，人们发现，连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也开始冲击中欧市场了。而那种以高代价生产，又习惯于以过高价格出售的德意志谷物经济，立即失去了它主要的出口接受者大英帝国，它现在已主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冲击，因为它意味着容克传统的谷物出口经济已不能继续发展了。而且德意志由一个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一个进口国，是在德意志内部的农产品价格被迫下降了四四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德意志自身农产品消费市场已有被来自海外粮食进口品全面突破的危险。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一八七〇-一八七〇》，哥廷根一八七〇年版，第 四四页。

如果人们去研究各国在这场正在形成世界农业市场的竞争中所作出的反应，对于探讨各国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英国式道路”是采取缩小甚至放弃无利可图的农业生产、依赖殖民地和向外购买农产品等方式来容忍这种价格下降的。“美国式道路”则利用广阔的土地，采取降低成本和技术更新来改善农业的收入局势。“俄国式道路”则采取容忍农民、地主和农业工人收入的下降，强制性压低价格的方式来参与农业市场的。“荷兰与丹麦式道路”则采取了放弃谷物产品的种植，转而全面种植经济植物的方式。而在普鲁士—德意志，容克这个直接受到震动的农村商业阶级，直到 1846 年中期以前，都一直将“自由贸易”称之为教义。如今，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为了捍卫它们社会和政治统治上的经济基础，必须对这场国际上的生产过剩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与其说是通过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通过政策战略上的转变来完成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走上了一条农业保护主义的道路。^①

当然，这个工业增长阻碍与农业危机重叠的时代，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讲影响是不同的：企业主们因价格下降和销售问题而受到了震动；与此同时，对那些有固定收入的消费者来说，在物质上甚至变得更为有利了；但是对于依靠工资为生的产业工人大众来说，伴随着工业萧条的只是削减工资、缩短工时、解雇威胁所构成的失业气氛。这种气氛无可争议地推动了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该党在 1848 年的国会大选中已成为第四大党。柏林警察总监 1848 年春这样谈道：

工商业发展受到的阻碍，人们公开谈论的困境，已给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确性带来了怀疑。甚至连那些过去在相当平静和温和的人口圈子中生活的人们，都在日益扩大着他们对现存事物的不满，都在考虑是否可能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理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15—1848》，慕尼黑 1969 年版，第 102 页。

论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改善。^①

摇摇总之，无论是那些有影响的经济利益集团，还是广泛的人口各阶层，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了工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严重摇晃的事实。因此，德意志经济政策中意义深远的转变便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了。

在全面贬低自由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自由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之后，一场从自由贸易向保护关税制度的过渡开始了。当农业和工业经济中的企业家们以“反外国竞争”的口号来为他们的保护要求提供最响亮的证据时，帝国政府立即以“保护民族劳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为这种要求提供了合法性。它涉及在向外倾销商品的同时，保持德意志国内价格的稳定，以便能在日益增高的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使德意志内部市场获得不受干扰的扩展。因此，~~1890~~1890年俾斯麦放弃了他过去在国内长期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与坚持老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绝了交，转而采取了一项工农业保护主义政策。帝国政府现在也必须依靠这种经济政策，来保护土地占有分配上阶级结构的现状，来捍卫首先是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产所有者的集体占有地位，并在以牺牲城市下层人口的利益为代价的基础上，维护他们传统的特权地位。

~~1890~~1890年《保护关税法》的出台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它所筑起的关税壁垒，自然使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德意志消费者不再可能得到世界市场价格下降带来的好处。而到 ~~1895~~1895年，农产品的关税已是 ~~1890~~1890年的五倍。这种关税率的不断上升，无疑是大农场主向帝国高层领导强烈要求并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一眼望去，这种德意志帝国的农业政策掩盖的只是一个表面上得到了伪装的阶级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8~~1988年版，第 ~~104~~104页。

立法”。^①

另一方面，工业关税则明显有利于重工业界，而歧视已出口化的制造业和轻工业。从现在起，不仅外贸结算体制，而且这个在内部经济中一直生产过剩的经济体制的整个形势，都要依赖这个关税制度的效能与成功了。从纯经济的观点出发，这项关税政策也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从 1914 年至 1923 年间先后两次出现新萧条和不景气的局面看来，这种保护主义，作为当时“反危机周期”的景气政策，显然并不能被人们称赞为“万灵药方”。

然而，从统治稳定化的意义上讲，这项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恰恰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它的根本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这个帝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由过去稳定的大农庄社会变成一个开放性的工业社会，大工业已意味着群体劳动不易由传统的、家长式的纪律来进行控制了，大萧条所造成的不满明显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工人政党不断崛起的战斗性和力量面前，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农业界，所有占有者阶级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容克这个大农场主阶级，则在经济民族主义中看到了摆脱他们政治上孤立的可能性，而工商业经济中自由贸易的代表们，也在俾斯麦“保护民族劳动”口号的诱惑下，走上了一条与容克实行全面和解的政治妥协道路。这场所谓的“保护民族劳动”的实施，对内就是通过 1914 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对外就是通过 1914 年的《关税保护法》。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亚利山大·格尔勋克龙所说的那样：

由于自 1914 年以来的那场农业危机，当时出现了一种剥夺容克——这支前工业化精英——权力的大好的民主时机，然而，由于整个一揽子国家保护主义措施和资助性计划，其中 1914 年、1915 年、1916 年的关税法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次

^① 汉斯·罗森堡：《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欧的经济过程，社会和政治》，柏林 1956 年版，第 156 页。

机会被抹掉了。而在这里，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与那些要求保护的工业界一起，从他们集团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出发，与容克们携起手来了。^①

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俾斯麦之所以选择这条保护主义道路，还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从纯经济上考虑，德国本来也有可能找到类似于英国式道路的理由。但是，英国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帝国并拥有统治海洋的庞大舰队的岛国，而德国既没有一支可以与之匹敌的舰队，它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封锁它的世界性商业通道变得异常容易。同时，德国又被两个强大的、并正在日益增加着敌意的大陆强国——法国与俄国——所包围，这两个大国都能在食品供应上做到自给自足，并且在工业上都有其他更为丰富的资源。因此，俾斯麦的保护主义政策，本身又是能够受到社会上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们的欢迎的。

这样，在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一场最为重要的干预之中，在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周围，俾斯麦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一个重工业与易北河以东的农业之间的联盟，一个资产阶级的钢铁与容克贵族的裸麦之间的联盟，一个现代化大工业的经营者们与普鲁士“前现代化”的独裁权力精英们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在这种口号下完成的：“将维持民族的各种力量集合起来！”正是在这个口号下，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开始丧失了它曾具有的 19 世纪 40 年代革命的进步意义。因为“民族”（*Nation*）这个口号，从本源上讲，是属于市民资产阶级的，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和反封建的。在过去的“自由主义时期”，呼喊“民族”这个口号，曾经是确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夺取政治统治权的手段。普鲁士容克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钢铁、采矿业中的天主教极端分子，当然还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对“民族”这个标签持否定态度的。而现在，在这个新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9 年版，第 107 页。

联盟的缔结中，在保守主义政治的光谱中，这些盟友们已开始利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来作为反自由民主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民族集合化道路”的意识形态了。通过对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有意模糊，通过对民族感情的热烈呼吁，霍亨索伦王室和帝国当局能够从广泛的中间等级的共鸣中赢得信徒。这也就为容克，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延长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联盟的建立也被称之为“第二次帝国建立”。

三、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

无论是家族占有性质的大公司，还是完全依赖于银行的股份公司，或是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都意味着工业经济的一种质量全新的发展阶段和组织形式。以这种大企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表明：在经历了中、小型企业经济时代的数十年后，大企业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而过去人们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竞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与中、小企业的工业体系相适应的。

当旧有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种种理论已不能克服它们之间微小的政治争端，因而也不能认识和理解这种现代工业体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分量的时候，卡尔·马克思首先通过他的资本集中化理论，最早预测到了这种发展。随后，恩格斯特别是列宁也开始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对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之中。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批严肃的德意志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粤·熊彼特、苏尔茨·盖维尼茨等人，与当时信奉“合作资本主义”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样，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工业结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粤·熊彼特这样谈道：

那些自从 19 世纪年代以来正在德意志形成的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迄今不为人知的规模，不仅通过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化和严格管理，而且通过经济寡头之间的密切合作，来

确保发展的稳定性、机会的可预测性以及有力的赢利所带来的繁荣。工业扩张的“长生不老之药”——技术创新——被有规律地投入大企业组织之中，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已与企业紧密联合起来。^①

毫无疑问，新的现代工业体系内在发展上的不均匀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一种由利益相关者们构想出来的短期性替代计划，是能够一时受到削弱的。但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意义上所讲的、也是被人们过去通常称之为“价格调节器”的竞争来说，对于企业的独立自主来说，对于被作为个人投资风险的报酬，即赢利的获得来说，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只有越来越少的空间了。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掩盖作用仍被保持着，但是人们已越来越不可能将这种现代工业的发展委托给亚当·斯密设想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了。

这种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与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中的集中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那些最具有现代性质的工业企业，根据生产效率、合理化、获取最大利润的法则，通过平行和垂直的联合，获得了自身固定资本上跳跃式的增长，使自己变成大企业，继而发展成为统治市场份额的康采恩、托拉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根据各工业部门的分支，通过卡特化——这种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之为“德意志型”的经济集中模式——结合成垄断性的辛迪加。

德意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垄断组织卡特尔的地方。尽管在1873年还未统一的整个德意志区域里总共只有四个卡特尔组织，但是，由于其最初表现出来的在产品价格和市场销售上的垄断特点和优势，因而能使大企业在面临经济危机和萧条时，通过一种日益

^① 约瑟夫·鲁·熊彼特：《1873年，经济发展理论》，柏林1955年版，第26页。

联合起来的经济结构顽强地捍卫自身。因此，它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大企业应付危机和萧条的特别手段。

然而，在德帝国时代，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若是脱离了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可能获得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加速度发展。事实上，德帝国当局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就已认识到，在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要远比那些中、小型企业有效率得多，指挥起来也要方便得多。因此，无论是从国家为企业建设所投放的无息贷款中，还是从国家法律所提供的关税保护政策中，大企业的资本集中化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大企业成为了德国经济结构发展上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部分。根据 1894 年对各国股份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统计数字表明，英国有五万家这类公司，但每家公司的资本平均不足 10 万马克，而德国只有五千家这类公司，但每家公司的资本却平均超过 100 万马克。^①

更重要的是，德帝国政府也是世界上最早公开赋予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合法性的政府。早在 1870 年颁布的《德意志公司法》里，帝国政府就已作出规定：“在不干预集中的条件下，国家只安排征收结构合理的品种和并规定严格的品种数量，并承认卡特尔协议具有法律效能。”^② 这样，在 1873 年到 1896 年帝国经济漫长的萧条时期，卡特尔组织通过弱肉强食的发展和市场的分割，数量迅速上升。当 1896 年又一个经济高度繁荣阶段到来时，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现代工业大企业体系在德意志已经形成。卡特尔组织也由 1873 年的 1 个发展到 1896 年的 100 个，到 1901 年，又增加到 150 多个。而更高一级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也首先在采矿和冶金、钢铁部门中，继而也在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中出现。正因为如此，约瑟夫·鲁·熊彼特将 1896 年称之为“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要一年，因为它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

① 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纽约 1958 年版，第 100 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58 年版，第 100 页。

会史中的两个时代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分水岭”^①。

德意志的大企业和垄断组织反映出在工业世界经济中这个民族国家特有的、也是令人生畏的大规模生产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也是与德国银行的特别属性紧密相关的。与英、法不同，在这些早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金融业中保留了票据银行与投资商业银行之间的区别，而在德意志，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大力发展的是“普通银行”。这种合资性质的“普通银行”，由于本身吸收了众多的资金并又具有股票市场的传统功能，能将每一种可能得到的资金变成资本，因而成为了组织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在巨型工业企业里，德国的大银行通常是最大的股东和资本的提供者、合并的组织者和“卡特尔的催化剂”，也是向海外出口商品和发展商业利益的强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每个工业部门又是由少数几个与大银行密切联系的最大公司统治着的，它们的发展都毫无例外地紧密依靠高技术 and 对外贸易。前者通过与大学、研究所、研究协会的合作得到滋养，后者则通过组织完善的商业和外交网络得到所需的服务。

正是由于国家政府这种“充满善意”的扶植，以及工业资本力量的高度集中化和垄断化，才在德意志较快地形成了一支人数极少、极具经济实力的大资产阶级上层。一位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是由一群具有经济统治天才的人们组成的小集团，这些大企业主天生善于用最严格的方式来管理和统治企业，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是毫无自由主义观念可言的。而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在德意志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远比这些上层领袖们小得多。”^② 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正如汉斯·莫特克所讲的那样：“普鲁士国家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共同交易，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最终放弃 1848 年民主革

① 约瑟夫·岑·熊彼特：《1848 年，经济发展理论》，柏林 1909 年版，第 140 页。

②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5 年版，第 190 页。

命的一个原因。而且，资产阶级在帝国时代中与国家政府进行的有利可图的合作，为迅速克服资产阶级早期自由主义作出了贡献。”^①

建立这类“世界主义大企业”的倾向，固然也同时发生在美国，但它至少在当时是受到美国政府的抑制的，而在德帝国则是长期一贯地得到政府鼓励的。除了效率与控制方面的理由外，还有国民经济思想体系方面的其他原因。在帝国当局看来，没有什么不名誉的集中，恰恰相反，“集中化”被视为“走向一个更为合理的经济体系的重要一步”。“大而全”的企业被看作是“未来的道路”，被看作是促进民族海外竞争力、避免资本浪费、防止经济震荡、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最好方法。这种倾向与理解，本身也与德国的现代化在工业发展的一个更迟阶段中的到来有关。因为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就缺乏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自由独立性，他们属于那种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扶植的、后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家。但是，德帝国时代经济发展上的突出成就，又反过来使这种受到国家促进的新型工业化体系，随后在英国和美国成为引起广泛赞叹的仿效模式。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克莱汉指出：“德国的大公司是一种国际力量，它们具有广泛的外交影响，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无限的支持。”^② 这种对德帝国当局促进作用的赞叹，以及对德帝国资本集中化进程的仿效，本身也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更快速过渡的一个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帝国进行的这种在企业和工业部门领域中的集中化进程，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国民经济领域之中，并作为民族经济的一种特点出现了。关税保护以及所有其他对外经济上的国家干预性措施，都是将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来发挥作用的。此外，出于经济上的防守或进攻的动机，一个在中欧实现由德意志领导的“跨民族组合的国家卡特化计划”已在帝国经济

① 汉斯·莫特克：《德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柏林 1940年版，第 145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48年版，第 120页。

部的酝酿之中。它明显带有德意志力图垄断整个中欧市场的帝国主义倾向，因而也使德意志国民经济集中化的这种外延扩展与其他工业化列强国家在经济上的正面冲突变得日益难以避免了。

四、“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是与这个社会从封建农业经济结构快速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工业无产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从 1848 年的改革运动在德意志人中引起经济自由主义冲动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以来，一个传统社会关系“大裂变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技术性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能充分利用企业主所有权，单方面地对收入和财产施加有利于己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大大加速了两极分化。工业繁荣不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等级”、仅靠工资为生的无产者。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过程的危险性，生产者生存的无保障性也大大加剧。因为“工业化新机械完全缺乏足够的安全装置，使得技术失误造成的工伤事故变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①。工人工资收入不仅受到经济局势动荡的强烈影响，而且由于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其来源也毫无保障。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开始造成日益紧迫的住房问题。

总之，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安全机制已经萎缩或丧失，因为这种安全机制是与 1848 年大改革前的容克农庄等级制，与地方团体性的社会秩序，与普鲁士宗法制度中的慈善机构的预防性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当广大来自乡村的无产者们定居于城市之中，并生活了整整一代人后，疾病、工伤残疾、老龄等问题在他们身上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并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带有过去“温情面纱”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消失了。资产者狂热的

^① 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 1989 年版，第 252 页。

“拜金主义”只能使无产者群众深感自身的贫穷。严酷的经济事实意味着他们不过是劳动力的载体，不存在着对他们自由、尊严、个性的任何承认，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任何合乎道义的约束，只有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推动了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发展，1919年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已经表明，形成自身阶级意识并进行反抗的工人群众，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已被组织起来。经济结构的变迁带来的这场“社会裂变”的压力，已危及到现存统治秩序，它迫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最后不得不对社会再分配领域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去进行一场新的社会组织化的转型，以逃避一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摇摇摇摇

然而，最先主张进行这种有控干预的并不是容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是一批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改革派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

德意志的官僚本身就是以“国家整体利益的辩护人”、“超党派的公益保护者”自居的。社会裂变并导致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与这些改革派官僚的愿望相反的。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应用足够的手段来阻止贫困的尖锐化，以维系现存关系的稳定。”他们同时主张“国家当局应在抛开了旧的开明专制的整体福利之后，重新返回来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义务”^①。

学者阶层则以“真理的化身”、“民族文化的载体”而自居。尤其是那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唯有他们自己才可能“充当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调解人”。加之当局的各级官员往往不是他们的同学，就是他们的学生，这又使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可望通过这种与官僚阶层的天然联系来实现。因此，当他们看到“无产者日益增长的骚动会将整个现存统治秩序带入危险的激流”时，他们主张“部分调整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平衡现存社会

^①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953年版，第 104页。

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重新结成一个整体”^①。

作为资本拥有者的企业主，则主要根据切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来作出反应。当社会问题尖锐到工人罢工能经常性地中断生产过程，影响到他们利润的获取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作出某种让步。这种让步是由生产政策上的必要性、工人再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对利润的获取关系来决定的。是否作出让步或作出多大让步，则往往取决于罢工威胁的程度、资产者财力的大小。因此，在德意志，恰恰是那些最大的、也是财力在日益壮大的工业垄断巨头们，首先在工人最集中的工矿企业中“办福利”，并将其视为“对付工人暴动的社会保障的前提”^②。

新教神职人员信仰“君权神授”，向往专制国家“无冲突的理想社会”。在他们对社会裂变的敏感反应中，不仅有对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反感，对现代“大城市文明”的厌恶，更有对“拜金主义”狂潮带来的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但在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经济现代化导致的两极分化所加快的非教会化和非基督教化。因为当作为教民的产业工人对上帝的虔诚无法改变自身不堪忍受的境遇时，他们中信仰“上帝救世主”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因此，神职人员普遍赞成“进行一场反贫困的十字军远征，并在社会上重建基督教信仰的统治地位”。^③

早在对 1890 年“西里西亚织工事件”的反应中，由这批人士组成的“为劳工阶级谋福利的中央协会”，就已经在宣传建立福利制度的思想了。由于他们自由结社的形式，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成员甚至与在海外的马克思、恩格斯有着通讯往来，该组织立即遭到了

① 埃里克·伯特赫尔：《社会政策与社会改革》，蒂宾根 1927 年版，第 100 页。

② 约亨·施特鲁韦：《通过社会政策带来的发展》，科隆 1923 年版，第 100 页。

③ 洛伦茨·冯·斯泰因：《社会主义在德国》，达姆施塔特 1927 年版，第 100 页。

普鲁士内政部的粗暴干涉。这使他们感到“一个无阶级冲突的市民社会的蓝图，在一个非自由主义原则的、权威凝固化特点的政府之下，看来是不可能达到的了”^①。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协会的大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 1848 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建立福利制度的要求始终出现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各种宪法方案中。当 1871 年德意志获得统一，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改良后，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和发展，在思想界知识精英中导致了“讲坛社会主义”的出现。

“讲坛社会主义”是以 19 世纪 40 年代经济学界的一场“思想突破”为基础的。这场“突破”所表达的不仅有对无产者革命的恐惧，而且也有对曼彻斯特自由放任主义、绝对利己主义的尖锐批评。“讲坛社会主义者”们强调：“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经济中，如果人们要去走一条在历史—经验上能得到证实的独立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在德意志就应该走一条以新教伦理道德原则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公正为方向的文化国家的发展道路。”^②对这一点，马克思·韦伯后来指出：

那些最后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是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但还不单单是这些东西，它还必须有如下的东西作补充，即理性的思想，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的经济上的伦理道德。^③

“讲坛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文化共同体”的概

① 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科隆 1848 年版，第 120 页。

②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848 年版，第 120 页。

③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新教伦理》，居特斯洛 1848 年版，第 120 页。

念，并从中导出这种观点：

要维持现存的社会、经济、国家秩序的健康发展，仅仅只能通过改革的道路来达到。在今天的社会危机中，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出现了经济上的变化和新阶级的导入，而在于民族的文化权利地位受到了这种发展所伴随的革命的危及，必须用改革来避免革命。^①

由于这种观点得到了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一致赞同，因此，“讲坛社会主义者”于 1904 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协会”，成为了一个除社会民主党外，所有政党都有成员参与的社团组织。该组织的纲领设计者、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认为：“必须动用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推行一项‘福利国家化’政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② 在他的影响下，也特别是由于 1907 年开始的那场长期萧条，连帝国宰相俾斯麦也感到：“公益再也不可能通过经济上的绝对自由、自我决定的手段、国家的克制，而只能再度靠加强国家主动性的措施，才能达到了。”^③ 他声称：“只有现在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权采取措施，方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办法是由政府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中看来合理的，并能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④

俾斯麦相信，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便能在无产者中制造出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于是这位“铁血宰相”，开始用“皮鞭加糖块”的手法来对付这场社会裂变和工人运动的挑战，即

①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70 页。

②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70 页。

③ 赫尔曼·克伦茨：《德意志经济史》第 4 卷，慕尼黑 1951 年版，第 405 页。

④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 1987 年中文版，第 173 页。

在用 1878 年的《非常法》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同时，开始用社会保险上的立法去赢得工人阶级对这个国家政权的好感。

1884 年，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保险立法《医疗保险法》，终于通过德帝国议会长达两年的辩论之后诞生出来，随后又有了 1886 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91 年的《老龄—残疾保险法》。在医疗保险方面，工人缴纳三分之二的入会费，其余三分之一由雇主缴纳，入会费平均占工人工资的 1/10。在工伤事故保险方面，所有支付由雇主单方面承担。在老龄—残疾保险方面，雇主与工人各支付一半入会费，这笔入会费占工人工资的 1/10。同时国家对投保人每人投放 1 马克的帝国津贴。一种涉及到国家法律强制和社会自我管理原则、投保原则、法定标准索赔原则、组织多样化原则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险制终于建立起来。

在 1891 年以后，帝国政府还多次增加工人的福利金并扩大福利面。1891 年的《帝国保险管理条例》除增设了《遗属保险法》外，还特别增设了《职员保险法》。通过该法，职员这个数量日益上升的新的现代社会阶层，在各类保险上都得到了比工人多一倍的保险金。因为帝国当局和企业主希望，通过这种特别的法规，能够促进他们等级上的自傲感，从而达到对不同的受雇者——工人与职员——分而治之的目的，并在不断裂开的两极分化的鸿沟中填进这种“平衡力量”。无论怎样，帝国当局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将国家与人口中的特定阶层联系起来的战略，至少在职员阶层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此，“福利国家化”政策已走出了它的开端期。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功能和意义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与经济运行中随处可见的其他国家干预政策一样，其动机仍然是容克“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为了穷人的政策，而是为了对付有威胁性穷人的政策。

这项政策的主要得益者，首先是容克贵族和霍亨索伦王室。在这场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在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存的复杂化局势中，由于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已经越来越不主要取自

农业经济中的集团了，国家当局看到了以具有纳税能力的资产阶级为代价去软化工人反抗上的好处，因而在扮演严厉权威的同时，接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并以凌驾于社会各经济利益集团之上的姿态，稳定地推行了这项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一时间也排除了自由资产阶级中开明人士与工人运动之间政治结盟的可能性，并对德国工人运动长期的政治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 1919 年《非常法》废除后，它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中培养起这种观点：“只要我们拥有这个议会的大多数，这部国家机器也是有可能像贯彻资本的利益那样，来贯彻工人的利益的。”^①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容克政权所面临的压力，提高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地位。这个由“前工业化”传统精英所执掌的政权，竟能在工业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中死里逃生，而且最后敢于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部分答案是不难在“福利国家化”政策的推行中找到的。

作为“避免内部冲突的战略”，“福利国家化”政策也是有利于德意志对外竞争与扩张的。正如当时的立法者们所看出的那样：“人们几乎不可能从缺乏任何公正待遇、丧失安全保障、陷于饥饿之中的工人那里去期待必要的爱国主义。”^②而且，这项政策的推行本身就是帝国时代“民族集合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这样写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的，不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是我们民族方式的维护和发扬光大。我们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为的是使这个民族在未来的艰苦斗争中达到整个社会的团结一致，它将强行打开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门！”^③至于它的推行在这条道路上的实际作用与影响，人们也不难在 1919 年社会民主党“为祖国而战”的口号中，在各政党“城

① 阿尔诺·克勒讷：《德意志工人运动》，科隆 1954 年版，第 237 页。

② 汉斯约阿希姆·科赫：《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起源以及它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56 页。

③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5 年版，第 155 页。

堡和平”的缔结中找到。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贯彻，无疑推动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无疑因此获得了更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的产生标志着对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克服。它的思想内核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即“纯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律形式上的自由，并不能为工人的生存提供真正的自由，因而至少必须通过这种社会福利保障去补充这种法律上的自由”^①。固然，它的贯彻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但客观上却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与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听任产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忍受苦难的状况不同，德帝国的国家当局在世界上头一个担负起对工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险和救济的责任，因而也为此帝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又一个依据。与其他所有的国家干预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政策和措施有所区别的是，它毕竟不是一项加剧穷人痛苦的政策，而是一项减轻穷人痛苦的政策。它毕竟为过去在生存上毫无保障的工人提供了一张“社会福利网”，而这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当时是找不到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它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绝对量的变化上都开始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滑动，并同时使这种滑动成为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了。而且，一旦从国家法律上打开了这个突破口，这种滑动方向便显得难以逆转，它将迫使统治者得不断地去调整经济社会的现存秩序。

“福利国家化”政策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一种推动科技进步的社会机制。由于企业主必须单独支付全部工伤事故保险金，这种经济上的“不合算”，迫使企业主与科技工作者不断改进陈旧机械，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益的技术设备，研究安全生产措施，这无疑推动

^① 弗里德里希·吕格特：《德意志社会与经济史》，海德堡 1939 年版，第 236 页。

了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发展。而医院“人满为患”，也迫使政府和社会投资增设医学院、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推动医药研制和药械制造业的发展，这无疑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正是由于这项政策在缓解劳资矛盾、增强民族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的特点，使它自从 1838 年开创以来，便一直在帝国时代、魏玛时代甚至第三帝国时代，直到今天的联邦德国都不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最后也陆续为所有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所仿效。因此，它也成为了德意志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最值得肯定的、最具有连续性的，也始终被保存下来的特点之一。

第三节 摇现代化进程的压力

一、工人运动的壮大

在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得越是迅速的地方，工人运动的成熟就越是来得早。早在 19 世纪中叶，德意志独立的工人运动就开始从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集合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并在 19 世纪 40 年代建立起自己的政党，这早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不像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政党；也不像法国，这里的工人政党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才出现。德意志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形成与政党的建立，与德意志工业化的突破几乎同步完成。工人运动的这种“早到”，显然需要人们从特别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阶级形成的关联中，从德意志缺乏一个能代表工人利益的民众性政党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无产者独立阶级意识的呼唤中，从德国工人运动的其他奠基人，如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卓有成效的组织努力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流亡者圈子里，尤其是在一批流亡巴黎的、手工工人出身的左翼政治活动家领域里发生影响的，1848 年革命后，它的传播才真正开始对德意志社会产生影响。自 19 世纪

缘年代以来，随着德意志工业革命的突破性进展，阶级构成上的鲜明轮廓加速了自由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分裂。市民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已经蜕变为一个阶级政党，已经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置于过去传统中的那种“拯救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努力之上了。在这样一个政党身上，大机器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再也不能看到真正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运动和组织了，因此，产业工人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分离并不是突然间完成的，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初还不能说完全剪断了所有的联系。但是，自从 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以来，工会就已经表明自己是工人运动有组织的中心了，而且从一开始，企业主和国家的镇压就是针对它的。正是这种镇压的暴力，促进了工人政党的形成。1848 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将自己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与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组织起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将政治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存的统治秩序。

德意志工人运动特别有效的组织力和旺盛的战斗力的，还需从工业资本快速而高度的集中里去寻找。与英国不同，在那里工业资本主义尽管发展得最早，但发展得并不太快。利用殖民地对内部矛盾的排泄作用，英国的雇佣劳动制能够比较平稳而持续地发展。因此，尽管英国的工会组织早在 1824 年就已经合法化了，但由于英国工业资本更小的集中度，工会组织没有达到全国中央的组织化，而是保持在地方水平上，并且是按行业来组织的。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它的罢工效果大大低于德意志工人罢工的效果。与此同时，英国工人的组织在国会中是没有影响力的，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通过现存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政党来作为自身利益在国会中的代表的。

而在德意志，民族工业不是通过纺织业而是通过铁路业和重工业来作为它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领导部门的，这本身就带来了比英国更高的资本集中化特点。而且，这个通过战争得到统一的帝国，对它的邻居来说是一种威胁，而这些自身感到威胁的邻居们对这个新帝国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因此，德意志的统一几乎是自

动地使这个国家在欧洲大国关系中陷入到一场要赶上、超过其他大国的快速进程中去的。也正是在这种竞争压力的驱赶下，德帝国陷入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漩涡之中。这个工业快速扩张的进程，也特别给工业经济中的不同集团，即工商业资产阶级集团和产业工人阶级集团，带来了发展上的潜力。因此，在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里，与国家干预和鼓励下的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并行发展的，恰恰是产业工人的高度集中化和高度组织化，它轻而易举地带来了工会运动的全国中央组织化趋势。这种趋势所形成的战斗力，甚至能迫使企业主集团在罢工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以前，就得通过与工人运动代表者的协商来作出妥协。^①

早在帝国初期的经济繁荣时代里，面临产业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和日益上升的力量，德意志资产阶级中相当可观的部分就已经倒向了贵族阶级一边。自1907年经济大萧条以来，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快速上升，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便放弃了他们从贵族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理想，转而接受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与那个特权化的更高等级——容克贵族集团——和平相处，并服从于宫廷和贵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以抵抗这种来自下层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因为经济上不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还没有能从容克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已看到他们的地位受到了一个新的现代阶级的力量聚集所带来的威胁，这对于经济基础正在逐渐缩小的容克阶级摆脱政治上的孤立无疑是有利的。

在英、法、美等西方工业化国家里，资产阶级无论最初是否愿意，最终都得通过一种民主的宪法秩序，通过一种对政治、社会制度有步骤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调节和改造，来将产业工人阶级逐步接纳到这个工业社会中去，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前民主、半专制”的德帝国里，尝试的是另一条道路，一条为确保传统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而阻挠政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4-1918》，斯图加特1982年版，第153页。

治制度现代化的道路。

在此，人们必须注意到，这种传统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本身是要依赖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到巩固的。在这种结构中，传统权力精英实行独裁统治的前提就是，在允许某种程度的私人经济市场化的同时，通过专制国家严厉而“仁慈”的权威，来阻止人口大众对政治统治的实质性参与。而且，在还没有出现现代化的大众宣传媒介的条件下，给予这些多元力量以相对的行动自由和独立性，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这恰恰能使这些多元力量在一种貌似现代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通过它们各社会环境之间相对的封闭性，在争夺选票的斗争中，来达到彼此抵消力量的结果，从而也使这些多元性的力量不能真实地作出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德意志各邦的地方主义，两大教派的分裂，国防军的“国中之国”，大学中的相对自由，城、乡文化上的彼此分离，家庭传统观念与社会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作为传统而存在下来的社会结构，都能使人口大众之间的这种彼此对抗得到保持，从而也能为传统的独裁权威提供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这两个新的现代阶级的对立，反而使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这种对立意味着人口大众的又一场分裂，正如宗教的分裂那样，为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又增加了一个“乘数”。例如，同样是产业工人的工会，在德意志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工会、天主教徒的工会、新教工会。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资产阶级身上。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往往集合在中央党内，而新教徒中的资产阶级则分别处于民族自由党或是保守党人的集团内。

俾斯麦最初是以“满足工人长期要求”的名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对付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力量的手段，才将“普选权”先是引入到 1849 年的《北德联盟宪法》中，后又引入到 1871 年的《帝国宪法》中去的。这种在当时还是欧洲最自由主义的选举权，似乎在德意志引导着向大众民主的过渡。但“普选权”引入的真实动机却在于，它本身能够为贵族的传统统治收到“坐山观虎斗”

的效果。因为这能使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阶层，以及各种地方、宗教力量为争夺选票去彼此斗争，而谁也无法取得帝国国会的真正的多数，从而极大地减轻现存统治所面临的压力。

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在 1848 年以后全面投靠贵族集团后，这套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学来的“波拿巴主义”的手段，便主要用来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了。因为传统的权力精英，通过“普选权”的贯彻，仍然能够利用工业社会中的有产阶级“对红色幽灵的恐惧”，利用广大乡村居民对“大城市文明的厌恶”，来阻止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的大多数。帝国当局也总是能够将国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称之为“没有祖国的家伙”、“国家的敌人”、“民族的叛徒”，并联合起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工人运动和它的政党进行严厉的排斥和打击。由此可见，“法制国家”与“普选权”的运用并不总是朝着同一个发展方向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恰恰是处于对立之中的，因而“普选权”的引入，在帝国时代只具有貌似民主的特点。

对于这条道路，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维尔豪斯称之为：

一条采取现代政治的手段来阻止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道路，一条通过行政手段，在以技术—工业的现代化为一方，与以维护传统的统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妥协的道路。尽管它成功的可能性，在同时代人看来，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帝国的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那么艰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及所引起的崩溃和革命中，这种君主制统治形式，是在没有遇到巨大反抗的情况下被扫除掉的。因此，这清楚地表明：这场在专制国家的过去与民主的现代倾向之间，在君主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政治妥协，是失败的，这种在维护传统统治结构和传统价值观条件下进行的局部现代化的尝试，同样也是失败的。^①

^① 鲁道夫·维尔豪斯：《失败的妥协》，戈斯拉尔 1952 年版，第 8 页。

当这场失败还没有最后到来的时候，进行这种妥协和尝试的统治者总是会不遗余力的。在一场从 1918 年开始的、也被人们称之为“第二次帝国建立”的政治新联盟的组合中，俾斯麦将容克与资产阶级这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从政治上联合起来，并力图通过 1918 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但工业化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与贫困化，却在不断地扩大着这个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尽管俾斯麦力图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来对付“有威胁性的穷人”，但是，这种“皮鞭加糖块”的方法，仍然未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因为医疗保险公司是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根据投保人的出资份额来选举管理小组的，工人有权选出其中三分之二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很快觉察到了这一点，也决定性地利用了这一点。这样，医疗保险公司的各种管理机构，很快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中层干部和领导人物发挥实际政治影响力的更高级的学校和场所”^①。因此，恰恰是在《非常法》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18 年，它还只获得 200 万张选票，而到俾斯麦下台的 1919 年《非常法》解除之时，已获得了 300 万张选票了。

社会民主党现在已被权贵们称之为“正在冒烟的反对派”。一位容克贵族出身的历史学家费多尔·冯·左伯堤茨，在他的《在最后的帝国领导下的社会编年史》中，用这样的笔调描绘了 1918 年怨月愿日“色当纪念日”在柏林发生的事件：

出现了可恶的插曲，它是由想干扰这场伟大的庆祝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搞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的领导者们试图充分利用他们的“失去祖国性”。他们组织人群，涌上柏林的主要街道，高呼口号反对伟大的皇帝，反对军队和民族的节日气氛，他们喊着：“前进，我的主人！”并散发私印的传单。1918

^①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法兰克福 1918 年版，第 100 页。

芬尼一张，到处都有。昨天警察还逮捕过干这种事的人，并禁止、没收过这种东西。但人群冲破了警察的防线……与此同时，动物园里的野兽也随着钟声的敲响和皇帝的登场，不安地嚎叫起来，怎么也制止不了。这些反叛的野兽真是太不尊重这些衣冠楚楚的主人了。^①

尽管有三级选举制，社会民主党仍然利用“普选权”闯入了普鲁士的议会，而且在几乎每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中，它的选票和议席数量都在稳步上升。显然，不断进步的工业化，特别是都市化，为这种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不断地缩小着乡村农业人口的份额，并在持续上升的城市人口中日益增强着工人运动的政治分量。社会民主党在 1890 年的国会选举中终于成为了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该党的长期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于 1898 年 1 月回顾工人运动 25 年历史时这样写道：

我们这些老年人真诚地想到：这场运动长期以来已变成了一个因素，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内外政策，它将日复一日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整整 25 年的斗争从我们身边飞逝而过。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我们的敌人曾经想用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将我们置于死地，但社会民主党在历经了失败以后，又在胜利的进程中继续前进了。这一天将会来到的，那只骄傲的狮子，即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将会沉沦下去，而红旗将胜利飘扬！^②

与此同时，容克保守党的领袖冯·海德勃兰特这样说道：“这

① 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 1894 年版，第 111 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91—1898》，斯图加特 1898 年版，第 111 页。

是一场政治雪崩！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了，群众将有效地施加对我们贵族的影响。即使是一位更强有力的政治家，也仅仅只能暂时性地阻挡一下这股潮流。但我们是不愿自动放弃我们的位置的。”^① 在这种压力之下，惶惶不安的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逃避一个失败的未​​来呢？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决定德帝国命运的，它就是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世界政治”。

二、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出笼

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所释放出来的种种具有强制性的能量，唯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扩张主义政策，才可能与之相适应，因为唯有它才可能提供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殖民区域统治方式来确保市场的扩张。这种现代帝国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从经验上讲，无论是对德帝国而言，还是对美国、英国、法国而言，都是不间断地与经济波动性联系在一起。那种对赢利机会进行理性预测上的一如既往的艰难，那种对经济繁荣的热切期待，正是培育现代帝国主义政治的温床。

对德帝国来说，即使是 1871 年到 1873 年的高度繁荣期，也丝毫不意味着经济已经踏上了具有不间断发展的连续性道路，因为这期间仍然有着 1874 年到 1875 年、1876 年到 1878 年的两次中断，而且在 1873 年再次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工业经济的发展曲线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着均匀的、不断上升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这个干预型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全球的那些不发达地区是能够为德帝国提供倾销和投资机会的，而且也能为它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化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认为，利用实用主义的扩张，有可能为一种反周期的经济景气政策找到早期形式。于是，由国家当局促进的出口攻势，以及从外部市场获得赢利机会的战略，对准了恢复或保持经济繁荣的目标，并力图限制经济的无规律发展。这样，国民经济的

^① 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 1930 年版，第 140 页。

繁荣前景也就紧密依赖于不同形式的“成功扩张”了，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间接性的帝国统治”，导致了一条在万不得已之时为确保未来发展机会的“吞并主义道路”。

这种经济上聚合起来的动机，只是帝国主义“世界政治”推动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还有一种“社会防御战”的企图与这种扩张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帝国的传统领导集团，力图通过一种成功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来确保其在国内政治上的传统权力结构的继续合法化。海外扩张政策本身也在履行这种功能，即将无论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还是产业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引向外部。因为这两个阶级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对容克贵族阶级的传统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只不过一个采取了隐蔽的方式，一个采取了公开的方式罢了。对于大工业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可以在不改变现存统治结构的条件下，或是用他们的政治代表，去逐渐取代贵族政治精英们的位置；或是迫使传统的统治集团，随时满足他们经济利益上的要求。对于产业工人阶级来说，推翻现存政治统治秩序仍然是它追求的长远政治目标。

德帝国政府的这种“社会防御战略”，本身具有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的内部社会目标，它涉及用现代化的方法来顽固地捍卫传统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它不仅应为维护传统的“前工业化”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服务，而且也应借助工业资产阶级和学者阶层的援助之手来阻挡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当然，这种帝国主义战略是能够被投入到更多的战线上去的，例如，它或是通过在海外实现的赢利，来为传统统治集团在内政上捞到好处；或是通过一种纯粹的行动主义的虚假成功，给民族意识形态的威望带来一种社会心理上影响的满足。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深刻地指出：

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才成为了一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它将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替代性的空间中去了，而且对资产阶级来说，这个空间也是与现存的国家、它的结构以

及它的需求相适应的。与此同时，甚至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可能在一场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从而使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有可能在一场“民族集合化”政治中，为维护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找到一种新的保证。^①

作为统治稳定化和合法化的工具，这种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本身是属于这个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发展过程的。在这个由国家进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统治，唯有通过国家领导尽可能地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维持住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最重要的稳定条件，才能获得合法化。正是这种压力，与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操纵统治术一起，才构成了德意志对外政策的核心。俾斯麦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目标就是：改善那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和那些在 1871 年形成的“新保护主义的社会盟友们”的稳定性条件，以便能够缓和那场自 1848 年以来一直在发展的、围绕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冲突，并将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不断聚集起来的反抗潜能转向遥远的、也是作为一体化极点的新目标。因此，“民族任务”、“民族利益”之类的概念发出了新的光芒，从总体效果上讲，也重新巩固了这个传统权力精英集团，以及负载着它的特权化的容克集团的统治地位。

然而，大萧条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仍在动摇着这个传统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因而也使得加强对外贸易的要求与夺取殖民地的要求开始统一起来。1924 年新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的首届主席菲尔斯特·霍尔曼这样讲道：

加强对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应该有助于走出危机，也应该能缓和社会冲突。如果不能为德意志生产过剩的产品找到有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5 年版，第 150 页。

规律的、宽阔的倾销渠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步伐的前进。我们在德国国内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所作的斗争，其效果远不如通过殖民地所能取得的影响大。除了那些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以外，那种得到加强的、在海外夺取殖民地的宣传本身，也是与更好地防范共产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①

经济繁荣与社会平静之间的关联，作为一种理想，一直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们所极力推崇的，这种关联也同样浮现在俾斯麦的眼前。1879年的帝国议会通过了这位帝国宰相加强对外贸易、建立“保护领地”来使内部局势稳定化的方案。仅在1879年以来的短短数年时间里，德帝国便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中国胶州湾获得了“保护领地”。然而所有这些行动，都还没有真正导致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手们的尖锐冲突，这是因为俾斯麦一生都是对这种“非形式化帝国”感兴趣的，而且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在中国采取的“利益均占的自由贸易区”和“门户开放”是最符合他的思想的。但是，在内部压力和国际竞争的钳形运动之下，他毕竟已经作出了一项推行“保护领地政策”的决定，而这项政策必将导致更直接的建立殖民帝国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由于俾斯麦本人精明的头脑和特别的地位，他一时还能够阻止国内工业资产阶级要与英、法等国在殖民扩张上展开直接竞争的危险。例如，他甚至放弃了一些保护领地，拒绝了“德意志殖民协会”要建立一个“中非殖民大帝国”的方案。然而也因此造就了他内政上强有力的敌人，这些敌人准备在他退位后加强殖民政策。但他的后继者已不可能继续扮演这种“驯兽者角色”了，这不仅仅是由于以后的帝国宰相们往往都不具备他所具有的高超的治国之才，更重要的是，这个现代阶级社会中的对抗领域已经扩大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俾斯麦与帝国主义》，科隆1979年版，第157页。

了。社会民主党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恐惧，是这方面最好不过的证明。因此，外泄现代化引发的种种内部矛盾，已成为继续维持统治合法性必不可少的手段了。

当俾斯麦于 1890 年辞去宰相职位后，德帝国已成为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随着从“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式向威廉时代的“多元化政治”的突然过渡，经济帝国主义的倾向加速了向社会帝国主义方向的发展。“将各利益集团的压力转移向外”，“将革命因素转向对外”，“为民族感情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类呼声已变得更加强烈了。

威廉二世时代的历届德帝国政府，都迫切期望能通过“世界政治”在对外方面获得一种唾手可得的成就，并利用这种成就反过来影响国内。德军元帅瓦德西在“世界政治”中看到了对内政的良性影响，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从内部得到帮助是一种不健康的标志。”米克尔斯宰相要求积极奉行“民族集合化”政策，而毕罗夫宰相坚持认为：“仅仅只有一项成功的对外政策才能有助于内部的和解、平静、集合和统一。”^①

不仅是这些传统政治精英，而且就连那些著名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开始支持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了。如弗里德里希·瑙曼、马克斯·韦伯、恩斯特·冯·哈勒、恩斯特·弗兰克等人，都清楚地强调了这种思想：“或是通过满足工人阶级的福利政策和议会化来使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政治’成为可能，因为这些内部的改革如果发挥功能的话，是能使各阶级的一体化变成对外强大的前提条件的；或是通过‘世界政治’的成功来为福利政策找到物质上的真正基础，并保证社会内部的一种停战状态。”而毕罗夫在离开宰相岗位后，在他的那本《德意志政治》的回忆录中认为，“这种充满生机的民族政治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5 年版，第 158 页。

工具”^①。

显然，人们不难从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前景中找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的真正意义。它是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集团，在面临现代阶级冲突所引发的权力分配挑战时所作出的一种回答。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指出：

由于这个传统政治秩序，是几乎不考虑这种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了变化的社会形势的，因而现在它开始用这种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来力图抵消这个正在加速现代化的社会与传统的政治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了。^②

显然，这种“世界政治”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首先是一种为了内政上的需要、经过冷静计算之后的对外政策工具化的产物。在这个半专制国家内部，面对着这个“帝国民族”内部的分裂状态，面对着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激烈而紧张的关系，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们从他们防御战略的角度出发，既不想，也不能从必不可少的规模上去贯彻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措施。因此，除了进行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驯化外，他们再也提不出其他有成功希望的选择了。对此，德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伯默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就连这种选择的成功希望，也仅仅只有或是通过一种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得手，或是通过世界历史上一场巨大的赌博和冒险，或是通过一场在欧洲进行的胜利战争，才是能够盼望的了。”^③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5年版，第158页。

②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德国》，慕尼黑1979年版，第158页。

③ 赫尔穆特·伯默：《德国通向大国的道路》，科隆1975年版，第172页。

三、容克贵族阶级的败落

对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特别热情，原本并不来自于普鲁士传统的统治阶级容克贵族，而是来自于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容克贵族的政治家们之所以最后会去选择这条道路，恰恰说明由他们在一个世纪以前启动的这场现代化进程，已经反过来导致了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绝对统治地位的一场无可挽回的败落。

在帝国建立以后，容克贵族和他们的政治家对领土扩张并无太大的热情，相反，他们倒总是反对一种“大德意志”计划。因为在一个包括了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里，只会减轻普鲁士相对的政治分量，而这正是他们的政治基础。而且，这种“大德意志计划”会在帝国内部带来强有力的农业上的竞争，自然会进一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基础。事实上，自 19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实现工业化全面突破以来，容克贵族就一直极为担心自己会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前逐渐崩溃。而在国外，特别是帝国统一以后，他们一直担心来自法国和俄国军事上的威胁和来自俄国农业经济上的威胁。总之，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里，这样一种扩张主义政策的推行，只会不断增加和扩大已经占据了压倒优势的德意志工业界的分量的，因此，长期以来，他们对这种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和兴趣。

作为土地贵族，容克们真正依恋的是一个能从英国得到工业制品，同时又能向它出口粮食的农业的普鲁士。对他们来说，牺牲德意志工业的保护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利益，去与英国结成反法和反俄的联盟，才最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如果人们从逻辑上看，在国际上，容克土地贵族本应去号召缔结一个与英国的联盟，以对付俄国；从阶级利益出发，这个阶级也本应去推动英国与容克的联盟来对付德意志的工业界，因为对容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来说，最有竞争力的对手仍然是工业资产阶级，尽管工业无产者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

从根本上讲，由于这场一次性的现代化进程，容克贵族的统治地位已经发展到只有靠阻止德国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这样一种政策，本身又与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德帝国精力充沛的突起不能容忍地发生着矛盾。容克们知道，他们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来贯彻这种政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贫困的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组织力量已经构成了对现存统治秩序严重威胁的同时，这种反工业化的政策，还必将引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从而使容克因一种致命的内部矛盾而受到打击。而且这一点也十分清楚，若是为了他们的农业利益而牺牲工业保护主义，就必然会损害到建设一支现代化陆军的工业基础，而这样一支“普鲁士陆军”是容克的所有特权受到特别保护的真正而“正当的”依据，因而容克们对此是不能不尽其所能的。^①更不要说，这样一种反工业化的政策，只会将他们自己置于民族利益反对派的位置上去，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掉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从容克的前途出发，反工业化的政策早就没有贯彻的可能了。

由此看来，正是为了避免如此致命的矛盾局势的暴露，才驱使着帝国时代的容克贵族政治家们去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他们也只剩下用支持大工业界的帝国主义来换取对农业的足够保护这条路了。美国著名的德国问题专家埃卡尔特·克尔指出：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上讲，这场在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妥协，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土地贵族赞同工业界所需的工业保护关税，而工业界赞同土地贵族所需的农业保护关税，与此同时，两者又共同将无产者阶级隔绝在获得国家控制权的可能性之外。从对外政治的角度上讲，与这种集合化政策相联系的对外政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贯彻的：放弃与英国的友好关系的同时，用农业上的反俄政策工具来最终放弃俄国，这实际上是任它去成为法国资本开发的目标；放弃在国内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55年版，第 150页。

实施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同时，通过在工业和贸易上的倾销手段来与英国竞争。^①

对容克贵族来说，这种解决方案尽管保护了他们的农庄，但还是离他们的理想相差得太远，因为它仍在继续培养着那个已经崛起的工业界更为显著的地位，而这一点对容克来说，已毫无选择余地。容克贵族及其政治家们被迫最后去支持“大海军建设”的决断是这方面的一个最为沉重的例子。

帝国国会在 1898 年和 1900 年通过了两个扩建“大海军”的方案，但要求建立舰队的压力并不来自容克土地贵族。作为农场主，他们本身不仅害怕征税，而且更害怕建设一支代表着工业界力量的新海军会带来与代表容克农场主利益的陆军在资金和威信方面的竞争。究其原因则在于，海军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现代性，它不是传统的容克农庄环境心态的表达，而是作为一种现代民族工具来出现的。作为海军军官，市民之子便能最后走上高级军官的生涯，并赢得荣誉。同时，舰队本身也表达了“工程师们的现代性”，表达了由机器组合起来的集中性打击力量，一种暴力手段的未来。正如在大英帝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是市民资产阶级权力意识自我确定、自我保障能力的典范。而容克陆军军官团是继续将战争作为有力量的上流人士之间进行的一场骑士式斗争来看待的，如果经济动因有任何参考价值的话，那么他们的敌人也并不是几乎已没有什么农业的英国，而是那个怀着复仇野心的法国和在世界农业市场上与容克农场主竞争的俄国。如果在未来的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中，想要避免德帝国的失败的话，在他们看来，“惟一的方法就是不能与世界第一海上大国英国为敌”。^② 这当然也是那位赫赫有名

① 埃卡尔特·克尔：《战舰的建设与德国的政党政治，1898-1900》，芝加哥 1968 年版，第 106 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8-1900》，汉堡 1900 年版，第 106 页。

的陆军参谋总长冯·斯蒂芬将军心里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霍亨索伦王室的总代表威廉二世，之所以跳出来狂热地支持“大海军”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则是因为尽管他是更有意识地使自己依靠容克的，但他同时也力图使君主制成为最有充沛活力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的“德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想法，首先是与英国竞争相联系的，这种想法已被德国由一个农业国向一个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所证实，也为工业经济扩张的不可避免性所证实。但这并不代表容克土地贵族们原本真实的想法，这一点是人们应该记住的。

事实上，对德皇这一“未来的世界大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物，是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此人并不是一个容克世家子弟，而是一个出身于市民中间等级、在政治上有能量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不仅野心勃勃地为海军的发展制定了一揽子计划，而且还通过出版界、大学和整个中间等级的声音，在社会上组织起庞大的群众性压力集团——“德国海军联盟”，这个联盟立即得到了大工业界的支持，特别是克虏伯的大力赞助。当1906年英国提出与德帝国达成政治谅解的条件是德国应缩小海军规模时，立即遭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威廉二世是用讥讽的语调来回答前来谈判的英国国防大臣提出的“为什么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坟头会长满野草”这个问题的：“是呵，在我的帝国内，现在已没有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地位了！”^①

工业界才是占压倒优势地支持建设这支舰队的。他们既对在这种建设中能获得利益感兴趣，而且也对这支舰队能有益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血腥性感兴趣。克虏伯的发展是严重依赖于政府合同的，因此，它也像其他的钢铁、造船、采矿和化学利益集团一样，有着直接的利润上的动机。但对建设海军的热情并不限于重工业部门，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气公司等，它们虽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06—1906》，汉堡1906年版，第187页。

不赞成由重工业部门促成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然而同样也是舰队建设的热情支持者。在强有力的支持者中，也有集中在古老的汉萨城市中的德意志商业的诸公司。总之，在这个工业化社会里，唯有金融界的利益集团显得有些不冷不热，但他们的热情也在随着《海军国债券》的发行一起增长，最后也加入到“大海军建设”的热潮之中。

简而言之，除产业工人阶级以外，在所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中，唯有土地贵族反对建设这支舰队，但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支持了它。这只能说明，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容克们现在唯有使他们自己去与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达成和解，才可能把戏唱下去了。这也恰恰显示出他们长期的困境，以及他们在败落中的软弱性。

《海军法案》的通过，以及“大海军建设”，表明容克的官僚和武士们已开始屈服于一批新来的资产阶级官僚和武士们的意志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再可能由旧式的军人阶级排他性地来指挥了。尽管这批新到者通常成为了容克风格、道德、感情的拙劣模仿者，但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它表明，“与其说是容克们在统治，还不如说是容克统治权的一种转让”。^①同时它还说明，德帝国社会中最帝国主义、最好战的集团是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右翼。正是他们，为帝国主义扩张提供经济和历史上的合理依据并使之普及化，声势浩大的“德国海军联盟”和“泛德意志同盟”的出现，则是他们开始对一个现代化大众性社会玩弄起煽动伎俩的证明，而且这种煽动伎俩在当时也是玩得相当成功的。

无可否认，德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风格，的确得到了与普鲁士相联系的军国主义精神的灌输。人们也可以说，即使容克贵族正在失去他们真正的权力，但他们手中长久保持的文化上、知识上、社会上的统治权仍决定着正在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前途。但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58年版，第 152页。

是，人们同时还必须看到，采取贵族社会的统治方式，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甚至比英国更为明显，在与胜利者的妥协中，贵族可能幸存下来，但是凯旋的却是工业资产阶级！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卡尔特·克尔所指出的那样：

容克保守派们赞同舰队建设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因为害怕它；不是因为他们赞同它所代表的倾向，而是因为，如果他们反对它，他们就必须要为那些同样倾向中的某一种倾向的恶化而担忧。

他进一步引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对普鲁士容克贵族所作的评价：

他们支持这种专制虐政的实施，仅仅只是为了使他们自己不受这种虐政之苦。^①

在这种政治防御动机之上，容克保守派势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与之平行发展的是，他们犹豫不决地、但显然也是谨慎地由保守主义走进了帝国主义。而这种帝国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来源于容克土地贵族，还不如说来源于那些具有无限扩张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锋们，“如果容克们不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他们担心会出现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新联盟”^②。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首先是与工业化有着不解之缘的，列宁得出的这个人所共知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有一点十分清楚，像在所有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

① 埃卡尔特·克尔：《战舰的建设与德国的政党政治》，见《美国历史》，芝加哥 1958 年版，第 100 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58 年版，第 100 页。

一样，大工业资产阶级已经作为德意志社会的统治力量出现了。是他们将德帝国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出口机器，并向英国发起了挑战。尽管在议会中，大工业界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低于它的代表性，然而，它已处于一个向国家提出它的有效需求的位置上了。无论是德皇威廉二世，还是帝国政府中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精英们，都对工业界的这类需求十分敏感。而海军，这个得到了工业资产阶级最热情支持的新兵种，已经有意识地将它自己与作为民族工业和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帝国臂膀的梦想联系在一起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列所指出的那样：

容克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了，而是一个受到围攻、而又过分紧张的利益集团，它已经丧失了维持它长久的生存所必需的学习机能。但是，在一种已没有什么主动精神的情况下，只要普鲁士的特权不改革，它就仍然具有否决权上的资格。他们正是靠着他们古老霸权规定上的这些残余，用向日益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需求作出让步的方法，来力图减轻他们败落的程度，然而这种败落是无可挽回的。^①

当然，容克贵族在培育对俄国的对抗情绪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没有《农业保护关税法》的情况下，一个工业的德国与一个农业的俄国本来可以缔结一个自然的联盟，但是，由于俄国人自己在19世纪初已开始大规模地工业化，因而任何这类关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世界的工业现代化浪潮从外部给德国带来的又一种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对于帝国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来说，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显得更为重要了。与此同时，一种依赖民族主义的宣传来使这个分裂、对抗的社会重新整合化的努力，也变得更为重要了。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55年版，第 180页。

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

要想对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作深入的了解，人们有必要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区别：一种是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是将民族民主式地建立在公民性以及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它是从个体的意志出发，在以个人自我决定为基础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权和公民权中，自由主义式地导出“民族”这个概念的。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民族主义，在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中，整体性地、也是帝国主义性地决定着这些民族的行为。另一种民族主义则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它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的，而且也都是能被民族地理解的；二是一个民族是通过它自身成员文化上的共同性来定义的。由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将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机构看作决定民族的本质性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同时又将这种统一力量的表达称之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因而在国际斗争中，甚至能更好地将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国主义式地发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动力”。

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概念的了解上，人们是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帝国威廉时代发展成一种侵略性极强、整合性极高的民族主义的。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德意志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思想发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它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之间的关系。

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发展根源，它本身也是文化民族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德意志古典主义、普鲁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已给这场新的文化民族运动打下了烙印。对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基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他从“前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出发，将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强调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件东西对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奠基来说也特别重要：第一件东西是新的语言哲学，它通过洪堡、黑格

尔、格林等人得到了不断发展。“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人类享有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它不仅是人的产物，而且也是不断给人打下烙印的体系”^①。这种对语言基本意义的强调，本身指出了语言—人种上的区别，指出了通过语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后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义。第二件东西则来自赫德尔，他强调了从学者、精英们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识型的大众文化的转向。在这里，讲着同样语言的“人民大众”被包括进文化反思的对象当中，这本身是具有一种民主—平等主义倾向的。因此，“文化民族”的原则成为了浪漫主义方案设计中的本质部分。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有着古典主义的来源。自 18 世纪晚期以来，人们首先在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发展起一种“文化统一体”思想。也就是说，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个人类集团（即民族）在语言—人种上的共同性。随后黑格尔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将这种对统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义—美学上的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上的解释系统化和理智化了。而且他的美学哲学的艺术体系，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这样作出了评价：

在 18 世纪的德意志大学中，所有人文科学里的主流派，都是由这种首先是古典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然后也是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顽强地决定着的。^②

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关键性的概念，也就被当作科学的解释而产生出来，“民族特点”也就被浪漫主义地看作是一种长久、永恒的现实。这种有着古典主义美学根源的思维方向，无疑给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它对自身民族价值的特别抬高带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67 年版，第 107 页。

^②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67 年版，第 107 页。

来了好处，也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它力图理智地解释世界，然而却再次妨碍了人们去真实地认识科学的理智，因而也总是具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也首先是那些有着共同的文化、但并不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人们的一种民族主义，是那些受压迫的民族，例如东欧、东南欧的民族，爱尔兰人、挪威人、佛兰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口是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来组成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着共同国家里的人们那样，是由人民主权论和政治意志来组成民族的。因此，在这些没有共同国家的民族那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经用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民族那里，民族主义早已在民族的共同属性中得到发展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也是更加适应于那些没有共同祖国的民族的条件。而且，在这些民族身上，对语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强调，比较起那些生活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来，有着不同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了巩固的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与他们所属国家的政治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在像诸如德意志这样的没有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生活的民族那里，同一性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个中心性问题。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了。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上了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的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以及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的“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才开始真正地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也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识界的抵抗，转而开始发展成群众性的反对“异族统治”和“划一化统治”的斗争，从而也浪漫主义地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对德意志民族运动最大的影响就在

于，它使德意志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明白：“唯有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发展并得到保护，也才能真正地将个体整合成民族。”^① 因此，从“世界公民”到“民族国家”，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发展道路的著名公式。

由于这个民族的分裂与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联系，因此，对这种政治目标的追求，便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力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因而在它的早期也无疑具有进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当个人自由、平等的要求与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时获得的时候，正如 1848 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现的那样，围绕着两者优先权的问题便在具体的政策上和争执中陷入了长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优先权。从这里，人们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最终会放弃自由主义的优先权，转而拥护容克贵族集团于 1871 年建立和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的原因。当然，由于将奥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个“小德意志统一”帝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这个文化民族全面统一意义的民族国家，因而它在这个时代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也仍然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ein 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从而也为德意志人以后建立具有完全统一意义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努力，继续提供着一种潜在的“合理依据”。^②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与这个德帝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巨大压力分不开的。尽管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然而也正是在帝国时代的高工业化阶段，才使得传统与现代性社会环境上的区别变得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62 年版，第 101 页。

② 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 1954 年版，第 101 页。

日益鲜明，因而也才使社会中的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极大地增强了。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生活小集团之中，生活在地方、区域、等级的社会之中。与统治的联系，忠诚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观形象的基础上的。人们受着传统引导，在这种传统中，行为准则被保留下来，并且也是现存的。也由于人们面对着的是这种有具体形象物的直观世界，生活的意义是简单的，也是现存的。总之，人们传统的行为模式，是与农业社会结构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类型如封建庄园、行会等狭窄的“共同体”相适应的。

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使所有这些关系陷于了瓦解之中。特别是在德帝国时代，在这个开始走向统一化的社会中，工业化社会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取代着农业社会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是绝大多数人，已开始从传统中走了出来，走进了一个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的社会，走进了一个具有理性的、无形的、抽象结构的大集团。个体现在面对着的是一种猛然变大了的抽象概念——“国家”。从传统以及它的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本身在个体化，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要靠“内心”来引导了。个体的存在变得如此具有独立性，同时也就使得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权威，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了。但与此同时，由于传统负载集团的瓦解，因而在这个新的社会大集体中，绝大多数成员之间又是彼此并不认识的，每个人都得依赖于许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人，个体也恰恰因此而被孤立了。终于，准则、联系和忠诚再也不能形象具体地、具有象征性地被提供了，感觉从直观形象的世界移进了思考的世界之中。这种过渡导致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它使个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并朝着批评传统的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意义，显然在传统中越来越难找到了，觉察出这种危机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识界。这是因为任何准则首先都是要以语言上的抽象为中介的，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媒介物也正是语言和文化。于是，这些知识界的学者们，便首先从那种也是

由他们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中，从艺术、文学、哲学和时事评论中，来获得他们的行为准则，来获得他们的同一性身份。总之，要寻找一种能将特定社会的不同特征表达为一种不变的传统时，“文化”这个概念，无疑能非常好地履行这种功能。^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教育普及化、社会学校化的德帝国时代里，他们能够通过学校、出版部门将他们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介绍给社会各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联系中，语言和文化以及知识界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意义的原因。

换句话说，传统瓦解的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由于对传统的赞同变得只具有相对性了，与别人的共同性就必须被重新确定，于是，一种新的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这个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这个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征的象征物，成为了个体与集体感情联系的焦点，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实上的解释，就能成为这种新社会整合化的形式。这是因为，它毕竟能联结起这个社会，能将超越个体的身份介绍给个体，并在一个多重复合、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为个体减轻无保障性和归宿性，因此，本身也是能够满足个体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与联络交往上的整合化的新要求的。总之，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心理上的局势，为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帝国社会的崛起，首先准备了社会基础。

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削弱为基础的。随着帝国时代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人们内心世界中的价值地位上，在生活意义的确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断缩小，事实上连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于是，各种政治运动成为了一种有关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性质。而民族主义是属于这种政治运动的，它向追随者们许诺了获得拯救的理想，并要求作出牺牲，同时，它也使追随者们坚信，这种牺牲是值

^① 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 1930年版，第 154 页。

得的。^① 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继承了相当部分的宗教上的功能和风格，从而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的场所。

然而，由于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初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已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发生了分离，并转而与保守主义更鲜明地结合在一起了。基于这两者反法国大革命“~~1789年~~1789年精神”的共同传统，这种民族主义已强烈地转而反对“天赋人权”、反对个人自由的政治传统，并开始成为一种为现存国家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德帝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官僚集团力图要将这场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因而它借助于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理论，设计出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民族观念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强调，凡是能找到“理性的”（~~1789年~~1789年这个词的地方，也总能找到“民族的”（~~1789年~~1789年这个词。而“整体高于局部”、“国家高于国民和社会”、“秩序高于多样性的自由”成为了统治者的口号。^② 而在这里，“国家”是被他们浪漫主义地理解为“民族”表达的。摇摇摇

这种国家方案尽管不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它能够很好地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者们对个体提出了“绝对服从国家统治”的道德上的特别要求。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是一种自然、有机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它是和谐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的共同体”^③。显然，这种乌托邦的理想，是与高工业化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处于绝对矛盾的位置上的，因为这种社会现实恰恰是以个体之间的差别化和反差为基础的，是以个体之间的

①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52年版，第 140页。

②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2年版，第 150页。

③ 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 1952年版，第 140页。

冲突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也是以工人阶级与容克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却被他们轻而易举地作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来解释。

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所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就越是明显，社会整合化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只能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同样也能够与激进的、反启蒙精神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自从1873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那场具有现代性质的德意志反犹运动的兴起，已提供了这种结合的证明。作为一种极端狭隘的和反动的政治文化反应，这场反犹运动，就其性质而言，还仅仅是德意志非犹太中间阶层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运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作出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890年以后，知识界的青年极右派们所发表的大量反犹作品，已在公开鼓吹“人和种族的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并公开叫喊“经济上的崛起和对海外地区的征服，应归功于民族的特别本质，也就是它种族上的特性”，为了“条顿人的世界任务”对内“必须同时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①。这种具有“前纳粹主义”性质的反犹主义，竟然能够在和平时期，通过在社会内部树立民族对立面的尝试，动员起德意志社会中相当广泛的非犹太中间阶层，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本身是完全缺乏免疫力的。

同时人们也不应忘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跨世纪阶段中，高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所有阶级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持久的紧张性，这两者本身是有着一种同时性的，所有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许多附带紧张关

^① 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1955年版，第76页。

系，也都聚集在这根紧张轴上。在这种局势中，对民族感情和忠诚的呼吁，能够作为促进这个社会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的杠杆来使用。当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是以推翻现存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时候，那么，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强调，本身是能够作为维护这个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来投入的。

尤其是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表现的那样，“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本身负载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并能将这个社会大集体中的人与别的社会大集体中的人区别开来，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连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也在 1914 年屈服于这种压力，与其他各政党缔结“城堡和平”并“为祖国而战”。这场工人运动的加盟，使得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化特点。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 1954 年的回顾中这样讲道：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被骂成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们的幸灾乐祸归于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重新学会了我们几乎已忘记了的东西，即在所有的阶级冲突之外，这个民族的所有阶级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重新学会了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想被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无论哪个人，剥夺走我们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①

当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的时候，特别是当负载这种自我赞扬的价值体系的集体非常强大的时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04 页。

候，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便获得了它自身的、也是近乎于机械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通常是任何具体的个人或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与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四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区别。这四大主义是同一社会内部正在变化着的力量平衡的产物，并仅仅是第二位地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的；而民族主义是不同国家间正在变化着的权力平衡的产物，并仅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国家社会内部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因此，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与同胞视为同一的认同感一旦加强，那么，与其他国家同样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也就自然减弱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认同与排斥模式上的变迁，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价值、民族信仰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条件。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也都是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目标的。这种工业民族之间日益上升的战争气氛，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加剧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正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指出的那样：摇摇摇

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不是在十年间，而是在几年内，便触及到国际问题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于面临着“全世界敌人”的仇恨，我们体验到了我们整个人类那种使人沉醉的强化感。我们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了这种突然的、也是精神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必然会带来过度行为的种子的。这种发展被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情绪所催促，它粉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平衡。由于被仇恨所包围，这个民族便依赖于它自己的仇恨。社会和国家机器被这种孤立的、光荣的，然而也是命运不佳的斗争弄得紧张过度，传统已完全被歪曲了。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意识，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环境里，本来可能仅仅只会是

一种残存现象，但现在已开始在全社会蔓延开来。^①

当然，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德帝国一国所特有的现象，但是，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始终有着它自身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知识界所鼓吹的“~~1914~~原精神”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特点。“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②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总之，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现代化推动力的产物，在 ~~19~~世纪，它起初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觉到自身落后性的一种反应。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本身也推动了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因为它具有集中化和动员化的特点，因而瓦解着生活世界的地方分裂化，并造就起那种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易感染性”的大集团——民族的社会。它提供了一种新社会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并用社会成员个体身份上的同一性，来替代由于现代化发展被破坏了的传统。它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共同事件日益增长的参与，从而也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和能动性。

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必须看到它的相反因素。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产物，一种由于行为标准、传统和宗教的家乡遭到毁坏而出现的“思乡病”产物，一种由于异化、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所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它用造就一个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乡，用一种包括起整体的新条件，用一直通向

① 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中的德国与世界政治》，纽约 ~~19~~年版，第 ~~19~~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14-1918~~》，汉堡 ~~1918~~年版，第 ~~1918~~页。

“光明未来”的文化历史上的辩解，用向社会个体成员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企图摆脱由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它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它通过对这种民族独特的优越性夸张式的宣扬，唤起了成员的民族荣誉感和崇高感，从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强烈内聚力。因此，自从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能够作为威廉时代的民族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工具，作为德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来服务。而且在外部的强压之下，它遗产中最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变种，也能够汇合到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去。

第四节 发展的困境与战争的选择

一、俾斯麦时代的德帝国外交

当俾斯麦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后，他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旨在拖延一场这个新帝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对抗。事实上，当 1875 年英国和俄国都表示他们将不会容忍德意志对法兰西的另一场胜利时，一个压迫着德帝国的“联盟恶梦”，就已经开始在追逐着俾斯麦了，而且也最终毁灭了这个帝国。

在立国之初，俾斯麦精巧得令人赞叹的外交政策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协议组成的。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都被包括在与德帝国的联盟之中，其目的在于以此来杜绝它们对法国报复计划的支持，并遏制它们彼此之间的争斗。俄国与奥匈帝国的争斗，将被它们与德帝国的“三皇同盟”所遏制；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将由德帝国在“三方联盟”内部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对法国殖民野心加以鼓励，就能保证法国与英国、意大利之间不断地发生摩擦。鼓励英国去支持土耳其对俄国和法国的反抗，就能使英国达到某种独立状态。这样，由于德国的外交拥抱，以及英国对土耳其的

保证，便可将俄国抑制在东欧和近东，或是推动着它向亚洲作进一步的扩张，而在那里，俄国是会与英国以及它后来的盟友日本发生冲突的。而英国由于受到法国和俄国对欧洲以外野心的威胁，便只能寻求德帝国的支持。总之，由于这些复杂结构的结果，德帝国将成为欧洲外交的公断人，冲突将针对欧洲以外的地区，不让它扰乱欧洲地区的平静，从而防止将这个新生的德帝国推入危险的混乱之中。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俾斯麦 1871 年后仍继续当政，这个帝国就有可能不会被迫去进行战争，也就不会最后崩溃。这显然夸大了俾斯麦个人的意义，而忽略了其他基本因素的作用。尽管他的后继者们都显然缺乏他在外交上的才干和控制能力，但是，一个仅仅靠不停地消耗哄骗天才的政策是不健全的，也是极有可能失败的。俾斯麦的“联盟体系”，实际上是被迫使他离任的那个时代所严重损害掉，因为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德帝国能否在如此之多令人棘手的三角关系中始终维持住它具有平衡力量的伙伴地位，而且也取决于它能否使世界其他国家相信，这个新建立的德帝国真的是一个“已在领土上心满意足”的国家。

俾斯麦首先就放弃了将奥地利吸收进统一帝国的那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一统梦想，也一再努力掩埋建立德意志殖民帝国的野心。在他看来，一个有奥地利加入其中的德帝国将会严重威胁、甚至绞杀普鲁士的传统统治地位，因而很可能是不可统治的。而且，这样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确会使其他的欧洲国家感到威胁，并驱使它们作出激烈的反应，更不要说去统治异族人了。因此，在 1866 年击败奥地利后，他尽力保持着这个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与德帝国的分离。俾斯麦在 1873 年这样讲到他的动机：

1871 年创造的这个中欧空间地带的新组织，已经达到了这个欧洲秩序所能容忍的最大极限。只有当德意志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也是不断地照顾到这个国际秩序参加者们的利益时，普鲁士—德国的存在以及它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才能得到保

证。这个帝国，应完全像德意志同盟那样，必须具有能在这个欧洲整体体系内维护和平、安全、平衡的功能，并发挥桥梁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帝国应该保留它向西方和向东方的政治选择，以扩展自己的贸易活动空间，并以此来保证这个普鲁士—德国在和平轨道上的发展。^①

但是，这位有着“自由行动之手”的“诚实的捐客”的政策，只有在一种双重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一，德帝国永远放弃一种积极的“世界政治”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其二，“这个旧大陆的心脏地带，也就是柏林，必须能始终独立自主地调节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所有冲突，并阻止在这个大陆以外任何新的、不受控制的强权政治引力中心的形成”^②。但是，这个以柏林作为力量中心，并通过极高的外交艺术手段编织起来的条约体系，其根本弱点在于它想维持一种现状，而这种现状从一开始就是有裂缝的，因此也是不能长久的。也就是说，俾斯麦的“欧洲联盟体系”太少估计到向一个全球国际体系过渡的意义了，同时也太少估计到内政和外交中变动的活力了，而这种变动的活力，早在欧洲向工业化时代的过渡时期里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首先，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存在着民族主义自身的驱动力。俾斯麦的帝国本身就是依靠召集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的。但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既强有力又任性的力量，它本身不易得到良好的控制，也不易恰到好处地用来适应权力政治的要求。尤其是德意志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可能不波及巴尔干和波兰。大量民族“飞地”的存在，使得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斯拉夫人，都不可能同时一致地满足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现状，而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从五百年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年版，第 157页。

② 本德·于尔根·文德特：《欧洲中部的德国》，慕尼黑 1955年版，第 100页。

那个被意大利和普鲁士击败的哈布斯堡君主制，已经面临了超过它自身力量的、来自它统治下的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来自外部的“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压力的新挑战。俾斯麦的帝国不能对如此之多传统的德意志地区的利益与命运无动于衷，也不能在不停地建设自身大国的条件下，去允许俄国统治巴尔干。因此，历届德帝国政府都将毫无例外地被拖入东欧领土的纷争之中。

其次，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内部，民族主义的扩张势力，都得到了经济利益上的强有力援助。1873年到1896年的长期萧条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关系，而且也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大规模的破产和延长了的失业，各国政府都不得不从自由贸易转向了保护主义、经济集团化和帝国主义。俾斯麦于1873年开始的那场国内政治改革，仅仅是这种变迁模式的一部分。他最后也不得不改变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不得不去与奥匈帝国建立“双边联盟”。无论怎样，不仅是德意志的保护主义，而且还有其它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都使得他别出心裁的“心满意足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现实了。

保护主义是一种对萧条的调整方式，但它不仅涉及关税，而且还涉及一场工业的普遍改组。由于公司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并陡然一体化，国内市场被卡特化并受到国家关税的保护，因此，德帝国的大公司能够以极高的竞争价格在国外倾销他们的过剩产品。在用保护关税来确保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向外倾销来促进对外贸易，已成为“反经济周期政策”中最有前途的方法。尤其在这个仍然是以钢铁和机床为主要技术代表的大工业时代里，在这个以资本集中化和两极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里，是不可能真正造就出一个国内的群众性消费市场的。因此，获取更大利润的可能性，只能来自于需要并能够建设铁路和工厂的国家和地区，一句话，来自于对外贸易。

德帝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本身也是不容易与俾斯麦过去一直推行的那套外交政策相协调的，因为关税本身担负着以极大竞争性的贸易关系为基础的各国外交。随着关税壁垒不断高筑，国际摩擦便无可避免。在1873年以前的自由贸易和经济繁

荣的工业世界里，蜂拥而来的德帝国工业品能够期望从开发和发展外国市场中找到更大的机会，而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萧条并寻求“解救”，因此外国市场开始关闭，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了。将必需的市场与原料带入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内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因而各国政治自然而然地被吸引着走向“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达尔文，而不是科布登，成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预言人。对德帝国来说，“自给自足”意味着从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获取市场和原料的同时，保护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正是这种新的经济逻辑导致了威廉二世的中欧“大陆政策”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而这两者都是不易与俾斯麦的联盟体系的逻辑相协调的，因为他的联盟体系是以一种保守的、“在领土上已获得满足”的帝国臆想为基础的。

工业世界的普遍萧条和广泛的重商主义，使得俾斯麦的以“领土饱和”臆想为基础的外交政策陷入了自相矛盾中，同时也迫使他去选择一种新的外交路线。在这方面，俾斯麦本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879 年，他不顾德皇威廉一世的强烈反对，使德帝国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双边联盟”，而且这个联盟的新规定也同时被写进了两个由德意志人领导的帝国的宪法之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俾斯麦作出如此非同寻常的举动呢？至少他担心日益软弱的奥地利会倒进法国的营垒或是崩溃，而让德帝国单独在巴尔干与俄国人算账。但是，经济上的考虑也与政治上的考虑相互交织在一起，当他试图通过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成就来促进内政上的变革时，与奥匈帝国缔结关税同盟的计划在他心目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与奥匈帝国相比，俄国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那么容易长期受德帝国的政治控制。而且在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里，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与早期正好相反，与公开贸易想象中的利益相比，“安全的经济空间”获得了优先权。在这种前景下，与奥地利的联盟，作为重商主义保护政策中天生固有的运动，在俾斯麦看来，并不算是对外政策中的一大

错误。

但是，当这个联盟缔结之后，俾斯麦便将他剩下的政治生涯都花费到试图避免它的后果上去了。一个如此紧密的与奥地利的双边联盟显然与俾斯麦早先的战略已完全相反，因为它显示出一个中欧德意志霸权集团的野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俾斯麦过去曾坚决反对过的“大德意志”的大陆政策。当然，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这个联盟还仅仅意味着两国在日益密切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合道路上的第一步，严格地讲，还仅仅是一个政治卡特尔，但是它足以给国际关系带来一种不信任因素，一种必然会给欧洲平衡日益增加负担的因素。尽管俾斯麦还背着奥地利，通过一项秘密的《德—俄再保险条约》，试图减轻德奥联盟所造成的后果，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一个暂时的保护性选择。因为一个包括了奥地利的更大的德意志联合的前景，这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在它们的欧洲邻居们看来，是一场恶梦，一种“德意志危险”的根本标志，这种危险也正是他们所要设法祛除的。俄国从1874年开始就在谋求与法国的友谊了。而现在，德帝国与俄国的巴尔干野心的冲突，已是可以预料到的了；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对大陆霸权本能的反对，同样也是可以预料的了，特别是当一个更为强悍的德意志工业正在逐渐压迫着英国人的国内和世界市场的时候。总之，恰恰是与奥地利的联盟在推动着一个俾斯麦过去一直在提心吊胆的反德外交联盟的形成。

二、俾斯麦以后的德帝国外交

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分析能够说明，在德帝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上，只存在着两种明朗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经济上自由、领土上满足的德国，但它得指望自由贸易来为它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并出售它的产品；第二种选择是一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德国，为了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而需要一个与它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人口相应的空间上的霸权。俾斯麦开始于第一种选择，但在他执政的后期，已越来越感受到通向第二种选择的运动所带来的压

抑了。

他的继任者冯·卡普里维宰相（~~1890~~~~~1898~~年），同样有对经济现代化固有争端和冲突的极度敏感，但他不像俾斯麦，他倾向于自由的顺应，而不是保守的抑制。作为一位军人，他并非不担心德帝国作为一个中欧暴发户大国的危险地位；作为一位宰相，他被那股涌出帝国的移民洪流弄得心烦意乱。同时，被俾斯麦视作医治国内经济萧条唯一手段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事实上，直到~~1890~~年，德帝国的工业仍然没有通过保护主义政策而从经济萧条中真正摆脱出来。卡普里维还特别意识到了保护主义严重的国际后果。他担心如果保护主义政策再不加以改变，工业化各国之间的经济战将毒化欧洲政治关系，邻居们的报复将会威胁到这个暴发户的德帝国。因此，为了减少经济冲突，复苏德帝国的工业扩张，为了稳住国内居民的外移，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这位新任宰相一上台便尽力返回自由贸易，并力图促成一个自由的欧洲贸易集团。在他的论点中，这一点是应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由狭隘的民族经济所组成的欧洲，必将有一天会被美国所统治。”^①

卡普里维“新方针”的贯彻，本身要求国内相应的政治势力与自由贸易前景的一种新配合，而且他甚至成功地动员起自由贸易派们，也一时克服了土地贵族们的反对，并与奥匈帝国、俄国、英国缔结了一系列相当自由的贸易条约。同时，他还试图对德意志社会进行某些自由主义化的改革。也正是在他的宰相任期内，帝国政府结束了反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常法》，并使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与波兰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新方针从一开始就激怒了容克土地贵族的保守党人，也吓坏了民族自由党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仅在五年时间里，容克土地贵族与重工业家的联盟，便将这位新宰相拉下了马。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长期的经济萧条竟然在他下了台的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898~~年版，第~~18~~页。

一年后，即1891年左右才最后结束，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贸易扩张的时期，这也正是卡普里维所缔结的那些自由贸易条约真正开始生效的时期。这些有效期至少一直持续到1894年的条约，本身就极好地证明它们对德帝国的工业是有利的。然而，保护主义势力在帝国内部已经占据了上风，特别是毕罗夫宰相（1894~1897年）任期内，当卡普里维缔结的那些自由贸易性质的条约在20世纪初到期时，这位宰相就毫不犹豫地将新的保护主义条款强加在俄国甚至是奥匈帝国的身上，而这两国的市场，在德帝国实施农业保护关税的同时，一直是对德帝国工业品敞开的。因此，也毫不奇怪，毕罗夫的新条约变成了以后几年外交摩擦的主要根源，因为俄国甚至奥匈帝国的老式农业与发展中的工业，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那种有利于德帝国而对自己有如此明显负担的现状了。

毕罗夫的政策显示出保护主义在德意志已集合起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从1891年到1894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兴旺，与在它之前的萧条一样，同样大地有助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发展。在没有改变那种由萧条培育出来的重商主义结构和态度的前提下，进行充分扩张的普遍心理，导致了德意志扩张主义势力的激增。而且由于萧条可能再来，唯有那些以安全领土和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国家才能死里逃生，这样，与德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张相联系，随之而来的就是扩大德帝国殖民属地和增强海军力量。因此，德帝国的“世界政治”也就与毕罗夫任期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毕罗夫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在国外摆出了一种威胁—交战的态势，其主要目的，还只是为了将中间等级和产业工人的注意力从国内宪法改革上转移开来。但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也在为一场狂热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拥有强大舰队的海军以及它的“世界使命”，成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理想的寄托物，这是不同于仍然属于贵族的那支中欧陆军的。当国内市场迅速卡特化的时刻，那些向上爬的中间等级也只能从外部市场的开拓中才能获得新的希望。因此，唯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使人确信，德国的贸易是会被逐出拉丁美洲、近东、远东那些“徒有虚名的独立

地区”的，这一点也同时成为了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共识。

社会民主党的日益崛起，本身就迫使着其他政党去寻找它们自己的民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在动员中间层和中下层选民方面已经证明是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的，因此，德意志的帝国主义也就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奇特地结合起来，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人也转向了帝国主义。1894年以后，资产阶级的舆论完全被这种观点所浸透：“未来发达的德国需要在世界上有一块属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块能够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相比较的势力范围。”^①

总之，具有如此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来自于德帝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内部强制性，任何一种向着“满足的”自由主义方向复归的外交政策都已不可能了。事实上，俾斯麦在1871年后开始进行的向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变，甚至在1854年以前就已经使他过去奉行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变得无用了。他是第一个改变它的人，卡普里维变不回来，德帝国走上了扩张之路。

三、“联盟战略”的失败与战争的选择

如果说德帝国必然会选择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向，必然会为帝国的生存而进行战争的话，那么俾斯麦留给后继者们的遗产也是相当不妙的。

俾斯麦的欧洲“联盟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不合逻辑或过于复杂”而失败的，而是首先有一个事实他要负部分责任，即这个1871年建立起来的帝国秩序具有太强烈的反法情绪，而且由于它最初的政治方向，已经使得这个帝国秩序陷入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变化过程相矛盾的境地之中。美国外交家兼历史学家乔治·弗洛斯特·肯兰指出：“这位帝国宰相现在必须为普鲁士军事领导的过错而受罚，这些过错是他曾为达到他政治目标的初期年代里所容忍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895年版，第101页。

了的。”^①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属于这种错误，它首先是建立在巩固德意志征服成果的基础上的，建立在提高这个新帝国对外安全的军事立场的基础上的。由于法国在历史传统中对德意志世界一贯占有优势，因此，吞并这个地区，对于防止未来法国的突然袭击，或许能够提供一种物质上的保障。1871年的战争也证明了无论是从法国出发攻击德国，还是从德国出发去攻击法国，占有阿尔萨斯—洛林都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因而容克军方积极主张吞并这一地区，俾斯麦也对此表示支持并付诸实践。但是，马克思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

当人们将军事上的考虑抬到原则的高度，并根据这个原则来确定民族边界的时候，那么，奥地利也能有权要求明西沃，法国也能要求莱茵兰，如果边界应由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些要求都将不会结束，因为每一方都从必要性上讲缺乏军事上的边界，而且又都能通过吞并更广泛的领土来获得改善，因为它总是由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因此，一场新战争的种子已经埋下了。^②

总之，这场吞并已使法国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德国的天敌。这个敌人，从德帝国建立之日起，实际上就成为了俾斯麦“联盟体系”的一种破坏性因素，并一直以灾难性的方式束缚了1871年以前德帝国对外政策上的活动空间。一个以法、德谅解为基础的欧洲集团，这种对德国的未来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能性，已经与这个帝国无缘了。还远远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个敌人对于德帝国来说

① 乔治·弗洛斯特·肯兰：《瓦解中的俾斯麦欧洲体系》，法兰克福1961年版，第100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皇帝帝国的危机源泉，1871—1878》，哥廷根1964年版，第100页。

太强大了，以至于不可能永久性地粉碎它，而一个没有被粉碎的法国，怀着失去领土的怨恨，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自从 1906 年以来，毛奇就在担心两线作战的问题了，到 20 世纪 20 年代，对法俄联盟的所有不祥之兆的担忧，已使得德意志军方的整个高层领导都开始对这场吞并持批评态度了。他们报怨因这场吞并给德帝国“在欧洲造成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它规定了德法之间永久性的战争状况”。当 1913 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高潮过后，为对付两线战争而绞尽脑汁的参谋总长冯·施利芬将军已完全清醒地认识到：“或是进行反对法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或是最终找到关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调整上的新规定，除此之外，帝国的政治已没有别的选择。”^①

德帝国的建立曾依赖于沙皇俄国当时“善意的中立”。俄国与德帝国关系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恶化，从政治上讲，要归因于俾斯麦于 1873 年缔结的与奥匈帝国的联盟，但从经济上讲，则首先要归因于德国的农业保护关税和对俄国投资的封锁。

那个于 1880 年 1 月开始生效的德意志《农业关税法》本身就是直接针对俄国的谷物出口的。因为俄国廉价的农产品已经猛烈地冲击了普鲁士容克大农庄传统的中欧市场。然而对于沙皇俄国来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要实现一场成功的工业现代化，其资金来源又决定性地依赖于农业出口上的收益。德帝国农业关税在七年之间就抬高了三倍，只能培养起俄国内部的“日耳曼的恐惧症”。

尽管“谷物关税问题”已经引起了两国关系的摩擦，但俾斯麦政府还进一步采取了打击俄国早期工业化并引起严重后果的步骤。从根本上讲，俄国早期工业化的快速成功也需要外国资本的输入。而在俾斯麦看来，一个迅速工业化的俄国，对德帝国来说只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不仅会使拥有发达交通系统的俄国能将农产品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皇帝帝国的危机源泉，1906—1913》，哥廷根 1974 年版，第 103 页。

更迅速、更廉价地运往中欧，从而给容克的大农庄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样一个工业发达的俄国只会给德国的工业界带来一个潜力强大的竞争对手。更何况，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已将矛头对准德意志有着传统利益的东欧、东南欧、巴尔干地区。因此，必须提防未来与俄国的一场军事上的冲突，因而资助俄国的工业化，无异于增强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俾斯麦政府于 1890 年 5 月下令实施了一项德国资本市场对俄国的封锁政策。要求任何对俄国的投资都必须要有俄国方面以货物或证券作保证，同时又拒绝将俄国的纸币再作为绝对可靠的资产来看待。由于俄国已处于它工业革命突破的前夜了，也就是说，已处于具有无限资本需求的阶段之中了，这就为法国寻找东方盟友的企图提供了机会，巴黎的银行将它的资本迅速投向了在资金方面陷于饥渴状态的俄国。

从根本上讲，德帝国反俄的强硬政策更多是由于内政上的因素所决定的，易北河以东从事谷物经济的容克土地贵族集团，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统治利益，本身要求农业保护主义，而容克的陆军则更担心一个由工业化武装起来的东部对手。今天也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俄国的市场本来也有可能为德意志大工业界的“海外帝国主义”，特别是为商品和资本的输提供出一种大陆性选择空间的呢？但是，无论怎样，1890 年柏林的决定以及它的后果，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了完全否定式的回答。也就是说，即使有这样一条可能性道路，那么现在这条道路也已经被完全堵死了，而柏林自己是参与了这场俄、法军事联盟在经济基础上的建设工作的。尽管俄、法军事联盟的缔结还有五年的路程，但德军将两线作战的前景已经预料到了。连俾斯麦离任前已开始承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同时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①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9 年版，第 525 页。

如果政治—经济的强制性意味着法国和俄国肯定是德帝国的两个敌人的话，那么德帝国就应尽一切努力来与英国结盟。但是，俾斯麦不仅从没有真正努力地去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还具有讽刺意味地培植起德意志公众对英国的厌恶。因为俾斯麦及其战略圈子担忧：“帝国内部的一种自由主义化的发展，有可能从德英合作中产生出来。”在这里，此时扮演着最重要角色的还不是逐渐临近的外贸上的竞争，而是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政治风格的对立，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局势的不同性。俾斯麦对德帝国驻英大使冯·席维尼茨这样讲道：

偶然与英国发生对外政策上的摩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培植起德意志公众对英国的不愉快感，并以此来阻碍英国思想在德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君主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①

正是这种维护政治统治传统合法性的要求，才导致了德意志帝国在面临东、西边境上那两个强大的潜在对手的同时，却有意地与英国始终保持着外交上的距离。当然，与英国的冲突是工业关税中天生固有的东西，但是，这种工业关税是德意志大工业资产阶级支持容克土地贵族的农业保护关税要求的回报物，因此，人们可以说，德帝国与英国、俄国的冲突是俾斯麦支撑他的政权所依靠的保护主义联盟天生固有的东西。

19世纪 90年代以后，在“跨出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的驱使下，俾斯麦的继任者们已有更多的理由与英国争吵和冲突了。不仅优质的德国工业品已经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开始排斥英国货了，而且为了确保德意志大工业的扩张，德帝国的对外政策随着海军的扩建，已决定了反对英国的攻击方向。自从 1895年的头一个舰队修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5年版，第 155页。

正案以来，无论是德意志极具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目标，还是英国力图保证世界海上大国的倾向，都使彼此的怀疑不断增加。正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中，军备竞赛开始了。德意志的“大海军政策”与“世界政治”已与海峡对岸的一幅敌人的图画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也于 1898 年和 1907 年分别与法、俄签订了条约，一个以德帝国为对手的“三国协约”终于形成。

当欧洲三个最强有力的国家成为德帝国的对手时，俾斯麦立国之初的外交战略及其“联盟体系”也就完全失败和崩溃了，因为它标志着德意志与外部世界全面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总之，是俾斯麦造就了德、英两国外交上的距离，是毕罗夫最后将英国推进了它的老敌人法国和俄国的怀抱，而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宰相任期内，德帝国受到了恶报。

显然，当人们分析德帝国在 1914 年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时，有必要用更宽的历史视野，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从内部来讲，走向战争选择，无疑表明德帝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们已无能力通过改革来应付内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压力，便力图通过对外大胆的冒险措施来摆脱内部的困境，而且这样一种尝试在 1871 年至 1914 年的战争中曾经获得过成功。因此，容克集团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利益，阻止社会民主党人的崛起，万不得已之时，是不惜再度借助战争的冒险手段，来使自身受到社会民主化进程压力的统治至少能获得一个喘息之机的。也就是说，通过一场使这个民族摆脱内部所有对立、紧张和冲突的对外战争，来维持“前现代化”统治结构的现状。

但是，这还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会由德帝国来打第一枪的惟一原因，人们还必须从外部的国际环境上来寻找其他的根源。

其一，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代里，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方向，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大集团的组织原则，已经越来越多地对经济、技术、文化和法律关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起阻碍作用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工业革命在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加速着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交通和资本循环；另一方面，这种工业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却与民族利己主义的政治结构重叠在一起，这就越来越导致了危机和紧张，而这种危机和紧张便日益破坏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突中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工业化民族国家对这场大战的爆发都是负有责任的。

其二，在这样一个总背景下，当德意志仿效邻居们的榜样建立起统一国家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定一个强大的新帝国将会比法国或英国更少扩张性。而且，这个后起的德帝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得竟如此迅速，到1871年，它的优质工业品不仅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压倒了法国，而且也深深渗入到了俄国市场，并成功地在整个世界上与英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在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异常强大的德意志，无疑是以一个最惹眼的“暴发户”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它的强大，本身就是在向那场在它缺席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安排——“维也纳体系”——的挑战，而这种安排是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将会不断软弱下去的预先推断上的。“维也纳体系”本身就难以装下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统一的国家，更不要说去承受这个国家要与奥匈帝国联合的倾向了。因此，尽管德帝国并不是国际秩序中惟一的破坏者和侵略者，但它却是最惹眼的破坏者和侵略者。

其三，在这个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代里，为了自身发展而优先抢占地盘，控制国外空间与资源的企望，是与当时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些国家个个都是丝毫不亚于德帝国贪婪胃口的大国。当法国在重新寻求对欧洲的统治并在抢占非洲和东南亚，而英国已经建立起对半个地球的世界帝国的统治，俄国和美国在残酷无情地扩展它们的大陆内地的時候，它们是不可能礼貌地将空间留给一个后起的、政治上联合的、经济上强悍的德帝国的，而是希望它仍然被锁在欧洲传统均势的紧密框架之内。然而，一个在经济上进行扩张的德帝国，是不会满足于仍被锁在中欧的“盒子”里的。俾斯麦以后的帝国宰相们都是

这样看待世界局势的：“当欧洲外的巨人在到处形成的时候，继续保持欧洲的均势，无异于宣判德意志人的无所作为，最后是宣判所有欧洲人的外族统治。”^①因此，德帝国不仅被要赶上一个正在衰败的英国的愿望所驱使，而且也被一种对俄国和美国正在崛起的恐惧所驱使。在这场关系未来命运的竞争中，德意志处在一种致命性的不利境地之中，因为美国、俄国甚至英国，都位于欧洲大陆——这个工业文明发祥地——的周围，而德意志则处于它的正当中！这些东方和西方边缘地带优势力量的增长，仅仅是间接地损害着欧洲的现状，而德意志若仿效它们去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就必然直接地攻击这种现状。特别是在整个世界都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德帝国的“世界政治”的扩展以及它的重分世界的要求，无疑意味着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对抗。因此，德帝国也就成为了国际秩序中“惟一真正的惹麻烦者”，因而也必定成为众矢之的。所有其他的工业化国都在等待时机，来镇压这个世界经济中的“暴发户”。

其四，在这种世界局势中，德意志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也就越来越含有一种“两线作战”的危险了。这种危险尽管独立于一种受威胁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然而却给权力精英们提供了按他们的意志来影响公共舆论的机会。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标便在这种担忧的辅助下，以及其他安全政策动机的辅助下建立起来，“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便经历了一场危险的、过分扩展的极端化过程”^②，它发展成一种受威胁的综合症，并越来越清楚地反映在德意志“被包围”的恐惧之中，一种“在一个敌人的世界里被围攻”的心理状态之中。而“先发制人的战争”，提供了通过有效的军事行动在最短时间里排除这种“安全上的困境”的希望，因而在 1914 年的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获得了一种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同时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12 年版，第 10 页。

② 本德—于尔根·文德特：《欧洲中部的德国》，慕尼黑 1915 年版，第 100 页。

也通过内部制度上的框架条件的规定性，使得无论是对战争进行一种克制，还是对冲突进行的一场和平解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因此，当1914年7月因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所导致的欧洲战争危机终于到来的时候，德帝国除了用“先发制人”的战争冒险方式，去挽救它最后一个盟友奥匈帝国的生存以外，实际上已别无选择，否则它将单独地去对付一个包围着自己的敌对世界。但是，当柏林鼓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进行冲突的时候，协约国同盟便立即感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因此，德帝国政治权力精英们的这场“计算好了的冒险”最终失败了。

从对这些内部与外部原因的分析当中，人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抑制内部冲突的努力，使得外部的冲突来得更快了；而外部冲突的发展，则使内部冲突的抑制似乎变得更容易了，然而实际上却变得更为艰难了，它最终给德意志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场革命的爆发与帝国皇冠的落地。

第五节 对德帝国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中，俾斯麦创立的德帝国，不仅是惟一依靠“自上而下”的军事暴力手段从六年之内的三场战争中崛起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在先完成了民族自身的农业革命、继而又经历了自身工业革命的突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这个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传统的“前工业化”权力精英们所统治的社会，带着当时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闯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为进步的技术工艺时代，因而也加速了这个社会自身的变化。但是，这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突进的速度越快，转变得越是充分，其影响就越是复杂，后果就越是广泛。

严格地讲，德帝国时代的现代化困境首先是由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引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业化与民主化并非必须是配套的。对于现代化后起国家来说，工业化往往与对官僚机构功能的依赖性联系在一起。而民主化作为一种对工业化所产生出来的

社会多元化利益和冲突给予公开承认、并进行调整的制度，并不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而是它的一种间接结果。因此，从快速建设工业化的意义上讲，经济上的进步，在一种仍然还是相当传统的政治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也通过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史一再地得到了证明。

但也恰恰是德意志工业化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向这个社会自身提出了一系列显然无法回避、非同一般、当然也是正在变得尖锐而鲜明的问题。这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首先是由来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政治精英们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才加以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动机。但是，当这个进程进入到突破阶段之后，它所产生出来的广泛社会效果，已经不再是这场工业化的最初推动者本身所能轻易控制的了，因为这场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了新的阶级、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冲突。

这些新的阶级，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随后是产业无产阶级，一个一个地向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与当初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初衷相一致，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是力图将这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的。于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精英们，先是利用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统一帝国的建立，获得了继续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后是利用传统统治方式与现代干预型国家嫁接上的便利，利用税收、金融和外贸等方面的有利政策，去迎合大工业界敏感的需求。总之，他们通过对经济进程不断加大力度的种种干预，去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周期性，以继续证实自身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使得帝国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使得财富与贫困向工业化社会的两极更快地积累起来，因而也使得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都快速地得到了增长与发展。

传统权力精英们现在发现，他们已经走入了一种“怪圈”之中。因为随着这场经济现代化的一次性进程，工业化和都市化已足以瓦解农业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了，而这正是他们政治统治的基

础。更不要说在世界农业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来自美国和俄国廉价的农产品对他们传统的谷物出口贸易的猛烈冲击给他们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日渐萎缩的影响了。也就是说，他们所有控制工业经济周期性的努力，最终都只能促进他们政治对手力量上的强大，都只能促进对他们来说日益难以控制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样的进程是与他们最初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但同时又已经是他们无法逆转的了。如果他们不去对经济周期性采取有效的控制步骤，一场社会爆炸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也就成为一个受到围攻、并日益陷入败落境地的阶级了，它所有的努力都旨在进行一场顽强捍卫自身传统权力的防御战，而所有这些维护统治权的努力都瞄准了阻碍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目标。

固然，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领域中，从法律上讲，人口在空间平面上移动的灵活性早在 1806 年帝国建立以前就已完全可能了，而且事实上，自从 1806 年以来，乡村人口也在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向城市移动。但是，直到 1848 年以前，由于在政治实践中对传统等级观念特别顽固的坚持，对“帝国民族”的赞扬，以及对具有国际性的无产者阶级“无祖国性”的歧视，人口垂直移动的社会灵活性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尽管在帝国时代也像美国内战后一样，出现了不少令人目瞪口呆的成功发迹者，正如在文官、军官、法官以及大学教授中，已能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资产阶级子弟成功发迹，但总的来说，仍然是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占有等在支配着进入大学教育机构入口的机会，在支配着社会灵活性的机会。尽管这个社会在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但对一个专业化熟练工人的子弟来说，要想爬到公立学校教师的位置上，然后再爬到更高的官员和大学教授的位置上去，是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瓦尔特·拉特瑙，一位犹太人出身的、德意志大资产阶级中的著名人物，在 1896 年这样讲道：“等级化在我们这里仍然是如此鲜明，以至于仅我就经历了这种情况达 40 年之久，更不要谈一个工人和工人的儿子如果能上升到高层市民的地位上去要花多长时间

了。”^①而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斜坡，不仅容克贵族以及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们不会去加以铲除，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在顽固地加以维护的东西。

尽管俾斯麦在闪光的措辞中一再表达过这种信念：“历史并不是可以制造的，某些基本问题是必须任其发展的，人们是不能控制时代潮流的。”^②然而，他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政问题上，却毫不动摇地做着刚好相反的事情。“普选权”的引入，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政治的手段，来阻止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罢了。尽管帝国国会的选举权没有实现它的发起者在公民投票上的希望，这一点已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断崛起所证实过了，但是，由于这种公民投票的选举权并没有对帝国政府的组成构成影响，因而从实质上讲，仅仅意味着政治力量日益强大的反对派们仍在继续遭到诋毁，这就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一方面，随着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难以阻挡的进程，政党的意义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对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进行阻挡的顽强努力，政治上的责任权又仍然保留在容克贵族集团的身上。当然，与此同时，这个统治集团也就无法赢得其他社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真正忠诚，而这种忠诚的赢得，本身是有利于将这些集团及其代表者纳入到合法的政治决策的位置上去的，纳入到社会一体化的轨道中去的。因此，这种容克贵族集团保守主义的内政政策，导致的只是由警察国家的武装进行的一场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潜在内战。

在医疗保险中，工人代表的参与决定权，并不是一种国家当局有意作出的政治补偿，并不意味着赞成工人政治上的结社权，因此，也并不意味着工会有真正的法律上的起诉权。《帝国结社法》

①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版，第 104 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版，第 104 页。

直到 1918 年才得以通过，而企业内部的工人参与权也只是在战争期间通过工人的罢工斗争才逐步开始实施的。至于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在两极分化加剧的帝国时代里，对大多数选民来说，仅仅意味着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传统的统治阶级以及它的政治精英们，不仅可以用它来抵抗要求调整的压力，而且甚至能够降低选举权的质量，因而他们是爱不释手的。只是在世界大战带来的普遍困境中，他们才感到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已经是这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容忍下去了。

马克斯·韦伯在 1919 年作了这样的表述：

如果不进行明智的修改，将会有一场战后革命的恶梦。人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那些身穿军服的返乡者们的可怕要求了，这种要求仅仅只是从选举权问题上那种充满羞耻感而毫无体面的义务中派生出来的。如果由这些返乡战士组成的整个群众队伍，在用他们的鲜血捍卫了那些优先选民的财产占有以后，又再度发现他们，作为最低下的阶级，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是毫无影响的话，那是会发生一场革命的。^①

而且就连保守主义政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奥伯斯特·鲍尔在 1918 年也承认：“普鲁士终究得像每个国家一样实行平等所有权，否则所有这些牺牲者现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永远成为犹太人和无产者吗？”^②

在这样一场对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挠中，“前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的巨大影响支持了传统特权阶级的防御战。德意志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将统治精英们的决策神秘地解释为“超党派性的”，它捍卫着容克阶级虚假的政治优先权，并顽固地阻挠着对官

① 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蒂宾根 1956 年版，第 104 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 1989 年版，第 104 页。

僚机器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拒绝承认社会利益冲突的尖锐现实；而中间等级的社会浪漫主义、新托密斯主义进一步将工业化社会的冲突贬为“非自然状态”；普鲁士主义则将专制政治的弊端辩护为这个军事君主制生存力量令人振奋的证明。所有这些都阻挡了现实主义的目光，但却都是有利于那个传统的统治集团的；所有这些又都是能够通过讲台和布道坛，通过课本和出版物发挥潜能，并将其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真正价值”来发挥影响的。在这样的气氛中，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当中，还有谁会真正站到广大的工人和农业工人这些受雇者一边，去检查这部官僚机器的廉洁，去反对容克贵族的那种晚期专制主义特权的影响呢？由此可见，在应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上，在对社会危机的管理控制上，帝国时代的社会政治上的权力结构，连同支持它的意识形态，除了能用一种“和谐化的共同体”理想，除了能用臆想中的“民族利益”，最后是战争时期“城堡和平”的假面具以外，已经找不到任何长远的解决方案了。

这种对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挠，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必然会给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化。例如，通过关税保护，一个大农庄主总是能够比工业化城市中靠工资为生的群众，轻松得多地对进口食品的昂贵价格作出反应的，甚至能继续用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谷物；一个大企业主总是能够应付那种少得可怜的所得税的，而没有人去检查他是否偷了税，但高昂的间接税却首先使千百万贫苦家庭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面对沉重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大多数工人群众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数十年来，他们只有通过一个遭受歧视的政党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而对大农庄主利益的满足、对大工业家利益的迎合、以及出于政治统治需要对中间等级的“关照政策”都在证明：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是不惜以大多数劳苦群众为代价，去购买一种制度稳定化的效果的。在这种有利于强者的财产分配基础上，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与歧视弱者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相应的。因此，尽管有“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进步开端，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产品分配

危机的加剧和阶级对立关系的紧张化。

面对这种内部危机的加剧和阶级对立关系的紧张化，帝国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所有的措施、政策与战略，都是与他们“反常而富有创造性的学习机能”的发挥相互交错在一起的，而这种对现代主义手段的学习过程，又是与顽强捍卫传统统治权力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社会保护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军国主义的“三位一体”为此已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了。但是，这些具有早期现代干预型国家特点的政策，却经常令人惊讶地具有弹性，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从外表上看，传统的统治精英们在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却是越来越没有前途地坚持着那场捍卫自身传统权力的防御战。因为这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社会管理上的局部现代化的混合，尽管从短期来看，维持了一个历史上死里逃生的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然而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却极为明显地造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负担和压力。

总之，德意志传统的政治精英们，正是在自身所促进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压力下，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内外矛盾集中化的压力下，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在维持一个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时候，对内涵发展的阻挠，必然导致向外延的扩张；对内部改造的回避和拒绝，必然选择对外的冒险。打破世界格局、重分世界殖民体系的战争努力，恰恰预示着对帝国传统权力精英们学习机能衰退的真正判决。因为它表明这些权力精英已经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及时引导一场向现代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过渡了。而且在这里，所涉及的已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这样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将导致一场革命的爆发和这个传统政权的没落。这个重大的转折属于一个不容商量的历史事实，它是对这个传统政治精英已无能力进行创造性适应的报复。

第四章

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第一节 摇向民主制的艰难转轨

一、1918~1919年的德意志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德国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于1918年10月这样写道：“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掉了，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革命、开端。在这个开端之后，我们将在一个新的、也是陌生的世界中生活。”^① 一场革命果然在不足一月之后就爆发了，它负载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国、从战争向和平的艰难转轨。

魏玛国民议会召开期间，所有议会党团的办公室里都贴有这样一条标语：“不要忘记，德意志人民进行了一场革命！”^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57年版，第140页。

② 埃伯哈尔德·科尔伯：《从皇帝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科隆1970年版，第140页。

宪法的起草者们感到革命有被忘掉的危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问，德意志人民进行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不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单独领导的，更不是由它们来推动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严格地讲，应被理解为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由三场不同的政治运动组成的革命。从思想类型上讲，存在着三场相对独立的革命运动：（员）议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以及他们的政党所进行的“立宪主义革命”，它通过工会、企业家联合会的领导们与国家的共同合作，而得到了补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家中包括通过战争走向机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集团的领导人。（圆）从工人自发行动中发展起来的“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它随后在苏维埃运动中找到了他们机构上的框架。（猿）社会主义左派集团的“具有首创精神的革命”，它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才真正开始赢得意义的。

与此同时，这些运动是平行发展、相互重叠、彼此对立、彼此阻碍着的，并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赢得了各自不同的新分量。这三个发展阶段为：（员）直到 1918 年 11 月 9 日柏林革命胜利前的希望时期；（圆）直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国民议会选举前的决断时期；（猿）在 1918 年春天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的失望时期。

在 1918 年 11 月的战争热情中，通过《城堡和平条约》而将帝国内部的所有政党都纳入其内的民族集合化运动，似乎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开端。因为在这个内、外政治经受考验的战争年代里，这场集合化运动的诱惑力，已通过对“民族共同体”令人欣快的召唤而加强了，由于它同时也将自由工会与企业家联合会联合在一起，因而这种欣快感笼罩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泛人口的情绪，并聚集起大众性的潜力，也培植起强烈的希望。但正是这种希望以及它后来的失望，后来决定了革命的局势。

世界大战的艰难进程加剧了德意志社会的内部紧张。这是因为：一方面，帝国当局军国主义—保守主义的权力要求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不满情绪在增长，与此同时，围绕着“工资和面包”的根本社会冲突也在戏剧性地发展。

在这样一种两极分化中，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并缓慢地赢回了它们“为社会整体谋幸福”的传统特点。因此，自从 1917 年以后，普遍的失望导致了三场运动如此广泛地转型，以至于使它们与军国主义—保守主义霸权的脱离成为了可能。

在帝国国会里，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的跨政党联盟构成了大多数，从而为它们找到了一个支持“谅解的和平”和“宪法议会化”方案的讲台，因而也形成了“立宪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个运动力图在以后的所有革命阶段中保持住领导权。

“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源于 1918 年的希望：“战争的巨大牺牲必须至少通过一场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战后秩序来得到补偿”^①。正是这种希望聚集起一种过高期望值，也为后来的失望编好了程序。毫不奇怪，战争失败的进程使得曾在 1918 年召唤出来的群众性战争热情，很合理地变成了对帝国当局无能以及强摊战争负担的愤慨。大量的罢工运动，表达了帝国当局的权威和旧有社会道德秩序的瓦解和崩溃。

在战争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左派也开始赢得影响。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成多数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翼“斯巴达克派”。当然，这场政治上的分裂最初还并不是沿着左—右派的行列式进行的，而是根据对战争贷款的态度、对结束战争方式的选择来进行的。而且，只要革命的进程还没有要求一种明确的决断，这种不明确性就还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共同召唤来掩盖。在随后决定革命前途的几周里，工人阶级的整体政治力量仍然是在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口号下来动员的。

这样一个政治转型进程由于鲁登道夫将军的阴谋诡计而戏剧性地得到了加速。1918 年 11 月 9 日，这位三军统帅部首领已预感到西线即将来临的崩溃，因而想尽快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67 页。

寻求与协约国对手谈判。他告诉兴登堡和赫特林宰相：“必须立即签订停战协定，为此，尽快组成一个能给盟国造成印象的、能代表它们特点的自由哲学的政府，是十分重要的。让那些先生们去为我们自讨苦吃去吧！”^① 因为这样一个政府是要由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组成的一个议会大多数来造就的，但同时也是要由它来承认德意志的战败、承担战败后的一切后果的。而这样，军国主义—保守主义的领导集团则能逃避因他们错误的战争政策而造成的责任后果，并将“后方有人向前线战士的背后捅刀子”的咒骂，转移到民主主义政党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上。

正是这种无耻的算计，才导致了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以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为宰相的、短命的君主立宪政府的产生。但也正是在这场“十月改革”的背景之下，要求威廉二世退位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斯巴的德皇司令部里的人们力图急转方向盘，但一项要求德意志舰队发动最后攻击的命令，激起了 11月 11日在威廉港和 11月 11日在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并将群众的“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带入了革命的轨道。在德意志绝大多数城市里，一场工人—士兵苏维埃革命运动快速而广泛地开始了不流血的夺权。威廉二世众叛亲离，被迫逃往荷兰。11月 11日，革命在柏林取得了胜利。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菲利普·谢德曼比左翼“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更早地宣布：“霍亨索伦王朝已经退位，伟大的德国共和国万岁！”^② 而弗里德利希·埃伯特，此人是在几个月以前才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随即接替巴登亲王，出任了新国家的总理。

苏维埃运动广泛发展的快速性以及群众自发行动的一致性表明：皇帝的军事和民事当局已丧失了所有的权威。但是，这个运动

^①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 1983年版，第 147页。

^②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 1983年版，第 147页。

爽快地接受了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代表权，却反映了这场“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内部的一种混乱的期待，即在战争和革命结束之际，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合法秩序，它应赋予大量牺牲者以合法权利，并满足从1914年愿月以来受到欺骗的民众们的希望。但是，“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的追随者们的行为立场是不同于立宪改革派的，当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充分暴露出来时，也就给坚持革命路线的左翼“斯巴达克派”扩大影响创造了机会。当然，“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的社会主义期望与立宪主义实践之间的对立，本来是有可能用其他方式来掩盖的，如果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参与到苏维埃运动的民主纲领中来，并将它纳入到革命的立宪框架中的话。但实践表明，他们丝毫也没有作这方面的打算。

新国家的领导对国家管理连续性的坚持，是属于这场德意志革命最具有传统特色、并且也是打下了最深烙印的东西。对以埃伯特为首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秩序的优先权是绝对的。首先，这里有对俄国革命的反感和对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恐惧；其次，东欧那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在初期岁月里的内外困境也被他们视为不祥之兆，那里正经历着经济困境和内战；其三，西方战胜国强硬的停战条件也使埃伯特认为，一个井然有序的新德国能提高在和平谈判中与盟国作斗争的地位；其四，国家的组织能力面临着由于军队复员遣返和向和平经济转型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已经踏入机会主义轨道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其说是将群众自发的自我组织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还不如说是将“扩展公共管理，实现普遍幸福”的目标理解为“社会主义”的。

正是植根于这种传统的德意志式的“社会主义”理解，才导致了埃伯特会去选择与国防军领袖威廉·格勒讷将军之间的合作，从而也才产生了新的共和国与老的军官团之间的基本妥协。因此，这场德意志革命也就完全处于立宪主义运动的自由主义、议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传统轨道之中了，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这个高度复杂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本身是有着躲避政治转型负担的倾

向的。

正是在这种对秩序优先权的绝对要求中，正是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三个内在的问题立即排除了这场“立宪主义运动”的革命性质：第一，旧帝国的文官、军官和法官所谓“不问政治”的忠诚，很快就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但新政权已经得依靠它们了。第二，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想在苏维埃运动忠诚的支持下开始对管理机构的民主化，也不想建立一支在政治上远比旧帝国军队要可靠得多的、真正忠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第三，这个党的领导决定，仅仅只有在立宪民主方案的框架内，才能允许采取社会改革的措施。因此，对重工业的社会化，对易北河以东庄园的划分措施，都转交给未来的德意志国会去决断了。但是，由于德意志人在过去的帝国国会的议会道路上，是习惯于政治代表们之间“自动而必然的运转机制”的，因此，选民中的非社会主义的另一半代表们，在以后的魏玛国民议会中，能够轻而易举地抹去由社会民主党召唤出来的进行社会变革的棱角。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裂，以及“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与“立宪主义运动”之间同盟的崩溃。1918年圣诞节在柏林街头的武装冲突，导致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并与以“斯巴达克派”为核心的、于1918年11月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埃伯特与陆军最高司令部勾结起来镇压了左派联盟的这场革命暴动，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夫妇于1918年12月18日也被自由军团的士兵杀害。但是，对于军方来说，这场“反布尔什维克战斗”，仅仅只是一场反对所有革命激情的开场。

在国民议会1919年1月19日的选举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得到20%的选票，多数社会民主党得到近30%的选票，即使两者加起来，也达不到绝对多数。这不仅表明选民中的一半以上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立法，而且也表明过去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力量，即使不发生分裂，也仍然不可能通过这个资本主义民主的国民议会来完成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德意志自由民主党得到15%的选票，

天主教中央党得到 1/5 的选票，它们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魏玛大联合政府。这个结果同时也证实了，在这个由帝国向共和国过渡的年代里，选民意志上有着一种可观的连续性。

在权力问题通过魏玛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得到澄清后，“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以及它的苏维埃动力并未被摧毁。工人群众的斗争运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甚至超过了 1918 年 11 月的革命规模。在这个阶段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联盟在苏维埃运动中赢得了听众。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已势所必然，因为“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所寄托的希望，在新政府的身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是，在 1919 年 1 月到 3 月的武装斗争的对峙中，苏维埃运动遭到了镇压。因此，迄今为止的革命结果，只带来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到这时，这三个给这场德意志革命打下烙印的运动，它们的命运是清楚的：

首先，“立宪主义运动”包括它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成分得到了贯彻，而且就这方面而言，这场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进一步地对老的军方和管理机构中的传统精英的依靠才购买到这场胜利的，因而也必然为此而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这一点特别通过 1919 年 4 月 4 日的国会选举表现出来：这个曾具有立法功能的魏玛大联合，已不再能保持议会的大多数了。

其次，“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曾协助“立宪主义运动”在 1918 年 11 月夺取了权力，但在随后的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月份里，它既不能发展起一种独立的方针，又不能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民主化潜力在这个新秩序中稳定自身。因此，这场群众运动在失望中走进了与新政权之间的一场内战式的争端中，从而导致了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之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在失望的影响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彻底决裂，并与德国共产党联合起来。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直是无条件地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模式为方向的，也是以推翻这个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它的远期目标的。

总之，由于这个转型进程的结束，从1918年夏天起，这个一直对民主化革新潜力和行动进行紧张封锁的局势，成为了魏玛共和国下一步发展的出发点。

二、公开妥协下的魏玛立法

1919年1月19日，国民议会的代表集会于文化名城魏玛制定宪法，这里是哥德的家乡。这位伟大的诗人曾训导他的同胞：“伟大并不是用财富和权力来确定的，而是用道德上的信念来确定的，伟大就是献身于自由。”^①因此，要为自由的德国奠定基础，魏玛无疑是比波茨坦或柏林更为合适的地方。

魏玛国民议会于1919年1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立宪主义者们的胜利。但是，这部宪法的产生，并不能被视为民主革命圆满的完成，也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方面，因为在1918年的那几个月里，在群众革命失望阶段的气氛中，整个德意志社会，仍然被那些完全不同的戏剧性事件以及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阴影所笼罩着；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个历史进程，或者说对共和民主制度的产生，是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的。就连德意志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托马斯·曼都这样说道：

我并不想对注入整个国家机体中的议会制和政党政治报以政治上的敌意。但是，我也并不想去过问政治，我想要的是公正、秩序和财产。如果说这是市侩的，那么我想当一个市侩。^②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1933年版，第140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1933年版，第140页。

这种市侩观点正是德意志社会长期蔓延的“最好的政府就是一种最好的管理”思想的一个变种。它对于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说，不是一个很有负载力的思想基础。更何况对于“好的政府”和“好的管理”的理解，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于魏玛国民议会本身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多数，也由于各派力量之间平衡的不稳定，因此，这部宪法的通过，只能是这个社会各种力量公开妥协的结果。例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倒是出现了一个由天主教中央党与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但在教育和文化政策领域中，中央党又是反对世俗化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另外，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尽管遭到了打击，但运动参加者在企业经济参与权上的某些要求还能在宪法中找到。同时，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也都存在着中央集权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端。

一部浑然一体的宪法是不可能指望出现的。对革命结果的不同政治表态，通过政党们的投票，很自然地导致了历史连续性与新开端的混合，以及一种极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因此，宪法的“非统一性”，正如它通过对抗性的社会对立、组织起来的地方分裂利益以及正在竞争着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所表达出来的那样，是一种对1919年各派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表达。事实上，在制定这部宪法的时候，本身存在着两种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是将各种政治力量的运行限制在一种纯粹的组织规章上；或是在一种有意识的多元主义的妥协中将正在竞争着的力量集合起来。《魏玛宪法》的起草者们选择的恰恰是更有冒险性的第二方案。

《魏玛宪法》规定通过比例选举制来选出国会议员，公民拥有动议权和投票表决权。按比例来选出议员，无疑是所有舆论得以表达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它只有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人们普遍接受政治运作关系和竞争准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运转，而在一战后的德国，从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新的选举法，

由于政党数量上的增加，使得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都不可能掌握议会的大多数，因而有着立法程序复杂化的效果，也使得“联合政府”成为内阁组成不可避免的形式。由于给予了那些本来就引起人们注意的反共和分裂组织以公开发展的机会，因而也就同时危及了共和制的安全和稳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议会政治运行上的不稳定性而非连贯性，最后导致的是频繁的解散国会，又必须实行新的选举，因而往往减少了人们对议会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信赖。

同样，公民的动议权和投票表决权制度，不仅能通过总统和政府部门来引入，而且也能通过选民中的一个确定了数量的部分来引入。由于没有附上反对滥用的原则，这种制度或是很少被成功地使用过，或是往往使仇视共和制的极右派利用它来阻碍共和政府的目标。1875年在讨论《杨格计划》的过程中，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魏玛宪法》引起后人最为激烈批评的是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尽管与帝国时代相反，现在国家元首即总统是要通过选举来产生的，而且政府首脑也得依赖于议会大多数的赞成，确切地讲，至少不是议会大多数明确拒绝才能产生。但是，宪法同时还规定：总统任期七年，并被授予行政权和军事力量的指挥权，包括有权任免总理、解散议会、下令举行新的选举、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以及宣布《紧急状态法》的权力。第115条明确宣称：“如果公共秩序和安全面临严重的混乱和威胁，总统能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全。一旦需要，他能够使用军事力量并且能暂时地宣布中止履行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要求整体或部分服从。”^①这种能将国家的基本法律撇在一边的权力，是一种甚至连过去的皇帝都没有的特权。虽然该条款还同时规定，这种权力能通过国会的表决而随时中止，但是，由于没有限制《紧急状态法》的期限长度，因而使这种民主的保障设施，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近乎独裁的总统权力的设计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他一直

^① 戈尔德登·奥·克莱格：《德意志史》，1954—1955年，慕尼黑黑1955年版，第115页。

主张在未来的共和制中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具有独断合法性的总统。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总统，能够抵制那种由于政党官僚的代表在议会中的垄断权力而造成的令人担心的政治僵局，并产生出更多的政治上的灵活性和创新性。”^①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总统权力恰恰可能带来共和制的不稳定甚至是危机。从1914年到1918年间总统权力的实践，就证明该条款是完全能够变成一种反对议会制的立法的，因为第二任总统保尔·冯·兴登堡是用解散国会来回答每一种企图废除他的《紧急条令》的尝试的。而且在这种局势中，国会的拒绝权本身也能将总统所任命的政府推进死胡同，要能走出这个死胡同，总统就只能或是通过长期地解散国会、进行选举斗争，或是通过公开的政变才有可能。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是惟一的，例如在第一任总统埃伯特的任期内，同样的总统权力又恰恰证明是能够在战后危机中成为一种稳定性因素的。总之，这个方案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参与的力量究竟是站在宪法的基础上行使它们的权力呢，还是有目的地参与埋葬这部宪法，因而也一再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宪法上的漏洞”。

由于害怕造成社会上的无组织和混乱状态，宪法第113条和第114条给予帝国时代的所有旧行政官员以优厚的待遇，并承认了他们在政治舆论上的表达权和进行合作的自由权，只要他们不与他们所忠于的国家相冲突。其结果是，共和国行政事务权交到了这些职业文官的手中。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们也许并不公开地反共和制，但基本上是赞成反民主的。大多数官僚的打算是保持威廉时代的行政方式，而不是去与这个具有议会制政府体系的多元化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②

^① 米夏埃尔·施图尔姆：《魏玛共和国》，柯尼施泰因1984年版，第147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魏玛共和国的瓦解》，斯图加特1967年版，第133页。

宪法第 2 条规定：“保证法官们的地位。”这被许多法官解释为给予了他们表达普遍的君主主义情绪的许可证。1919 年以后的德国法庭上，大多数法官是攻击共和国的部长、丑化共和国和它的象征的。对于推翻共和国的行动，严厉的惩处是针对左派革命者的，而不是右派叛乱者的。在这方面，巴伐利亚的司法部最为著名。对于 1919 年 4 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啤酒馆暴动”一案的审理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明。总之，关于文官和法官权利的立法，恰恰说明了在民主新开端中对旧有势力的公开妥协，也说明了对德意志历史连续性的保留，而这种妥协和保留恰恰能极大地干扰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实施。

宪法第 2 条列出的“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清楚地体现出宪法的妥协特点。这些新的基本权利保证了地方的自治管理，规定了宗教团体的权利，勾画了教育、经济等制度的基本特点，陈述了对家庭和青年的保护。第 1 条声称：“将经济生活的秩序与公正的原则联系起来，以保证在这个界限中个体的经济自由，并达到确保所有人的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目的。”^① 宪法中这些充满阶级妥协的文字，反映的正是 1918 年革命中的一种普遍的期望，并引出了诸如实施社会化、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工作介绍、失业救济、工会结社自由、工人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参与权等要求。但是，这些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并没有真实联系的要求，还得通过严谨的立法程序才能加以具体化，其内容上的履行，无论怎样讲，都得依赖未来立法机构以及议会多数才有可能。

从理论上讲，通过《魏玛宪法》，战败后产生出来的德国共和国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和冒险，因为它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决断性、法制性、社会福利国家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讲，它的成功，必须在所有那些对这个制度表示基本赞同的政治和社会集团有大多数能力的合作中，才能证实和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2 页。

具体化。但与此同时，这部开放的宪法，又是双倍地与以下这种结构发生冲突的：从内政上讲，共和国载体集团在碎片化，这些集团彼此间的对立正在增加；从经济政策上讲，缺乏经济上必要的增长和分配上的余地，而这些增长和余地本来是有利于这种基本妥协的稳定化的；因而从社会政策上讲，妥协和改革的行动余地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限制。正因为如此，这部宪法所代表的公开妥协又完全可能是经不起考验的。

事实上，妥协的解决方案只能拖延矛盾，并减弱这个新国家合乎身份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其他的民族国家中，是与诸如攻占巴士底狱之类具有象征性的新开端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妥协中，人们可能只是在适应环境，但几乎不与它认同，这特别适合于对德意志右翼势力的描述。当然，也正是右翼势力暂时性的瘫痪，才给“十一月革命”送来了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也正是老权力精英无摩擦的退出，以及他们所留下来的代表们的合作意愿，才在立宪主义运动的政治家中培养起一种幻想，使他们轻易地认为，他们是能够依靠这些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忠诚的。而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敌意，往往不是在宪法通过时的欢呼声中就能察觉出来的。

因此，魏玛立宪主义的成就，唯有在与 1919 年前的半专制主义独裁模式和 1933 年后的纳粹主义极权独裁模式的比较中，才能得到肯定。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魏玛宪法》还提供了一种民主政治实验的开放性框架，若是在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下，也仍然是有发展能力的。它将帝国时代被传统政治精英们斥之为“帝国敌人”的人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一时间捆扎在这个新秩序中，并在妥协中寻找着平衡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出路，因而也为社会福利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框架和前提。然而，与这些成就面相对立的却是相当可观的阴暗面：凡尔赛和平决议的负担；社会抗议运动的失望；在权力和管理机构中反共和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们政治上的连续性；对市民资产阶级中的一个正在增长的部分——“新中等

级”——社会集合化努力的缺乏，而他们正在成为十年通货膨胀中的失利者；当然，还有更为超限定性的东西，一种由于战后停滞的经济所带来的对行动余地的束缚。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这部宪法刚产生出来的时候，它所具有的妥协特点与共和国新秩序的开放性，意味着这场实验的未来前景以及对它的评价都是开放性的，或者更通俗地讲，都是还未作出定论的。而这种未来和评价取决于对以下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改革的空间、福利国家巩固的空间以及这场社会妥协的物质基础的空间是否存在？被拖延解决的矛盾和社会碎片化的倾向是否会越来越尖锐？传统权力精英们是否会以“冷战”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社会模式是否会在民族的愤怒和叛乱中扫除这场在魏玛达成的不光荣的妥协？

在这里，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所作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

不仅对一场古典式的市民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而且对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来说，德国都太“进步”了。民主主义运动的传统和工业化社会组合性的高水平，阻止了一场激进的决裂，并强制性地要求那些参与其中利益的人们对连续性的维持。仅仅是对更新利益的兴趣，才使得这个社会达成了一场不稳定的平衡。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性，才使德国在这些方面显得特别的脆弱，即它不是在社会民主的模式中排解它的矛盾的，而是在一种由“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动员起来的军事—工业复合统治体系中侵略性地向外排解它的矛盾的。这种危险在1918年至1933年，仅仅由于战败和共和国的新秩序，才被暂时性地阻止了。但是，这个新的开端能否伸张自己是要取决于：是否这个通过宪法达成的阶级妥协的共和国能够赢得真正的合法性，是否这个立法方案的开放性能够用来为巩固和塑造共和制服务。因此，共和主义的这场试验能否成功，取决

于它在这个战后时代中有什么样的行动余地。^①

三、难以接受的“凡尔赛和平”

“凡尔赛和平”作为巴黎和会的产物，对魏玛共和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种跨党派的民族主义认同是建立在“反对凡尔赛苛刻、耻辱的和平”的口号上的。不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也指出了“凡尔赛要对希特勒的上台负责”。但是，若要将“凡尔赛和平”作为这个共和国崩溃的单一性原因来评价，那是错误的。在评价“凡尔赛和平”的时候，人们有必要对它给德意志人带来的社会心理负担与物质上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进行仔细区别。同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凡尔赛和平”对德意志人精神变态的影响，是一种留有后遗症的政治现实。

如果人们将 1919 年的情况与 1933 年的情况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发现，这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秩序，也仍然给予了魏玛德国某些机会。但当时大多数德意志人并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接受这一点，因为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并不太清楚事实上的军事形势，因而对“凡尔赛和平”是没有接受准备的。相反，他们将这个和平方案作为“不能忍受的耻辱”，将国联作为“胜利者的神圣同盟”来看待。这种对 1919 年现状的拒绝，“对魏玛共和国中所有重要的以及还不太重要的政治组织，连同它们在对外政策上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②。

对战胜国来说，1919 年仅有两种关于“德意志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完全彻底地从军事上粉碎德国，取消它作为大国的资格，组织更多的拥有主权的德帝国继承国家，并将它其余的疆土划

①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化，魏玛共和国中的工人与工人运动，1918—1919》，柏林 1982 年版，第 104 页。

②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919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104 页。

分给它的邻居。二是造就一种在德国邻居们的愿望和要求与德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的和平，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秩序。巴黎和会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这个方案的实施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其一，所有国家的公共舆论都在召唤一场“胜利的和平”，因为战争中的巨大损失仅仅只能通过最终的巨大胜利才能证明是合理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与德国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尽管在 1918 年，德意志人勉强地转向了一种“谅解的和平”方针，而那只是德帝国在已面临全面军事崩溃时在对外政策上所作出的反应。但是，战胜国的公众并不想牺牲作为胜利者的优势地位，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们都受到了这种公共舆论的影响。

其二，德国自己就在 1918 年对苏俄的《布列斯特条约》中显示出战败者能从胜利者那里期待什么样的谈判和结果。因此，在西方战胜国的眼睛里，对战败德国进行一种温和处理的道义合法性，已经暗中受到了损害。

其三，德国人之所以转向一种“谅解的和平”，也是因为在败局已定的前景下，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的吸引。这个计划主张：“扫除自由商品交换中的限制，创造一种得到承认的国际法律秩序，这个秩序应通过一个以国际商业经济为基础的法律上的平等秩序，来取代具有民族和领土方向的诸大国的平衡。”^①但是，由于 1918 年的停战协定已在大体上剥夺了德国的武装和实力，以至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已不可能再度接受战争了。这样，美国强权政治上的分量下降了，威尔逊的影响也随之而下降，他的“十四点计划”对未来和平的影响也就大大减弱。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和平的缔结过程几乎不可能是矛盾的。事实上在凡尔赛，战胜国基本上没有怎么考虑德国代表团带来的方案，也没有进行什么与失败者之间的任何正式谈判，起草好的条约

^① 弗里茨·费尔纳：《巴黎的和平秩序，1918—1919》，维也纳 1961 年版，第 140 页。

草案也是逼着德国人签字的。但是，这种强硬态度又是与相对温和的和平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一种长期性的修改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一种和解的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仍然害怕：“这个已经战败、并且正在陷入革命造成的内部混乱状态之中的德国，可能会再度发生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从而使它有可能与苏俄联合起来。”^①

仔细分析起来，对德国来说，物质上的和平条件固然是沉重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如果将战败的德国与胜利的法国进行比较，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德国在经济上和人口上的优势并没有因“凡尔赛和平”而被扫除；法国也并没有能达到它的战争目标，更不要说与 1919 年的情况相比了。

事实上，除了那些本来并无太大价值的殖民地以外，德国的领土损失主要涉及的是那些讲外族语言的人口占据优势的地区（如划归给波兰和丹麦的那些地区），或是涉及那些虽然讲德语的人口占据着优势，但自从 1918 年以来还没有完全从政治上被真正统一到帝国中来的区域（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当然这幅图画很少与但泽、默默尔、萨尔的情况相符合。但是，在这三个地区，但泽和默默尔是作为“民族飞地”来处理的，而萨尔区是有希望在未来通过举行公民投票来最后决定归属问题的。

边界线有利于波兰的移动之所以会激起德意志人的愤怒情绪，首先是因为：由于日耳曼民族在广泛的边界空间里的散布性，在每一次边界移动中，总是有一个少数民族数量可观的部分必然要呆在边界的另一边；在 1918 年直到 1919 年的这一个世纪里，对有效边界的每一次改变都是有利的于德意志人的，而现在头一次发生了对波兰人的有利变化。当然，德意志在东部边界上因民族被肢解而导致的愤慨之所以广泛得以传播，不仅仅是由于边界移动引起的，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贯彻的一种新原则立场引起的。

^① 弗里茨·费尔纳：《巴黎的和平秩序，1918—1919》，维也纳 1961 年版，第 126 页。

这种新原则立场就是：在处理边界问题上以牺牲战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造就民族国家。三个多民族的帝国（德帝国、沙俄帝国、奥匈帝国）被近一打之多的中、小国家所取代，但在它们当中，也仅仅只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者的继承国，也就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从民族上讲变成了具有某种匀一性的国家。然而，这是以这些战败的民族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划分在边界的另一边为代价的，而所有那些新国家，却占据了从民族意义上讲有争议的边界线，因而也在它们的版图内保留了很大的民族少数派力量。

在1918年至1919年期间的几次和平缔结中，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们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混合体原则来进行平衡的，因而发展了一种联邦式或是邦联式的结构。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却完全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原则上的，并想通过国联及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来解决因此而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民族国家却变成了引起民族统一运动的杠杆，变成了以强制方式完成民族匀一性尝试的实验场所。德意志人希望民族边界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也就是说，使得在边界另一边居住的德意志人再度移到自己的边界内来。从本质上讲，这仍然属于实现民族匀一性的问题领域的，因为对德国来说，这个领域才刚刚发生问题。当然，这只是相对于1918年以后的现代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而言的，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种不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内的民族统一性而言的。摇摇摇摇

在随后几年里，德国之所以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东部边界作出修改，并打出它按“民族主义的原则作为修改原则”的王牌，事实上也正是“凡尔赛和平秩序”所给予它的。俄国边界的后移，东欧和东南欧是在少数几个中、小新国家中进行分配的，而它们对法国的依靠从长远来看是很少能起作用的。因此，如果德国能够推行一项与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达成谅解与合作的政策，并懂得发展它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分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都能为德国提

供一种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实现非正式霸权的机会。^①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反对凡尔赛耻辱的和平”的运动，恰恰阻止了德意志人去觉察这种中、长期战略上的有利性，这种有利性是具有真实性的，而这种真实性恰恰是“凡尔赛和平”提供给德国的。摇摇摇

如果说，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力量只受到很少的削弱，那么，从短期来看，这一点却由于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的裁军措施而被抵消了。这类措施包括将德国国防军的规模限制在十万人之内，对武器和工事的大规模限制，盟国在德国享有裁减军备上的监察权和监控权，以及对莱茵兰有限期的占领等。所有这些必然会对这个民族产生侮辱性影响，因为这个民族曾经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军国主义的精神，才在过去的统一战争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里获得它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从更长远来看，“凡尔赛和平”也恰恰在这里附带地赋予了德意志人一个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理由，因为对德国的这种非武装化，也是被巴黎和会上的胜利者们宣布为一场普遍裁军运动的开端的。当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裁军的时候，德国的重振军备从道义上讲，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

至于战争赔款，它的理由是与要让德意志人承担全部战争责任的企图联系在一起，而且赔款的数量也是巨大的。尽管这证明是德意志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负担，但绝没有证明是对任何未来经济恢复上的那种令人绝望的封锁。通过战争赔款而带来的缴纳上的高额负担，是在 1918 年至 1920 年这几年中才处于争端的中心位置上的。

总而言之，“凡尔赛和平”是西方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德国的和平，也是建立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战后新秩序的一块基石。它同时又是具有这样一种特点的和平，即在对具体、单独问题上的处理，总能不断地引起人们的疑问，但是，作为缔造和平的努力，若是普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23 页。

遍地加以实行，则又有可能在当时的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框架中，产生它一定的效果。而它所导致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德意志大国地位的维持以及那种从长远看来的有利性，不仅与眼前在胜利者一边客观存在的胜利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德意志人的情绪在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加热反应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从现实政治上讲，一场对它进行修改的可能性道路已被勾画出来。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凡尔赛神话”也从社会心理和精神上给这场修改带来了不利的遗传性因素，因为德意志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已通过各种舆论机构愤怒的反宣传，获得了一种可称之为“爆炸性”发展的效果，以至于自从德国被迫在和平条约上签字以来，那些与“魏玛体制”作斗争的政治潮流便开始占上风了。^①

因此，尽管共和国仍然存在着选择和发展的余地，但为履行《凡尔赛条约》而进行的国际间的“冷战”，使得德国的稳定和欧洲的稳定都变得更为困难，并在极有价值的年代里，拖住了缓和与经济重建的手脚，推迟了不可缺少的德—法谅解，延长了深刻的战争心理，并使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仇怨恨变得更加尖锐了。

第二节 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战后危机

魏玛共和国到魏玛共和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多事之秋，围绕着战争赔款、通货膨胀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接踵而至，各种不同内、外力量的行动可能性，或是在这些事件的驱动下，或是在它们的阻碍下，彼此联系在一起，一连串的危机事件使得这个时代的历史画面有被撕碎的危险。行为者经历的混乱以及各种问题的相互关联，清楚地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现实。魏玛共和国政府必须去处理这个最为重要的内、外经济政策上的复合体。

^① 沃尔夫·冈·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魏玛共和国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魏玛共和国版，第魏玛共和国页。

一、“履行条约政策”与“灾难政策”

当《凡尔赛条约》于1919年1月18日生效时，真正的问题才开始出现。围绕着对和平规则进行详细解释的斗争，与各种隐蔽或公开的企图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建立欧洲战后秩序的第二回合的斗争。

核心问题在于德国不仅要对由它直接造成的战争损失负责，而且还得为整个战争的代价承担责任。在1919年的巴黎会议上，盟国赔款委员会由此而计算出来的德国赔款数额达到了1320亿金马克的可怕高度，以至于要驾驭它，既不是同时代人所想象的财富，也不是他们拥有的金融手段所能达到的。同年12月，经伦敦会议的修改，这个数目降到1000亿金马克。然而，对德国赔款的强行勒索也是因为在战争中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自己对美国的欠债所造成的，只要美国坚持这笔战争借款必须全部立即归还，这些协约国盟友们就必然会迫使德国尽快赔偿，来补偿自己的损失。

如此高额的赔款自然引起了德意志人的愤慨。但是，如果人们看到在以后19年间德意志人缴纳方面的实际负担，那么就会看到一幅清楚得多的图画：战争赔偿所造成的负担，更少是由于赔款的总额，更多的是由于缴纳的方式而引起的。1919年12月开始迫使德国接受的金融负担是分为三笔来偿还的：头一笔应在1920年12月前交付，价值为1000亿金马克；第二笔应在1921年12月交付，价值为1000亿金马克；第三笔为1000亿金马克，也应在1922年12月交付，条件是德国的偿付足以维持或恢复与头两笔相联系的偿还基金。但无论如何，德国必须在1922年内缴纳1000亿金马克。^①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笔赔款究竟给德意志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负担。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笔负担达到了魏玛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所不能忍耐的边缘；而相反的观点认为，相对来

^① 戈尔德·奥·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1933年版，第100页。

说，它还并没有涉及到一个比今天的对外发展资助更大的因素。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德意志人因糟糕的战后经济形势而受到束缚的行动余地，由于赔款的缴纳而变得更为狭窄了。而当时执政的共和民主政治家们认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估计，在几年无摩擦的支付和国际缓和以后，一种大幅度降低总额要求的机会将会看好。因此眼前赔款数量上的实际负担，是能够逐渐加以克服的。也仅仅只是就这方面而言，赔款才是可以忍受的。”^①

然而，围绕赔款的紧张冲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并没有消失。有三个问题先是给 1919 年到 1924 年的国际关系，后是给 1924 年到 1933 年的国际关系投下了阴影：第一，赔款的总额高度，高度复杂的各项规定和计算上的非透明度，必然导致德意志方面可以理解的拒绝态度。由此而导致的反对赔款的态度，必然将魏玛民主政治家们与战胜国进行妥协的所有努力一再被贬为“对民族的叛卖”。第二，缴纳方式以及给德意志人所造成的真实负担，是在国际间布满冲突的相互作用中才逐渐显露出来的，而这一点也是直到 1933 年的灾难性对抗之后，才被西方各国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的，因此，具有现实性的新开端直到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三，在 1919 年以前，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如此持久的金融上的转移行动，而且这种转移没有用来启动新的经济发展，例如像 1919 年德国用法国的赔款资助了统一后那几年的繁荣那样，恰恰相反的是，当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重建得用最大的努力才可能达到的同时，赔款筹措上的影响却形成了德国进一步的负担性因素，因为作为支出的一方，德国除了要用实物支付外，还得筹措外汇现金来支付赔款。而且，西方大国是用德意志的支付来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因此，这种金融上的转移也没有启动欧洲的新需求。另外，赔款价值计算的基础——金马克，是一种基于战前美元比值关系的抽象概念，它的实际价值已经由于德国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越来越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28 页。

少，并在 1919 年到 1924 年根本就不存在了。因此，赔款问题也就不可分割地与 1919 年德国内、外政策上的行动余地的萎缩联系在一起了。

就这方面而言，围绕着赔款规则所发生的冲突，是被事先编好了程序的，因而也自然地演变成一场围绕着如何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国际斗争。法国使赔款问题工具化了，因为它希望在德国“不履行条约”的情况下，能顺理成章地进行对德国政治上首先是领土上的制裁，从而达到对《凡尔赛条约》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修改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它当时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受到英国的抑制未能达到的。与此同时，德国也在使它的支付问题工具化，以便对条约的“不可能履行性”示威。

德国有两种战术，即“履行政策”与“灾难政策”在彼此竞争着，但这两者都是以快速修改《凡尔赛条约》为目标的。“履行政策”的代表者们想向盟国表明他们的善意，并在履行的过程中让盟国知道，条约是不可能履行的，因而必须立即进行修改。因此，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对一个平静的欧洲市场的兴趣，同时也寄希望于英国不愿让法国在欧洲过分强大的倾向。但“履行政策”的代表们直到 1924 年都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它太公开寄希望于煽动盟国之间的不和并孤立法国了，而且也太指望能快速取得成功了。产生这种急切心情的原因是，作为刚刚上台的民主政治家，面对着自己的人民，他们必须作为国际问题上更好的“修正主义者”，来使自己获得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在他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凡尔赛苛刻的和平”的解释，并准备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群众基础的时候，这种急切的希望是不难理解的。

“灾难政策”与“履行政策”一样，也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并有着同样的修正目标。但这种政策的代表者们表现得更为直接，因为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仅仅只有在国际冲突的新升级中才存在着德国的机会。他们看到 1918 年苏俄红军已打到了华沙的大门口，中欧的战争、经济混乱甚至内战的前景，可能会触及到美国对秩序的兴趣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扩展的担忧，以至于美国

会支持一场新的谈判，英、法等国若是拒绝这种谈判，就会给盟国的大联合带来分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冲突的升级必然刺激起战胜国同盟的新的团结化。

随着维尔特总理领导的政府和国会接受伦敦会议关于赔款的最后通牒，“履行政策”的战术时期开始了。无论怎样，这导致了德国以平等身份参加了1919年1月到3月在热亚那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但与会的德国代表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没有获得通过，修改条约的努力没有成功，而这种成功本来会使这届政府在面临德国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压力面前获得合法性。

由于盟国并不准备与德国进行一场无保留的平等合作，因此，德国转而与社会主义的苏俄在拉巴洛缔结了条约。这个与苏俄友好的条约成为了德国在未来的欧洲政治游戏中、在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和争端中经常要打的一张王牌。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却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东方战线上的成功，也没有使西方大国转而采取对德国的一种软化态度。英国将德国“履行政策的政治家”看作国际政治中“不可靠的人物”。因此，一方面，英国对法国的进攻战略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只要德国人敢于发起一场对《凡尔赛条约》的公开修改，它就得维持对法国这个战争盟友的忠诚态度。而法国在这个德苏条约上看出的是，德意志人是不会在一个由法国人领导的欧洲政治秩序中安分守己的，因此，法国将这个《拉巴洛条约》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来看待。

法国在1919年年底利用某些德国赔款交付上的拖延，联合比利时出兵强占鲁尔，“以确保有生产率的抵押品”，而私下的目的却是“将莱茵兰和鲁尔从德国分裂出去”。德意志人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的愤怒浪潮来作出回答，这场浪潮也由于政府宣布的“消极抵抗”政策而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在占领区的德意志人拒绝与占领者进行任何合作。与此同时，为了支持这场由政府下令进行的“无限期的罢工”，共和国便动用国家财政来支付工人和官员的工资。

到1920年夏天，局势表明这场“消极抵抗”将遭到失败，因为用滥发纸币来维持的工资支付将通货膨胀没完没了地不断推向高

峰，而法国人却成功地通过大量投入外国工人的办法，使那些抵押品进行生产了。这就表明，一场长期的德、法对抗，只会带来莱茵兰甚至是鲁尔区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正是法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斯特莱泽曼的领导下，新上台的大联合政府试图在秋季来一次内政外交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总扫除，因为斯特莱泽曼已经认识到，除了全面向法国投降外，德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余地。而在这个时刻，美国作为另一位想修改“凡尔赛和平秩序”的大国，同时也作为从胜利的战争中崛起的世界范围的真正胜利者开始登场了。在过去几年里，与在远东政治中表现得不一样，美国从欧洲政治责任中退却出来。美国国会虽然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它的政府也与国联保持着距离，并拒绝了与法国人建立安全同盟的承诺，但它绝没有放弃在欧洲经济上和金融政策上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机会。事实上，美国恰恰需要利用从 1914 年到 1918 年的冲突和 1918 年的灾难，在战后欧洲的稳定化中扮演一个与它的分量相称的领导角色。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德国经济上的精疲力尽，一方面成为了美国从经济上介入欧洲的杠杆，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走向稳定化的条件。

1918 年 11 月 11 日，赔款委员会成立了以美国金融专家查尔斯·道威斯为主席的一个专家委员会。道威斯考察了德国的赔偿能力，并在现实的存货登记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负载能力的赔款计划。该计划于 1919 年 1 月公布，并于同年 12 月被德国国会所接受。它向德国提供了一个可以负担的每年赔款缴纳上的定额，还包括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的内容，但同时设立了一个在盟国赔款委员会监督下的对德国经济和金融进行管理的机关。正是在它的监督下，稳定化受到了货币改革的掩护和支持，而这场货币改革结束了通货膨胀。

由于国际上一致确保了赔款的缴纳，法国在来自自己盟友的压力下，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并宣布了从鲁尔撤兵，这个行动到 1923 年 1 月才开始实施。

在围绕着修改而进行的顽强斗争拖延了四年之后，《凡尔赛条

约》才开始被视为一个并不是那么不可能的战后欧洲新开端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世界大战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直到1945年底才算真正结束，德国也才真正获得了一个极为必要的喘息之机。然而，从这场暂时的稳定化中能否发展起一个欧洲大国的方案，以及在这个方案中德国的对外政策能否有一种长期的稳定化，仍然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加以证实的问题。

二、通货膨胀的十年

正如对外政策上的对抗历史是有节奏的一样，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发展史也有一种特殊的进行式。从1918年开始的运动并没有随着1918年战争的结束而停止下来，而是直到1923-1924年的转折时期才真正出现了一种暂时性的中止，只是在灾难之后才出现相对稳定的。

长达十年的通货膨胀是从1918年的战争年代中开始的，它带来了德意志社会结构的一场改组化，而又没有使这种结构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对这十年进行总结的时候，人们有必要将这场通货膨胀的进程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员）1918年到1918年的战时通货膨胀时期；（圆）1918年到1924年复员遣返通货膨胀时期；（猿）1924年以后的超通货膨胀时期，它在1923年导致了德意志货币的全面崩溃。

直到1918年以前，对德意志的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还是一种不熟悉的现象。只是在战争的进程中，他们才发现内部市场上购买力的明显丧失和国际外汇市场上帝国马克的软弱地位。战争结束之时，批发价格的指数翻了倍，若以1913年为1，1918年则为1.5。马克的价值只有战前的一半，货币财富意义深远的贬值已经开始，所有人的购买力都下降了一半以上。

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要归于战争期间帝国政府采取的以下几项经济措施：首先，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帝国政府在战时大力发行公债，这些公债本应在“最后的胜利”之后还本付息的。其次，帝国政府还提高了流通的货币量，它实际上越来越脱离与战前相联

系的黄金储备量了。再次，消费品的短缺和军用品轻率的便宜价格，导致了价格的普遍上升，这种上升又通过日益增长的货币供应量而得到了加强。但是，由于 1919 年的失败，那种通过战争对手的赔款来偿清债务、提高货币实际价值的幻想破灭了。唯有一场紧急的货币收缩才可能在德国造就一个扫除式的新开端。

但共和国政府几乎不能采取这样一种痛苦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对于领年金者和认购战时公债者来说，无异于一场没收。而人们会将他们的愤恨转到这个新国家的头上，而不是转到过去的威廉帝国的头上。而且在复员遣返期间，人们也是有意识地寄希望于政府的资助政策的。大联合政府为了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便开始动用国家财政来补偿战争牺牲者以及德意志人口中的迁居者，尤其是那些在被割让的地区里有房产的人。但是，由于战后头几个月较少的税收收入，国家财政支出只能应付官员的工资和救济金，而经济在向和平生产的转型中必须通过补助金和低息贷款来加以启动。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还必须应付潮水般涌回的复员士兵日益有威胁性的失业问题。因此，所有这些必须支出的费用，都得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来应付。这样，战后头一年中马克的价值再度减半，第二年又继续下落。批发价格的指数上升到 1919 年的 100 亿，1920 年上升为 100 万亿。当然，这时的通货膨胀政策也仍然取得了它具有现实意义的成就。当战胜国各国陷入一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的复员遣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充分就业和向和平经济的恢复也得到了较好的保证。但无需掩盖的是，对货币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因此受到了拖延。

到了 1920 年，通货膨胀获得了戏剧性的加速发展，批发价格的指数已上升到 100 万亿的水平，1920 年 1 月一美元等于 100 万亿马克（而在 1919 年，1 美元仅为 10 万亿马克）。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一半以上的支出是通过印发纸币来维持的。对高通货膨胀不加抑制，也有对外政策方面尤其是赔款问题上的原因。大联合政府本着“履行条约政策”的方针，也想利用这场正在形成的货币危机向西方战胜国证明，《凡尔赛条约》实际上是不可能履行的。

随着 1918 年鲁尔的斗争，真正的时刻到来了。对外政策上的“灾难政策”占据了统治地位，德国政府开始用滥发纸币来支持“消极抵抗”，整个经济陷入了混乱，头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骚乱。1919 年开始的超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无止境地上升，终于使马克在外汇市场上完全失去信用，在内部市场上也越来越失去它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从批发价格指数来看，若以 1913 年 7 月为 1，1918 年 1 月则为 100 亿，1918 年 11 月已上升到 100 万亿！而美元与马克的比值也成为了天文数字：1918 年 1 月一美元兑 16 马克，1918 年 11 月 1 日一美元兑 100 万亿马克！① 所有的价值都虚假了。

在德意志人的回忆中，1918~1919 年超通货膨胀的无节制性，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马尔孔·科莱的人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每个月赚 100 亿马克，我们一天发两次薪水，而且允许每人每天可以有半小时离开工作岗位，以便能冲到商店，赶在下次与美元的比值表公布出来前买些东西，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钱也会失去它的一半价值。钱已经来不及印刷了，只能印一种银行符号，那上面写着：“为了这十马克，我出售我的美德。”②

这样一幅戏剧性的货币崩溃的画面有着它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它造就了一种长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货币价值闻所未闻的崩溃，才提高了对随后进行货币改革的可接受性。无论怎样，1918 年 11 月 1 日，随着德意志地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19》，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347 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19》，慕尼黑 1983 年版第 347 页。

产抵押银行的建立，一种以德意志的地产作抵押、价值稳定的新马克开始被接受，通过 1924 年《道威斯计划》关于赔款问题的新规定，德意志货币的稳定化终于成为了可能。

通货膨胀的十年结束了，但人们还必须研究它究竟给德意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负担？究竟什么人是得利者，什么人是失利者？

在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中，大企业家无疑是通货膨胀的得利者。他们获得了低息贷款，因而也能在通胀期间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并组织大规模的康采恩。货币的崩溃给他们带来了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的优点，革命时期的社会成就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与工人工资上的提高，恰恰能通过通货膨胀的折价形式转嫁到价格上去。在这里，人们首先会想到鲁尔工业巨头、德国企业家联合会主席胡格·斯汀纽斯。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买下了德国所有的森林来供应他的矿山所需的矿井支架，他买下了欧洲最大的煤矿，他投资于匈牙利的钢铁工业和罗马尼亚的化学、铝材和木材工业，并建立起对 14 家报纸的绝对垄断权。在他于 1924 年 1 月死去时，他已在 12 家建筑公司，12 家化工、纸张、食糖加工厂，12 家矿山和保险公司，12 家钢铁厂，12 家冶金企业，12 家商业和交通康采恩和 12 家铁路、船运公司中拥有大部分股份，并拥有 12 家完全属于自己的各种企业。^①

农民也属于得利者，因为他们能够用毫无价值的货币来偿清他们的债务。另外，那些外汇和实际价值的占有者也是通货膨胀的得利者，特别是当他们无需为他们的生计去变卖他们价值稳定的财产的时候。

对工人来说，通货膨胀总不是那么明确地具有积极性的。总的来说，由于工会与企业主联合会之间达成的社会妥协，1923 年到 1924 年复员遣返时期的通货膨胀，使工人得到了国家提供的资助。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23 年版，第 123 页。

此外，尽管实际工资低于战前水平，但它是处于上升趋势中的。而且在1914年以前，也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失业。当然，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低。从专业熟练工人、职员、官员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只有非熟练工人才明显地改善了他们的地位。然而到1918年源月以后，工人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因为整个德国工人队伍中只有1/3的人是完全就业的，1/3的人只是部分就业，而1/3的人是在失业。^①

对于那些迄今为止一直靠剪息票为生的人，知识分子集团，靠工资为生的“新中间等级”如职员、官员来说，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们的地位一直处于恶化之中。领退休金者和接受救济者也随着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的收入完全不能适应价格的上升。至于那些“老中间等级”中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遭受的打击甚至比战争中还要厉害。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唯有通过在黑市上进行的投机，才有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获利者。

必须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使个人受到的现实性震动是相当混乱的，即使是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也可能根据不同的时间划分，不同的区域位置上的局势，在经济矛盾交织中所处的具体地位的不同，而与他周围的人有所不同。但是，局势的混乱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无安全性、无保障性，也决定性地表达了这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心理后果。投机商对道德标准的否认在广泛的圈子中传播，它沉重地打击了中间等级传统的“节俭原则”；而困境中的犯罪已能得到法律上的辩护，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死里逃生。但无论是投机商的活动，还是这种困境中的犯罪，两者都在表明帝国时代相对僵化的社会道德秩序终于陷入动摇之中。这个进程，曾被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作为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后果所判定过，但直到现在才真正变得规模巨大而不可逆转了。

总而言之，价值观念完全颠倒了，成功在为违法手段的“神

^① 戈尔德·鲁·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1918年版，第100页。

圣性”辩护。与此同时，正直和正派却遭到了亵渎，因为它们战胜不了通货膨胀社会中的“饿狼法则”。个人状况的无保障性和社会道德上的局限性是一目了然的。

三、防御中的共和国

忠于共和国的政治评论家库尔特·图科尔斯基于 1933 年 1 月 25 日这样写道：

在我们德国，眼下并没有进行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里倒是有一场反革命。在普鲁士的大学生中，出现了一股规模巨大的、涌入自由军团的潮流，以至于连大学的课程也中止了。但是反革命并不限于自由军团，它包括成千上万的男人们——在人员波动性的组合中——在波罗的海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战斗，在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反波兰的战斗，在德国的大城市里反对所谓“斯巴达克主义者”的战斗。而那些受共和主义政治家们委托而投入自由军团的伙计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对民主制表示冷淡的，一般来说，他们是蔑视和仇视共和国的。^①

这种反革命从思想和行为上讲，是以一种需要追溯到 1918 年革命前的传统为基础的。“泛德意志同盟”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世界大国美梦，殖民主义的宣传和实践，所有这些都培养了一种期望，但这种期望已由于世界大战的失败而变成了失望，因此，也使这种右翼激进主义立场进一步尖锐化了。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运动，现在又加上了独裁的、政治上进行群众动员的新形式。

在“魏玛原思想”中，这些威廉时代后期的危机现象，开始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297 页。

与“城堡和平”、“前线战士”以及“战争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幻想融合在一起，因此，一种侵略性的群众动员，已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领导的军部独裁中找到了它政治上的中央。“德意志祖国党”这个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在卡普和堤尔皮茨领导下，已能召集起百万之众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国际谅解”政策。随着 1918 年秋战争的失败，这个运动处于瓦解之中了，但运动中的动机并没有消失。1918 年 11 月的那场快速和几乎不流血的革命胜利，仅仅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股反革命潜在势力的严重低估。

从 1919 年开始，这股反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并以“自由军团”的形式武装起来。现在除了对革命的仇恨以外，在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里，还加进了“反对凡尔赛耻辱”的复仇斗争以及“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因而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同情。

魏玛大联合政府的政治家们是很难对付这种反革命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将目光盯在镇压左翼力量上，部分是因为他们竟然信赖旧帝国军队所谓“无政治性”的对国家的忠诚。听一听德国第一自由军团司令、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威廉·莱因哈特将军在 1918 年 11 月的一番陈词，就能明白这种信赖是多么的天真！

我并不否认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事实。我的上帝！当一个人忠实地为他的君主和国家服役了三十年的时候，他不能突然地说：“从明天起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了！”但是，你无需害怕。我相信在一分钟之内是不能再建立起一个君主国的，无论怎样，盟国将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在十年的时间里，会发生这样的事的！①

因此，当一场右翼激进主义的內战开始威胁共和国的时候，共和派

① 奥托—恩斯特·舒德科普夫：《军队与共和国》，汉诺威 1923 年版，第 24 页。

的执政者们是得不到这支军事力量的支持的。最后还倒是《凡尔赛条约》的“非军事化”规定，讨了共和派政府的欢喜，因为它瓦解了自由军团中右翼激进主义武装力量具有威胁性的集中化。

1920年 1月 1日由卡普和吕特维茨将军领导的“卡普暴动”，就是为反对这种瓦解措施发动的。尽管国防军的最高领导没有支持这场政变，但他们拒绝用武力对付政变分子。其理由是：“陆军不能在不毁灭自己的情况下向它战时的伙伴开火”^①。因此，德国政府被迫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是靠了一场得到自由工会、两个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支持的全国总罢工，才在 1月 12日挫败了这场反革命政变。

在鲁尔工业区，通过罢工武装起来的工人“红军”，不仅击败了自由军团，而且还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提出了进一步民主化、建立工人政府、对重工业实行社会化的要求。魏玛大联合政府立即派德国国防军进驻鲁尔，这些旧军人对左翼力量的仇恨是无需怀疑的，工业区里的恐怖活动立即使很大一部分工人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共和国疏远了。这些苏维埃运动的成员或是退缩到绝望之中，或是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之中。这就导致了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种行动封锁，因为这部分工人再也不会相信这个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国了，而传统的右翼保守力量正在缓慢地恢复自信。

1920年 2月 2日的国会选举中，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行动封锁。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右翼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中右派的德意志人民党都得到了加强，而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这三个组成魏玛大联合的政党失去了一直拥有的议会多数，他们只能控制国会 249席中的 114席，从而使议会舆论组成上，以及共和国的政府组成上，开始了一种长期的不稳定。

这是一场在武装斗争中形成的权力分配的结果，它反映出选民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 1963年版，第 127页。

的大多数对宪法党的背弃，尤其反映出反动的右翼阵营以及革命的左翼阵营与共和国不可和解的疏远。如果说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曾出现过政治上的奇迹的话，那就是尽管有这样的行动封锁和不断的大大小小的危机，这个共和国竟然能死里逃生地坚持到了1933年至1934年。

德意志选民的十分之一和大约三分之一的有组织的工人转而支持共产党，并一直坚持在左派的阵营中。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这种局势，使得要想完全碎片式地分裂整个工人运动，分裂的力量还太弱了；但是要想让整个工人运动一致地去支持政府的改革措施，或是一致地去支持一场由民主革命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转变，分裂的力量又太强了。从右派方面来看，对自由军团的“非军事化”，尽管扫除了对共和国直接的暴力威胁，但共和国必须承认冯·西克特将军领导下的国防军是一个右派势力的“国中之国”，而且也无从避免右翼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势力在巴伐利亚的权力接管。

右翼激进主义势力已经在1933年反法、比的“鲁尔斗争”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了利。尽管不同于魏玛年代初，他们还没有被统一地组织起来，也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被一体化，但人们能够对这个运动的某些基本特点作一概括。

从意识形态上讲，在这个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运动身上，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和反犹主义发生了一种具有爆炸力的融合，这种融合通过世界大战的经历，通过自由军团反共式的投入，通过为之奋斗的“反对凡尔赛耻辱”的斗争，以及通过对“十一月罪人的共和国”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了。

从组织上讲，这些“前线士兵”和自由军团的经历，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已被加工成军国主义的一种雇佣兵的变种，因而出现了一种被民族主义神秘化了的“青年崇拜”和一种“领袖崇拜”，这些崇拜决定了这种右翼激进运动的外观和内部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特点，那些上过前线的青年军官成为了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想类型。这些人既不想也不能适应战后日常生活的困

有真正解决，但这场稳定毕竟维持了五年之久。

为什么共和国在 1924 年能死里逃生，而在 1932 年却崩溃了呢？对此可能没有太明确的答案。不过指出以下几点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帮助：1924 年已经表明历史中并不存在着毫无前途的局势。而 1932 年却证明，在一种特定的形势中，一种完全不受强制性限制的选举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人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 1924 年民族危机与国际危机的深度才似非而是地将这个社会挤向了一种可能的巩固化方向。当然还有更多的因素对此产生了作用。

首先，在对外反抗政策的死胡同中，在超通货膨胀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人们接受了外部失败和内部困境的现实，而在过去，即在 1918 年到 1924 年间，人们是不愿接受这种失败的。这里体现出 1924 年公众情绪陷入了一个普遍的低潮，这个低潮能够变成一种清醒和稳定化的出发点。

其次，共和国能在 1924 年顶住所有的危机，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多亏了它的软弱。具体的稳定化措施首先负担了让步，它并没有将统治力量挤向一种清楚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从结果出发的。因此，人们也唯有在一个分散了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内部才能描绘这条成功路线。

再次，共和国之所以能在 1924 年死里逃生，也是因为共和制还没有遇到明确的、有说服力的、也是强有力的有关体制选择方案上的挑战。因为左派还没有从他们在 1918 年和 1920 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而右派也还处于盲动和混乱的状态之中。

当共和国在 1924 年克服了危机并过渡到一个稳定阶段时，一个喘息之机到来了。是否能从中产生出一种长期的稳定性，这要取决于对现实的知足、社会妥协政策上的意愿以及行动余地。然而，在 1924 年开始的稳定中，这方面的前提条件恰恰没有形成。

第三节 摇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是在面临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

化的深刻危机时才丧失掉它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人们显然有必要在这段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去考察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为此，人们可以从五个横断面上来研究这场社会现代化及其文化经历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五个横断面可以大致表述如下：（员）人口结构的突变、代沟冲突和妇女的解放斗争。（圆）在对工业化关系进行的一种新塑造中，人们力图实现对“病态经济”的强制性遏制。（猿）社会政策经过紧张的设计并在危机条件下的撤回，反映出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性。（源）在公共社会的形式中，旧有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一种新的传媒世界和新的政治组织化形式出现重叠，并混合在一起。（缘）在向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转变中，在一种新的、被作为现代主义的东西来感受的生活风格中，“美国主义”的样板既得到了喝彩，也遭到了咒骂。

当然，这五个方面的社会现代化，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是按各不相同的节奏进行的。它们既能被看作是一个同一的、并列式的进程，又能被看作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或是彼此对立地展开的进程，因此，它们各自的变化速度也绝不是同步性的。应该说，在社会现代化的整个领域中，有三种不同时期的变化在重叠着：一是可以被称之为“跨世纪的发展倾向”，它的方向和目标是从 19 世纪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二是可以被称之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局势”，正如人们能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局势中所发现的那样；三是可以被称之为“重大事件的现象”，正如 1929 年的“超通货膨胀”所经历的那样。

总之，由于战争、经济停滞和危机，同时也由于革命，出现了将众多以前已经设计出来的方案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出现了将已经在进行试验的方案引入到更广泛战线中去的机会。然而，也正是这种令人惊慌的同时性和重叠性，才使魏玛共和国经历了它的社会现代化的危机时代。

一、几代人的经历与妇女的解放斗争

数十年以来，德意志的人口一直是以一种很高的年增长率有规律地发展着的。这是因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口的发展，一方面是以人口净增长为标志的；另一方面也是以乡间人口向城市区域的移居为标志的。它一直具有城市人口“年轻化”的鲜明特点。

在魏玛共和国中，尽管有世界大战带来的近 1500 万的人口损失，但在缩小的版图内，德国的总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从 1914 年的 6800 万上升到 1939 年的 7500 万，超过了那个具有更大版图的帝国时代中 1914 年的 6800 万的水平。但是，如果人们将德意志人口按年龄结构进行编排，并将 1939 年的情况与 1914 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 25 年的时间里，人口结构发生了惊人而深刻的变化。

在 18-24 岁（即 1914 年至 1939 年出生的人）这个有着特别活跃生活期的年龄组中，能明显觉察出战争所造成的 200 万男性的损失。尤其在受影响最深的 18-24 岁的年龄组中，男子的数量明显低于 1914 年。与此相应的是 18-24 岁这个年龄组中的妇女过剩，大量妇女在她们的“青春年华”中不得不保持独身。职业妇女的问题也变尖锐了，因为无论怎样，妇女中相当大的部分已不再能回到作为男性供养对象的家庭妇女的角色中去了。

25-34 岁（即 1914 年至 1939 年出生的人）的年龄组，在 1914 年提供了特别旺盛的生育力。但是，在共和国时期，当他们离开学校时，遇到的却是一个过于拥挤并陷入停滞的劳动市场，因而他们也必然带着他们特别的愤怒，并在最糟的出发条件下，去面对涉及他们社会地位的“代沟冲突”问题。

35 岁以下（即 1939 年以后出生的人）的年龄组，其绝对数量已明显变小，特别是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其数量只相当于 1914 年出生的正常数的一半。尽管有战后前三年中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只能较少地改变这种消极后果。因此，共和国的人口结构是与战争以及战败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若是将这种对 1913 年间德意志人口结构的比较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之中去，人们就会发现，一方面，出现了这种必须提及的“跨世纪倾向”，即两个子女的小家庭理想，日益上升的对生活质量的期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出生率下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口金字塔变成为上宽下窄的蘑菇状；但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影响却使人口结构明显地“碎片化”了，在性与代的方面，已出现完全不同的区别。

这种人口的“碎片化”属于魏玛共和国中普通老百姓最基本的经历。与之相联系的是，不安定和新冲突非同一般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社会心理状态的发展，因而也就出现了关于青年一代地位、角色的争论，关于妇女地位变化的争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关于性、家庭、子女教养问题的争论。

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个时代比魏玛时代更强烈地在公众社会中贯穿着“青年神话”的。^① 都市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分配给青年一代一种特别的“开路先锋”角色。这同时也使他们在工业中、都市中、移民中以及在社会焦点问题上，都拥有超过一般人影响的代表。因此，青年人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传统束缚和监护崩溃的代号。“青年人”（*Jugendliche*），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本身就指出了易出危险的领域。

为了解决或是至少缓和“青年问题”，《魏玛宪法》赋予了国家以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1919 年的《全国青年福利法》规定了国家要“对特别困难的青年进行救济”，“对正常的青年进行照料”，并许诺：“每一位德意志的孩子都有权接受教育，以获得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能力。”^② 在这里，恰恰没有提到发展青年人正常个性的任务，而只是提到通过公共机构来教育青年人成为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3—1918》，斯图加特 1967 年版，第 171 页。

②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227 页。

“一个有能力的人”。

事实上，在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容忽视的。战争期间的孩子和青年人，在没有父亲管教的情况下，经历过 1945 年“萝卜的冬天”的物质困境，这本身已可怕地助长了青年人的违法行为，并导致了青年人对迄今为止一直有效的社会道德准则的背离和父母权威的丧失。战争和通货膨胀年代又极大地削弱了中间等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使得这种权威的丧失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中显露出来，从而使青年运动对僵化的“成人世界”的批评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在工人家庭里，尤其是在专业化的工人家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权威冲突。传统的父长制家庭模式过去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现在，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成为父母们的心病。经济上的困境，停滞的收入，极有可能出现的失业，使他们付不起子女们日益高昂的学费，因而也使他们作为家庭经济承担者的权威明显地受到挑战。因此，“反叛父母的权威”已成为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题。^①

随着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带薪假日”在企业中零星地出现，自由时间无疑变得更多了。尽管这种业余时间的塑造能为所有的年龄组利用，但在这方面，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年人成为了开路先锋。他们的业余时间不仅是在朋友圈子里度过的，而且也是利用业余消费品，如收音机、留声机等，并在电影院、酒馆、舞厅中度过的。而无产者家庭中的青年人，作为一个边缘上的集团，也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对传统规则更为大胆的违反，已经使共和国的执政者和资产阶级的公众社会感到了担忧。

无论怎样，通过对业余时间新形式的利用，青年人总是能比成年人更快地适应都市化和工业化大众文化的新价值观。在两性关系上，不少青年人在追寻着“美国主义”的榜样。而与此同时，将

^① 戈尔德·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63 年版，第 194 页。

这种现代性作为“破坏性的”和“非德意志的东西”加以拒绝的“文化批评”，也在另一部分青年那里找到狂热、偏激的追随者。当然，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谁是提倡者或是反对者的问题，往往不能根据阶层而只能根据每个具体的个人来判断。然而恰恰在青年人中间，这种判断上的对立特别具有爆炸性。因为不同于成年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战后还没有定向的情况下，又必须去寻找一种个人生活设计和一种社会生涯上的未来前景的。

处于青年阶段的人，必须完成生活上的转轨，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失业，不仅对于青年工人来说，而且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在福利国家的危机中，给青年人的资助费用减少了，以至于未成家的青年工人往往成为那些已受到失业震动家庭中的沉重负担。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大专院校的劳动市场曾在帝国时代有过特别的扩张，但在战后共和国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尾随其后的一代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这个市场关闭的大门。因此，激进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选择，是与青年大学毕业生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危机意识相应的，关于“精英”和“天才”的命题，为“淘汰劣等角色”的讨论准备了心理上的条件，“一个无法安排它新生力量的共和国就是一个衰老的共和国”的口号，正是以“青年一代”的名义喊出来的。与此同时，这一代找不到位置的人，却能在侵略性民族主义“没有空间的民族”的口号中，找到他们的角色。因此，纳粹主义运动很容易从这个多余的“青年一代”中招兵买马。它能在1933年成为德国各所大学里校园政治中最强有力的运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①

魏玛共和国既在法律上给予青年人以特别的重视，但同时又在经济生活中将他们推到有威胁性的边缘上。这就使得它的青年人，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上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则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向右翼激进主义运动靠拢。一位当时很出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1933年版，第132页。

名的青年作家克劳斯·曼这样讲道：

我们正处在一种将一切都看作有可能的特别位置上，并一直保持着我们应有的准备状态，来防止我们的迟钝。如果下个星期我们这个国家里出现一位君主式的独裁皇帝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有丝毫惊讶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只是由于困境和混乱才统一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还并没有找到能够使我们去共同为之努力并奉献我们自身的目标，虽然我们大家都赞成去寻求这样的目标。^①

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是在年轻的失业者中，对这个共和国制度的敌视在不断地激进化。那些活跃在街头的右翼军事战斗联盟的行动主义组织，本身就能为这些年轻失业者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种有意义的现实，而个人软弱无力的经历，又往往能够通过集体地实施暴力的方法来补偿。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冲锋队”在大危机的失业浪潮中，总是能够在那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较为软弱的地方，吸引相当多的追随者，从而最终使纳粹运动成为了一场“青年运动”。

与“青年神话”一样，“新妇女”的神话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帝国时代，妇女的职业率（即妇女就业者在妇女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恰恰在共和国时代，这种职业率由 1918 年的 25% 上升到 1925 年的 30%。更为重要的是，妇女就业者集团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大变动。在同一时间里，女佣的比例从 1918 年的 45% 下降到 1925 年的 35%，农业女工的比例从 1918 年的 15% 下降到 10%，与之相应的是工业女工的比例由 1918 年的 20% 上升到 35%，女职员、女官员的比例从 1918 年的 10% 上升到 15%，然而，妇女就业者中的最大集团，即作为家庭经济辅助性帮手的集团，其比

^① 戈尔德·曼·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 1959 年版，第 100 页。

例没有变化，仍为**犹豫**。^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妇女为顶替参军的男子在交通业和重工业中承担了“男性型”的职业。这种例外的局势，由于男子从战争中的返回很快结束了。对妇女公共性的聘用，仅仅残留在管理、教育、社会福利性质的事务中，因为在这些行当中，妇女很久以来已经为“社会上的母性”模式作好了准备，并要求有妇女特殊性的资格了。因此，共和国时代的妇女，大多集中在工业、贸易、公共服务以及第三产业等现代化领域的职业岗位上，这些岗位或是以前不存在的，或是本身不太适合男性的，例如女速记员、需要极为细心的流水线上的女工、女售货员、国民学校的女教师、社会福利方面的女性工作者等。妇女与男子即使干同样的工作，也只能拿更少的薪水，并行使着下属的功能。然而在**1919**年至**1932**年的企业“合理化运动”期间和**1932**年以后的经济大危机期间，这恰恰导致了廉价的妇女劳动力与男性工人相比，更少地被解雇。^②

因此，在劳动市场的不景气和危机中，公共舆论对在**职已婚**妇女的愤慨尖锐化了。早在**1918**年，而不是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以后，新通过的《妇女官员地位法》已将这种“双职工性的妇女”赶出了国家官员的岗位，这就特别严重地威胁到女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未来。到**1933**年，除了有**100**万名单身女大学生就业外，还有**100**万女大学毕业生是失业者。

但是，妇女们反抗男性排挤和歧视的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从德国妇女运动的传统理论出发，妇女本身是以一种“女性”的特别文化任务为方向的，这自然使歧视与“合乎性别”之间的处理变困难了。特别在都市化社会的职业领域里，多数的妇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57**年版，第**151**页。

②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57**年版，第**150**页。

女与男子一样，是认同一种“暂时性就业”的妇女特殊性别模式的。根据这种模式，对单身妇女来说，从离开学校到做母亲之间，从事职业活动是作为她们摆脱物质困境的手段来出现的。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就必然导致都市化社会中最现代化岗位上的职业妇女稳定的年轻化，以及这个职业妇女集团内部的相互排挤，从而也极大地减弱了她们反抗斗争的力度。

这种斗争的困难性还在于共和国中、后期出现的两股彼此相反的潜流：一方面，到处出现的是在宣传媒介中得到扩散的那种“不问政治的、消费型的”年轻女职员的“现代妇女形象”；另一方面，不仅在作为反对派的男性当中，而且也在相当多的妇女当中，出现了一种对和谐家庭中“高尚妇女”和“贤慧母亲”理想的追求。这两股潜流之间的对抗，因“美国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而变得紧张化了，因为在由男性制造出来的“毁灭男子的荡妇”的宣传中，“新妇女”的形象是最蛊惑人心地、也是最紧密地与“美国主义”的喧嚣联系在一起。在著名作家卡勒斯通的笔下，现代妇女的形象也就是有性感的、有点独立性的妇女：

她们有短短的发型，化了妆的相貌，时髦的服装，叼着香烟，干着一份轻松敏捷的打字小姐的工作，或是在“消费的天堂”里做一名女售货员，并在舞厅里或是在好莱坞电影的观赏中度过她们的业余时间。^①

这种“新妇女”的神话，通过商品化的爱情小说家们对女性私生活充满浪漫的、也是无止境的挖掘，使得人们更难认识那些小小的女职员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了。而广告和消费世界的宣传品，带着“干扰人正确判断力”的功能，为职员领域中的年轻妇女们指引着消费的方向与追求。仅仅因为这个妇女集团的收入是如此地有限，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5年版，第 152页。

才使得她们辛辛苦苦储蓄起来的钱都流进了那个消费的“新世界”之中。

总之，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许多领域里，对妇女的期待上升了，也向她们提出了在政治和现代化职业劳动中的新任务。但是，由于对她们传统角色上的过分要求既没有中止，也未能消除，因而实际上又是与她们新的社会角色相矛盾的。因此，妇女们传统的双重负担，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刺激和愤慨的发泄才能得到补偿。不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敌人，而且还有这种社会变化的牺牲者，都在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中寻求其他的选择。这能帮助人们解释，为什么代沟之间的冲突和性关系中的混乱得到了加速；也能帮助人们解释，为什么在危机年代里反动的纳粹主义“妇女神话”同样又能在许多妇女那里找到听众。

二、病态经济结构与“合理化运动”

早在帝国崩溃的前两周，鲁尔工业巨头胡格·斯汀纽斯代表大工业界与自由工会领袖卡尔·列金就开始了关于国家政治与经济未来的谈判。企业家集团主动伸出谈判之手，主要是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由势力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可能导致的苏俄式社会主义革命。但同时他们也在担心，“这个国家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会不愿再放弃官方对自由经济的控制的”。因此，他们打算与工会结成一个联盟，并“通过这个联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贯彻力，来说服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中，根据企业家联合会与工会的设想来重新安排经济”^①。自然，这首先意味着得承认工会是与之有平等权利的谈判伙伴，承认工业化的劳动关系中集体利益的平衡原则。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工会领导人认为：“对工人来说，在本来就已充满混乱和困难的年代里，利用集体的劳动权利，比利用一场激进的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1918—1933》，杜塞尔多夫 1965 年版，第 152 页。

经济—社会上的根本变革，能更可靠地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公正。”^①因此，当革命扫除了帝制以后，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在议会制的塑造中维持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1918年11月15日出笼的《斯汀纽斯—列金协定》，宣告了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组成“中央劳动共同体”，同时也承认了自由工会是工人阶级所委任的代表，工人有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规定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得由两个联合会的集体协商来作出决定，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于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场“阶级合作主义”的试跑开始了。

但是，魏玛共和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在经过了战前几十年的繁荣和工业革新之后，接着是数十年的危机和增长受阻。无论对这种长期发展节奏的解释在经济史上会引起怎样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战前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已不再能成功地借助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来实现新的突破了，那种新突破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最终实现的。世界市场上旧的分工尽管得到了维持，但欧洲老工业民族已遇到了年轻的竞争者，并正在失去传统的市场。美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比德国、英国、法国这三个迄今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工业民族发展得更快。^②

作为战败的结果，外部因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德国国内的发展，它使德意志经济遇到了远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大的困难。不仅《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带来了领土和资源上的损失，而且对莱茵兰的占领，法、比军队强占鲁尔，铁路和商船被没收均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发展障碍。尽管后来有《道威斯计划》的扶植，但1919年12月16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规定的132亿金马克的赔款义务毕竟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出口压力。所有这

① 路德维希·普雷勒尔：《魏玛共和国中的社会福利政策》，杜塞尔多夫1968年版，第127页。

② 迪特利希·阿尔德克洛夫特：《二年代》，慕尼黑1968年版，第107页。

些不仅使魏玛共和国时代处于比帝国时代狭窄得多的发展框架内，而且也严重干扰了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若以 1914 年发展水平为基准，魏玛经济只得到了起伏不定的缓慢恢复。仅以工业生产为例：若以 1914 年为 100，那么 1918 年则为 75，1919 年为 65，1920 年为 55，1921 年为 45，1922 年为 35，1923 年为 25，1924 年为 15，1925 年为 10，1926 年为 12，1927 年为 15，1928 年为 18，1929 年为 20，1930 年为 22，1931 年为 25，1932 年为 28，1933 年为 30，1934 年为 32，1935 年为 35，1936 年为 38，1937 年为 40，1938 年为 42，1939 年为 45，1940 年为 48，1941 年为 50，1942 年为 52，1943 年为 55，1944 年为 58，1945 年为 60，1946 年为 62，1947 年为 65，1948 年为 68，1949 年为 70，1950 年为 72，1951 年为 75，1952 年为 78，1953 年为 80，1954 年为 82，1955 年为 85，1956 年为 88，1957 年为 90，1958 年为 92，1959 年为 95，1960 年为 98，1961 年为 100。①

在这种内、外经济的不景气之中，维持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惟一办法，就是保持企业家利益集团与工会集团之间的平衡。在共和国初期，要实现这种平衡，在没有外来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大联合政府就只有借助通货膨胀手段来苟延残喘。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主将成本上的负担转嫁到价格上去，同时又能使国家用滥发纸币来支持工人的工资以及庞大的社会支出。总之，通货膨胀一时掩盖了一系列的分配问题，并维系着“中央劳动共同体”这个共和民主大联合的政治基础。

当 1924 年的货币稳定化结束了“通货膨胀魔术”之后，劳资冲突便立即加剧并取代了合作，因为“中央劳动共同体”政策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已经崩溃。企业主力图将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压力转嫁到工人头上，并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仍坚持在《斯汀纽斯—列金协定》中早已获得的权利，并要求提高工资。到现在人们才发现，德意志战后经济上的分配活动余地竟是那么的狭小。劳资谈判难以达成协议的困境，迫使大联合政府开始实行“国家仲裁制度”。坦率地讲，这些由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数是倾向雇员方面的要求的。国家劳动部长海因里希·布劳恩这样讲道：“在贯彻工资原则时，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的塑造雇员在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的确，1918 年至 1919 年的仲裁处理，以及 1920 年至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0 页。

愿像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是应工会的建议才形成的。”^①而且，在 1918 年至 1920 年之间，实际工资成本和薪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引人注目的提高。但由于稳定时期工资的起点定得很低，因此，雇员平均的实际收入直到稳定结束时才提高到与 1914 年大体相同、略有波动的水平。^②

企业主过去能利用通货膨胀将生产成本上的负担转移到价格上或更低的工资水平上去。而现在，当这两种转移方式都成问题时，他们便仿效起美国，寄希望于生产“合理化运动”。但在他们的合理化方案的实施中贯穿着一种复仇主义的目的，即通过所期待的企业集中化提高生产率，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险上的支出（因为工人的保险入会费的一半是要由企业主来支付的），从而达到重新夺回由于战败和革命而失去的地位，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和国内经济生活中主人的目的。^③与之相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通过生产“合理化运动”获得一种改良社会的推动力，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可能为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创造更好的条件的。总之，一种要对社会进行逐步合理的结构性改造的幻想在支持着他们。

因此，不仅在企业主集团那里，而且也在工会那里，美国“合理化”的样板是带有一种“合理的经济幻想”的特点出现的。不错，美国的“泰勒制”和“福特制”，对劳动流程、生产程序的肢解，以及劳动时间的控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使工资与标准化劳动步骤的最高效率联系起来，从而也使流水作业式的大批量生产成为了可能。但在魏玛共和国的这个时代里，它的影响很少与经济生活中人们所希望的理性的增长目标相一致。就其原因，至少有以

① 帝国劳动部：《德意志的社会政策，1918—1920》，柏林 1920 年版，第 150 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 9 卷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0 页。

③ 埃尔哈德·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 1920 年版，第 150 页。

下几点：

其一，工业领域内部在日益地垄断化，并已在通货膨胀期间获得了加速，最出名的例证就是斯汀纽斯的康采恩、隰法本化学公司以及联合钢厂的建立。

其二，民族和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卡特尔化，使得内、外市场都被价格协定和生产定额所规定。

其三，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干预。尽管这种国家干预与世界大战时帝国的中央指令性经济主义相比，已通过向和平经济的过渡受到了遏制，但当它涉及通过国家资助和保护主义来为特定的生产部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时，总是特别受到人们欢迎的。

其四，国家对工业的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如果说这种份额在 1914 年为 15% 的话，那么到 1924 年它已上升到 25%，而在 1929 年甚至上升到了 35%。^①

魏玛国家的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提高了国民经济的非灵活性，鼓励了官僚主义的再分配机制，并助长了卡特尔化和垄断联合力量抱作一团的投入。同时，它证明了它自身是很少喜欢创新的，也几乎不可能使战后的德国经济很好地去适应战后世界市场的新条件。在这方面，魏玛时代的德意志银行家和企业家的投资态度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们的投资很少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性。尤其在国内和世界市场高度卡特尔化的条件下，他们并不是将他们的资本和从国家手中获得的大量贷款投向那些在未来真正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有风险的领域，而是投向那些传统的、因而也好像是更为安全的领域。

与此同时，国家极高的支出同样也给这种投资行为加倍增添了负担。这是因为只要国家的高支出是通过税收来满足的，那么生产的成本就会提高；只要国家的高支出是通过向企业提供贷款来维持的，那么国家就会使获得贷款的条件变得更为苛刻。因此，企业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29 年版，第 155 页。

家集团更加坚决地反对国家在分配上所作出的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反对这个福利国家的措施，并喊出了“反对工会国家”的口号。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国家的干预是一种“超组织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来说，企业的垄断化恰恰是一种“缺组织的资本主义”，一种实际上脱离国家控制的“古典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现在竟然在彼此争夺市场垄断权的大工业垄断企业之间，以所谓“全面合理化”的方式来推行了，因此，不仅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且它们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冲突都远比帝国时代要残酷得多和尖锐得多。^①

然而，生产“合理化运动”的推行，却在工人的技能结构上导致了滑动。不仅导致了依靠传统手工作业方式干活的工人的非专门化，而且也导致了在技术上有专门技能的新型工人的专门化。又由于“合理化运动”是在一种几乎陷入停滞的经济中进行的，因此，它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稳定的就业者与无规律的就业者或是根本无业可就的人之间，以及老年工人与接替他们的青年工人之间，也就是说，在整个工人阶级中间带来了尖锐的“碎片化”，即“非团结一致化”。而且，“合理化”本身就具有减少劳动力需求的作用，在企业主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中，往往造成了一种日益加快的对工人的“磨损”。每一位向新生产纪录冲刺的工人，也正在制造他自身失业的可能性。^② 因此，随着“合理化运动”的推行，失业的基座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在战前人们几乎不认识的长期结构性失业，并具有在特定的部门中和地方上集中化的特点。在没有普遍的经济繁荣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这只能进一步削弱社会的总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

①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正常性的假象，魏玛共和国中的工人与工人运动》，见《魏玛共和国》，柏林，魏玛1994年版，第183页。

②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魏玛1994年版，第184页。

总之，“合理化运动”绝没有打开通过社会管理技术上的领导来使经济生活井井有条的理智王国的大门，恰恰相反的是，在那些专家统治的改革幻想失去光芒的地方，往往就是从对社会问题采取“暴力式的最后解决”的非理性主义中寻找“医治手段”的地方。因此，在形式上的“合理化”的贯彻中，物质、精神上的非理性化正在积累。除非国家能向失业者作社会福利金上更大的投入，否则这个社会的爆炸是不难预料的。

魏玛共和国能否死里逃生，取决于 1918—1933 年的这场社会和政治上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妥协能否得到维持，说到底，取决于能否出现一场普遍的经济增长，来提供更大的分配余地。由于在所谓“金色的二十年代”里，仍没有出现一场普遍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不改变经济体制和结构的情况下，可供分配的活动余地就自然越来越小，企业家集团与工会受各自利益引导的立场，也就相撞击得越来越厉害。又由于这种对立性的弱化本来就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达到，因此，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要调解这场分配冲突也就更不可能了。这样，围绕着社会福利金究竟是增加还是削减所展开的分配冲突，必然上升为分配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使自由工会，而且也使魏玛国家的体制本身，都进入到企业家集团的射击区域之中，而这个国家不仅是社会福利政策执行的保证，而且也是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仲裁政策来对社会进行直接干预的行动者。摇摇摇摇

魏玛经济体制的危机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的同步性，恰恰说明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和社会上的进步必须与经济上的发展同步化。长期的经济繁荣也是与这样的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在威廉时代和阿登纳时代所发生过的那样，尽管在这些阶段上也出现过其他对政治进步的阻碍。

而在魏玛时代，出现的却是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员）对社会冲突进行调节的设计方案和工人企业参与权的未来方式都被拟订出来了，但由于物质上很少的妥协活动余地，而失败于对冲突准备的缺乏。（圆）在生产方式中，同时也

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领域里，出现了一场广泛的“合理化运动”的幻想，这种“合理化”在具体的影响中，还不如说导致了一种物质上的非理性化增长。（猯“金色的二十年代”描绘了现代消费社会和广泛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第一个轮廓，但与此同时，福利金的增长却引发了深刻的分配冲突，从而使整个国家体制陷入企业主集团的交叉火力之下，因为企业主们认为摆脱这场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出路在于粉碎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国家”。因此，这个民主和社会福利的法治国家会在一场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失败，是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

三、“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要追溯到帝国时代的成就上去。当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引发并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时，俾斯麦接受了“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思想，积极推行了一项“福利国家化”政策。自从 1884 年以来，德帝国开始在工业化国家中头一个建立起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保险制度。尽管投保人所能领取的福利金是很少的，但是，通过 1911 年的《帝国保险条例》新增设的《职员保险法》与《遗属保险法》，一种涉及几乎所有工业受雇者阶层的社会保险制终于形成，这对于魏玛时代的福利制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

魏玛民主政治是以劳动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利益妥协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政权不再仅仅属于打有易北河以东新教出身单一烙印的容克成员，大量来自中间等级的成员和天主教徒进入了政治决策机构，以社会民主党为政治臂膀的自由工会运动也摆脱了政治上受歧视的“门外汉”地位，并参与了对国家的负载，这种“大联合”的政权组合也无疑有利于福利保险制度的发展。

然而，共和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远比帝国时代广泛得多，也严峻得多。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已因战争的失败而大大加剧了，而且还出现了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安置 100 万潮水般涌回的士兵复员问题，100 万以上

的伤残者和阵亡者遗属的救济问题，几百万被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掏空了福利金的投保人的生存问题，以及提高受雇者的工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证明战后具有现实性的困境已经突破了过去帝国时代中“社会问题”只与“工人问题”相联系的传统界限。^①

“大联合”政府的执政者们“决心以另一场斯泰因改革来拯救战败后的德意志危局”，国民议会中的大量专家、教授与学者更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决心与努力来证实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帝国时代福利保险制的成功贯彻一直使他们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国家干预和在经济上的投入找到它理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医学的进步能杀死细菌那样，在公共干预中，科学家与社会技术专家们的合作能消除所有已形成的社会问题。”^②“讲坛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工程技术论”思潮已得到了跨党派的拓宽。

1919 年 1 月 11 日颁布的《魏玛宪法》至少从法律上勾画出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特点，因为它首先规定了社会保险应达到的水准，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定义。第 133 条款宣称：“为了保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为了保护母亲，为了应付由于老年和生活中的软弱地位以及情况变换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帝国^③将在投保人决定性的参与影响下，创造一个全面广泛的保险制度。”第 134 条款还涉及新的领域：

每一个德意志人都应在他个人自由不受损害的情况下行使道义上的义务，奉献他精神上、体力上的力量，正如整体的幸

①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52 页。

②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58 页。

③ 注意：魏玛共和国仍然被立法者们称之为“~~帝国~~”，即“帝国”。

福所要求的那样。对每一个德意志人来说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通过经济活动挣得他的生计，倘若对适合他的劳动机会没有得到证明的话，那么将照顾他必须的生计。具体的细节将由特别的帝国法律来进行规定。^①

因此，“福利国家”的原则已提到了立法的高度，享受“福利国家”的保护已成为每个德意志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已建立在民主决断性、法治性、社会福利国家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新生共和国的威望也就与福利制度的发展荣辱与共了。

尽管在政治权力的紧张争夺中，在各政党力量的消长中呈现出德国政局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但在 1919 年至 1933 年十二届走马灯式的内阁更迭中，负责“社会福利工程”的国家劳动部长却始终是由同一位天主教中央党人海因里希·布劳恩来担任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在 1918 年大危机以前共和国的历届联合政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决心，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福利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具体的发展步骤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解决 130 万伤兵和 100 万遗属的供养问题。1919 年 1 月的《帝国供养法》和《健康严重受损者法》使战争牺牲者获得了有关医疗、职业恢复、教育培训以及养老金方面的法律保证和许诺。^②

其二，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收入和财产，这里首先包括过去投了保的工人、职员和复员军人，因此，为解决这些人的生存问题，1919 年 1 月的《关于救济义务的帝国条令》和同年 12 月的《关于公共救济的前提、方式、程度的帝国原则》，使地方乡镇的救济联合会成为了公共救济的载体组织，并要求它们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75 年版，第 153 页。

②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918—1933》，法兰克福 1982 年版，第 153 页。

“及时地、足够地资助需要帮助者”，同时也委托它们“决定这些人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并测定他们应得到多少福利金”。①

其三，在 1919 年相对稳定开始以后，传统的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三大保险制不仅重新开始正常运转，而且也通过大量法令和管理行动得到了扩展。例如，所有的保险都考虑到家庭，并增加了给投保人子女的津贴费；所有的福利金不仅支付工作日，而且也支付星期日和节假日；对所有生育妇女实行全面免费照顾，并发放十周的产假补贴，无论是否投保人家属；工伤事故保险不仅对劳动过程中的事故进行赔偿，而且对上、下班路上发生的事故也进行赔偿；养老保险扩大到家庭手工企业中的雇员身上；投保人所获取的养老金已由战前的每年平均 150 马克提高到 1919 年的 180—200 马克，其中工人每月为 12—15 马克，职员为每月 15—20 马克。寡妇及其子女的年金翻了一番；孤儿年金的支付也由 15 岁延长到 18 岁。②

其四，1919 年 7 月 1 日还通过了《劳动介绍与失业保险法》，它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保险制的发展是最有意义的。它规定向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咨询、职业进修、改行培训，并向投保的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这笔保险金由投保人会费支付，入会费占工人毛工资的 1%，雇员与雇主各缴纳其中的一半，但同时国家保证用财政手段来平衡会费筹集与资助总额之间的差异。一位有两名子女的失业者，如果他属最高的工资等级的话，最长能在半年时间里获得他最后劳动收入的 1%；如果他属最低工资等级的话，则能获得 1%。在这半年后，如有必要，将由一种“危机救济金”来替代这种失业保险金。③ 这笔救济金则要根据个人需要的程度来测

①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918—1933》，法兰克福 1984 年版，第 100 页。

②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918—1933》，法兰克福 1984 年版，第 100 页。

③ 《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柏林 1919 年版，第 28 页。

定，并完全由国库开支，其中，由国家财政负担五分之四，地方乡镇财政负担五分之一。^①

因此，直到 1913 年以前，魏玛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新的条令、原则与法规，共和国不仅扩充了帝国遗传下来的对工人、职员三大保险，而且还增设了战争牺牲者供养、社会救济、危机救济和失业保险，仿佛“福网恢恢，疏而不漏”了。

然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发展，同时也是靠着对一种几乎萎缩的国民生产总值引人注目的重新分配来发挥影响的。国家为传统的三大保险所作的支出，已从 1914 年的 1 亿马克上升到 1918 年的 1.5 亿马克，国家和地方财政为那四个新设立的保险分支机构在 1918 年共支出了 1.5 亿多马克，而 1914 年是没有这方面开销的。因此，仅在 1918 年，由社会保险各种机构支出的总额达 1.5 亿马克，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1/5，而不是 1914 年的 1/10 了，即使考虑到货币价值上升的影响，它也是 1914 年的 1.5 倍多，但就 1918 年的市场价格而言，整个净国民生产总值还没有真正达到战前最后几年的水平。^②

因此，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在美元扶植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国家财政也一直在赤字经营。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便增加税收，这就降低了企业的赢利性，加重了企业资本构成上的困难，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于是，企业就越是疯狂地“合理化”，结果是更多工人的失业，而国家又得投入更多的津贴费。这种恶性循环使魏玛经济早在 1918—1919 年冬天已缓慢滑入了危机轨道。福利制度的扩大正是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成为了危机的参与性因素之一，尽管它绝不是危机的根本性因素。

^①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 1 卷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0 页。

^② 联邦统计局：《人口与经济，1914—1918》，斯图加特 1954 年版，第 100 页。

大危机的深化，使劳资双方围绕着是削减还是提高社会福利金的争端升级了。但是，在高失业背景下，罢工已不再是一种对企业主有威胁性的斗争手段了，因此，对雇员的代表来说，实际上已无任何谈判的余地。1932年11月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主持的联合内阁倒台，标志着企业家集团掌握了主动权并占据了上风。靠总统委任上台并向右转的布吕宁内阁以及后来的巴本内阁，都力图用减少国家支出、增加税收、平衡财政的经济紧缩政策来寻求避难所。为此目的，这两届政府不断以“紧急条令”的形式对经济生活施加有利于大资本的干预，同时也通过缩小福利保险面、减少福利保险金、提高投保入会费、延长金额领取的等候时间、缩短支付时间等方法，来对社会福利金进行全面、大规模的削减，特别是巴本政府，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来撤除这个“福利国家”。

然而，撤除福利制度的动机并非意味着撤除的绝对后果，因为大萧条的动力比这种政策更加有力，并反叛着这种政策的企图。例如，从1932年到1934年，尽管布吕宁、巴本政府已将领取失业金的时间由半年即18周缩短为12周，将领取危机救济金的时间由12周缩短为8周，但由于仅登记注册的失业人数已由1932年12月的150万上升到1934年12月的250万，而且个人失业的持续时间也明显变长，因此，尽管拿失业保险金的人因支付时间缩短而持续减少，但领危机救济金的人却不断增加，被停发危机救济金而被转入到地方乡镇的公共救济领域中去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由于这两种救济都是由国家或地方公共经费来支付的，这就自然扩大了公共费用的支出。布吕宁、巴本政府的紧缩政策在不断恶化着这种关系。在1933~1934年的结算中，国家给平均150万失业者支付了1.5亿马克，而在1934~1935年的结算中，国家给平均180万失业者支付了2.5亿马克，但个人的平均费率则由100马克降为70马克。到1935年11月，“250万失业者中只有150万的人在拿失业金，100万的人在拿危机救济金，100万的人在拿公共救济，还有100万的人什么

都没领到”^①。

因此，布吕宁、巴本政府的紧缩政策带来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局面：一方面，投保者个人所得的费用在不断减少，这自然导致了民怨沸腾；另一方面，国家为此所作的公共支出却增加了一半，~~魏玛~~魏玛年底通过各保险机构支出的经费额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已由 ~~魏玛~~魏玛年的 ~~魏玛~~魏玛上升到 ~~魏玛~~魏玛以上。^② 更重要的是，由于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将其威望与“福利国家”的许诺联系在一起，因此，福利国家的危机自然使它失去人心。毫不奇怪，只能领取到越来越少生活费用的工人和职员们，怀着满腔激愤参加到反共和国的街头集会中去了，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流入到了纳粹党力量的蓄水池中。摇摇摇摇

从魏玛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的悲剧中，至少有两点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作为社会再分配内容的福利制度的顺利扩展，必须有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作为前提条件。这是因为依照投保和法定索赔标准原则运行的保险体制，作为一种经营体制，是要以投保人多而索赔者少才能维持下去的。在这里，低失业率是这种体制顺利运行的关键。这种低失业率，只有在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而且也只有在生产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更多的分配。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是有可能使福利制度的扩展与经济稳步增长同步的，正如在 ~~魏玛~~魏玛世纪末到 ~~魏玛~~魏玛世纪初的威廉帝国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失业人数从未超过 ~~魏玛~~魏玛万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失业率是在 ~~魏玛~~魏玛至 ~~魏玛~~魏玛之间滑动的。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发展线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福利制度的扩展

①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魏玛~~魏玛—~~魏玛~~魏玛》，法兰克福 ~~魏玛~~魏玛年版，第 ~~魏玛~~魏玛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魏玛~~魏玛—~~魏玛~~魏玛》，杜塞尔多夫 ~~魏玛~~魏玛年版，第 ~~魏玛~~魏玛页。

却往往是国家在社会紧张局势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这种形势又往往与经济的不景气联系在一起，整个魏玛时代正处于这样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失业人数最高达近四百万以上，失业率高达约三分之一以上。^①当失业人数猛增而投保入会费猛降的时候，也正是保险金支出的任务猛然增大的时候。它迫使国家财政唯有向福利保险制作更大的投入才能保证它的运转，即使国家采取削减个人福利保险费的办法，也仍然导致国家支出的猛然上升，而国家采取的一切平衡财政的措施又必然导致更多的失业者。这种恶性循环，充分暴露出在福利保险制扩展与经济增长同步情况下所不易察觉出来的福利制度运行结构中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当需要帮助者个人的社会困境最大的时候，也恰恰是他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帮助最小的时候，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都一再面临的、也远未得到克服的矛盾。

第二，福利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以及必然产生的社会冲突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性措施。这种补救性在于它能为国家当局提供一种“时间差”，使国家当局在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还未发展到爆炸以前，能有机会去进行经济上的调整。由于这种对生活特别困苦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福利救济金的方式，往往不是加剧了穷人的痛苦，而是减轻了穷人的痛苦，因而往往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维持现存统治稳定性的作用。当然，国家当局如何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引导经济走向本身是个未知数。更重要的是，一种福利制度的存在和运行，并非意味着它一定就能产生出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关键还要看它朝哪个方向运行，而这是能否真正提供那种“时间差”的关键。

当帝国时代福利制度被开创出来的时候，它就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绝对量的变化上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

^① 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1933年版，第182页。

面开始滑动了，因而也就使得这种滑动成为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了。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总是在不断地加剧两极分化，但生产者又总是不愿再度丧失已争取到的条件，而是要去争取更好的条件的。因此，若要让福利制度能继续取得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就只能使它朝着增加福利保险金、扩大福利保险面的方向扩展，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在不断加剧穷人的痛苦。

当然，这种方向性上的绝对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与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热衷于社会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看到了前者，但没有看到后者，更没能看到福利制度的扩展是要受经济发展条件制约的，具体的调整措施也是要受到时代特点的制约的，宪法许诺与状况现实性之间的鸿沟，甚至只有在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可能有步骤地去跨越的。而他们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却是在没能考虑到实现它所需要的物质前提的情况下拟订出来的，因而终于成为了这个“新的社会福利工程师阶级”平庸的证明。

布吕宁、巴本政府的愚蠢与反动则表现在，他们看不到不断削减福利保险费恰恰能起到激化社会矛盾的效果，即使福利保险制仍然存在并正在运行。因此，他们不惜以工人、职员那点可怜的福利金为代价去满足大资本的利益。当然，削减的幅度是与激化矛盾的程度成正比的，更不要说撤除福利保险制了。从1930年至1933年间，数百万失业者个人所拿到的各种救济金，从实际价值上讲，并不少于战前的帝国时代^①。然而，由于这种款项处于不断急剧减少的过程中，因此，它在受济者心理上造成了安全保障的完全丧失感，更不要说那些什么都没有拿到的失业者了，这就自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也就为纳粹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良机。

① 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33》，法兰克福福登版，第152页。

四、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政治组织的新集合化

在德意志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将经济上、地方上、教派上和社会上的特殊性与世界观上的信仰、政党政治上的选择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大的政治阵营是与各种不同的、打有各自特别烙印的社会道德环境相一致的。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雷勒·莱帕修斯指出：

德意志政党体系内部的稳定性要归因于这些政党选民储备的社会环境的一致性、整体性与和谐性，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造就出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方向，自身的联络方式和政治选择上的光谱，一种通过数代人后仍然继续着的共同的价值取向、观念与准则。^①

自从帝国时代以来，德意志各政党是从这些明显处于彼此分离状态的社会环境中来招募它们各自队伍的，因而也形成了政治结构上的一种传统。例如，保守主义的阵营依靠的是由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农业环境；民族自由主义的阵营依靠的是新教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绅士社会；中央党早在俾斯麦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时期，就从政治上组织起所有阶层中天主教徒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最先是依靠更古老的手工工商业地区和城市的支持的，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它逐渐获得了在天主教影响范围之外所有的工业化发达地区中工人的支持，并在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斗争中，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

俾斯麦时代的《德帝国宪法》并没有将政府的形成与议会大多数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对于维持传统权力精英们的统治是必须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71-1918》，斯图加特 1982 年版，第 104 页。

的，与此同时，那种针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所作的“帝国敌人”的划界，也巩固了根据社会环境的分界线来划分政治阵营的格式。这种社会环境的第一次瓦解倾向，在 1919 年 1 月“民族共同体”的欣快感中，意外地、但并非长久地显露出来，因为 1920 年的选举能够证明，传统社会环境对德意志政治阵营的约束力仍在继续产生作用。

但也正是从 1919 年以后，具有各自社会道德的政治诸阵营的发展，开始处于两个彼此相反倾向的交叉点上了。一方面，在工业化社会的流动灵活性影响下，过去社会环境上的牢固联系被松散化了，各阵营边缘上已开始显示出“平整化”的倾向。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尝试，即各阵营通过组织更大的群众性政党，或者说“全民党”的集合化方式，来扩大他们的追随者队伍。

另一方面，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战后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分界线。在通货膨胀的得利者与失利者之间，在分配斗争中的各社会集团之间，在青年一代与更老一代人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男性与女性就业者之间，在职员与工人之间，在工人内部的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以及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新的社会—政治的“碎片化倾向”，沿着彼此交叉的紧张线在发展着。因此，各政治阵营过去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由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差异化，作为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和动员化的结果，开始逐渐地被打碎。更多的丧失环境者、无环境依托者开始涌现出来，但他们又是可以作为或大或小的、各种不同的“新环境”的代表者来出现的。^①

这种不完全的排列与串连却能够清楚地描绘出横穿于所有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扭曲的线条。此外，由于战争、革命和通货膨胀，已出现了传统社会道德约束力的普遍弱化，社会的不安全性、生活的无保障性都在刑事犯罪案件数量的不继上升中惊人地显示出来。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魏玛共和国时代这样的群众性刑事

① 埃尔哈德·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 1925 年版，第 123 页。

犯罪现象。德意志市民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已陷入瓦解之中，整个民族的传统道德已被一种合乎时代特点的投机商心态所取代，因而也给老的社会环境的破裂带来了新的冲击力。

在魏玛元年以前，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队伍曾经表达了一种以固定的社会环境为召集方向的政治阵营的样板。在倍倍尔的领导之下，这个工人社会被消极地纳入到威廉时代的世界中。然而共和国时代并不能够给它带来同样规模的积极聚合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工人环境的统一性终于瓦解了。自从魏玛四年以来，特别由于那种内战式的碰撞经历，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了痛苦的分裂，形成了共产主义者阵营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阵营之间不可调解的对立。尽管从魏玛原年至魏玛四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在全体选民的犹豫到犹豫之间，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在犹豫至犹豫之间，而且在魏玛五年，两个工人政党总计起来无论怎样都有犹豫的选票，但是，政治上的对立阻碍着两党之间的任何合作。^①

这种政治对立的背后，本身就存在着两个政党成员群众之间社会上的矛盾。比较起社会民主党来，共产党的成员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在他们当中，尤其能找到更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同样有效于它的领导层。而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占优势的是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他们在一种“向上爬”的意识中，为自己、更多是在为自己子女社会地位的改善而奋斗，同时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在发展着。相反，城市中非熟练的年轻工人在生活前途的失望中，是向共产主义左派革命的政治文化方向发展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前，共产党已发展成一个由失业的非熟练工人组成的群众性政党。

两个工人政党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其成员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生涯上的不同前途。那种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向“人民社会主义”和“文化社会主义”的“修正”，总是能在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队伍中找到听众的。而与此同时，共产党宣传的是生活的困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魏玛年版，第页。

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上的无能性、改良主义的虚幻性以及进行一场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从对魏玛国家的稳定性来讲，这种工人运动的分裂，不仅削弱了这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的政治分量，而且也耗去了整个工人运动进行议会竞选斗争组织上的潜能。特别是在 1929 年以后的大危机期间，共产党由于要与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因而是将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来斗争的，这就在日益增长的纳粹主义危险面前，造成了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困难，从而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一种无行动能力的境地之中。而这种局面，从根本上来讲，又要归因于德帝国崩溃时的那场革命中，多数社会民主党勾结国防军镇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斯巴达克派”的痛苦经历。

政治上奉行天主教主义的中央党，是到魏玛共和国时代才变成负载国家的力量，这支少数派的力量被引向了一种政治中间派的位置上，而且也在政党政治各种力量的消长中成为了任何一种联合政府都无法缺少的力量。

这种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的社会环境，其真正基础是教区全体教徒共同的宗教生活与协会组织制度。在反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这种共同的宗教生活的功能，将各个不同阶层中的天主教徒，从乡民、工人到资产阶级绅士捆绑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但在战争、革命和战后的混乱中，一场得到加速的世俗化进程，在不断削弱着这种环境上的联系。天主教的各种协会本身是根据特别等级和阶层的标准来组织的，例如，有它独特的天主教工会运动。但是，由于存在对成员教派上的严格限制，因此，这些协会组织尽管能够表达天主教主义的一种群众基础，但要想承担起政党的领导还是太弱了。

由于天主教在传统的宗教道德上有着比新教更强的约束力，也由于它的神职人员的权威在世俗生活中打下的烙印得到了更长的维持，因此，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对纳粹党的选民招徕是有较高的免疫力的。例如，在 1925 年它获得了 13.4% 的选票，而在 1928 年

也仍获得了 1918 年的选票。应该说，在所有的传统政治阵营中，这种结果表明了它有惊人的稳定性。但是，它的选民的缓慢丧失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区域里，只有 1918 年的天主教徒（其中 1918 年是妇女）投票支持天主教中央党。^①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是靠从传统的市民社会中来召集它的选民队伍的。但这个处于大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大地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其社会环境不仅从职业上讲，而且从地方、宗教属性上讲，都是分离化的。一般来说，在 1914 年以前，相对于产业工人，至少在新教领域里，这个中间层中的以独立经营者为特征的“老中间等级”，是将自己作为这个特权社会的基础来感受的；而“新中间等级”中的中、小官员是将自己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来感受的，教师们是将自己作为“精神贵族”来感受的，就连职员们的特别利益在帝国时代也受到了当局的照顾。但 1918 年至 1933 年间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魏玛共和国新的政治格局，使他们受到了最强烈的震动。国家对战争经济的干预以及通货膨胀政策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饱受苦难。除了收入上的损失外，他们还丧失了一种在帝国时代曾拥有过的相对特权地位。对他们来说，共和国政治机构的暗淡无光，是与大工业—自由工会的“合作主义”，以及那种使他们感到沉闷的优势联系在一起。这种“合作主义”的两极分化，在 1918 年的合作阶段结束之后，笼罩了所有社会政治上的事件，却没有人再来关心社会中间层的真实利益了。

这个自由主义阵营选民潜力的削弱，能最好地说明这个社会中间阶层的“碎片化”局势，因为在社会中间层成员大量走进纳粹主义运动以前，正是这种“中间等级的恐慌”才首先松动了这个由资产阶级绅士们本来就不太巩固地联系起来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网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两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5 页。

党——德意志民主党与德意志人民党，其选民一直是依靠新教区域的城市中间等级的绅士社会和职员社会的。这两个政党在 1919 年总共获得 10% 的选票，但在 1920 年只能得到 1% 的选票了，在大危机年代里更是下降到 0.5% 至 0.3%。^① 早在纳粹党崛起以前，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因为选民的大量外流而越来越小，而纳粹党也正是靠吸收这些“政治上失去了家乡”的资产阶级选民中的相当多的人，才真正开始壮大起来的。

因此，德意志传统政党体系中的每一个阵营都出现了“碎片化”的局势，但是，对“碎片化”的危机感，又迫使那些传统的政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与从这些传统政治集团中分离出来的新政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一样，都以更大的努力来维系本集团内部的团结。因此，新的“碎片化”从根本上来讲，还不能改变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不能改变那种地方主义、宗教分裂，城乡文化上的彼此分离，军队的“国中之国”，以及大学特有的“相对自由”，家庭传统观念与社会灵活性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已更为分裂化的诸社会力量之间的彼此争夺变得更为激烈了。保存或是壮大自身阵营的要求，恰恰迫使着新、老集团纷纷寻求通过新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战胜竞争对手。

与社会环境“碎片化”同步的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是以如下这些表现形式来体现它的新颖之处的：行军式的行列队伍，大型集会的策划和导演，体育上的大型活动，舞台上的群众喧闹。所有这些政治与社会文化上的组织技术导向以及构思原则，都包括了对个体因素的统一标准化，对参加者服饰划一化。这种形式上的秩序化要求，出自于一种要打动人心、对群众进行大规模装饰的期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上的功能作用与系列化，恰恰是与对群众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集合联系在一起。

在政治运动的领域里，恰恰是纳粹党，这个最为极端的右翼政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5 年版，第 103 页。

党，最早开始将这种对群众的装饰化和形式化变成了他们的识别符号。在它身上产生出来的无可怀疑的“魅力”，不仅迅速地感染了其他政治潮流，而且也开创了现代政治集合化的新方法。

帝国时代公共社会中政治与非政治的召集形式，是从协会生活的社会基本模式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基本模式又是与协会对个体成员集团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更大的公共社会仅仅只能通过传统的印刷媒介物或是尽可能多的集会才能形成。但是，这种集会的范围和规模是要由演说者音量的有效距离来确定的。因此，那个时代的群众性大型集会，本身又需要更多的演说者来轮流登场，需要群众性的游行才能达到集团化的目标，而且也只能偶尔通过音乐、广告画和齐声朗诵，才能使其生动活泼。

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不仅对群众的政治动员意愿提高了，以至于公共的表达形式需要更大规模的组织形态，而且公共形式化的技术手段也得到了发展。追随者能坐着载重汽车奔驰而来，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扩大着广告和传单的印数，电话网为组织的中央提供着一种广泛有效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联络，扩音技术的进步使演说者的声音以更大的音量传达到过去根本无法听清的后排群众那里，同时也使他们无需像过去那样，唯有通过定音鼓和小号的不时提醒，才能专注于台上的演说者了。因此，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数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的集会，现在都已成为了可能。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为群众动员作出了贡献。自从有声电影在 1929 年引入以来，自从收音机克服耳机传播阶段，无线电技术能通过一个发射台将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以来，在批量生产和群众消费的促进下，庞大的听众集团已能够围绕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物轻而易举地聚集起来了。

由于老自由主义和老独裁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的危机，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群众性动员，这种对新的大规模政治方向表达上的需求，遇到了这个社会文化和技术上可能的时代。而共和国的敌人——纳粹党，早已看到了利用这些大众传播媒介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以及使用这些现代组织技术来精心设计自己新的

政治风格的可能性。^① 因此，正是它首先使政治阵营变成了生活方式，使行列式的队伍变成了运动形式，使运动中的群众开始成为了装饰上的图案。这种政治潮流的划一化和军事化，也就首先从激进的右翼边缘中繁殖起来，而且在大危机到来之前，已经变成了它在政治文化表现上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同时，这种政治文化的传递也开始了。在彼此对抗的阵营之间，出于保存、发展各自阵营的需要，出现了一种尽管政治纲领敌对、但在组织技术形式上却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的现象。当然，人们还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新的政治集合形式，仅仅只表达了德意志公共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一个以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为代表的更为彻底的统治时代还并未到来，而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权力精英们在帝国时代所贯彻过的那种仍给予各种社会集团以某种相对自由权利的权威独裁统治的。

五、“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时代里，消费的吸引力与愤怒的批评撞击在一起。一种对“美国主义”的控诉，反映出这种新的、现代化生活世界的经历本身就是矛盾、不安、令人愤慨的，同时也说明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现代主义强烈的挑战。

1933 年，当时最为著名的德国教育学家京特·德恩在他谈论大城市无产者青年的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们想问青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仅仅只会回答：更多地享受生活。“挣钱”和“娱乐”已成为了他们生活存在的两个支点。因此，在高贵和低贱两种不同的娱乐中，人们能够发现原始的性欲，爵士音乐，新无产者化的、艺术上无可争议的居住文化，以及保养身体的卫生学理性。无论

^① 戈尔德·奥·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 1933 年版，第 100 页。

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青年人都有这样的打算，用结实、强健的骨骼站在这个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地球上，寻求从这个世界中，也仅仅从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捞取那些能够捞取到的东西。这个民族从思想上讲已经有意识地，也自然肤浅地、真正地“美国化”了。当人们与他们发生接触的时候，就会想到：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成为了所有事物的最后目标。^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义”的观念已涉及对生活环境理性化的一种评价，而这种理性化是要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因此，理性化的欣快感与对工业文明的批评，构成了德意志社会对现代化生活进行紧张争论的两极。那么，“美国主义”是如何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经历的呢？同时代人的文化批评又是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表达的呢？这些表达又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背景呢？

自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尤其是自从 1918 年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取得稳定化以来，“美国主义”的神话虚构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无保留的、不受束缚的现代性的象征和代号了。美国那种“闪闪发光的海外胜利者”形象，那种“充满无限可能性国度”的比喻，那种世界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那种在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与种种神奇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些观点中，赞扬的是不受阻碍的理性、无传统负担的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的群众文化、崭新的传媒世界和约定俗成的生活风格。美国的爵士音乐似乎在宣告与人们所熟悉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决裂，美国观赏性的拳击运动在大规模的公众面前公开展示着竞争的残忍，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宣传着具有模式化的生活风格和审美观，而《亨利·福特自传》的德文译本在许诺着一条通过“合理化”来阻止阶级斗争的出路。仿佛美国意味着无

① 京特·德恩：《无产者的青年》，柏林 1963 年版，第 103 页。

无忧无虑的进步，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共同的、也是无负担的未来。

赞扬“美国主义”的德国社会评论家鲁道夫·凯泽尔于1936年这样概括：“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方式，是一种具体化的和有潜力的方式，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①

但是，与这种对“美国主义”的赞扬相反，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文学者们是持相反观点的。文学评论家赫尔伯特·伊尔林讲道：

大众们在屈服于美国口味，而且这种口味正在变得一致化和标准化起来……事实上，美国电影是一种新的世界军国主义，它在向前推进，它比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更加危险，它吞下的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还有整个民族的个性。^②

在有关“美国主义”的完全对立的种种观点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反动对抗进步、传统反对现代性的问题，这些战线上的斗争也始终是存在的，而且在危机的局势下也总是能够得到深化的，因而也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但是在这里，还有人们在这种不受限制的工业化社会中对人性未来的担忧。

事实上，谁寻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谁就不想用自身文化上的传统为代价，去换取一种美国式的彻头彻尾的理性化未来。今天看来，这种对人性的担忧中，本身也有着对现代化新事物所产生出的负面效应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向。精英人物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合理化运动”和现代工厂劳动纪律的抵制，受市民资产阶级剥夺的农民带着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理想进行的反

① 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黑1936年版，第290页。

②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36年版，第155页。

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化运动，所有这些，并非只是在代表一种残余的怀旧心理，它们同时也反映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为克服现代化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出的努力。因此，当人们要去评价魏玛共和国时代这场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时，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它的原因与背景。

对人性未来的担忧，仅从对工业都市化“社会问题”的争论上就能体现出来。当“大柏林市”在 1925 年以 140 万的人口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都市时，德意志人口的 25% 已成为了城市居民，总人口的几乎一半也已生活在大城市里了。因此，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受是由都市化发起的挑战所决定的。都市化、大都会化是靠着对乡间邻里关系和传统道德联系的摆脱来发展的，它中介着大城市的匿名性，都市化的多重功能，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但与此同时，以大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对大城市的种种批评本身也在增长，它们控诉着城市在征服乡村土地的过程中，对传统生存条件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的稳定性和可靠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控诉着城市中个体的无根性和孤独化，丧失个性化和异化，社会冷漠以及大量的生活公式化；控诉着它把“人性”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将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

“美国主义”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的理性化，首先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新教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批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受到了现代主义面貌的吸引，而且在表达形式上讲也是属于先锋派阵营的。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的那首《死位知识分子对一个油箱的崇拜》的讽刺诗中，控诉了在技术实用性要求冲击下人的本性、个性、文化和感情的丧失：

把我们塑造成集体的，这就从我们中毁灭了自我！因为不是像我们想要的那样塑造，而是像你想塑造的那样塑造。在你的面前，什么感情都没有了。我们听到的是，将我们从精神的

罪恶中拯救出来，以电子化的名义，以理性和统计的名义！^①

自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这种对现代化的批评一直就是德意志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潮流。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也是批评式地接受现代主义矛盾的现实的未来的。它力图将现代主义与传统联系起来，防止现代化的过速发展，自然也是希望能缓慢地削弱自身与宗教传统的联系的。它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早就看到了西方国家理性主义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阴暗面，他这样写道：

对于那些“最后的人们”来说，这种文化发展使这句话变成了真理：“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受者。”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已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它使“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在对非个性力量的塑造中，他们的掘墓人走了出来，努力寻找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并再度开始了他们彼此间永恒的战斗。这个“失去了魅力的世界”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因此，必须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②

这种对现代化展开的进步主义的文化批评，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落后性和对传统的特别依恋，而是由一种有意识的对现代发展倾向的理解导致的。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因为这场现代化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摆脱了威廉时代的传统装饰物，才使得这种进步主义的对现代化的文化批评在德国成为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可忽视这一点：种种对现代化的批评，既是针对现代性的，又往往是使用了传统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暗喻的，这就使得人们很少去、也很难去将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55 页。

② 马克斯·韦伯：《科学原理论文集》，蒂宾根 1924 年版，第 155 页。

这种来自进步立场的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文化批评，与那种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例如，在“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斗争中，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本恩发出了几乎与进步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同样的声音：

自1915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那种所谓的乐观主义，那种拉生意时保持的微笑，那种挂在牙齿上的冷笑，都是与西方国家的人们以及它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①

但是，纳粹主义蛊惑人心的倾向，又是最能够将不相同的种种时代潮流联结成一种愤慨的融合的，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感到在德意志仿佛存在着一条笔直、单一的从尼采到希特勒的“毁灭理性”、“敌视进步”的反现代化批评路线。而事实上，纳粹主义者在“为了德意志民族利益”名义掩盖下的野蛮的所作所为，与尼采、韦伯、托马斯·曼等人所持有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观点和态度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对现代化经历发出的种种苦涩、严肃的诊断，本身也反映出德意志学者阶层，特别是它的人文学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有必要回顾德意志学者阶层的发展史。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

德意志学者阶层（~~用德意志语说~~，即“受过教育的市

^① 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1952年版，第276页。

民”)自从它作为一个真实的阶层存在以来,就具有它自己的道德和风格,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估价和生活引导,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了。他们大多数都比占有财产的市民(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要穷得多,但他们是以这个阶层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而自豪的,就仿佛他们是能够被看作与那些有钱人一样属于同一类的。“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与“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这两个类似的德文组合名词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① 摇摇摇

这种精神上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唯心主义哲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上的成就,通过教育在社会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在国家管理、大学、教会中所赋予的那些被大众所公认的有威望的职业,通过作为整个市民阶级(即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与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先锋派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来获得的。早在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他们就曾有过三分之二的代表。

随着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年革命以及在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的败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在威廉时代,尽管他们在大学中仍保持着一种相对的思想自由,但他们已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了,这场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德国工业化和内政发展的结果。

工业化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大变动,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学者阶层与占有财产的市民之间的一场分裂。占有财产的市民一部分分裂出来,并作为工业界的大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部分手工业和工商业中的中间等级成员沉沦到产业工人这个新阶级中去了,而且整个学者阶层在政治上发挥影响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在整个帝国时代中,老的容克阶级的权力继续扩大着,而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连同由学者们在其中定调子的那种绅士

①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年版,第月藻郾洋魏書彼手魏魏皂页。

政党，都已陷于瓦解之中。社会民主党作为新型的群众政党，已经替代了过去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政党的角色。这自然是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所不能适应的。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那些将自己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教育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学者们，必须忍受他们在社会功能和威望上所受到的损害。随着不断进步的高工业化，对技术型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专家的社会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技术—自然科学上的职业，甚至连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上的职业，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不断赢得了更高的威望，而基础理论科学与人文科学则相反，正在越来越多地忍受着“时代贬值”之苦。^①与此同时，另一种靠工资为生的、同样也能坐在椅子上从事书写的脑力劳动者的职员队伍，作为“新中间等级”已经形成，并早就在吸引着那些大学毕业生了。因此，这个学者阶层已明显地看到自己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之中。

这种不适应性在知识界文化倾向不同的派别中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即知识界中的现代主义者们，他们的文化反映受着一种冲动的驱使，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重新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甚至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克服异化。”这条路线是由马克斯·韦伯等人代表的。

但是，这条路线又是极容易被另一条文化批评路线所掩盖和淹没的，因为这种不适应性本身也能够培养起一种因每一场危机而变得更加激烈的反现代主义愤慨，尤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那种自由而激动的知识界气氛中，能够强化一种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悲观论”近乎歇斯底里的发展。而这种愤慨和“文化悲观论”，尽管曾经在威廉帝国中和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得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见《魏玛—魏玛》，杜塞尔多夫 1968 年版，第 104 页。

到过短暂的抵消，但却在大战失败的经历中，在“凡尔赛综合症”所引起的民族屈辱的情绪中，在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社会生存基础的崩溃中翻了倍。

这场通货膨胀威胁到了整个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社会存在，它剥夺了他们在帝国时代还能享受的养老金、相对的安全感、独立性和闲情逸致，并将这个阶层赶入到对一个职位的谋求或对他们的作品出售的事关生存的依赖之中。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尔哈德·许茨如此痛心疾首地写道：

战前那种“狂放不羁的文化艺人”已被紧密依赖市场的记者们所取代了。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医生、作家、记者、演员们中，干第二职业几乎成为了规律。人们在不停地追求着每一种赚钱的可能性。大学教授的那种闲情逸致，作为每一种精神活动和思想形象的培养基，再也不存在了。那种能得到老龄生活保障的感觉，一种类似于对付神经病人镇静剂之类的东西，已经消失。这是一种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为生计所迫的情绪压抑着学者们的创造性，那种纯粹为精神服务的思想丧失了。^①

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凯塞尔为穷困所迫走上盗窃之路，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一事件成为了魏玛时代整个学者阶层经济贫困化令人痛心的里程碑。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加速了这个学者阶层的最终没落。作为一个教育的等级，教授们已经不再拥有以前的团结一致了，因为在应付社会变化方面，技术—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总是显得比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着更大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然而，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它的整个队伍都在发生真正的萎缩，因为所有专业的、连同实

^① 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 1962年版，第 153页。

用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职业谋求上发生了困难，从而也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威望丧失的苦恼。“因此，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①。

尽管有着这种社会地位上的降格和孤苦，但是学者们，尤其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文学者们，仍然坚持着自己是这个民族“思想精英”的意识，而且也是比任何人都更为坚决地拒绝对早已发生的社会变化采取适应态度的。这种“学者的清高”——没有这种清高，他就不是学者——阻止着他们与工业界的联系，例如，在“有钱人”那里谋求一个商务顾问的头衔。因此，工业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尽管动摇了学者们的优越意识，但也恰恰因此而使这种“学者的清高”硬化成一种顽固的拒绝态度，这种态度自然要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共和国时代中工人阶级政治分量的加强，也使学者阶层在一种受威胁感中激起了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绪。就这方面而言，由于工业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也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政治分量的提高是以学者阶层地位和威望的下降为代价的，因此，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成为了反资本主义、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最为具体的文化表达形式，在这方面打头阵的也自然是德意志人文学者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这个集团反现代主义的矛头是首先针对工业化以及它的后果的，在“金色的二十年代”，它也同样以“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批评形式表达了出来。它不仅掩盖和淹没了知识界左翼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进步光芒，而且也利用了知识界左翼提供的证明，壮大了“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运动的声威。

魏玛时代现实困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整个学者阶层困境的一致性，使得人们从文化观点上，已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文

^①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灵鹫出版社，第144页。

化批评运动了。从政治上讲，这种压力与一致性，也为无论是左翼进步的文化批评运动，还是右翼保守的文化批评运动，都赢得了一种不与共和国相认同的特点。自从马克斯·韦伯在 1918 年去世以后，这个时代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只是因为他们既抛弃了旧帝国，又对共和国悲观失望，而且也并不相信未来会出现什么奇迹和希望，才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左翼”的。无论是文化中的表现主义者，还是新客观主义者，这些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揭露社会阴暗面，而不是以改造这个社会为目标的，因而也自称是一批“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的人”。左翼文学家埃里希·克斯特勒在 1934 年这样写道：

我们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都已经停止了，我们想改变，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血液已经被毒化了，我们打算在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都覆盖一层膏药，但是，你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已被毒化的血液吗？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带着从头到脚的膏药一起崩溃！^①

也正是由于他们普遍地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可挽救，因此，他们既没有去帮助共和国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去帮助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下的任何作品，却同样能为纳粹运动所利用。

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则是一批不仅抛弃了旧帝国和共和国，而且将未来的理想投影到过了时的“前现代化”社会形式中去的人。具有特点的是，他们都呼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因为他们都认为，社会变化的极端性，只有用更极端的彻底解决方案才能对付得了。因此，他们与左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还怀有一场反革命的梦想，并不停地宣传：“这场革命将粉碎所有的制度，改变所有的价值观，导致一个具有无与伦比

^① 戈尔登·奥·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黑 1933 年版，第 192 页。

之力量和思想统一的新帝国的出现！”^①

这场被他们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是停留在“沙龙”、“俱乐部”的坐而论道和著书立说上的。这些言论与作品尽管运用了极高的伦理腔调，却迅速滑入了反理性主义的轨道。他们所信奉的那条传统主义路线，例如，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对民主共和国的仇恨，《沥青文学》的喧嚣，对“新帝国共同体”的幻想，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德意志的世界使命意识”，“专制独裁的社会改造”等，从思想纲领上讲都对准了“前现代化”样板，但从意识形态上讲却又与纳粹主义的文化政治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讲，这些人大多又是极为轻视“不学无术、没有教养、野蛮的”纳粹主义者和希特勒的，也不去参加纳粹党及其运动，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大多成为了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迫害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的作品对青年人的影响，使得他们实际上为纳粹夺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保守主义阵营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唯心主义哲学家阿尔图尔·摩尔勒·范·登·布鲁克、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还有那位由保守向激进作急转弯的青年文学家恩斯特·容格尔。这些“文化悲观论者”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没有灵魂的、丑恶的纯商业资本主义”，都相信“这个由民主、自由虚弱无力的哲学所统治的社会正在败落并最终要灭亡”，并号召“造就一个英雄民族，把德国从这种迫在眉睫的局势中拯救出来”。布鲁克这样写道：

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性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用自由的名义造就了无拘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815-1918》，慕尼黑黑 1969 年版，第 192 页。

无束和道德败坏，以进步的名义培养了守财奴和奢侈浪费。它伪造着生活的本质，阻碍了本能的发展，抑制了人们为应付苛刻的现实所不得不具备的能力，用慢慢破坏民族道德结构、剥夺民族对权力的热情和愿望的方法来促使民族崩溃。这种证据已经能够在西欧和南欧的国家里找到了，这些国家已经呈现出退化的征兆，德国将会屈服于同样的疾病，除非它在青年人的胸膛里能重新鼓舞起抵抗的意志，除非这个民族能重新返回到古老、单纯、质朴、荣誉和勇气的普鲁士品质上来。^①

布鲁克也是一位最有影响的“背后捅刀子理论”的宣传家，早在 1915 年就通过他那部轰动性的著作《第三帝国》，预报过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尽管他所设计的那个“新帝国”，实际上仍然只是贯彻“前现代化”传统专制的一种翻版。

斯本格勒是通过他于 1918 年出版的那部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全面批判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而名声大噪的，这部著作也一直成为在世界上引起最激烈争论、引起最多误解的历史理论著作。在这部充满“文化悲观主义”气味的著作中，他认为“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仅仅证明了胜利者也真正的失败了，因为所有西方文化成员国家都同时衰败了”。但是，在认识了布鲁克后，他发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怀疑，“在经历了这个普遍衰败的时代之后，难道德国就不再能以一个生机勃勃新大国的面貌重新出现了吗？”因此，在布鲁克的引荐下，他加入了反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知识界的“六月俱乐部”。在 1919 年由该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对青年听众的演说中，他这样讲道：

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非洲的阴影正笼罩着欧洲，

^① 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普林斯顿 1957 年版，第 153 页。

在我们的价值观就要开始实现的时候，青年们，抛开文化和种族上的包袱吧！这些包袱会压垮你们，使你们无法开始你们必须开始的航程。在前面艰难的岁月中，强有力的人物将会出现。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能依靠的人，他们需要连俾斯麦都没有能找到的一代新人！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也是必须的！这个命运已经确定了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青年们，勇敢地服从于你们的责任吧！^①

尽管这个“新大国”准确的纲领究竟是什么，连斯本格勒本人也模糊不清，但他的崇拜者，青年文学家恩斯特·容格尔则迅速将这种右翼保守的“文化悲观论”推向了激进的“新战争文学”。这位“新战争文学”的先锋，极力煽动反理智论并宣扬战争暴力论。在他的作品中，强调的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是冲突的“英雄场面”，以及杀气腾腾的帝国主义战争思想，因而也使他成为了“保守主义阵营中向纳粹主义方向作最激进转变的反叛者”。在他那本《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的名著中这样写道：

战争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经历，战争是必须的，因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唯有在战争中，在战壕中，战斗并战死，人们才能找到返回他们生命本质和源泉的方式！这是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进行的，也是这样准备的！因此，考虑后的行动只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征兆，内脏是比心灵更为健全的指导者，热情、汗水和鲜血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战争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预示新权力的力量，它是将世界捶进一个新境界和新共同体的铁钻，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将用鲜血注满！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新人将在我们中间产生！凡是没有在弗兰德斯战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慕尼黑~~，慕尼黑 ~~瓦登堡~~ 年版，第 ~~四四七~~ 页。

斗过的人们，你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①

后来加入纳粹党的许多青年人，在他们的“美国主义”梦幻破灭之后，都是首先通过这部小说，才激起了“渴望战斗的情绪”的。

对此，著名的进步主义文学评论家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对于我们德意志人来说，要想从命运和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源泉，可真是太容易了。而命运又总是在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和幻灭的人们逃避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而辩解，也总在他们引以为荣，这不能不是悲剧！^②

当那场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结束了“美国主义”的神话，同时也是第二次动摇了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生活安全的时候，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评，已经能够用更高的伦理腔调来反对“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主义了。在一种向“前工业化”田园诗景致的全面退却中，这批“文化悲观论者”的所有作品都在企图从历史神话的复兴中，找到一条摆脱 19 世纪思想—文化危机的出路，因而也将“健康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与现代化大城市的“无灵魂性”对立起来，将德意志乡村的“传统美德”与大城市的“罪恶深渊”对立起来，至于纳粹主义者，已经喊出了“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实现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的口号。由此可见，纳粹主义本身是能够从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伦理说教中获得足够多的营养的，是能够从愠怒的小资产者对已丧失的特权的依恋中获利的，也是更能从战后一系列危

①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848—1918》，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4 页。

② 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普林斯顿 1957 年版，第 104 页。

机中不断培植起来的价值丧失感和方向迷失中获得市场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他沉重的语言对 1914 年代的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在我看来，对于人类这个种属来说，决定命运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或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成功地克服侵略和自杀的驱动力对人们的生活以及融洽相处所造成的干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在现今的时代里，理应得到一种特别的关注。人类现在对自然力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已能凭借这种对自然力的控制，轻而易举地灭绝到最后一个人了。人类现在已经相当多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担忧了。现在人们所能够盼望的是，两位天神（死神与爱神）中的一位，那位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作出一种努力，以便在与他那位同样也是不死的对手的斗争中伸张自己。但是，谁能预测到斗争的结果和结局呢？^①

第四节 摇虚假的稳定

一、斯特莱泽曼的对外政策

在经历了 1918~1919 年内政和外交上的低潮后，关于德意志行动余地的幻想再也没有地盘了。由于结束了“消极抵抗政策”，并奉行那种被不少同时代的德意志人称之为“外政上的投降”政策，才为共和国迎来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的新开端。

作为 1918 年至 1920 年的外交部长，斯特莱泽曼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政策，即用和平手段修改《凡尔赛条约》，努力减轻、扫除战争失败带来的后果，为德国重新回到大国行列创造前提条件，它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4 页。

的中心目标就是“德国的自由与德国的大国地位”^①。这一政策对德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改变，其速度比任何人在 1919 年所曾预料的都要快。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就有效扫除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大量限制。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大国政治秩序中也似乎愿意承担一种新的、合作者的角色了，以至于人们将“相对稳定时期”也称之为“斯特莱泽曼时代”。但是，人们同时也不应忘记，沉重的内政、外交上的负担依然存在，它们能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恶化的内、外框架条件下导致一种对外方针上的致命性变化。

斯特莱泽曼是在四个方面展开他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而且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也每每打了大量保留性的折扣。

其一，斯特莱泽曼开始奉行新的“履行条约的政策”，并将对条约义务的履行与有步骤的修正联系起来。自从《道威斯计划》实施和新货币取得稳定以来，关于德国的赔款作出了新的规定，德国每年只需缴纳 1.5 亿 ~ 2 亿马克的赔款，但同时美国的资本开始涌入这个国家。从短期来看，这满足了德国外汇上的需求，并开始了赔款上的循环。从中期来看，这形成了一种美国贷款——德国赔款——法国向美国还款——新一轮美国贷款的恶性循环。1932 年底，这场热闹的财政循环的崩溃，终于使参与国陷入了一场危机和灾难之中。

1923 ~ 1924 年的《杨格计划》是在《道威斯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的，它规定德国要在 1925 年最后偿清它的赔款债务，但每年所缴纳的比率比《道威斯计划》规定的还要低，同时盟国对德国财政上的监控也宣布取消。然而事实上，《杨格计划》几乎没有实施，因为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胡佛的《缓债令》允许德国延期一年缴纳赔款。而且在 1933 年夏天的“洛桑会议”

^① 沃尔夫·冈·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919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5 页。

上，在德国的强烈要求下，盟国最后一笔勾销了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承担的所有赔款义务。

在赔款问题上，总的来讲，它给德意志战后经济造成的实际负担，要比人们所担心的少得多。从 1919 年到 1920 年德国大约交出了共 100 亿马克的赔款，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出现了一场外国在德国的投资其总额高达 100 亿马克的贬值。根据《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规定，德国每年实际缴纳的赔款在 1 亿至 10 亿马克之间，因此，从 1920 年至 1924 年间，其总数实为 100 亿马克，同时有价值大约为 100 亿马克的外国资本流入德国，仅美国人就因为经济大危机到来而在德国损失了其中的 10 亿马克。^① 因此，赔款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其关键不在于给德意志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具体损失，而在于赔款规定的庞大数目和缴纳方式，先是苛刻，后是遥遥无期，给德意志人带来了心理上沉重的压迫感，因而也为德国国内右翼激进主义力量的煽动提供了一个价廉物美的口号：“从前线的一代直到他们的第三代！”同时，那种贷款——赔款——还款——再贷款之间的恶性循环本身也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年代中的“洛桑会议”开得太晚了。

其二，斯特莱泽曼的“谅解政策”为德国经济恢复带来了机会，德国也再度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在决定性的领域中，它的经济发展仍低于战前水平。从 1919 年至 1923 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15%，但仍低于 1913 年 16% 的水平，并大大落后于美国的 23%。在世界出口份额上，德国下降到世界第三位，由 1913 年的 16% 下降到 1923 年的 12%，而美国为 23%，英国为 15%。出口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 1913

^① 迪特玛·佩茨依那、维尔勒尔·阿倍尔斯豪舍尔、安森·福斯特：《德意志帝国统计资料，1919-1923》，慕尼黑 1928 年版，第 100 页。

年的图景下降到1933年的图景。^①此外，德国还面临了一个不断提高入超和外债的问题，因而也提高了德国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出现特别的问题。德国经济潜力的缓慢恢复本身是有助于提高它在世界政治上的分量的，以“谅解”为方向的新的对外政策，也使它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在世界市场上似乎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接纳，而且在世界经济增长和美国贷款的基础上，这种国际上的谅解政策与世界市场的自由主义化也似乎在同步运行。但是，当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崩溃时，1929年以前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案也必然会变成负担。这是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每个民族都是尽可能地拯救自身而不顾别人的，而且在世界市场的开放经历了失败之后，各工业化国家都必然逃进民族和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之中。因此，1929年实际上并没有真实地向德国提供经济开放方面真正有前途的选择，它面临的仅仅是这个灾难性的现实：在经历了一战前的民族自我供求关系的年代之后，在一战后的这场世界经济重建未能真正完成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获得成熟、适当的时机，它的第一次向世界开放的尝试，仅仅在持续了六年之后，便在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矛盾中失败了，从而也使“金色的二十年代”的“相对稳定”陷入崩溃之中。

其三，斯特莱泽曼力图向德意志公众提供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修改现状上的成就，其目标是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民族大国地位。因此，他特别发展了一种对西方的谅解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争取获得法国的谅解。因为在斯特莱泽曼看来：

德国能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善意支持越多，就越会造成法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为了不使法国被推进孤立并对德国的西方谅解政策进行破坏，就必须承认并满足法国的安全利益。我们

^① 迪特玛·佩茨依那：《两场大战之间时代中的德意志经济》，威斯巴登1966年版，第233页。

只能在建立一种通过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安全体系的对策中，有步骤地扫除《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限制，而这是唯有在一种紧密的欧洲合作和德法平衡中才可能提供机会的。^①

在这条道路上，斯特莱泽曼与西欧各国达成了 1923 年 1 月的《洛加诺公约》，规定了由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来共同担保 1919 年的西部边界。1924 年德国被接纳进国联。在取得了这些公认的外交成就后，斯特莱泽曼将对莱茵兰的快速收复作为他的下一个任务，为此，他与法国外长白里安举行非正式会谈，谋求一揽子解决所有现存问题的方案。但是，法国方面提出德国应该提前缴清赔款，来免除法国和比利时在财政上的困难，以换取萨尔、欧本等地区回归德国，以及从莱茵兰撤军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没有唤起美国资本提供者的热情，而德国又是必须依赖美国所提供的贷款来保证赔款的缴纳的。

遭受了这场整体修改上的挫折后，斯特莱泽曼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成功，如在 1925 年，使盟国结束了对德国的军事监控；通过《德法贸易协定》使两国经济关系自由化，并在 1925 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酝酿的和平气氛中，于 1925 年 1 月与西方达成了立即从莱茵兰撤兵的决定；同时通过《杨格计划》达成了关于赔款的新规定，甚至德国与法国一起支持的一个“欧洲联合”的倡议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至此，人们可以说斯特莱泽曼的西方谅解方案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此时还不能断定，德国在恢复了它的行动自由后，是会去重新推行一项传统的大国政策呢，还是会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推行承认现状的政策。然而，由于斯特莱泽曼本人于 1929 年 1 月 3 日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各工业化国家民族经济主义的回潮，这种对西方的谅解政策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崩溃了，而 1933 年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919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23 年版，第 123 页。

转向。

其四，对斯特莱泽曼来说，修改德意志东部边界是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不可抛弃的目标”，因为在德意志公众那里，与波兰的划界是首先被异口同声地称之为“不公正的民族耻辱”的。在这种划界中，东普鲁士因“波兰走廊”而与其余的领土区域分隔开来，从而导致了约 140 万德意志人必须生活在波兰的主权之下。事实上，德意志在波兰的少数民族问题提出了一个广泛得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大约 140 万德意志人此时生活在国家边界以外的东欧、东南欧和中欧国家中，这还不包括那个现在已完全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拥有主权的奥地利的人口，它与德国的合并要求在 1918 年就遭到了西方盟国的拒绝与阻挠。

德意志东方政策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反映了一种广泛紧张的、也是难以解决的局势，它关系到这些空间上的政治新秩序问题。数百年来，在这些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居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同民族解不开地重叠在一起，并彼此啮合着，而各民族的核心空间被广泛的民族混合区域所环绕，使得任何一种边界的划分都必然会产生少数民族问题。随着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的崛起，这种民族混杂局势已造成了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但是，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只要东方的三个大帝国，即沙俄帝国、奥匈哈布斯堡君主国、德意志帝国，都保持着一种共同生活的跨民族国家框架，这种紧张至少还是相对有限的。然而，1918 年对以前的这三大帝国领土上的居民实施的“民族国家原则”的新规定，不仅使得新建立的国家与所有的邻居都发生了边界冲突，而且也使它们在自己的版图内与民族少数派发生争端。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它的相当部分不是在跨民族的国家里作为主民族，而是在大量的民族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这种局势还是崭新的。^①

因此，在东部边界问题上，斯特莱泽曼的立场从内容上讲是毫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0 页。

无灵活性可言的，仅仅在修改方式上，他比德国军事领袖冯·西克特周围的人要更具有现实性一些，而这些军人想通过 1918 年的《拉巴洛条约》走上一条与苏俄共同抹去波兰的道路。斯特莱泽曼则寄希望于在西方大国的赞同或者至少是容忍之下，通过谈判来修改边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洛加诺公约》的背景下，德国尽管也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仲裁条约，规定对所有冲突采取和平解决方案，但绝不放弃对东部边界进行修改的真正原因。然而，这种外交上的德意志民族政策与边界修改政策，必然会给这个本来就不稳定的东欧、中欧地区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而也是没有真正建设性前景的。

从长远来看，与战前相比，德国在这个空间中的地位事实上已根本改善了，因为苏俄大大地退缩回去并长期忙于它自己的事务。那些“共产主义防疫线”以西的新民族国家，从芬兰到罗马尼亚需要一种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依靠，而这种援助和依靠，法国和英国只能暂时性地向它们提供。德国若是放弃关于东部边界的修改政策，尽管这对它来说肯定是痛苦的，本来有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为这些新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安全合作的类似地区，也有可能赢得在这个地区的一种非正式的、靠经济力量来支撑的霸权地位。1919 年代希特勒以战争扩张为方向的东方政策表明，在这个空间中利用这种有利于德国的力量对比，受到了多么长久的推迟。因此，斯特莱泽曼若是推行一项以合作为方向的东方政策本来是有希望孕育一个不同的未来的。

在对斯特莱泽曼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作出评价和总结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种修正目标的追求具有消极因素。因为内涵上并不精确的“修正”概念，以及那种没有被打碎的大国意识，本身是能够使另一种德意志外交纲领在“修正”的掩护下，沿着重新谋求中欧统治地位，继而谋求一种欧洲霸权地位，最后是重新向世界大国地位伸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

当 1918—1919 年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目标的进一步实现变得

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使得两种方案成为了可能：或是放弃修正主义目标而采取全面合作的目标，或是对谅解战术进行重新考虑，而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政策。直到斯特莱泽曼去世之前，这种决断还没有作出。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尤其是布吕宁政府的政策，已经在向着所谓“大空间政策”的方向转移了，这种政策本身就是为冲突作准备的，因而已不再是谅解性的，而是对抗性的了。政府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卡斯·冯·策恩特隆 1931年这样强调：

从根本上讲，一个令人满意的欧洲，绝不是通过与法国的合作，而是要通过与法国的斗争才能出现的。我们需要的欧洲，是一个有我们参加的条约所组成的欧洲，那是一个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加以修正的欧洲。因此，德国必须在可能缔结的条约出台之前为进一步的修正而斗争，它绝不能在那些条约缔结之后，才去作那种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期待！^①

布吕宁政府之所以敢于采取对抗政策，依赖的正是由斯特莱泽曼已经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这就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对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评价。例如，他给德国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德国国防军迫切要求军事上的平等地位，这本身又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由他完成的从莱茵兰提前撤走外国军队的步骤，事实上已经夺走了法国人最后的有力手段，并给予了德国在未来的一种行动自由，以及在特别局势之下可能采取对抗性冒险政策的本钱；由他所争取到的《杨格计划》对赔款的进一步削减，为布吕宁结束赔款义务的最终实现创造了条件，但这种最终实现是以将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加以工具化的方法才达到的，因此，它不仅决定性地深化了经济危机，而且毁灭了在国际上进行进一步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所有可能性；至于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的计划，作为“德奥合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918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53年版，第 158页。

并”的预备性的阶段，则是斯特莱泽曼的东方政策中固有的，尽管它在 1918 年由于西方大国的抵抗而再度归于失败。

但是，第三帝国成为了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政策果实的最终收获者，因为至少到 1936 年至 1938 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是运行在布吕宁的进攻性对抗政策的发展轨道上的。当然，在作出这种结论的同时，人们还必须在斯特莱泽曼的方针，布吕宁的转折，以及希特勒直到 1936~1938 年的对外政策这三者之间进行质量上的区别。在实际政策的推行中，斯特莱泽曼一直是寄希望于和平协商和谅解手段的，因此，他的政策也有利于国际联系和国际义务的履行。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谅解政策上的矛盾性和非连贯性，这些也正是通过他的东方政策最先显示出来的。而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在大危机所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中，会得到进一步的恶性发展。摇摇摇

二、议会政党制的潜在危机

尽管从 1918 年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的民主议会制却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它甚至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到来之前就毫无效率可言了。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就必须了解这一时期参加组阁的几个最主要的政党。

在最初组成“魏玛大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中，社会民主党具有最强大的实力，而且在 1918 年以前也始终是第一大政党。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该党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已经演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了。这种特点导致了它在 1918~1933 年的革命中与容克军官团相勾结并镇压革命，从而也导致了该党内部的最终分裂，因而也削弱了它的政治实力和威望。

为弥补社会环境碎片化局势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社会民主党在“相对稳定时期”便努力向“全民党”的方向发展，因而也使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人政党，成为了一个“勉强的”产业工人政党。1933 年的成员统计中，产业工人仅占 1/3，其余为白领职员

(~~1914~~)、政府官员(~~1914~~)、家庭妇女(~~1914~~)、以及中学教师、专门职业者、独立实业家和知识分子(~~1914~~)。由于该党不能解决令人头痛的青年问题，在宣传上又囿于教条主义毫无生气的形式，因而其吸引力大大减退并逐渐僵化和老化。到 ~~1914~~ 年，党员中年龄在 ~~1914~~ 岁以下的仅占 ~~1914~~。^① 该党领袖埃伯特总统在 ~~1914~~ 年去世与兴登堡元帅的当选，使得这个党的政治势头大大衰落。特别由于与军官团在扩充军备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与矛盾，在 ~~1914~~ 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该党新领袖雷伯尔已清楚地认识到：“在军官团与这个第一大党之间的摩擦逐步加深的国家里，共和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②

德意志民主党是这个社会自由主义传统力量的代表，这支力量中仅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经受住了俾斯麦时代、威廉时代以及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所有暴风雨的考验。然而，由这剩下来的五分之一成员组成的这个政党却偏偏在这个“稳定化时期”瓦解了。作为共和国初期的第三大政党，该党在 ~~1914~~ 年的国会中曾占有 ~~1914~~ 席，然而在 ~~1914~~ 年的国会选举中迅速下降到 ~~1914~~ 席，进入相对稳定以来，却从未超过 ~~1914~~ 席，因而也是一个处于消失中的政党。^③ 造成这种崩溃局势的原因在于，该党作为一个市民资产者的绅士政党，其成员大多属于学院派的知识人士和中间等级的职业集团。从本质上讲，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主张共和制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战后特殊动荡后，它的绝大多数成员转向了右翼民族主义。这种向右转的潮流，使得这个不断萎缩的政党在 ~~1914~~ 年以后越来越对议会制度持批评态度，甚至玩弄起反共

① 西格蒙特·纽曼：《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斯图加特 ~~1914~~ 年版，第 ~~1914~~ 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4~~》，慕尼黑 ~~1914~~ 年版，第 ~~1914~~ 页。

③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4~~》，慕尼黑 ~~1914~~ 年版，第 ~~1914~~ 页。

和、反犹太的思想来了。

在社会环境碎片化的影响中，中央党是力量下降得相对较少的，因而也是表现得最为稳定的政党。它由信奉天主教的工会官员、工人代表、教师、作家、牧师，以及工业家、商人、地主、小农组成，因而也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党。这使该党领袖在运用实用主义方面比社会民主党更能变通，也比民主党更能调和与民众的关系。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妥协，该党领袖约斯声称，他的党“不是一个不是这就是那的党，而是一个为什么不能二者兼之的党”。因而它也是一个左右迎合的政党。^① 1918年以后，由于政党政治上的混乱局势与争夺，如果没有中央党的参加，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统治议会的大多数，因而该党领袖不仅成为其他政党讨好的对象，而且也使他们更加自信妥协式的机会主义路线。到 1920 年，它甚至表现出更乐意采取非民主制的其他政治方案来解决德国的所有问题。

古斯塔夫·斯特莱泽曼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则是在战前的民族自由党基础上于 1918 年重建的。由于该党领袖斯特莱泽曼在处理战后动荡局势方面作过一些贡献，因而提高了该党的政治威信。这个党的显著特点是求助于商业圈子，因而也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代表德国工业垄断阶级利益的政党。由于它与社会民主党在雇主与雇员关系上紧张的利益矛盾，使得它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当斯特莱泽曼于 1929 年去世后，该党便滑进了极右派的阵营。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则是在原帝国时代的保守党基础上重新组建的，其成员包括原保守党的部分成员、原自由保守党人、过去的民族组织的左翼、基督教社会党左翼以及大部分不愿跟斯特莱泽曼走的前民族自由党成员。该党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上层、工业界的各联合会、各职员组织以及容克势力集团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利

^① 西格蒙特·纽曼：《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斯图加特 1929 年版，第 104 页。

益，并奉行“修改凡尔赛条约，复辟君主制”的保守主义纲领。在 1918 年的选举中，前克虏伯的董事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上台出任该党领袖，标志着该党温和的保守主义时期的结束，并开始了毫不妥协的反民主体制的斗争。

了解了这五个主要政党的性质和倾向后，人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从 1918 年至 1933 年之间就有在 苑位不同的总理领导下的 苑届不同的政府，而且没有哪一届政府的寿命能超过 苑个月的。如此之高的政府“死亡率”，是由于国会代表权竟被如此之多的政党所分享，以至于“大多数”只能靠联合来取得。由于最初组成“魏玛大联合”的三个政党的势力都已减弱，因而再也不能获得国会大多数，因此，自从 1918 年以来，能使这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政体获得正常生存机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只剩下以下两种了：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联合中央党以及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左翼组成中—左大联合政府；或是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联合中央党以及德意志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来组成中—右大联合政府。^①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局势未能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提供一种可调和的余地，因而导致了各政党之间利益冲突的上升；又由于各政党的首领们能任意撤回本党的政府部长们，因而就连这些潜在的、“能活命的”政府联合形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在中—左翼的联合形式中，尽管能在对外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但社会民主党与斯特莱泽曼的德意志人民党之间在内政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利益冲突，使得这种联合越来越难维持。到 1933 年，德意志人民党已公开表示：“再也不愿加入到一个有社会民主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中去了。”^②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 1933 年版，第 295 页。

^② 弗里茨·斯特恩：《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现代德国政治文化短评》，纽约 1934 年版，第 100 页。

同样，就连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的中—右翼资产阶级大联合政府也难以稳定，因为这些政党虽然能在内政上达成基本一致，却难以在对外政策上长久地达成一致。例如，在 1933 年《洛加诺公约》缔结以后，中央党便愤然退席。所有这些冲突都只能导致执政的内阁立即失去国会的大多数，从而迫使现政府的下台和新政府的重组。因此，议会政治作为一种负担重重的进程，越来越象征着一种无止境的内阁危机。

根据《魏玛宪法》关于总统职能的第 25 条的规定，只有当政府的组成实在得不到国会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导致一种总统独裁式的解决方案。但是，在“相对稳定时期”，这种政府频繁更迭的局势，不仅正在造成选民对民主议会制的厌恶，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使得总统的政治倾向对民主议会制未来命运的影响自然增大了。

而在 1933 年新当选的总统偏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军统帅部代表保罗·冯·兴登堡元帅，他的当选对于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来说，无疑意味着一场严重倒退。这是因为这位共和国总统是一位并不光辉的、已经没落了的威廉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威望完全是从与威廉时代的传统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就这方面而言，他体现的是另一个德国。当初正是他与鲁登道夫一起，大谈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由于“德国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上了一刀”^①。也正是这种“背后捅刀子”理论，这种最无耻的反共和国的传闻，为这个人授予了“圣礼”，而此人自 1918 年以来已站到共和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了。

另一方面，兴登堡与他的顾问们，尤其是与那位国防军的新强人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一起，正在充分利用议会制政府形成上的困难和弱点，将总统位置扩建成一个与国会竞争的权力中心。正是他们力图将共和国的政治轴心移向右边，并加强着独裁式的统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4 页。

治方式。相对稳定结束以前，他们就已经在鼓吹这种观点了：“严格地信奉宪法和议会秩序，只会鼓励政党们的无政府状态，更好的办法是以人民和国家的名义使用总统的权威。”^①因此，这种总统独裁主义已开始被作为反民主的工具来使用了。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政治危机，《魏玛宪法》天生固有的裂缝就将撕开口子，而民主共和制的敌人已在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马克斯·韦伯曾力图区分统治类型，并提出过三种社会合法性的影响形式：传统的统治、理性的统治和“卡里斯玛式”（~~悦群崇拜~~崇拜^{崇拜}）的^②，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独裁统治。但是，人们必须承认，魏玛共和国是不能以这三种合法性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为基础的。

这个共和国从定义上讲是与传统的合法性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的合法性是与以前的君主制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联系，正在动员起共和国的右翼反对派们、传统的权力精英们的反共和潜力。因此，共和主义者呼吁传统的“德意志国家观念”，并尝试着将自己与 ~~魏玛~~ 1918年以前的民族集合化传统联系起来的努力，必将证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共和主义者们也曾动员过反“凡尔赛耻辱的和平”的民族主义来增强共和制国家的权威，但是，在“背后捅刀子”神话传播的气氛中，这种民族主义已经转而反对共和主义者本身了。

这个 ~~魏玛~~ 1918年建立起来的宪法国家，本来是能够以一种理性统治的合法效果来站住脚根的，因为“法治国家”的理想，通过一系列社会基本权利的补充，现在已获得了宪法上的承认。但是，这种宪法上的国家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对此还缺乏能施加强烈影响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 1918-1933》，慕尼黑 ~~1959~~ 1959年版，第 ~~100~~ 100页。

② “卡里斯玛”，即德文中的“~~悦群崇拜~~ 崇拜”，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但在中文上现已被人们习惯地音译为“卡里斯玛”，也有人译为“卡里斯莫”。

的、也是通过协商才能达到的妥协，因为经济上本身缺乏这种活动余地。因此，这些社会基本权利并不能发挥任何象征性的集合化影响，倒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官僚国家机器理性上的合法性，但它只是根据旧官僚们的自我理解才将他们的行动与“国家思想”联系起来的。由于这种“国家思想”的观念首先并不是与这个共和国，而是与旧的君主制帝国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具体的情况下，它甚至能够被动员起来去贬低这个共和国，正如人们在怀旧的共和国官僚们的政治愤恨和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共和国就更谈不上“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个人的魅力统治的合法性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失败，已作为令人失望的经历，深刻地留在许多革命参加者的意识中了。而那些威廉时代的议会主义老先生们，是完全不可能发展起类似于“卡里斯玛式”的吸引力的，就连像斯特莱泽曼这样的政治家，其个人威望也不能为共和国赢得长久的信任资本。因此，对领袖人物“卡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的要求，与反共和国合法性的要求一起在发挥着影响，它首先集中在纳粹党，这个激进的右翼集合化政党的身上。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代里，尤其是中欧、东欧这些刚建立起来的各类民主共和的国家里，在左派的战后运动失败以后，自由民主主义都只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在这些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对大战前的那个“美好的旧时代”怀旧式的倒退，出现了在独裁式大众聚合化意义上的对民主制激进的怀疑和反叛。在德国，对政治强人的呼唤并不限于那个极端的右翼政党纳粹党，甚至连斯特莱泽曼这样的政治家以及他的德意志人民党也不例外。^①只不过要负载这场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绅士们还太缺乏“才能”了。

在德意志自由主义者那里，这种对政治强人的呼唤，反映的还仅仅是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性，但是这种不适应性长期以来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年版，第 184页。

也感染了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中，围绕着豪巴赫、雷伯尔和米伦道夫之流的年轻的右派们，也在呼唤一个“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希望由他出来，动员起具有战斗性的、大众组织形式的、“人民社会主义”的革新动力。而德意志民主党，在这种不适应性中，却自杀似地将自己投入到与“青年德意志骑士团”联盟的冒险之中，由他们最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家党”，失去了比原来更多的选民。中央党同样也在寻求通过对一位领袖人物的“个性建设”，来达到对矛盾重重的内部的集合化。正是在布吕宁的领导下，中央党才成为通过总统统治来排除国会的支柱的。至于在与共和国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更是决心向右的方向作一场激进方针上的修正。当它内部的温和派分裂出去以后，独裁者胡根伯格蛊惑人心的政策变得更加容易了。而且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知道，这种到处叫卖的右翼反对派们的基本立场，能够通过纳粹党发挥出大得多的影响作用。

所以，在稳定化阶段结束之时，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实际上都已遭受了失败的磨损。社会主义者早在 1918~1919 年间就已经历过他们的失败了；共产主义者要赋予自身革命战略以真实的重量还太弱小了一点，1919 年 1 月武装暴动的失败让人记忆犹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自从失去了魏玛大联合的多数以来，也只能处于防御之中了；中央党人则将自己萎缩在不断脱落的中间派立场的边缘上。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温和派的退潮本身说明了他们的失败，而它的保守—独裁主义的右翼也将在 1918 年至 1919 年遭受失败之苦。不言而喻，与这些政党相联系的种种基本妥协都已失败了。

简而言之，共和国仅在短短 1 年的时间里就排演完了、也损耗光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种种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设计方案。也恰恰是这些政治与社会运动方案的多样性和活力能同时性地得以施展，才使民主政治遭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磨损。这种多元力量施展的同时性，正是魏玛共和国与过去德意志历史中的每个时代的区别，它所导致的磨损结果就是对民主共和制模式的失望和抛

弃。因此，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运动模式，带着与过去传统专制独裁政治相类似的但却是大大发展了的功能和理想，对政治上的右翼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这种对群众进行大规模操纵的新的运动模式，本身具有一种老式政党所不能达到的活力，同时还带有一种对全面解决方案的渴求，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被纳粹党所接受了。摇摇摇摇

尽管“强制性的局势”还没有产生出“强制性的运动”，但是它已决定性地减少了选择。因为政治文化的碎片化使得对选择的阻碍性增强了，这种阻碍性在“相对稳定时期”还并没有使摆脱政治危机的共和主义出路成为不可能，但一直没有使之成为更大的可能。

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

在纳粹主义的集合化运动赢得 1933 年国会大选以前，与旧帝国时期的社会环境碎片化并行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正是在这种碎片化的基础上，才再度聚集起一种暴力式的反叛。这种政治文化的碎片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旧传统精英力量对民主制度的阻挠。

1918 年的革命并不能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君主制的衰落和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而仅仅意味着对旧的精英集团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也就是说，在众多的领域中，老的主人们仍然能保持在顶尖的国家职能岗位上，只不过这些岗位本身已处于变化的政治联系之中了。国家管理精英在革命中死里逃生，这是有利于经济、军事、司法部门中传统的核心精英们的，也是部分有利于政治上的传统的核心精英们的，当然他们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内部或外部不同程度上的某些限制。^①

^① 沃尔夫岗·蔡帕夫：《德意志精英的变化，1918—1933》，慕尼黑 1959 年版，第 104 页。

然而，这种连续性还并不是 1918 年以后德意志旧精英发展局势的全部真实状况。因为尽管贵族代表中的具体个人甚至能相当好地挺过通货膨胀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贵族统治首先在政治上已被粉碎。过去那种“自动而必然的精英力量补充机制”，那种曾专门通过容克贵族出身者、用钱购买来的贵族头衔者、学者型的精神贵族补充者来形成一个结构稳固的主人特权阶层的政治统治机制，现在终于崩溃了。那些民主共和的“体制政治家们”，在贵族政治被排除的情况下，挑起了政治上的首要重担，但旧权力精英们并不想接受他们。^①

因此，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反映出这种特点：1918 年以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个旧上层的政治权力垄断及其运行机制被打碎了，但又没有一种新的权力垄断及其运行机制来替代它的位置。当政治混乱不断发生的时候，手足无措的新主人们又想起那些失去光芒的核心精英们，并再度起用他们。而这些核心精英们，即那些传统的负载国家功能的精英如文官、军官、法官、企业家和大农场主们，在几经踌躇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并再度根据他们在帝国时代的行为准则和观念来采取行动。这些精英集团中，没有哪一个能单独地向共和国发起成功的挑战，但他们在观念与行动上的联合性影响，却能对共和主义的方针产生出日益强烈的阻碍作用，因而能够加速政治文化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

司法界的角色证实了这个共和主义国家与旧权力精英们之间的鸿沟。在旧帝国中，法官们是能够将那种实证主义的、死抠字句的法律理解为与那个传统独裁式的国家基本结构以及社会秩序的等级制一致的。而在共和国时代，马鞍匠出身的埃伯特成为了总统，显然是与他们的传统观念不相符的；政党政治的联合政府，工人的平等谈判权，更是与他们的世界观格格不入。通货膨胀的经历，又使他们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丧失感与物质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因

^① 沃尔夫岗·蔡帕夫：《德意志精英的变化，1918—1933》，慕尼黑 1952 年版，第 193 页。

而在老法官们那里加强了怀旧式的对共和国的愤慨，在年轻的法官们那里带来了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激进化。但是，共和国的司法政策，又必须由这些对旧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宣誓效忠过的代表们来贯彻。

对 1919 年至 1924 年内战式争端的处置上，充分显示出他们的传统态度。对于进行暴动的右派，司法界总是以“出于民族思想的政治犯罪”为理由，使他们或者根本不受惩罚，或者只受到温和的处罚。参加“卡普暴动”的人几乎都得到了大赦，发动“啤酒馆暴动”的阿道夫·希特勒受到的不是监禁徒刑，而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兰茨伯格要塞里安安心心地写着《我的奋斗》。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进行反抗的左派，司法界则是毫不留情的。例如，对 1919 年的“涉及杀人案件”的处理中，17 名右派平均只判处了两个月的徒刑，其中 10 人被宣布为无罪，仅仅只有 7 人例给予轻微的惩处；但 17 名左派中则有 1 人被判处死刑，其余 16 名则被平均判处了 1 年的徒刑。^①至于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信仰者和汉堡起义的参加者，则全部给予了严厉惩处。因此，当法律只是用于反对左派的时候，当法官的判决还是以等级制的旧思想为准绳的时候，当劳动立法上的裁决仍然是根据保护占有者利益的阶级司法来作出的时候，这个国家和社会是没有公正可言的。

职业文官们尽管没有积极参与反共和国的暴动，但他们赞成那种与这个共和国不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理想。《魏玛宪法》明确保证了他们的旧有特权，但很少收到感谢和回报。除了有思想观念上与法官相同的原因外，这也是由于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们没能得到与通胀相适应的薪水，这就导致了他们存款的丧失，因而使他们在物质上受到了强烈震动。此外，这支文官队伍还遭到了 1919 年~1920 年的减员，以及 1920 年~1921 年的大量解雇和薪水下降的打击。所有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9~1933》，斯图加特 1982 年版，第 110 页。

这些，都是与旧帝国时代中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稳定局势完全不同的，因而也导致了官员中右翼激进主义情绪的增长，~~魏玛~~1919年以后已有大量的官员涌入纳粹党的阵营。

国防军军官团里聚集着最顽固的共和国反对派，这些人的忠诚是献给那个已被打碎的威廉国家的，也是一直将自己理解为真正的权力因素的，因而也成为了这个社会反民主共和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方向的反动力量的堡垒。共和制仅仅是军官团逃避盟国打击的临时避难所，军官们也仅仅是在反对左派革命的这一目标上才有可能与共和派达成表面的一致，而对于右派民族主义的任何反共和制的行动，他们不仅袖手旁观，而且暗中支持。由于共和国没有建立起一支忠于民主制的新军队，因而国防军作为拥有极大独立性的“国中之国”，其地位得到了意外的加强。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后，尤其是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后，只有十万精锐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并试图通过政府的对外修正主义政策来达到他们扩充军备的目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在现代化技术时代里，未来的战争将越来越会是一场总体性战争，每一种战争计划都必须确保对这个社会的整体动员。要为未来的战争作好准备，军方就必须从这种意义上与社会达成某种融合。^①因此，经过多年的准备，~~魏玛~~1920年怨月，国防军的新领袖施莱彻尔的班底拟定出新的扩充军备的纲领和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在对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伸张国防主权”的新要求，而且还在对内政策上提出了向右转变的新要求，因为迟至~~魏玛~~1919年底，《凡尔赛条约》对军队人事上的狭窄规定将被突破，到那时，必须作出对这个社会是否重新军事化的裁决。然而，国会中那场围绕重振军备的公开争论，使军官团终于明白，一场社会军事化的方针是不可能由社会民主党人来贯彻的。因此，在他们的方针遭到中左派的拒绝之后，他们依靠总统独裁，并对宪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魏玛~~1957年版，第~~四~~104页。

法进行独裁主义化和军国主义化改造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1934年米勒内阁的倒台本身就说明，1933年在社会民主党与国防军之间的那场军事政策上的妥协基础已经崩溃。也正是在这条轨道上，围绕在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国防军军官团才成为了在反对“魏玛不合法国家”斗争中支持纳粹党上台的最重要的集团。摇摇摇

重工业界的大企业家集团对这个共和国的忠诚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尽管有共和国初期的“阶级合作主义”路线，但是，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坚决拒绝，“民族精英”和“民族遗产捍卫者”的意识，以及那种企业里“家中主人”的观念，阻止着他们向共和国作更大的接近。

事实上，他们在1933年11月主动与工会达成的“中央劳动共同体”，不过是为了防止可能引起的社会革命剧变。而夺回在战败和革命中所失去的地位，一直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早在“卡普暴动”中，他们就暗中为叛军捐助了1200万马克。^①在1933年围绕着劳资冲突展开的“鲁尔斗争”中，就有100万名工人被他们开除。这清楚地表明，他们与工会之间的对抗已是多么的尖锐，那条“阶级合作主义”路线又是多么的脆弱。早在1933~1934年那种慢性而阴暗的危机气氛中，他们就已经强调：“只有从社会福利国家的负担中，从‘工会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拯救德意志经济。”^②这也正是他们在经济大危机时依靠总统独裁权力所要做的。

大危机期间，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独裁主义的反议会统治的道路，是因为他们担心：“社会民主党有可能会在危机结束以前再度

① 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希特勒的崛起》，柏林1933年版，第106页。

②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33年版，第106页。

成功地给魏玛体制带来一种重新稳定。”^① 布吕宁之所以一时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是因为他们盼望着从他身上能看到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成功的排除，只是由于 1930 年的银行危机才使他们抛弃了布吕宁，转而支持巴本内阁。如果说加工工业和以出口为方向的工业中的企业家在“相对稳定时期”还保留着与工会进行妥协的意愿的话，那么这些妥协派们并不能在德意志工业家全国联合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当大危机到来时，这个受到震动的集团也与重工业集团一样，开始为提高德意志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实现德国在其中拥有特权的中欧、东欧“大经济空间”的目标而奋斗了。与此同时，整个德意志工业界对军备定单和扩充军备的兴趣已大大加强。因此，一个反共和主义的、反工会运动的企业家们的统一战线已经出现。

四、行省居民的反叛

共和制遇到的不仅是旧权力精英们的阻碍，而且还有它国民的反叛。这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结构上的鲜明区别，但对共和制同样是致命性的。也就是说，旧权力精英们从各集团的分散走向集合的独裁主义倾向，与群众从原有的地方联合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反叛，作为两个发展方向彼此相反的激进化进程，冲击的目标是同一个共和制。

当真实的威胁与想象的威胁不可解地融合在一起时，整个局势就越是变得令人愤恨和充满危机。在这种气氛中，在中间等级当中，在下层那部分没有被包括到工人运动中去的人们当中，而且也在上层中，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反自由主义和“领袖崇拜”发展起来。纳粹主义者并没有创造它，而是继承了所有这一切。早在转向希特勒之前，在整个社会气氛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场对“魏玛体制”的抛弃。

^① 贝尔恩德·魏斯布洛德：《魏玛共和国中的重工业家，稳定化与危机之间的利益政策》，乌帕尔塔 1982 年版，第 285 页。

这种集体退出共和制的一致性征兆，自 1919 年代中期以来，首先积累于行省、乡村和小城镇之中，而大多数的德意志人还生活在这些地方。在这里，本身也是最容易出现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保留的，因为这场不受束缚的现代化，是与柏林的那种双重消极画面联系在一起：这个大都会既是“丧失个性化的场所”，又是“政党相互争吵的舞台”。但是，若将 1919 年代末行省中的这个进程仅仅理解为反柏林为代表的大都会化的传统主义者们的反击，那是远远不够的。还不如说，他们反叛的特别活力，恰恰是从对传统联系的一场反叛式的摆脱中才最后发展起来的。^①从政治上讲，这种现象反映出那些中间派和右派的传统政党们，那些行省中的地方性“经济党”或各种“农民党”，已失去了它们的选民；反映出小城镇和乡村中的选民在这些传统的政党中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代表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行省中传统的绅士阶层不仅在政党中，而且在各种地方联合组织中都已普遍丧失了权威。

纳粹党起先更注重的并不是这些地方行省，而是大城市。虽然在 1919 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大城市遭到了失败，但同时却在新教的乡村和小城镇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一场意外的、也是小小的、但却是引人注目的胜利。例如，在图林根地区，这个党以 1919 年的选票第一次突破了 1912 年的纪录。正是在此基础上，纳粹党才开始真正注重在乡间富有成果的煽动。在这里有两个进程在重叠着：首先，纳粹党转向了乡村和小城镇的社会阶层，就这方面而言，纳粹党自 1919 年以来的大发展恰恰表达了一场深刻的反传统联系的社会反叛，因为这些地方的选民过去不参加全国性政党的选举运动。因此，纳粹党既从行省中的这种现代化中获了利，同时又像催化剂一样地发挥着影响。另外，乡间与小城镇里的中间等级绅士集团和地方联合组织的上层人士也开始有步骤地瞄准了纳粹主义的全国性方向。当然，行省中的这个进程，直到希特勒上台后的很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5 页。

长一段时间里，才在那场被称之为“一体化”的运动中结束。

行省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绅士政党们影响的丧失，中间等级利益代表的激进化，以及纳粹运动的社会动员对行省中社会抗议潜力的吸收，表达了共和国全面危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场小城镇“中间等级的恐慌”，以及乡村下层的法西斯化的社会抗议，标志着在地方行省中，由地方主义的绅士集合化运动向全国范围的“民族利益代表”的集合化运动这样一场现代化痛苦的突破。这种颠覆性的“觉醒”，是用特别得到强调的陈词滥调来修饰的，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这种“觉醒”盗用了迄今以来一直使用的“集合化”词汇的正面意义，并将其大大地激进化了，以至于这场新运动，也是作为那些老的合法立场惟一可信的、也是前后一致的代表来出现的。这种机制在纳粹党消除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影响的例子中显得特别清楚。事实上，保守主义阵营越是激进化，他们造就出来的更新鲜、更有活力、更为激进的选择理由就越多，而纳粹主义者利用保守主义者激进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行省中的反叛首先也是针对那些地方绅士政治的代表人物的。在其他环境条件下，这本来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民主代表形式，导致地方联合结构的现代化，导致政党体制的多元主义的民族化。然而，当人们将共和国与大城市“寄生性的腐朽”、行省状况的恶化、中间等级的没落划上等号的时候，这条道路被截断了。如果说通货膨胀的经历为此作出了“贡献”的话，那么 1929 年代的农业危机更是给共和国的社会危机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

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面临的那场漫长的农业结构性危机，是在 1929 年代初的通货膨胀结束后，才真正开始发挥出全面而灾难性影响的，因为总的来说，这场通货膨胀对农业生产者还是有利的。在这里，德意志内部的结构问题与农业经济的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被人们称之为“相对稳定”的时期里，由于供过于求，国际上的小麦价格下降了 1/3 左右，这特别严重地震动了早已处于没落之中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产。但中、小农民的企业也同样经受了农业危机之苦。他们首先陷入到一

种价格剪刀差之中：一方面，对他们经营的现代化来说是必需的工业品价格，如化肥和机械化农具的价格在日益上升；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却在日益下降，这种局势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总要比给工业带来的损失大得多。^①

由于农民破产者日益增多，负债累累的农家院落被迫出售，因此，经常性的自发抗议活动成为了农业中没落情绪的象征性表达。当农业危机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不断深化的时候，它导致了乡村中一场快速的政治激进化。对于中、小农民，农业工人，还有乡村和小城镇中与农业有关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说，这种政治激进化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方向寻找阶段后，意味着向纳粹党的转向。

当越来越大的人口部分与纳粹主义的集合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德意志全国农业联合会上的政治活动家以及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主，却转向了总统独裁的方向。只是由于未能从布吕宁和巴本内阁手中获得经济上的足够资助，才使众多的容克地主在魏玛四年的危机进程中转到了与纳粹党结成一个联盟的追求方向上。摇摇摇摇

第五节 摇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自从 1929 年 10 月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自从 1933 年 1 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最后一届议会制政府结束以来，对于各种政治行为者和人口大众来讲，所涉及的已几乎不再是拯救或重建共和主义的宪法秩序问题，而是魏玛体制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问题了。由于这个政治体制早在“相对稳定时期”就已经在逐渐丧失它的合法性了，因此，这场危机是作为与这个民主共和政体实行决裂的催化剂来发挥作用的。这样，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受危机冲击的工业化国家，在德国，这场危机不仅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5 页。

表现为一场经济危机，而且也首先表现为一场政治危机。它标志着
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一场政治体制试验的全面失败。世界经济
大危机在德国所表现出来的惟一性就在于此。

这场全面的现代化危机为纳粹党提供了群众基础和选民力量，
对于这些集合在纳粹运动中的反民主因素来说，这场危机更是提供
了击退并最终瓦解德国民主主义潜力的机会。正是希特勒的纳粹
党，这个种族主义的右翼激进政党，对国家统治权冲击的成功，才
在这个高度文明化的工业国家里，导致了一种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
暴力统治的高峰和一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战争机器的出
现。

一、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场在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的那场经济重建的周期并没有完成的背景下由美国引发的。
在德国，它使 1920 年代那些重建措施所引起的特殊负担，与一场经
济崩溃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了。

在艰难地度过 1920 年的巩固化危机之后，在不足六年的宝贵
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并没有发展起一种可以预测的完整周期，而是
在两年以后的 1931 年，就引起了一场短暂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
尽管迅速得到了克服，但在 1929 年至 1932 年的上升性波动中，德
国经济便出现了发展受到干扰的所有征兆：各项最重要的经济指标
尽管再次达到战前 1928 年的水平，然而失业率特别高，投资倾向
却特别弱。因而围绕着国民收入中工资和赢利份额分配的斗争，变
得越来越艰苦了。

这种内部经济上的封锁局面是与对外经济上的负担相应的。战
后世界市场的重建仅仅是在忍受着日益深刻的矛盾的基础上才勉强
实现的。美国作为新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尽管寄希望于一个开放
的世界贸易体系，但同时也是通过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来关闭它自己
的领土的。而且当美元正在变成事实上的新领导性货币时，要维持
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大多数国家本应在向金本位的返回中努力

与美元挂钩，但是法郎与英镑仍然与美元处于一种没能得到解决的对立关系之中，以至于世界金融体系在伦敦、巴黎、纽约交易所紧张的三角关系中运转。此外，还要加上美国提供贷款、德国缴纳赔款、法国归还贷款给美国这场热闹的国际金融大循环所带来的负担。对于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对外国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的依赖性。因此，当纽约股票交易所在 1929 年 10 月“黑色星期五”崩溃时，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必然首先严重地震动到德国，同时也使德国生产的衰退与结构性危机、内部经济的封锁与外部经济的负担撞击到一起了。

在这场危机中，德国工业生产的衰退趋势使不少同时代的观察家们预言：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将会完全崩溃。德国严重的经济局势能通过以下的统计数字得到说明：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数，从 1913 年至 1924 年还经历过一次小小的上升，即从 100 上升到 116，但在 1925 年已下降到 101；从 1925 年至 1932 年，更是退到了不足战前一半的水平，即从 101 降到了 50。消费资料生产方面的衰退早就开始了，1924 年也仅仅达到了 1913 年的 95%，并一直滑向危机的最低谷：1932 年为 75%，1933 年为 76%，1934 年为 75%。消费品价格则有着比生产指数更强烈的下降趋势：1913 年为 100，1924 年为 95，1932 年为 75，1933 年为 76，1934 年已下降到战前三分之二的水平，即为 75。在同一时期，工资大幅度下降，通过国家紧急条令和企业主的报复性措施，实际工资在 1932 年只达到了 1913 年 75% 的水平。^①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依赖工资为生的就业者来说，这种实际工资的减少并没有说明灾难的真实规模，因为群众性的大规模失业，已经成为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最为突出的标志。事实上，自从 1918 年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就一直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当时它就占靠工资为生的就业人口的 10% 了。失业率虽然也曾在 1926 年下降到 7.5%，但以后又逐年上升，1932 年为 27.5%，1933 年为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4 页。

1932年，失业率为16.7%，1933年为21.3%，1934年为24.5%，1935年达到27%以上。这还只是根据进行了失业登记的1400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所得出的失业率，至于没有进行登记的失业者，一般的估计至少超过了1000万人。根据自由工会进行的统计，工会会员中的失业率在1935年间竟达到了35%^①。

这场危机对社会中间层的冲击是猛烈的。大多数官员和教师尽管没有失去工作，但必须忍受大幅度的工资削减；小商人和独立经营者，则由于价格崩溃和购买力的迅速下降，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至于农业领域中的人们更是在全面爆发的农业危机中忍受着煎熬。德意志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丧失安全感的整体规模是清清楚楚的。

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工人和职员，其中景况最为悲惨的是采矿业和重工业的工人，因为这里有着最高的失业率。但是，如果注意到失业者的年龄划分，人们就会发现青年的失业率特别高。18岁以下的人，这个年龄组正处于迈向成人生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却偏偏普遍而迅速地丧失了工作岗位。在18岁至24岁的年龄组中，失业率大大超过了平均值。对于这两个年龄组中的许多人来说，只要他们还生活在父母家里，那么根据各项救济方面的法律，他们在失业的同时，也就被排除在危机救济之外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失业不仅意味着工作岗位、劳动收入的丧失，而且也意味着个人前途的丧失。妇女的失业率也很高，但比起男子来说还是相对要小些，而这首先导致了“反双职工运动”的发展。

失业时间的延续变得越来越长，到1935年，许多人失去工作已达五年之久。然而，无论是失业保险，还是危机救济，所能提供的资助都只能维持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而且由于危机时期政府所颁布的紧急条令，就连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缩短。因此，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成为地方乡镇救济和慈善机构的负担。但是，就连这笔可怜的社会救济金也要通过有损人的尊严、有辱人格的严格检验程序才能

^① 迪特玛·佩茨依那：《两场大战之间时代中的德意志经济》，威斯巴登1966年版，第127页。

得到，因为根据法律，领取这种社会救济金的条件是，这种人必须证明他所有的私人财产都已被使用殆尽了。^① 因此，在跌入社会最底层以前，失业者们经历的是一场完全真实的生涯败落的过程。危机期间布吕宁、巴本内阁削减福利金，甚至撤除福利体制的措施，自然而然地将所有的失业者都推到了与共和国相对立的位置上。

失业者的日常生活不仅是用物质上的匮乏、对家庭生计的担忧、生活上安全保障的失落感来标志的，同时也是用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感觉、个人的无用性、无所事事的混日子的感觉等这类心理上的负担来标志的。他们过去的日常生活是由劳动生活的节奏、在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来组成的，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感觉到业余时间的可贵。然而在失业的状况中，他们过去在业余时间里的活动却在逐步减少，发生了一种普遍的对时间意识的丧失感。这种长期性的失业不可能使失业者在发挥劳动创造性方面穷则思变，只能导致他们在现有体制下对未来的绝望。^②

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倾向日趋强烈。因为这种战斗性的同盟，比起国家提供的那种意义不大、并在不断减少的福利救济金来，更能帮助失业者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一般来说，非熟练工人中的失业者往往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战士同盟”，熟练工人中的失业者更多地是加入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帝国旗帜”和“钢铁战线”，传统手工业中的失业者最初选择的往往是右翼保守政党领导的“钢盔团”，而职员中的失业者、被辞退的小官员、农业工人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中间等级破产者加入的往往是纳粹党领导的“冲锋队”。尽管这些战斗组织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但是，它们都能为其成员提供组织内部的理解、同情、亲近与伙伴

① 福尔克·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1—1918》，法兰克福 1963 年版，第 150 页。

② 维尔纳·康泽、汉斯·劳帕赫：《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和经济危机，1918—1933》，斯图加特 1967 年版，第 153 页。

式的团结一致，都能从时间上充实失业者的日常生活，都能用战斗的组织纪律来取代劳动的组织纪律，并将人们置入到长期的、不停顿的运动之中。^①

当人们在社会和政治上普遍迷失方向的时候，激进的右翼政党，特别是纳粹党的战斗组织，便首先作为具有集体生活意义的组织出现了。它最先通过有技巧的组织和宣传，组织起成员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种种许诺，来为绝望者提供生活的前景和意义。它在大街上向左派发起的进攻性战斗，本身也是与它们通过议会舞台夺取政治权力的战斗，与它们要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战斗完全相应的。

这场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从两个方面变成了共和国政治上最后危机的酵母：一方面，在中、下层中，被危机毁灭了所有前途的人口大众，政治上变得日益激进化，他们无疑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因此，当 1933 年共产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人失业者政党时，纳粹党却成功地通过对青年失业者的一体化，通过更广泛的群众动员，从各阶级中间，首先也是从被危机弄得惊慌失措的中间等级中间，从农民和农业工人中间，动员起了千百万迷失方向的人；另一方面，在上层中，那些右派政治家和旧的权力精英们则在试图利用这个虚假的“大好时机”来最终修改 1918 年的基本决定。

二、纳粹运动的动力

尽管纳粹党在 1932 年只获得 18% 的选票，但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这场大危机期间的头一次国会选举中，却获得了 33% 的选票，从而使它原来在国会中的议席由 3 席上升到 18 席，一跃而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在 1933 年 3 月 5 日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所获的选票达到了最高纪录 52% 的选票，议席也随之增至 18 席，成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5 页。

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个过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激进边缘上的政党，已成为了一个遍及各阶层的群众性政党，并集合、捆扎起全国规模的社会抗议力量。

事实上，纳粹党早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就已经在为它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了，因为它向群众运动方向上的突破是在稳定化的结束阶段里完成的。

自从1919年底从兰茨伯格要塞中释放出来后，希特勒便开始重新组织纳粹党。他放弃了武装暴动的夺权手段，改而采取通过议会竞选、争夺群众选票进而夺权的战略，一种“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战略。在随后几年重建纳粹党的活动中，“元首原则”已成为该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该党的政治活动已开始充分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媒介、集合式的风格、宗教仪式般的大型集会和军事检阅的混合手段，党徒们的统一服装和划一化的行列式已成为群众性的装饰物。所有这些都融进一种不知疲劳的组织上的行动主义之中，这种行动主义的风格构成了纳粹党鲜明的鉴别标志。“不停顿的运动，围绕自身意志的运动，作为向前动力持续性证明的运动！”^①这成为了纳粹党的重要信条。

从意识形态上讲，纳粹主义代表了在德意志右派中早已广泛扩散、绝无新奇之处的愤慨和思想的混杂。如果说纳粹主义者在其中也注入了新东西，那就是更大的狂热性和一贯性，更强烈的激进性和反动性，并将过去那些分门别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联结起来了，也将这种意识形态混合物中所有单个的成分都聚集在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上来了。在这样一幅激进的民族主义图画中集合了如此之多的“主义”，如反犹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保守主义，以至于如果人们要问究竟什么是纳粹主义的时候，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去概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57年版，第104页。

括：“纳粹主义就是反对现存的一切！”^①但是，正是由于反现代主义的纳粹主义具有如此之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来自所有社会职业阶层中对现存社会状况不满的力量，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成为了可能。

众多社会抗议的理由都能够来自保守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武器库，而且纳粹主义者激进的反现代主义与传统权力精英们保守的反现代主义也有着纲领上部分的共同性，这些因素甚至使老精英们产生了能够驯服纳粹党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幻想。但是，在纳粹党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的“马厩”里，在对这个未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工程设计中，纳粹主义者恰恰克服了保守主义者的复辟立场，将一种向远古更彻底的倒退以一种对未来美好蓝图的追求形式表达了出来，同时也通过它运动上特有的激进性动力，通过它表达方式上的公开性、风格与手段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权力精英们的老式权谋手段和理想区别开来了，因而在大众心目中，它又是以一种新的、从未使用过的力量形象来出现的。

这种力量形象首先也反映在纳粹党的成员结构上。根据当时官方对政党的统计，在 1933 年大选前纳粹党的 100 万党员中，职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0%）占 20%，城市独立经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0%）占 10%，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0%）占 10%，官员和教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0%）占 10%。总之，所有这些中间等级各职业阶层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了它们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占全部纳粹党党员的 25%。另外，来自中间等级的党员有二分之一充当各级领导。与此同时，工人虽然在纳粹党党员中也占据了 10%，但远远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 15% 的比例。^②

①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0 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8-1933》，斯图加特 1952 年版，第 100 页。

这种结构表明，纳粹党是一个以中间等级为核心的群众性政党，属于这个中间等级的有遭受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连续打击或破产或变穷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为特权地位的丧失而担忧的中小企业家、官员、教员和职员，以及看不到未来前途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总之，参加纳粹党的人，更多是社会上的落泊者，而不是崛起者，尽管也有崛起者。这恰恰反映了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中间等级普遍的艰难处境。但是，这种中间等级的特点，并没有妨碍这个政党向社会阶层另两端的扩展，大资产者阶层中有不少人已开始向这个右翼极端政党慷慨解囊了。因此，纳粹党成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众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舍恩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中间阶层占优势的政党，一个中、小官员，中、小工商业者，手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和职员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强烈倾向的政治反对派们、军事上的年轻冒险家们积极采取行动的政党，一个有少量贵族绅士和反民主主义的经济精英们参与其中的政党。”^①

但是，作为一个“民众党”，~~1933年~~夺权以前的纳粹党还仍然带有独具特色的歪曲化特点。一方面，它吸收了工人，但这些工人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工人，或是原本“出身良第”却无产者化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纳粹党至少此刻还并不能真正深入到典型的产业工人环境中去，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从根本上讲，失业者是由共产党来代表的，而非失业者仍然是由社会民主党来代表的。另一方面，虽然它比所有其他政党都更多地扩展到全国范围，并构成了一个更为紧密、更无缝隙的组织网，但是，它一时还难以成功地在传统的天主教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站稳脚根，因此，即使在大危机的头两年，他的成员主要来自新教区的中间等级各阶层，他们中不少人都有过在自由军团中服过役的经历，而且曾经是在鲁尔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对着干的民族主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54年~~，斯图加特 ~~1954年~~年版，第 ~~140~~页。

义联合会的成员，因而也是纳粹“冲锋队”的核心力量。

青年化是纳粹党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它的成员中，更多的是 18 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不是中年人和老年人，这批 1914 年后出生的人一般都没有前线经历。对 1915 年至 1923 年加入纳粹党的人的考察表明：绝大多数是 18 岁以下的人，在 18~24 岁之间的人只占 1/3，但这些人往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前线经历，而且在领导层中占压倒优势的也正是这个年龄组中的人。与其他同时代的所有德意志政党比较起来，纳粹党更清楚地显示出它是一个“青年党”。上台时希特勒也不过 34 岁，戈林不过 30 岁，戈培尔不过 28 岁，希姆莱与鲍曼不过 26 岁，而希拉赫、斯派尔、海德里希不过 21 岁。它行动的灵活性以及“未来化的方向”显然也要归因于这种年龄构成。这种充满动力的外在表达印象，为纳粹党在经济危机年代里带来了大量相同年龄组中的追随者，因为这一代人在共和国时代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脱离传统的生活模式，而受到群众性失业震动最强烈的也正是 18 岁至 24 岁的人。这些人的社会青春期不仅被延长了，而且在危机中已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希望了。因此，当过去那种对“美国主义”的热情，已经由于这场因美国引发的危机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他们在纳粹主义强大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向了纳粹阵营。

毫无疑问，纳粹党选民的真正潜力是在大危机中才形成的。但是，究竟是哪些人投了纳粹党的票呢？德国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纳粹党主要是靠吸收这些人来壮大自己的选民队伍的，即迄今为止的非选民（过去不参加投票的人）和以前投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党、投地方特别主义政党以及投自由主义各政党票的选民，但也有投社会民主党票的选民。前者表明了这些人本身对民主制度的厌恶，而后者则表明了这些人对原有政党的失望。

在 1918 年投弃权票的非选民中的 1/3，在 1924 年 12 月大选中投了纳粹党的票；在 1928 年 7 月大选中，又有在 1924 年投弃权票的非选民中的 1/3 投了纳粹党的票。与此同时，大危机的深化也导致了那些一直参加投票的选民在政治选择上的迅速变化，这些选

民过去是投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非天主教的中间派政党票的，如投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农民党、土地同盟、土地人民党、经济党、德意志—汉诺威党的票的。在 1925 年还是投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经济党票的人中的 犹豫，投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票的保守选民中的 犹豫，以及过去投剩下的那些代表农业利益和地方特别主义利益的更小政党票的选民中的 犹豫，在 1928 年投了纳粹党的票。在 1930 年 7 月大选中，那些在 1925 年还是投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票的选民中的 犹豫，投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票的选民中的 犹豫，转向了纳粹党。引人注目的是，在 1928 年，剩下的投代表农业利益和地方特别主义利益的政党票的选民中 犹豫成为了纳粹党的选民。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 1925 年投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人的 犹豫，在 1928 年投了纳粹党的票，剩下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 犹豫，在 1930 年也成为了纳粹党的选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的第一大政党，因此，这里的百分比代表的是上百万计的选民。^①

如果将这些有关选民的研究概括起来，人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纳粹党选举上的成功，首先要归因于它取得了超过平均值的、以前通常是投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的中间阶层的选票。但是，危机的深化，也使数量可观的原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向纳粹主义转变。

为什么在这场争夺选民的战斗中，其他政党（除共产党外）的力量在不断地削弱，而纳粹党的力量则能不断地膨胀并表现出它特别的活力呢？这要归因于两个起先是独立的现象。

一方面，社会中本身存在着大量对危机的担忧和对获救的渴望；另一方面，纳粹党本身就比其他所有政党更早地瞄准了对“卡里斯玛式”的，也即对“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悦~~ 崇拜）~~非~~ 崇拜领域领袖人物崇拜的“元首原则”方向，因此，一种“希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8—1933》，斯图加特 1962 年版，第 155 页。

特勒吸引力”被制造出来。但是，这种“元首原则”最初还只是首先在党的重建上作为粘合剂来发挥作用的，并没有被运用到选举中去。只是当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绅士代表们在政治上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党政治体系的瓦解，才留下了一种内在的政治真空。这种真空的吸引力与那种在共和国虚假稳定期间就一直普遍存在的对危机再度爆发的担忧，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以及对获救的渴望，开始将群众的希望导向领袖人物的崇拜。因此，当 1930 年开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全面危机日益表现出没有出路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无出路加强着对“卡里斯玛式”的，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的寻求时，这位纳粹党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才找到了他的追随者大众。

总之，当人们要对纳粹主义崛起的原因进行总结时，必须指出它多方面的原因：失业、农业歉收、社会和政治上的孤立、对危机的恐惧、在危机中普遍迷失方向，以及政治倾向向右转的激进化。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反应中，人们本身就能看到一场对这个危机重重的工业化社会的整体性的抗议，一场对过去被认为是安全的生活方式遭到毁灭的抗议。这种抗议的潜力并没有被完全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上，而是不同程度地涉及所有的人口阶层。由于这场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那种在强有力的政治抗议中突变性的迷失方向，不仅获得了一种毁灭民主制度的特点，而且也具有了一种摧毁所有传统与现存秩序的特点，纳粹煽动性的宣传攻势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局势为背景的。

无论怎样，纳粹党已经成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跨阶级的集合党和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的“民众党”。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懂得如何从所有阵营中吸收不满者的选票，而且也懂得如何利用组织体系中的“元首原则”来吸引青年人，并充分使用那种过去从未被使用过的、也是能打动人心的活力，更懂得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与 19 世纪 90 年代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瘫痪状态相比，与 19 年代初总统统治的旧式内阁政治风格相比，纳粹党代表了一个“激进”的新开端。

三、独裁统治的转变

在 1930 年 1 月米勒大联合政府倒台后，兴登堡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指派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布吕宁上台，组织了一个所谓“中间派”的新内阁，而实际上，在共和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右派保守—独裁主义的统治集团已经出现，它是一个由前共和主义的功能性精英们，那些旧帝国时代的文官、法官、军官，以及工业中的大企业家和农业中的大地主组成的社会权力和政治统治的卡特尔。这个蓄谋已久的统治集团对危机的回答，与其说是从经济上，还不说是从政治上来进行的。它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从经济上克服经济危机，而是如何取得外交政策上的成就，并保护大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当这届政府的紧缩金融、降低工资、削减福利金的财政立法遭到议会的大多数人否决时，布吕宁便解散了国会，并通过总统的紧急条令来使之生效。在这里，布吕宁已破坏了国会与总统权力之间的二元平衡，国会的作用事实上已被排斥掉了，而根据宪法第 113 条的内容，立法机构反对总统全权的最重要的干预可能性已不存在，这就完成了瓦解民主宪法制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扩充总统独裁权力的开端。

这届国会是在还有二年才会满期的情况下，为贯彻总统独裁统治被解散的，也就是说，这个完全还有行动能力的国会是被故意地排斥掉的。如果不是这种故意的排斥，这届国会直到 1932 年都仍然能够形成一种明显的民主主义多数派的。

1930 年 12 月 1 日的新国会选举使纳粹党成为了第二大党，而那些与政府接近的政党被挤进了少数派的行列。与此同时，由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选举中的惨败，也使这个右翼保守主义政党走进了与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进行对抗的激进反对派一边，这种局势也就使得这届新国会变得事实上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了。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本着国家政治上的责任感，拒绝与激进的右翼政党组成一个消极的多数派来反对这个政府，才出现了一个反议会的总统制政府与议会的“容忍多数派”之间奇特的中间局面，正是这种中

间局面才维持了布吕宁内阁的运转。总之，利益集团和各政党中的冲突，政党之间战术联合的快速变换，以及各政党政治计划的混乱和思想上的竞争，形成了布吕宁内阁实行独裁式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从内政上讲，政府责任已与议会决断过程相脱离了，这就导致了政治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总理的职位上，而这位总理只是通过总统才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但是，行政机构的独立性，由于排除了与之竞争的立法机构，也就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了，因而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兴登堡周围的阴谋集团。因此，这样的总统内阁事实上也正在进行一场政变，它力图完全排除议会在政府组成上的作用，来重返俾斯麦式的传统专制独裁式的国家领导道路。这些计划在布吕宁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君主制的思想中，在弗兰茨·冯·巴本全面独裁的“新国家”设计方案中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两人出于政治上自我维护的种种原因，拒绝了希特勒的权力要求，但他们丝毫也不想恢复过去的议会民主体制，也不想只是维持现状。

在社会政策上，他们充分利用这场危机来为最终修改 1925 年 1 月的《斯汀纽斯—列金协定》服务。这里面包括削弱工会、废除迄今为止一直有效的劳资协定、排挤社会民主党、降低工人工资、削减各类社会福利金甚至取消福利制度的一揽子计划。在这个领域中，涉及的并不是危机迫使政府采取了这种行动，而只是这一点：他们是将危机形势视作机会并充分加以利用，来为他们早就想达到的这些反动倒退的目标服务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经济危机更是成为了他们修改《凡尔赛条约》、停止缴纳赔款的一个廉价借口。事实上，布吕宁政府是有意地容忍德意志社会发生的这场日益增长的贫困化危机的。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的崩溃，外交部的新领导开始采取一种“自由行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它的目标就是在中欧建立德意志霸权，并创造一个在中欧“自给自足的德意志经济大空间”。尽管那项《德奥关税同盟计划》由于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而归于失败，但也正是法国人对这个计划作出的财政政策上的反行动，才导致了世界金融

体系的最后崩溃，从而也才使得德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

军事上的目标紧密地与建立中欧霸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国防军军官团一直力图扩充军备并恢复军事实力，而这只有通过《凡尔赛条约》的裁军规定进行修改才可能达到。从原则上讲，这种修改要求，也正是总统制内阁的路线，但这条路线在 1924 年却与布吕宁优先解决赔款问题的考虑发生了矛盾，因而也成为了他们不再支持布吕宁内阁的一个原因。国防军军官团抛弃布吕宁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对军事化的右翼群众组织“冲锋队”和“钢盔团”的评判上。因为国防军军官团此时还是想将它们作为民族武装力量的潜力来加以保留的，而布吕宁和他的国防—内政部长格罗讷更多地看到了这些“国家控制外暴力”在内政上的阻碍作用，因而主张取缔这些军事组织。^①

如果人们仔细分析布吕宁政府的政策行为，便会发现传统独裁政治与权力崩溃之间真实的辩证法。布吕宁实际上是在他的政策的推行中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国会越是变得失去功能，支持他上台的人们就越少需要他继续作为打击议会的手段而存在；他所实行的紧缩财政的政策影响越深，也就越严重地损害了那些由于这一政策受到剥夺的官员们对这种统治的忠诚；他对赔款的调整越是接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对一个布吕宁的需要就越是减少，军官团就越是在扩军问题上推行与之对抗的方针。总之，危机越是进一步地继续下去，抛弃他的时刻就越是临近。因为在这个关头，这些后台老板们必须将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的责任推卸在他的头上，以便能通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政治家”来引入他们期待已久的全面独裁的“新国家”计划，以及他们迫切需要加以促进的经济纲领和扩军纲领。

由于在布吕宁开始的政治进程中，已经排除了所有其他重要的国家主管机构的功能，因而也就只剩下总统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63 年版，第 340 页。

了。这样，向传统独裁的转变越是向前推进，这些政治阶级的权力崩溃就越是迅速，期望得到老权力精英们的“新国家”的叫喊越是响亮，那些剩下来的、围绕着兴登堡的幕后操纵者们就越是丧失行动能力。

因此，到 1930 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总统内阁政府临死前的挣扎了，权力的崩溃已经变成了权力的真空。过去被布吕宁作为毁灭共和国的有力工具来使用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现在开始转而反对这些进行传统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家们了。1930 年 1 月与 2 月的总统选举已经出现了一场阵线上的混乱，由于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了全体选民的意愿，即 170 万张选票，为了能在第二轮选举中对抗希特勒，老元帅兴登堡必须确保社会民主党人的赞成才有可能继续当选。^①

这一局面充分说明，在一个高度动员化和高度政治化的现代社会中，一种传统专制的独裁主义方针，在没有广泛选民基础条件下，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因为人口大众的力量潜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没有可进行操纵的、用一致性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众队伍，就不可能真正长久地发挥它的功能，进行它的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赢得和维持，只有借助于能包括相当广泛的人口阶层的政党才能达到。而在 1930 年代初期的德意志社会中，要拥有这种广泛的选民基础，只有两个政党可以做到，或是处于中左派位置上的社会民主党及其自由工会运动，或是右翼激进派的纳粹党及其集合化运动，而后者在总统竞选中正是兴登堡的对手。摇摇

因此，布吕宁的留用只剩下一个作用了，那就是依靠社会民主党人对他的容忍，来保证兴登堡的第二任期。当这一步达到后，他便于 1930 年 3 月 30 日被赶下了台。这同时也意味着从议会容忍的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5 页。

总统制内阁向纯粹的总统制内阁的过渡。弗兰茨·冯·巴本，这位有着天主教贵族血统和大企业家家庭背景的极右分子，尽管于远月员日被作为旧权力精英、大企业家和大地产“最为理想的代表人物”扶上了台，但他的上台仍反映出这些“前工业化的”政治精英们，太不了解群众性政党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联系的桥梁的必要了，也太不熟悉这种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深刻特征了。因为巴本组织的是一个由贵族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尽管它能得到兴登堡以及他周围的阴谋集团的支持，但它恰恰缺乏现代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群众基础。

毫不奇怪，在执政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在巴本的所谓“新国家计划”中，剩下的只有干巴巴地打独裁政变这张牌了。尽管巴本在苑月猿日以暴力方式取缔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但这同时也使得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容忍这种没有任何“中间派色彩”的独裁内阁了。这就迫使巴本只有通过两次解散国会的方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从而也使得随之进行的选举变得更为艰难。在员年员月远日的选举中，支持巴本的选民不足员，巴本同样必须下台。而与此同时，纳粹党的选民份额由猿下降到猿，这给纳粹党内部也带来了一场不小的混乱。共产党成为了这次选举的真正胜利者，它的选民份额由员上升到员。^①

那位善于随机应变的强权人物冯·施莱彻尔将军，立即利用这种局势来为自己寻求政府首脑的位置。在取代巴本于员月猿日上台后，他企图造就一个横穿敌对政治战线的、由自由工会与纳粹党的斯特拉塞派组成的群众基础来支持总统独裁统治。这种独裁阴谋政治尽管在毁灭共和国上是成功的，但它并不能被用来为其造就反共和国的群众潮流，因为这种潮流已经被希特勒引向支持纳粹党了。

^①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源卷上册，商务印书馆员年版，第猿页。

因此，魏玛年底，几乎所有的政治选择被尝试过了：民主主义的选择自从魏玛年以来已被有计划地排挤到边缘上去了；总统独裁统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也已被弄得精疲力尽了；国防军的一场政变，由于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公众社会，以及大街上激进的军事战斗同盟之间的混战，只可能导致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内战。至于共产主义的选择，尽管自从大危机以来，支持它的选民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受到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左”的路线的影响，它“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方针，使得它甚至与另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都处于对立之中，因而未能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在这个时代里，它仍然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中，也仍然被束缚在自身抗议潜力的隔离带中。摇摇摇摇

这样，对于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来说，也只剩下纳粹主义的选择了。纳粹党尽管掌握着三分之一的选票，但仍然不能单独掌权。与此同时，那些迄今为止参与承担总统独裁制政府的力量，由于没有群众基础，也不再能统治下去了。但是，这两边都蛮有理由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对方。希特勒不愿使自己被老权力精英所驯服，去成为实现他们目标的工具。反之，老权力精英之所以还没有最后彻底毁灭魏玛民主，只是为了将希特勒激进的集合化运动排挤出他们刚刚重新占据的领导岗位。这种对立直到魏玛年底都一直阻止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安排。然而到魏玛年底至魏玛年初，看来这两派都急需达成一项妥协，希特勒急需得到权力，因为他害怕他的追随者队伍会因为或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或是他所许诺的胜利成果不能立即兑现而不断地缩小。而老权力精英们则迫切需要一个群众基础来维持统治，因为共产党的力量虽远远不足以通过选票来获得政权，但是，它选民的增长趋势足以令传统权力精英们感到担忧。^①这样，两派之间过去没有寻找到的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魏玛-魏玛》，慕尼黑黑魏玛年版，第 源页。

1934年11月14日，当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授命他组织一个“民族集中化”政府时，他同时也为希特勒提供了动用国家机器和依靠大量来自工业界捐助来夺取多数的可能性了。这场所谓的“民族革命”的活力终于被释放出来，在随后几个月里，这场根据驯服方案所进行的权力委托，演变为一场全面夺权，而这场全面夺权将民主共和制所剩无几的痕迹扫荡得干干净净。

第六节 魏玛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1918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岁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划时代阶段的。一方面，它处于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从1918年一直延伸至1933年。正是在这个时代里，重大事件痨病式地连续不断，危机震动程度不断加深。对于现代化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所有这些并非边缘性的条件或现象，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魏玛共和国分享了这个时代的前半期。在它15年短暂的民主生涯中，资本主义的异化危机，现代化带来的不平衡，社会安全保障的丧失，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生活环境要求的尖锐对立，所有这些，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带来的深远后果，共产主义在苏俄胜利的影响，通货膨胀，经济大危机，终于将这个共和国推进了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之中，它意味着一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时代又处在社会文化上的种种革新不断得到加强的划时代交叉点上，它构成了自从19世纪末以来得到加速的、也是被人们称之为“跨世纪发展”的现代主义运动的高潮。正是在这场高潮中形成了它社会生活环境的种种特点，发生了现代福利制度上，经济政策上，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现代文学、艺术、音乐、工程建筑上的种种突破。在短短15年时间里，现代存在的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可能性尝试与努力都被表演完毕，与此同时，这场现代主义运动也就陷入了它的危机年代。普遍贯彻之后，随之发生的是怀疑、撤回和崩溃。

现代主义这场大胆试验，是在难以想象、令人棘手、使人尴尬的框架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受一场全球结构性危机的折磨已经三十多年了，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表达的正是这场结构性危机的最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强烈阻碍的经济发展，已经缩小了进行每一种社会妥协的行动余地。若是拥有这种行动余地，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本来还是有可能在民主框架条件下为不同的人口利益集团所接受的。但是，在魏玛时代，不仅没有出现可供分配的增长，而且甚至出现了对分配来说是必需的物质财富的减少，从而也使得所有围绕着产品分配危机的斗争激进化起来，并不断加深了这个社会的碎片化和两极分化。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最后剩下的只有不可妥协的、而自身又无全面行动能力的诸对立阵营的对峙。

现代化在这里经历的先是充满希望的开端，后是矛盾冲突对改革行动的封锁，最后是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撤回的骤变。例如，“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在1919年头一次得到了宪法上的承认，在随后几年的改革中，也曾获得过公认的法律上的具体成就，但是，将它们付诸实践时，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内部矛盾和外部障碍，甚至不需要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也是有可能导致对这种“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的取消倾向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政策领域。1925年在大企业主集团与工会集团之间达成的“中央劳动共同体”协定，尽管带来了工人在企业中参与决定权的开端，以及一种具有未来风格的、由国家出面来加以保证的劳资政策体系，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靠通货膨胀政策来维持的。当这种“通货膨胀魔术”结束以后，分配余地便立即萎缩，以至于履行这场劳资妥协的基础便立即破碎。尖锐的分配斗争为企业主集团反对“工会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削减工人工资、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激进转变作好了准备。因此，在长期危机的重重负担之下，魏玛共和国的这场社会基本妥协终于变成了共和派巨大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迄今为止一直是有效的社会

文化上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崩溃，从而在现代化的吸引力与它所激起的愤怒之间，在社会中崛起的希望与对没落的担忧之间，酿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早就在越来越多地决定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口大众的行为了。但是，在这场失败的大战之后，由于不再拥有威廉时代那种传统装饰物给人们带来的“舒适的背景”，因此，这种情绪也就不加修饰地处于支配地位了。人们也就不再能回避这些现代化所带来的新东西了。这些新东西也绝没有只显示出它们的积极效果，它们的两面性特别是它们的消极效果，决定了日常生活的经历，也统治了文化上的讨论。当魏玛文化在整个社会中上气不接下气地上演完了、也试验完了这些现代主义的所有节目和可能性时，人们又几乎同时地抛弃了它们。

人们能够将“金色的二十年代”定义为理性化的繁荣阶段，它不仅代表着技术和经济理性化的一个繁荣阶段，而且也代表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式理性化的一个繁荣阶段。社会上和技术上的功利主义，以及对工业文明“进步”的欣快感，先是在“美国主义”的热情中达到了高潮，随后又在危机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这个现代化的进程所引起的发人深省和令人愤慨的对立反应，不仅是由对一种传统的追念所培育的，而且也是以一种先前就有的对这些新事物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为方向的。只有从这种双向的思路出发，才能对那场“新保守主义革命”奇特的意识形态上的融合进行合理的解释。

魏玛共和国本身也是负载着它的失败而出生的。那种曾唤起过世界大战热情的民族扩张主义潮流，也必然会对在战争失败前提下的任何一种和平安排感到失望。正是在不承认失败的“背后有人捅刀子”神话传播的影响下，在面对尽管是苛刻的、但仍然是可以忍受的《凡尔赛条约》时，德意志社会中才会产生出复仇式的民族主义的膨胀。正因为如此，对 1919 年至 1924 年对外谅解政策上的成就是不可过高估计的。尽管这种政策勾画了现代国际政治的转化轮廓，也尽管它是寄希望于世界政治上的合作和世界经济上的一体化的，但是，那种对民族主义神话的坚持，那种对民族主义大

国方向的理想化，显然为外交政策上的复仇式转变创造了前提。这种转变，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崩溃，已在 1918 年至 1919 年开始了，它最初表现为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而在纳粹上台之后便发展成“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

这场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胆试验本身是在立宪主义运动的轨道上进行的，它输入了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国会反对派们的议会主义传统，并在 1918 年革命期间达成了一种以“阶级合作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妥协。《魏玛宪法》也代表了一个多元性、开放性的政治行动框架，共和派们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内政上的进步改革的。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战后的一系列危机，由于在“相对稳定”岁月中社会经济上行动余地的缩小，这些进步的社会改革成就立即遇到了危机。这样，民主制度的政治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在德国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它实际上只是在使矛盾更加表面化、激烈化，并对社会冲突起着放大的功能，而丝毫无助于矛盾的缓解。就连每一场“完成了的革命”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加工的，更何况是 1918 年 11 月开始的这场保留旧权力精英的“不彻底的革命”呢？因此，早在大企业家集团撤出这个被掏空的共和国大厦前，早在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撤除这座大厦前，这场社会妥协就已经受到最为严重的损害了，而且社会深刻的分裂化已经在不同的世界观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社会环境碎片化中反映出来了。

至于魏玛共和国没落的原因，要追溯到四个不同的毁灭进程，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单一的进程本来又都是有可能被克服的。

经济和社会上的长期危机首先动摇了这个共和国，因此，履行 1918 年基本妥协的行动余地萎缩了，从而使那场社会经济的结构危机转变成威胁共和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稳定化危机。但是，单靠这种非稳定化局势并不必然使共和国走向崩溃，正如 1918 年这个危机年所证实的那样。

同时，20 世纪 20 年代进程中的魏玛共和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成功地在人口大众中维持它本来就很很不稳固的合法性能了。这种

合法性的丧失反映在 1918 年基本妥协的失败上，反映在德意志的个人和社会的无前途性上，反映在那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中间派政党选民的萎缩上，也反映在工人运动的分裂对左派行为可能性的阻碍上。在 1918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之初，这种合法性的丧失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以至于从根本上讲已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再去贯彻《魏玛宪法》的民主原则了。但是，要将这个共和国毁灭掉，这个过程还仍然是不够的。

为此，还需要加上敌视共和国的传统权力精英们所奉行的独裁式的转变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想彻底取缔 1918 年的那场基本妥协，并复辟俾斯麦帝国的传统专制独裁体制的权力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是存心要毁灭这个已经破裂了的议会民主制的。尽管总统内阁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这个合乎宪法的秩序，但是，由于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的群众动员化，这种传统专制独裁式的解决方案也遭到了拒绝。因此，这种解决方案既不能阻止迄今一直是中、右派的选民涌向纳粹主义，也不能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想象一种长久的统治。正是在由他们自身引起的这种无出路性的局势中，传统权力精英们才最后走向了与希特勒的联盟。

希特勒组织的纳粹运动本来也不足以单独推翻这个共和国，尽管纳粹党已经在 1930 年至 1932 年的危机年代里发展起一种现代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民众党的全部破坏性活力，尽管纳粹党始终握有三分之一强的选票。但 1932 年底已出现了纳粹党选民潜力损耗的现象，而对纳粹主义有更强免疫力的天主教阵营中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仍得到了 1/3 选民的 support，两个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也总共握有 1/3 的选票。虽然这些组织彼此之间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它们毕竟还能用数字表明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① 然而，那些传统权力精英们在毁灭共和国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复辟战前秩序方面却又太软弱了，当他们能赞成的所有其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4 页。

他选择都被耗尽以后，终于作出了最后的选择，也是最为激进的选择：将纳粹运动作为他们与国家统治危机进行斗争的盟友来接受。正是这样一个选择，才使希特勒得到了通往权力大门的钥匙，才使得纳粹运动的破坏性动力发展到了夺权。

当人们看到德意志第一次民主共和制尝试的失败结局时，难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每一种在德国出现的危机征兆在其他的现代工业化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偏偏在德国发生了纳粹主义的夺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到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中保存了民主制度的工业化国家里存在有别于魏玛德国的条件和前提。在此，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在那些国家里首先存在着一种自由、民主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已被社会的广泛阶层长久地接受并负载了，而且这种传统没有受到现代阶级、阶层区别或对立的限制，因而即使在危机条件下也仍然普遍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应的对民主制度的社会认同；二是在大危机年代里的西欧工业化国家里，普遍存在着一种由保守主义统治精英队伍领导的成功的政治运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治运动也仍然是在民主制轨道中运行的。而且由于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的保守主义的政治阶级，并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失败所导致的权威丧失之苦，因而在面对不足为惧的选民组成的右翼极端集团和运动的冲击时，仍然能够发展起一种很高的政治一体化能力，仍然能够在维持民主制度稳定化方面发挥作用。而这两者，即对民主主义传统的基本认同与保守主义政治精英们在民主制轨道之中的一体化能力与努力，恰恰在魏玛共和国中是缺乏的。这种缺乏正是德国的危机不仅首先表现为一场经济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一场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它即使没有直接导致，也无疑推动和加速了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毁灭。

事实上，正是由于德皇帝制的崩溃所导致的传统精英统治连续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过去作为控制和平衡社会矛盾之手段的容克国家权威的丧失，才使得 1933 年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在德国有着比在其他国家里更为粗暴、更为直截了当和不加掩饰的发展。而且这个

进程也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旧有的现代化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变得更为复杂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因此，在这个进程中，不仅现代化的光明面打下了特别具有魅力的烙印，而且它的阴暗面更以特别令人沮丧的烙印打在了民族战败、传统价值观丧失、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经历上。这些单个的危机因素联合成一场共和制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广泛危机，而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是具有惟一性的。因此，在这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面前，对德意志人来说，已不再有他们所熟悉的道路了，既没有社会和政治行为上人们所熟悉的路径，也没有个人生活道路上可以企盼的前途了。惊人的自杀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34年，每100万居民中，在英国有1500名自杀者，在美国有1500名自杀者，在法国有1500名自杀者，而在德国竟有2000名自杀者！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魏玛社会反映出这样的特殊性，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突然得以加速和突破；而另一方面，这种加速和突破与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对传统的依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又反过来将更多的危机因素联合在一起，使得这个社会在这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时代里显得特别的脆弱。

在面临这场传统与现代化激烈冲突时，由于民主主义在德国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因而提不出一一种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信仰，它体现的不过是彼此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保存、发展自身势力而达成的一场妥协罢了，而现在，由于现代化危机的深化，这种妥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种意识形态迅速被排挤到政治边缘上去了。

因此，对于这场冲突来说，德国仅仅出现了两种明确的回答：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坚持传统的世界观，它是由传统权力精英们所代表的。他们进行的反民主尝试，企图使用技术上的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100页。

效率与传统专制独裁统治的复辟式组合，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危机中，这些矛盾已经发展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尖锐程度了，而且对于他们的那种不让群众参与政治决断的传统专制独裁—复辟式的统治模式来说，群众的政治动员化和利益对立的政治化已得到太多的进步了。所有这些都使德意志的保守主义选择归于了失败。

马克思主义虽然广泛解释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困境，并指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现代性方向，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工人运动的分裂，共产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都使马克思主义只能为德意志社会上的部分失业工人所接受。因此，共产党力量的上升，只是达到了引起所有有产者恐惧的程度，而并不能达到推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程度。

这样，惟一还有可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义了。因为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正因为如此，在魏玛时代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它成为了惟一得到膨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它跑来充当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中介了。尽管民族主义在德国既无一种长期稳定的成果，又无自身的明确性，这些特点也同时暗示了这种中介作用的种种危险性。但是，民族主义的这种潜力却由于这场全面的现代化危机而变得更有现实性了。更重要的是，只有纳粹主义者才充分地利用了它，因为纳粹主义者能够用它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与风格、手段上的现代性，能够用它具有特别包容性的“反现代化——现代化”的呼吁在这种民族主义中找到更多的共鸣，并充分使用这种潜力。而德意志社会对权威崇尚的传统，也恰恰使得人们能够在纳粹党“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身上找到投影物，因而使希特勒的夺权变得更容易了。

如果人们将希特勒的上台仅仅看作是德意志传统路线单行道式的继续和高潮，那么这种观点显然只有一半的真理性。若是布吕宁或巴本成功了的话，那么这种观点还能够成立。但是，他们的失败表明，现代化进程的活力再也不可能加以阻止了，它已经突破了传

统专制独裁路线的轨道，向着纳粹主义的灾难性方向发展。

尽管 1933 年纳粹主义者在德国的夺权，不是由于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们的一种特别超重的优势，而是由于群众的政治动员化所带来的对传统精英政治权威的进一步削弱所造成的，但是，必须指出德国传统权力精英们的历史罪过：正是他们利用 1918 年至 1933 年的危机局势，最先作出了自上而下的反民主决断，而当他们的传统专制独裁式转变仍然没有出路时，他们又作出了支持希特勒的决断。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危机发展成了德意志的灾难，它将拖着欧洲与它同归于尽！

在这里，引用德国政治评论家瓦尔特·本杰明的这句话是合适的：“进步的概念也是能够在灾难的思想中得到论证的，但是当它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灾难！”^①

① 德特勒夫·允·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7 年版，第 104 页。

第五章

暴力的现代化

第一节 摇反现代主义的纳粹主义

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研究，也许吸引了各国世界现代史专家们投入最多的精力。第三帝国具体的编年史研究，希特勒对外政策研究，以及纳粹法西斯侵略战争研究，也无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有关第三帝国时代中恐怖、残暴、野蛮、罪恶的知识，更是成为了现代人类必备的历史知识。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第三帝国历史的具体过程，而是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运动与德意志现代化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要认识纳粹主义的反动性，就必须首先了解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性质，为此就必须首先了解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这对概念的含义。

所谓“现代主义”，就是指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不仅想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也想成为它的主体，不仅想理解现代世界，而且还想支配它的一切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与现代性的矛盾并存的，它既与现代化

的负面效应并存，又与现代化的美好前途并存。因此，现代主义概念的产生，表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本身，已意识到他在历史中处于不可避免的客体化过程中了，因而作出了刻画自身主体地位的反异化努力。但是，这种努力首先是在肯定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时，也是明确地以一种对新的现代性追求为方向的。所有的现代主义者，无论是启蒙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方案和理想蓝图，在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反现代主义”的概念是针对现代主义才提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有以现代主义为参照系才可以理解，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同样的矛盾。反现代主义本身同样也是受试图实现某些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现代化的新事物露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是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那么与现代主义一样，反现代主义本身也反映了来自不同阶层和权力位置上的人们对现代性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反抗，因而也同样能够找到它合法化的理由。但重要的是，反现代主义还往往表达了一种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深深的怀念，并且也是将它向过去退却的渴念与对未来乌托邦理想的向往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反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现实的否定与反叛，往往具有反理性主义的性质，因而也往往是以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文明成就为基础的，这一点将他们与一切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了。但是，不同的反现代主义者，其保守或激进的程度并不相同。保守的反现代主义者明确地以追求“前现代化”的社会形式为方向，虽然有时也喊出“革命”的口号，但往往还只是在现存秩序的框架内作渐进式的后退努力；而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则往往具有爆破现存制度的特点，他们向更为远古时代的退却往往是以“新开端”的面目出现的。但是，要想在政治上贯彻这种反叛努力，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同样也得借助现实的手段，即现代化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因而本身又是不可能真正脱离现代性的，或者说，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扭曲的现代性。但是在这里，它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已不是意识方

向上的现代性，而是手段上以及它所引起的效果上的现代性了。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艰难困境，早就导致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了。而现代化在魏玛时代更为粗暴、更为直截了当和不加掩饰的发展，使得现代性要么被一种盲目而无批判的热情所环绕，要么被人们带着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蔑视所谴责，因而也使得这场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但是，这场现代化全面危机的历程，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反现代主义的力量，它不仅掩盖和淹没了现代主义反异化进步努力的光芒，而且也使所有反现代主义力量激进性的总汇集——纳粹主义及其运动像海底的一座不断向上崛起的冰川一样，终于露出了海面，因此，纳粹主义对德国的统治，反映的也正是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积压起来的矛盾总爆发的一个结果。

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

要研究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就必须首先研究希特勒的世界观和政治纲领，因为这位拥有无上权力的纳粹“元首”的思想意识和所作所为才是决定一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甚至可以将纳粹运动称之为“希特勒运动”。

在 1924 年写下的《我的奋斗》和 1925 年写下的《希特勒秘密之书》这两本书中，希特勒曾坦白地交待过他的纳粹主义（~~希特勒~~ ~~纳粹主义~~ 也即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且直到 1945 年自杀前的《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中，这套体系都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然而，也正是这个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成为了德意志社会在纳粹时代的 12 年中所要走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暴政道路上的路标。

归纳起来，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一种集民族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保守主义的大杂烩，其核心思想则是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来源于远古的、原始的所谓“日耳曼—雅利安人”必须进行反对犹太人的种族斗争，伸张“优等种

族”的“世界历史性权力”这样一套伪科学的基础上的。它特别集中地反映了一种野蛮、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希特勒总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考方法，来向人们描绘一幅类似于远古时代内部封闭的原始氏族部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画面：

在这个世界上，除日耳曼—雅利安种族以外，其他来源或其他肤色的人都是劣等的，其中最为劣等的、最有威胁性的种族是犹太人。同时，这个高等、天然的主人种族，日耳曼—雅利安种族，比较起那些劣等种族来，总是拥有这种特权的，它履行着一种历史上的使命，那就是征服那些由其他劣等种族居住的国家，并将它们歼灭掉。而当它忘记了它的义务，逃避赋予它的使命时，那么它自己就将被歼灭掉。^①

在这种反动残忍的种族理论中，希特勒将他所仇恨的一切东西都集中在犹太人这个靶子上。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中，他列举了犹太人的种种“罪恶”和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日耳曼人越来越脱离他们的社会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受到了它内部的敌人——犹太人的支配。”而且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单是现代资本主义魔鬼的暗喻，而且也是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的政治势力。现代的犹太人公社，经过若干世纪的颠沛流离而存在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分散的民族，它是绝对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所同化的。但是，即使每一个现代犹太人可能都有一点原始的犹太人血统，也早已被极大地混杂了。犹太民族之间的真正联系，只是一种种族上特有的心理构成。这使他们不可能理解同化的过程，因而必须消灭犹太人！”他随即大骂：“犹太人是作为其他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寄生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员德-员德，杜塞尔多夫 员德年版，第 员德页。

动物来生存的，是靠从内部分裂其他民族而兴旺起来的。由于吸收了犹太人，主民族便被来自两个方面的政治光谱所毒化。”接着他又大谈犹太人是“万恶之源”的荒谬理论，他写道：“从右的方面，犹太人是使所有者和工人失去个性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者和宣传者；从左的方面，犹太人是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制造阶级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者。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犹太势力联合起来，分裂了他们主民族的统一性。”^①由此可见，他的反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所谓的反犹太“异族资本主义”，这种“反资本主义”与他的反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通过荒谬绝伦的所谓“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的阴谋论”，才获得了伪科学上的证明的。

希特勒甚至用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他第一个例证。他大骂“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联合，才毁灭了沙皇俄国的，而在1917年，德国也发生了这样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他还将在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概视为“犹太人的罪过”。“这种由犹太知识分子和鼓动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仅仅是犹太金融统治的序幕……”在他看来，魏玛民主共和国只是一个“犹太共和国”。“因为魏玛德国已经越来越被犹太势力所控制了。犹太势力是通过使用金钱、出版界、左翼政党以及贸易联盟，如果需要的话，使用恐怖手段来统治德国的；异族资本已经无情地渗透了魏玛经济，阶级冲突已经加剧；魏玛民主阻止着任何本来能将异族置于本民族控制之下的强有力政府的上台；同时，魏玛的对外政策不过是为了取得与法国的和解，而这正是德意志虚弱的确实征兆！”^②因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种族理论，也就与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反东方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合在一起了。

① 弗兰科依斯·吉诺德：《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伦敦1951年版，第120页。

② 弗兰科依斯·吉诺德：《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伦敦1951年版，第120页。

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个所谓的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兴旺起来呢？希特勒从种族主义理论出发，推导出他的强权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反映出他与过去德国大多数右翼思想家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淘汰法则”上的共同点，而且也是为他所要建立的个人独裁统治的“元首原则”服务的。

希特勒认定：“在种族斗争中，最强者将会余生并最终胜利。在这个世界上，自然淘汰法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强者胜利，弱者完蛋。而惟一正确的思考方式，以及惟一正确的逻辑就是要去导致强者的加倍强大。对每一位雅利安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合乎逻辑的思考和行动，这种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我所有的行动，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变得更加强大！”^①

希特勒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样一个论题，早在 1924 年 5 月 24 日由纳粹党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就对听众们这样讲道：

历史是诸民族的斗争，这是一场几乎无可避免的竞争，为了生存和繁荣，一个民族需要足够的领土来给予它自己正当的支持。因此，我们未来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占有并掌握足够的生存空间。为了能够成功地建立这样一个德意志世界大国，这个民族需要将它自己组织在一个能够动员、指挥联合力量的国家内。一个民族的力量，来源于它的领导能力以及它种族个性价值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需要一种政治体系，这个体系应发展并赋予这个民族中有特别天才的人物以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像议会民主制那样总是害怕特别的领袖人物，唯有这样的政治体系，才能避免将一个民族分裂成互相争吵的利益集团。总之，要贯彻一种成功的对外政策，要在历史上实现日耳曼人的繁荣，这个民族需要统一在一个独裁主义的民族国家之内。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64—1965，杜塞尔多夫 1964 年版，第 242 页。

这个民族，也只有当它贯彻了一场内部改造和统一化后，当它能够将整个种族，也就是它所有的人民，一致地投向对外政治的这个目标上去的时候，它才能有一场伟大的崛起。^①

希特勒将德国过去的失败，归结为历届德国政府没有能力为迅速增长的德意志人口成功地解决生死攸关的“生存空间”问题，因此，他自诩为“扭转这个种族的衰落”是他“铤而走险的使命”。在《希特勒秘密之书》中，他谈到了有关解决日耳曼—雅利安人“生存空间问题”的五种选择：

头两种选择，即“控制生育”和“向外移民”，意味着限制并减少人口的增长，这是被他坚决加以拒绝的。希特勒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无情地降低日耳曼人口的种族价值，因而也是完全有害的。”其理由是：“控制生育，意味着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哺育更少的孩子，而一个民族原始的健康，是需要无情地从更大数量的孩子中才能发展起来的。向外移民，会送走这个民族最勇敢、最有价值的人，并会使日耳曼种族中这个最优等的潮流去为别的民族致富。”至于希特勒后来在反犹运动与“文化专制运动”中，仅在老帝国境内就驱逐了 100 多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德意志犹太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些人具有日耳曼人的种族特性，或是他认为这些人的血液已被犹太人毒化了，因而留在德国恰恰是有害的。

第三种选择是“内部开拓”。希特勒写道：“虽然一种更紧张和更科学地耕作现存土地方法应被加以鼓励，但它的效果太有限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对技术所产生的超额期望，在其他更有指望的选择面前，只会造成损害民族意志的危险。”由此可见，在希特勒统治下，民用科学事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他愿去追求的东西。

^① 埃伯尔哈德·耶克尔、阿克塞·库恩：《希特勒，言论集，1925—1945》，斯图加特 1962 年版，第 100 页。

希特勒谈到的第四个选择是“将一个领土狭小的民族国家变成一部出口机器”。但他轻蔑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小日耳曼国家的选择和它的世界政策的定义”。“拿剩余的工业产品去交换国内不能提高产量的粮食，这是19世纪初英国已选择的道路。但德帝国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德国却愚蠢地仿效这种选择”。他紧接着表达了对“雨后春笋般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社会”的厌恶，并认为：“当工业增长与都市化，既不能与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所需要的农业人口的增长、也不能与农业产量的增长保持平衡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形势不仅对于种族生命力的发展是不健康的，而且对于民族的安全也是危险的。这会使民族的安全，危险地依靠其他民族的善意。已有太多的民族在希望依靠出口他们剩余的工业产品来生存了。一旦外部竞争威胁到一个民族的生存，那么任何民族都是会用武力来改变商业局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商业大国向英国发起的挑战，是多么地命运不佳。而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最后都不能指望它的出口能与美国工业的出口相竞争，因为美国工业力量来源于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这种选择也被他抛在了一边。

有一种选择，即“欧洲联盟”的选择，在希特勒看来根本就不是选择，因为它是与种族主义的教义水火不相容的。希特勒并不缺乏“超级大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代感，他甚至是世界上头一个提出“超级大国”概念的人，而且在《希特勒秘密之书》中，以及在煽动群众的讲台上，都向他的读者或听众讲道，他“已听到了美国巨人和俄国巨人在欧洲外围回荡着的沉重脚步声，美、俄两国也是最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并将在欧洲合拢！因为美、俄两国都有连在一起的大片领土和资源，以及巨大的经济潜力”。他继续写道：“那些相信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将只会是和平经济属性的看法，显然是浅薄的。当美国内部的殖民化完成以后，它就将跨进欧亚大陆，所有欧洲国家，在即将来临的与美国的野蛮经济竞争中，将与德国共命运。”但是，希特勒仍然否定了通过“欧洲联盟”来与美国竞争的方案，而这是他种族主义思想体系的必然结论。

希特勒这样断定：“任何机械的欧洲联盟，都不能指望通过加

在一起的力量与美国的能量抗衡。因为美国的力量来自于长期的统一，而欧洲的统一将会由于它内部的争斗而耗尽全部力量。即使这样的欧洲获取了霸权，也将被胜利者自己所击败，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将会很快消失它的种族性，而且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个欧洲，将是犹太人欢迎的欧洲，犹太人将会繁荣起来。这样一个欧洲的理想，只是古老的奥地利，一个具有外强中干结构的最鲜明的例子，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现。”因为“混血通常会降低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像奥匈帝国那样由日耳曼人领导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注定是要崩溃的，而且也是该受诅咒的。因此，欧洲若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民族性，民族性从本质上讲是原始的，因此也是不容扩展的”。对于泛欧主义的第一位提倡者，匈牙利的寇登霍弗尔·卡勒基，希特勒恶毒地骂道：“他是由所有人杂交出来的！因为他愚蠢地幻想着一个泛欧联盟有朝一日能扮演与美国的统一相同的角色。”希特勒甚至还表示他害怕德国取得在这种联合欧洲中的统治地位。“如果这样的欧洲取得胜利，德意志人将堕入圈套，整个日耳曼民族会逐渐地被它的猎取物所混杂、消化和吸收，并最终在一个种族陷阱中消失。”①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是不会在他欧洲超级大国的蓝图中给其他民族留下任何空间的，甚至对这些民族连作为进贡者的资格也不给！那种认为种族主义政策后来严重干扰了希特勒对战争指导的见解，显然没有击中要害。贯彻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恰恰是希特勒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与目标。

这样，希特勒的逻辑无情地导致了他的第五个选择：

扩张领土，夺取生存空间。日耳曼民族不是在世界遥远的地区，而是在与德国毗邻的地方开始；不是要散布全球，而是要在足够的空间上保持在一起发展。这就要靠征服毗邻民族，

① 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秘密之书》，纽约 1951 年版，第 151 页~ 152 页。

并处置他们的领土来建立这种空间。日耳曼人，以及其他经过适当修整的日耳曼群体，将在清除了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种族后的空间上逐步实行殖民化。^①

因此，“收复失地”，吞并奥地利，建立“大德意志统一帝国”，只是他实现更大霸权野心的一种手段。这种更大野心，意味着这个种族帝国向东与向西无止尽的征服与掠夺。

这种“生存空间”的夺取自然意味着战争，因为在他看来：

除非德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否则就不能稳定地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场成功的与俄国的战争，才能为德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没有这种根本的空间领土作保证，任何成功都将是暂时性的，都将只会是旧有的世界体系压碎德国以前的一段插曲。德国只有取得整个欧洲大陆，才能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抗衡。要最后取得整个世界的霸权，那是迟早早会与美国和美国发生战争的，因此，战争与暴力是必需的！^②

这种夺取空间的“暴力论”得到了反复的强调。在 1937 年关于进行战争经济准备的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备记录中他这样声称：“我们人口过密，在自己的基础上不能供养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有在扩大生存空间的道路上才能找到，当然也仅仅只有采用惟一的方式——暴力！”1937 年他在一次对党卫军“接班人”的谈话中讲道：“长远来看，以 100 万或 200 万平方公里来供养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永久性地满足于这个不能得到扩大的空间，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民族的没落。”^③ 显然，这种所谓的“空间狭窄感”以及暴力式“夺取生存空间”的渴望，恰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38 年版，第 187 页。

②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38 年版，第 187 页。

③ 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 1937 年版，第 187 页。

恰反映出希特勒对反现代主义思考模式的固着化。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人口物质上的确保，正如经济上的成功一样，已经越来越少地建立在区域大小的基础上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民族的知识与能力素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取决于一定框架内知识与能力的集中化，取决于由此而提供的种种前提条件的，并是通过不断扩展贸易关系来得到补充的。通过对欧洲城市文明发展史的了解人们就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是尼德兰、英国，最后还有鲁尔，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现在还知道，就在一片并不比这个纳粹帝国版图的一半大多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上，几乎与战前在德国生活的人一样多的德意志人口，确保了一种高得多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事情都足以剥去希特勒“生存空间”强盗理论的反动伪装。

希特勒在总结过去那场战争时，严厉诅咒了俾斯麦以来德帝国所有的执政者，并将那个帝国时代看作是一段“漂泊不定，优柔寡断，令人遗憾的记录”。他写道：“在俾斯麦以后，没有一个人解决好了这个新帝国生死攸关的对外政策问题。而第二帝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德国成了一部巨大的出口机器，并愚蠢地梦想通过工业和商业扩张进行和平征服。这样的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英国的尖锐对立，而又没有真正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因为英国巨大的商业体系已经用武力建立起来了。”“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德国政府，最后为了矛盾的目标所作出的使人狼狈的追求，付出了一片日耳曼人鲜血的海洋。”

在对旧帝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中，希特勒并没有放弃攻击议会制度的机会。“为什么日耳曼民族会有如此糟糕的领导呢？”希特勒判定：“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的帝国早就已经腐烂了。因为在第二帝国坚持君主制保守主义形式的同时，它竟然允许一种议会制度的存在，这种议会民主制度早在帝国时代就已经逐渐在损害贵族和君主制的权威了。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损害了统治阶级一样，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瓦解了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因此，希特勒干脆地表示，他是“决不会去重建旧帝国的那套制度的”，他

要建立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纳粹主义新秩序”，“在这个独裁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内，将实行各阶级的合作主义，遏制资本主义，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驱逐外国资本和异族金融力量，使经济脱离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痛击，并向着绝对主权和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一旦民族社会主义使国内基础恢复活力，德国将推行一项真正的，夺取生存空间的对外战略”^①。

不错，尽管在全球这个时代中各国不同的法西斯主义，都具有向后倒退、恢复遭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冲击和损坏的旧价值观念的反现代主义精神特点，但是，德国纳粹主义还有它更为突出的重要特点：它从不打算恢复保守主义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而是要给更为古老的价值观念以“新的动力”，并使之复活，这种“新的动力”就是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与极端种族主义。正是这种结合，才使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社会充满了恶魔般的虐待和狂暴气氛，才终于使希特勒纳粹主义及其统治成为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独一无二的反动现象。

1935年 12 月，在征服了西欧大陆一年之后，并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前夕，希特勒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他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复古主义愿望，他这样写道：

在不远的将来，德国将采取最伟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将建立起雅利安种族永恒的世界统治。随着世界霸权争夺战中“优胜者流动奖杯原则”的失效，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将成为过去。因为借助整个欧洲的工业潜力，结合东方的劳动力，我们将重建起古罗马式的庙堂、温泉浴场和宫殿，我们将永远逃出一个复杂化的、对个体来说已经不能认识的世界，并因此而放弃对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克服的追求，也无需再回到欧洲传统秩序设想的框架内，去追求这些

^① 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35 年版，第 22 页。

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历史，自从 1914 年以来就已经被中断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重新返回去！^①

概括起来，灭绝犹太人，奴役所有民族，消灭自由民主，消灭共产主义，建立、巩固法西斯独裁统治，“纯洁日耳曼种族”，夺取“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就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最终目标。这种荒谬绝伦、残忍好杀、嗜血成性的纳粹种族主义，不仅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挑战，同时也勾画出一条“暴力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因为要达到这种反现代主义目标，是必须借助最现代化的战争手段的，因此，它的极端反动性和危险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激进的意识形政党在德国的上台，不仅是德国历史的悲剧，同时也意味着对整个人类的一场最为残酷的战争。

二、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无论是希特勒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对手，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事实：大量的德意志人，尤其在 1933 年以后，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是追随希特勒的。希特勒的纳粹党虽然没有成功地通过议会的大多数来夺取政权，但它在议会竞选上的成就，无疑是这个党最后能夺取政权的一个广泛而根本性的前提，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到 1933 年 1 月，至少德意志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支持这个右翼极端政党——纳粹党和它的“元首”的，而当时任何其他政治派别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支持率。

在希特勒对民主力量的绞杀和全面夺权中，德国产业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及自由主义者、天主教主义者只属于未作有力反抗就屈从了纳粹政权的人，但是，德国的中间等级却深深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这个等级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最为狂热的纳粹信徒，以至于中间等级成为了这场纳粹运动的载体阶层和中坚力量。

^①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 1958 年版，第 105 页。

这一点能够通过 1933 年危机前后中间等级在纳粹党成员中超过比例的优势而得到证实。

如何才能理解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种亲合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首先了解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心理状态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谓“心理状态”就是通过人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受这种环境影响、造就的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人的直接属性。^① 而德意志现代化的曲折道路，直接影响了德意志中间等级心理状态的发展。

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它大致包括三个集团：由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商人以及小农等“老中间等级”组成的“独立经营者”集团；由职员组成的“职员集团”；由小官员、各级教师组成的“公职人员集团”（后两个集团也被称之为“新中间等级”）。然而，这个社会中间层，在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场得到加速的内部分化和非统一化进程。

自从德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进入高工业化阶段以来，“老中间等级”就已经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排挤了，他们的人数一直呈绝对下降的趋势，这个在 1848 年革命中曾作为市民革命主体的老中间等级，到 1913 年在总就业人口中仅占 15% 了。但是，由于工业技术和企业经济管理的不断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化社会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以及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因素，“职员集团”和“公职人员集团”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而使“新中间等级”在总就业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至少到 1913 年，他们在总就业人口中已占据了 15%。正是由于“新中间等级”的快速增长，才使得整个中间等级在 1913 年以前达到了总就业人口中 15% 的水平，而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于“合理化”

^①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 1913 年版，第 26 页。

的进程，人数是呈下降趋势的。到 1924 年，他们已经下降到 1906 年的水平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工人队伍是处于分裂状态的，而且在他们当中，尤其在农业工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将自己看作与工业无产者属于同一类的，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业现代文明与农业传统文化上的对立，使农业工人的大多数在思想意识上，是将自己与乡村小资产者的农民相认同的。^①

中间等级在大危机中普遍表现出与纳粹主义的亲和性，首先是与德国在工业化世界中最早完成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直接相关联的。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来说，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经济的中央组织化，结束于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而德国则早在 1914 年就开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场过渡。

在德帝国时代，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虽然满足了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和农业大地产经济上的发展需要，并带来了工业化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但同时也首先危及到德意志中间等级的社会安全。

首先这个干预型国家并没有在财政上扶植、资助那些由小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小商人组成的“老中间等级”，而是歧视他们。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权力精英们认为：“这个阶层即使在经济上发生虚脱，也不会产生大工业界在虚脱状态下所带来的那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② 而恰恰是这个阶层在激烈的竞争中，最为敏感地感受到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了强烈震动，因为在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可能上升到工业大资产者行列中去，而绝大多数不能保持中间地位的人，都迅速滑入到无产者的行列之中。至于小农阶级，在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其社会地位和

^①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4~1933》，斯图加特 1982 年版，第 100 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914~1933》，斯图加特 1982 年版，第 102 页。

意义是随着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断下降而下降的。这个干预型国家对大地产的特别优待和资助，同样意味着对他们的冷落和歧视，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与城市中的老中间等级一样，作为资本主义战线上的一种小资产者阶层的附属物，其意识是以一种过了时的“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追求为方向的。丧失旧有独立性的威胁和陷入社会分化过程的担忧，使他们中的败落者早就在寻求一种向后退却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工业资本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了。

“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无产受雇者行列。但这个阶层的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职员是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作为“白领阶层”出现的。但是，作为受雇者，职员阶层却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以及劳动独立性方面，都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在经济生活中，受雇者对雇主的依赖性将他们与产业工人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地位上的特权、特别的意识，部分地也通过更高的工资，他们又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产业工人区别开来。这种介于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状况，将这些职员推进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之中。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局势的波动而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他们的政治选择在帝国时代有着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但是，在竞争中陷于不利局面的成员所表达出来的愤慨中，已经流露出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特征。

职员阶层也在发展一种处于无产者与老中间等级之间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仅反映出他们向老的“等级思想”靠拢的倾向，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力图用一种能证实自己也具有特别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来掩盖他们实际上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但是，在坚持传统主义方面，职员们又是缺乏经验的，因而在他们身上又呈现出特别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他的名著《职员》一书中，将“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

主义世界”看作是“职员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这位思想敏锐的社会学家还特别深刻地指出：

一方面，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职员式的秘书或女售货员，与职员式的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的。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来操纵大城市的业余生活，来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对“办公室机械化”的一种有力回击。这样一个世界，就像吸尘器打扫日常生活中的灰尘那样，已清扫了最后一个角落。^①

总之，现代性，优于产业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欲望和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队伍中带来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一种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

在“公职人员集团”中，小官员是随着社会管理复杂化才在人数上增长起来的。他们与职员的区别主要反映在：职员是受雇于私人企业的，他们则是受雇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普遍阶层”意识及“无财产性”，培养起他们的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气质。但是，与那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比起来，他们又充满了自卑感。不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使他们可望而不可及，而且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政府裁员也总使他们胆颤心惊。因此，他们也力图通过诸如“德意志官员联盟”之类的组织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组织往往具有保守主义性质，但是，他们中的被辞退者又往往是向右翼激进主义转向最快的人。这种特点也特别是那些军队中的非贵族

^①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法兰克福 1970年版，第 226页。

出身的中、下级军官们所共同具有的。^①至于以各级教师为主体的学者阶层，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已表述的那样，是一个早已处于危机之中、并不断丧失“优越感”的阶层了。但他们中间也有区别，中、小学教师往往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右翼激进主义的倾向，而大学教师中占优势的力量，往往具有右翼保守主义的性质。^②

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尽管有着种种社会局势上的区别，但也有着共同的特点。作为社会的中间层，他们普遍具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们不仅从对容克贵族、工业大资产者的奢侈豪华的羡慕、嫉妒以至怨恨中，产生出“向上爬”的欲望，而且也从他们相对于产业工的优越地位中，产生出强烈的自傲感，以及对一旦竞争失败后便可能落入无产者行列的恐惧和担忧。面临帝国时代传统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中间层的感受是矛盾和复杂的。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在这场由容克传统权力精英推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本身受到了等级上的歧视，因而对这个权威国家总是表示厌恶、反感和不满；另一方面，这个权威的专制国家毕竟还能在政治安定上发挥作用，这种安定又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依赖的。尤其对那些拿工资的新中间等级的职员、小官员和教员来说，帝国政府毕竟还为他们提供了有别于产业工人的更为优待的养老保险金。因此，正如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概括的那样：“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渴望服从，又向往权力。’”^③

如果说从他们对服从的渴望中反映出对一种能为他们的利益提供确保的权威政治的寻求的话，那么从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中，则产

①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 员德年
版，第 员德页。

②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员德- 员德》，斯图加
特 员德年版，第 员德页。

③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 员德年版，第 员德页。

生出一条激进主义的新政治路线。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利普塞特所指出的那样：

这条政治路线，是传统地处于中间位置的，它是通过对另外两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厌恶来体现自身的：一条是关系到大地产和大资本切身利益的右翼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条是由产业无产者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左派路线，而中间等级激进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们，极力寻求不受来自从左到右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感染。他们寻求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以便能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是将这两条道路同样作为灾难和痛苦的经历来感受的。^①

这条道路在帝国时代，首先通过那些激进主义的反犹组织获得了它最初的雏形。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是社会地位的不安全，它最初的行为载体是打有这种不安全烙印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由他们组织的中间等级落泊者集团。早自 1904 年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反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东西。

这条反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路线，在帝国时代一时还难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社会统一化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由于整个中间等级的成分是复杂而分离的，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命运和意识倾向也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更倾向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情绪，而且也更具有现代化的烙印，小官员则往往具有独裁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性格，教师中更突出的是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而他们之中境遇较好者，尤其新中间等级中的地位较稳定者，甚至也可能选择自由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75 年版，第 198 页。

代表。唯有他们中最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给自己带来了威胁的人，才通过这条激进主义路线来体现自身。

二是由于在帝国时代的政治安定中，依然有一些因素在帮助支撑这些惶惶不安的中间等级个体，如财产，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家庭，最后还有作为强大的德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危险在于，一旦这个中间等级集团的地位受到强烈震动，便总是极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激进的新独裁主义解决手段。^①

魏玛共和国时代具有连续性的经济灾难使他们的命运趋同化了，中间等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被贫困化和碎片化的统一性取代了，政治安定的环境被社会动荡的局势取代了。

在 1918 年战败和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年代里，德国中间等级在经济上迅速败落。史无前例的 1923 年超通货膨胀，将他们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如果说 1918 年~1923 年的相对稳定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话，那么 1929 年 10 月开始的大危机却又使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在这场危机中，他们终于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境地之中。

君主制的崩溃，已使中间等级过去赖以生存的基础遭到了毁灭，通货膨胀和大危机不仅打击了他们的节俭原则，而且也严重损害、最后是毁灭了魏玛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随的，是他们社会声望和权力的一落千丈，这严重地影响到个体权威即父母亲的地位，尤其当他们作为其子女经济未来支持人的作用也丧失掉的时候，便导致了他们获得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因此，在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困难，在未经自己成熟反思的情况下可靠地调整个人行为的困难，在变化中维护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在一个专门化和抽象化的世界中获得私人关系和成员资格的困难，在家庭中找到兴趣与幸福的困难，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个阶层的成员中都是存在的，但在

^①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前提与开端》，哥廷根 1923 年版，第 102 页。

地位迅速变化的中间等级成员身上，总显得特别尖锐。

德国中间等级对《凡尔赛条约》报有特别的愤恨是有原因的。像英、法、美这些早起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自从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大多经历了五十年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漫长发展，海外广阔的殖民市场为这些国家的中间等级长期、较稳定地“向上爬”创造了较好条件。事实上，这也正是这些工业化国家能长期保持民主制度稳定性的重要条件。而在德意志，自由竞争只经历了至多二十年的时间，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入“高工业化”时期以来，由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中间等级立即面临了国内市场完全被垄断的局面。将“向上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海外扩张上的德国中间等级，在世界市场已被瓜分完毕的严酷事实面前，毫无困难地成为了德帝国时代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意味着他们通过向外扩张实现“向上爬”的理想遭到了迎头痛击，因为战败后七分之一的领土、大量工业资源和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本身就意味着中间等级的发展余地变得比过去更小了。因此，当战胜国即西方民主国家强加的民族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经济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屈辱联系起来。

在对待魏玛民主制度的态度上，德意志中间等级不同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为帝国而战，但也正是在由战败和革命导致的帝制垮台中，才得到了某些在帝国时代没有得到的政治、经济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时代所代表的那条共和主义路线得到了部分贯彻，但是，“阶级合作主义”导致的依然是那条冷落中间等级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强化，因为这条路线甚至比帝国时代更少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中间等级中相当部分的成员，从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制怀疑、反感，甚至是仇视的。

那些在 1918 年以前还对民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中间等级成员，当贫困化的威胁在大危机中向他们再度袭来的时候，对魏玛制度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这一点，人们能够通过中间等级的自由主义政党

从 1914 年至 1918 年的快速消失过程中观察到。但是，中间等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不能导致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共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以阶级名义进行的政治宣传都无法吸引他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进行一场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包括扫荡中间等级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因此，这个成员复杂而分散的社会中间层，害怕“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磨石之间被碾碎”，因而极力寻求一场能替他们鸣不平的统一的新政治运动，而这场政治运动只需完成与帝国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政治路线的接轨，就能争取到德意志中间等级各个职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

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当社会形势或是历史联系达到了这些阶层所不能理解的程度时，那种由于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恰恰能符合这整个等级的典型的心理状态。”^① 在这些陷入没落的中间层身上，社会歧视的偏见总能打下特别深刻的烙印，而他们现在由于经济上的无产者化，已经成为了偏见的牺牲品。因此，这些受歧视者需要一种地理上、经济上、宗教上或是其他方面的同情和亲近。现在他们相信，唯有通过强调他们的“民族”（~~国家~~）思想，才能防止他们与一直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相混淆了，因为“工人无祖国”，是“国际”（~~国际性~~）性的。因此，在这场由大危机所带来的“中间等级恐慌”之中，当希特勒举起“民族”的旗号走来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纳粹宣传的热心听众。希特勒向他们提供着这种证明：“这个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中间等级就是民族本身！这个民族不仅由于自由、民主意识的毁灭性影响，而且也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动力的毁灭性影响而受到了威胁。”^②

①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 1914 年版，第 20 页。

② 汉斯·施派尔：《面临纳粹主义的职员们》，哥廷根 1918 年版，第 10 页。

于是，德意志中间等级通向纳粹运动的道路，终于被勾画出来。在这个具有“独裁美德”的共同体中，为实现所谓“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健康”理想，终于在这场“反对阶级斗争的斗争”中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能量。而被希特勒称之为“促进正常国家秩序的健康民族感”，正是“元首”与追随者之间联系的真正酵母。

三、现代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

在这种所谓“健康的民族感”中，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催化剂发挥了作用。它不仅是希特勒之流真实信仰的东西，而且也是希特勒手中的一件有效的武器。希特勒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作为世界敌人，那么就必须直接去虚构这样一个敌人。”“无疑，反犹主义是他宣传武器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东西。”^①事实上，反犹主义的社会情绪无需希特勒去加以虚构，而是德意志社会上历来就有的东西。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就必须去揭示在现代化进程的压力之下，德意志反犹主义发展史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之间的关系。

反犹主义的思想倾向首先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反犹太教的古老传统。犹太民族先是作为“巴比伦之囚”，失去祖国，漂泊流浪，客居他乡，后是作为各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大都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脆弱的社会组织。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些“外来户”既无资格做农民，又被孤立于基督教世界之外，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宗教迫害、文化歧视的靶子，因而也只能在当时是“低人一等”的商业贸易和现金交易之类的行当里艰难谋生。因此，在欧洲大陆上，犹太人这个概念，一直就是“叛徒”、“下等人”、“黑死病带菌者”、“寄生虫”、“守财奴”、“刻薄鬼”以及一

^① 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 1954年版，第 144页。

切恶名声的同义词。

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了德意志，普鲁士在现代化大改革中也于1806年宣布了犹太人的“解放”，从而使德意志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非犹太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当然，这种“自上而下”宣布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更不意味着这种“平等”意识为非犹太的德意志人所普遍接受。

犹太人的这种“解放”几乎与德意志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时启程。但是，这场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改变着社会生活的环境，而且也产生出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人们可以利用的，又是人们所必须加以忍受的。而历史上具有经商传统的犹太人，此时如鱼得水。这个不足德国人口1%的少数民族，在这场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几乎是整体性地跳入到富裕的人口阶层中来了。“到1844年，犹太人中已有1/3上升到中、上层资产者的纳税阶层之中，其中1/3以上是独立经营者，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4倍。而在1859年，犹太人的1/3成为了大城市人口，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1.5倍。1870年，10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1个是犹太人。”^①而且帝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家布罗希洛德就是犹太人。

与经济地位的提高相应的是，犹太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其比率也极大地超过了平均值。他们在现代科学、思想文化方面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表明他们已由过去的德意志文化的消极享受者，变成了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积极而富有成果的参与者。1870年以前，仅出身于犹太少数民族的诺贝尔奖得主就达15人之多。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在社会活动家中，德意志犹太人更是提供了众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人物，如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大诗人海涅、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拉萨尔、共产党的奠基人罗莎·卢森堡，以及德意志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伯勒、腊斯克、班贝格等。犹

^①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53年版，第101页。

太人在这个专制社会里没有获得真正的社会解放，这也是犹太出身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们，普遍具有政治思想上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倾向与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方向相一致。

但与此同时，犹太人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在这个他们曾世代代遭受宗教迫害、社会歧视的德意志社会里，又必然会加剧他们与非犹太德意志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甚至他们“解放”的速度越快，他们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

激烈竞争的压力使不少人找到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通往胜利者的道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而犹太人，由于他们千百年来的经商传统，因而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具有对市场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这样，他们也就表现得似乎比其他人更熟悉那条通往胜利者的道路，因而也就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起者一样，这使得德意志非犹太中间等级的反犹倾向具有了一种反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

作为非犹太“老中间等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进程总是既陌生又怀有敌意的。当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到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强烈震动时，“是将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困境，归于犹太人发明的日益增多的百货商店的”。^①这同时也使他们来自宗教传统的仇犹情绪，不仅具有竞争上的强烈意向，而且也具有某种反工业现代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性质。

小农阶级反犹情绪的爆发是以德意志农业经济结构性危机为背景的。这个阶级的成员，由于传统的反犹观念，本身就对犹太银行家、典当商、谷物牲畜商人的存在感到恼火。但又往往要依靠一个犹太当铺和银行家的贷款，或是通过一个犹太商人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在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断

^① 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法兰克福 1955 年版，第 150 页。

下降，造成的结果又恰恰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信贷利息的增长，这自然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因此，将犹太人视为“罪魁祸首”便成为他们一种相当自然的表达。这些人的反犹情绪中往往带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反工业现代主义，以及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保守性特点。

作为“白领阶层”的“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首先出现在第三产业的商店和银行之中，而这里也正是犹太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① 产业工人在受剥削的生活实践中，看不出犹太与非犹太资本家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且也由于犹太人在产业资本中的确没有什么地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反犹主义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发展一种自身“社会文化”的过程中，职员尤其是那些受雇于犹太资本的职员，首先将他们经济上反资本主义剥削的念头，转移到对犹太人的仇恨和种族情绪上，因为这种融于民族主义中的反犹情绪，能为他们求得一种特殊的意识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恰恰是与他们当中日益发展起来的那种强烈愿望相一致的，即将自身与那些作为“国际无产者”的产业工人区别开来。这种意识也迅速感染了受雇于非犹太资本占有者的商店和银行中的职员，因此，整个德意志的职员队伍，不仅都具有反犹情绪，而且也往往打有反马克思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意识烙印。

经济危机总能将更多的中间等级成员推向贫困化的边缘，因此，在这个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里，只要出现经济危机，犹太人总是作为引起非犹太中间等级经济灾难的“替罪羊”来出现的。在 1871 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 1871~1873 年、1874~1875 年、1876~1878 年、1880~1882 年间的历次德国经济危机中，各种反犹组织的“反犹太民族剥削者，反犹太交易所骗人勾当”之类的口号，对于非犹太中间等级来说，总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由经济原因

^① 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法兰克福 1955 年版，第 152 页。

所触发起来的中间等级反犹情绪，本身也是可以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时落时涨的。

一直能获得稳步发展的反犹主义，还不是这种由于经济局势波动所触发起来的反犹主义，而是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反犹主义。由于这种反犹主义的力量是以捍卫民族国家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来行事的，因此，它既能通过经济危机在社会上扩大基础，又能通过经济繁荣来得以加强，因而也就能够在德国政治的历史性骤变中保存下来，并最终成为了纳粹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严格地讲，学者阶层中的成员，作为社会“新中间等级”的一员，是可以为任何一种利益服务的，而这取决于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所受思想体系的影响。最极端的反犹主义出现在这个领域中的右翼集团里，与他们有特别多的犹太同行有关，没有这些竞争者，他们无疑会过得更好。但是，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集团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了知识界左翼进步文化先驱者们的挑战，而相当部分的犹太学者是属于这个先驱者阵营的。在这些自诩为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精英”，而在文化观念上还基本是“乡村式的思想家们”那里，不仅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被视为敌对民族的思想，~~1918~~1918年法兰西革命思想，在德意志社会渗透的结果，而且连他们所反感和仇视的一切东西，如现代城市文化，包括现代戏剧、无调性音乐、现代建筑风格、绘画和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他们的文化批评运动中，反现代性压抑的斗争是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集团的成员分为两大派，即保守派与激进派。~~1918~~1918年以前，在这个集团中占优势的是前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容克贵族家庭，并往往与皇室有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大多为学者阶层中的学院派成员和神职人员。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派，是从“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出发，来否定所谓“德意志—犹太混合文化”的。在这里，犹太少数民族已经不是作为经济上的“犯罪集团”，而是被作为“外来文化的异体”来看待的了，因而他们号召：“必须对犹

太人进行惟一神圣的民族文化上的加速征服。”^①这种“同化”观念，不仅在容克—大资产者的政党那里，如帝国时代的保守党或魏玛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那里，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那里，一直引起了共鸣。也正是在这里，有着一一条通向魏玛时代的“文化悲观论主义”，通向“新保守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路线。

激进派的成员往往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们大多是来自中间等级家庭的人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犹太大学生就学率的超比例，本身就加剧了他们就业前景中的竞争，而犹太人在文化思想界的进步角色，更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挫伤，因此，他们往往通过激进的反犹太来谋求政治上的生涯。也正是这些人，源源不断地为反犹政党组织提供着政治上的组织者和理论上的指导者。

但是，文化知识界的反犹太主义之所以能在帝国时代完成从保守到激进的转变过程，也是直接与 1914 年以后德意志经济上跳跃式的发展，社会多元化挑战的加剧，内部市场垄断性的增强，海外市场中的冒险与扩张意识的抬头，以及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民族主义膨胀相联系的。如果说保守的反犹太主义者要求的还只是对犹太人无条件的“基督教德意志化”，那么激进派则已开始从“人和种族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的观点出发，来进行反犹甚至是灭犹的宣传了。作为这场转变的代表人物，帝国时代最大的反犹太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发起者、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海因里希·克拉斯，是将这场激进的反犹运动作为对知识界右翼保守派观点的一场“革命”来看待的，他公开声称：

我们年轻人是要进步的，是要革命的！我们并不要什么文化上的征服，也不要什么同化，因为这种征服与同化只意味着宽容。当宽容在善待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时，我们并不想从这种宽容中学习任何东西。我们将抛弃这个意义上的每一种自由主

^①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3 页。

义观念中的人道主义，所有那些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以及由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所体现和宣传的东西都应抹掉，因为我们要的是一场日耳曼人的革命！^①

他们的反犹主义已无需再用宗教、文化、经济上的理由来遮遮掩掩，它现在的理由直接就是“人种上的理由”。

由于这种具有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民主自由色彩，为人类不平等进行公开辩护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是以一种原始的、没有得到进化的、“血统纯洁”的人种集团模式来作为未来的理想的，因而也就彻底否定了环境与教育的因素，否定了任何“同化”和“解放”的可能性。因此，这种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使德意志的反犹主义完成了由传统的旧式宗教反犹向现代新式种族仇犹的划时代转折。

在这个转折的基础上，一种文化上的反命题被制造了出来。其中，犹太少数民族仅仅是作为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理想模式的对照物出现的：“犹太人毫无根基，而日耳曼人土生土长；犹太人依赖于外部的法律，而日耳曼人在习俗上是独立自主的；犹太人满脑袋只有商业意识，而日耳曼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思想深度；犹太人喜欢的只是流于表面的无所事事，而日耳曼人则具有扎根家乡的历史固定性，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个性。”^② 在这里，显然已经完全具备了希特勒所强调的“健康的民族感”的基本内容。摇摇摇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泛滥，政治思想生物化的倾向在现代反犹主义中成为了强有力的因素，以至于大量“青年理论家们”已经在鼓吹“进行一场绝对优等种族歼灭绝对劣等种族的战

①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黑瓦特年版，第 103 页。

②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黑瓦特年版，第 103 页。

争”了，并认为“这场生存竞争是民族之间根据自然法则所必然要进行的”。^① 大量的反犹文章都少不了“犹太人是黄色国际（国际金融资本）与红色国际（共产国际）的幕后操纵者”，“犹太人企图征服世界，并首先从德国开始”的警告性描述。^② 海因里希·克拉斯在 1934 年出版的《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已提供了剥夺犹太人全部财产和权利，并将犹太人全部逐出德国的措施表，而卡尔·帕希认为：“最简单、最实际的解决犹太人的办法，无疑在于将犹太人全部消灭掉！”^③ 这正是 1933 年以后希特勒纳粹德国所要达到的反犹目标。

所有这些激进的反犹先锋们，在政治上追求的正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条中间等级的右翼激进主义路线，一条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路线。它不仅具有种族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特点，而且还具有反保守主义特点。这些反犹激进派将矛头公开指向了现存权力关系和统治秩序，当然也威胁到了容克大地产和工业大资本的根本利益。他们喊得震天响的“将所有反帝国秩序的反犹民众集合在共同旗帜下”的口号，使得威廉二世也得出了与俾斯麦同样的结论：“对这些人的让步必然会导致对整个德国的战争。”^④ 因此，在德意志政治发展扭曲离奇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似非而是的形势：激进的现代反犹主义，当它想在政治上贯彻其纲领、享受其权力的时候，它需要这个“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国家的崩溃，以及权力向一种“自由”、“民主”的议会政治制度的过渡来作为它绝对必要的前提。

① 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 1935 年版，第 206 页。

② 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 1935 年版，第 101 页。

③ 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 1935 年版，第 206 页。

④ 帕勒·马斯良：《政治上反犹主义的来历》，法兰克福 1935 年版，第 101 页。

当然，在帝国时代的激进反犹太主义组织中，除了少量跨行业的组织，如“泛反犹联盟”、“泛德意志同盟”外，大多还是按各职业阶层来编织的，如“社会帝国党”、“德意志社会党”、“德意志农业反犹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等。尽管这表明了这种激进主义政治力量的分散化和非集中化，但它已足以对传统权力精英们构成一种有威胁的挑战了。因此，对传统权力精英来说，将这股潮流引向外部，本身也成为了统治者解除国内政治负担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因为随着德帝国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这种民族主义所鼓吹的“内部更加统一化”，导致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即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激进反犹太主义的统一组织“祖国党”在战争中产生，并迅速拥有百万之众，已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具有反犹情绪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已开始通过同一个激进政治组织，来作它统一化的尝试了。

魏玛共和国恰恰带来了德意志犹太人的进一步“解放”，因为帝国时代的歧视，以及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非形式上的限制都被扫除了。与之相应的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战后这个公共社会的生活中来了，参加到左派政党，自由、民主主义政党，大专院校圈子，大众媒介中来了。这个同化过程，本身也打破了德意志犹太人过去在充满敌意的社会压力之下自身相对的封闭性。大量犹太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派的发展相认同的，而且他们中更多的人成为了现代主义者。而在这里，一个国际的世俗化的未来文化的轮廓是很清楚的，因为这种未来文化是扫除那种带有反犹因素的、传统的、狭隘的民族障碍的。

因此，在这场政治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中，德意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中间等级，对社会地位变化的感受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样，犹太人也就更适合充当整个非犹太中间等级一切灾难的“替罪羊”了。尽管“祖国党”很快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崩溃了，但

它给予希特勒的启示是重要的：用犹太人作为攻击的靶子，就能联合起几乎所有德意志中间等级成员，甚至是更多的人的。在动员那些陷入恐慌之中的德意志中间等级的时候，希特勒充满反犹火药味的演说，总能得到热烈的喝彩，究其原因，也恰恰在于通过反犹宣传中所体现出的反现代主义的巨大包容性。每一个中间等级的成员，总是能够在纳粹党的反犹宣传中找到他所赞成的某些东西的，即使他并不完全赞成纳粹宣传中的所有东西。而且希特勒通过唤起人们的反犹主义种族情绪和意识，能够使这个德意志中间等级中的各阶层，从他们真正的需要和困境上转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犹主义本身就具有掩盖社会矛盾的内政功能。

尽管希特勒并非只是依靠反犹来上台的，但是他的上台却是依靠了广大群众对他反犹宣传的容忍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对反犹宣传的容忍，表明了德意志社会对仇犹的口号已是多么的熟悉！当希特勒在 1933 年开始建立起纳粹暴政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利用国家力量来做激进的反犹先锋们在帝国时代所做不到的事了。灭犹的方案早已放在这位纳粹“元首”的抽屉里了，它们是根据内外局势的需要才一个个地抛出来的。从通过 1935 年 9 月 30 日的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罢免“非雅利安”官员开始，一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的灭犹斗争拉开了序幕，它通向的是一条将犹太人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最后是屠杀欧洲 近 600 万犹太人的种族恐怖专政的道路。而谁具有反犹情绪，谁就不会想到广泛的公民权利遭到了剥夺，谁就会对犹太人肉体上的消灭保持沉默，甚至还会对犹太人影响的消除而感到心满意足。希特勒的种族恐怖专政依托的正是这种反现代主义的“健康的民族感”。

四、“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依靠反犹主义的宣传，即使在大危机年代里，也只能有效地联合德意志的中间等级，而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追随者。因此，希特勒要想实现他内外政策上的目标，还需要一种

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东西，那就是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摇摇

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孤独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过上“令人愉快的集体生活”。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否认多元化社会中利益冲突现实性的功能，而且具有反民主、反共和主义的性质。但是，在大危机年代中，德意志社会对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主义能成功地通过对这种意识的强调，召集到广泛的群众队伍。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只能从德意志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从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去寻找。

“共同体意识”的最初来源是与19世纪德意志现代化的快速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这场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向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传统价值标准的动摇和旧有社会联系的崩溃。在这场“社会大裂变”中，客观世界比主观想象的行为模式以快得多的速度变化着，个人在旧有的社会中失去了传统的法规，而又没有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获得一种安全地位。伴随着德意志快速的工业化成果一起来临的，还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现代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没有来得及从政治上战胜容克贵族的情况下，又面临了工人运动的挑战。在产业工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中间层却经历了一场分裂化和非统一化，因而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进步因素在19世纪革命后的年代里，逐渐地被挥发掉了，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共和主义，它将共和国理解为与君主制相反的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的国家，但这种共和主义不是形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之中，而是形成于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统治的德国工人运动之中，因而也使所有占有者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

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之中，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控制问题提出来了。“讲坛社会主义”

理论家们为传统的君主制独裁提供了这种证明：“强有力的国家当局能够使个人赢利追求的结果和谐地协调起来。”^①正是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起来。这种思想尽管带来了现代福利国家政策的起源，也反映了部分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想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在当时首先是为维持容克专制国家对这个正在发展着的多元化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服务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同时助长了一种“阶级和谐论”思想，并在工人运动内部导致了一种“阶级合作主义路线”，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在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方向。而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内部，这种“阶级和谐论”转而发展成一种“无阶级论”和“反阶级斗争论”。这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守主义的社会学家菲迪南·特尼斯。

特尼斯在他 1924 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集中地反映了受到两极分化威胁、丧失了社会地位安全感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对现代化进程的抱怨。这种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感受，导致的却是对过去非现代性社会特点的追念之情。与“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的是，在这种感情中，他头一次公开地将臆想中的“无阶级冲突”的过去，“农业文化共同体”，与现实存在的“工业阶级社会”，作为一对反命题提出来了。他是这样来描绘过去那个非现代性的社会的：

在这个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日益增长的统一，各部分是有组织的进行协作的，因而也是一个人类家庭温暖的世界。它是通过和睦一致，习俗和宗教来巩固的，也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愿望的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代表着必然的永恒和进步，而且也唯有在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

^① 曼弗雷德·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慕尼黑 1924 年版，第 102 页。

中，民族性和它的文化才能得到保持。而阶级斗争毁灭着国家，它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社会文明中变味了，所以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着的文明中濒于死亡。^①

事实上，被特尼斯美化的这样一种共同体从来就不存在。因为就是在那个早已过去的农本经济的时代里，也一直存在着剥削、压迫和阶级冲突，存在着疾病、早夭、饥饿、战争、人身依附性与屈辱。然而，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却是一个过去充满感情、无限美好的“共同体”与一个现今冷酷无情、不堪忍受的“契约社会”之间的对立，他甚至声称：“这个天然的人类共同体已经受到了一个非自然的阶级社会的威胁。这种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因而必须加以阻止。”^②

这种阻止社会变迁的企图尽管在历史发展中证明是失效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失效所带来的恐慌，才首先在传统精英的统治层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这个强调普鲁士“美德”和纪律化的统治集团，不仅早已在一场政治制度现代化与传统决裂的前景中，猜测到对他们权力的危及，而且也在这种共同体意识形态中，看到了能为他们统治权力的凝固化服务的功能。因此，利用这种“无阶级论”，不仅能够为这个受到阶级斗争震动的统治阶级提供一个柔软舒适的枕头，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掩护下，他们也能够减轻令人头痛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打扰。当然，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在那些充满担忧的“老中间等级”的身上找到了支持，因为这些以独立经营为特征的“老中间等级”发现，他们只有在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维持中，才可能找到死里逃生的机会。这样，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集团的协助下，也在他们之间，结成了一个反现代主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75 年版，第 151 页。

②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75 年版，第 151 页。

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好古者联盟”，这个联盟是将它所强调的“内部和谐”作为现实，或者至少是作为基点和目标来看待的。

自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这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共同体”的思想意识不仅为“新中间等级”广为接受，而且也为不少的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和天主教集团中的工人所接受，以至于它发展成为德意志社会自我理解的民俗学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民俗学中，引出了一连串的反命题，即“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立，“民族共同体”与“阶级社会”的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际主义”的对立。在这些反命题中，前者是作为理想出现的，而后者则是作为深深厌恶的、也是坚决加以反对的东西来出现的。这种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崛起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是由于 19 世纪初拿破仑入侵才真正诱发起来的。这个运动中占上风的文化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潮流，从来就是决定性地拒绝 1789 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意识的。在这个思想潮流中，“民族”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语言、习俗、历史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失去的传统联系越多，这个占上风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就越是密切地与“共同体”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而也神话般地、不加批评地将民族强调性地理解为“一个发展起来的命运集体，个体是无条件地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服务的。在必要时，个体必须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而献身”。德国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能从它原始的关联中分离出来，变成落后的东西，并为反动的目标服务的。”^①正是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才

^① 洛塔尔·加尔：《19 世纪的德意志问题》，波恩 1974 年版，第 187 页。

造就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它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一种包括了所有居民组织的一体化力量，国民的效忠最后也几乎排他性地遵循着皇帝帝国权力扩张的方向。对社会结构来说，“它造成的后果是，由于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民族运动中原有的平等原则被排挤掉了。在威廉德国对狂妄目标追求的影响之下，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奇特动力，而又失去目标的不知疲倦的一代人的政治宗教”^①。

在这里，这个社会内部“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意地移进了一幅民族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图画之中，因而这个民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同舟共济，形成一个为之而献身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里，外部压力必然加强内部统一的法则，由于威廉德帝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冒险目标而被滥用了，因为那种自己制造出来的外部压力，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外部压力，连同现实中的外部压力一起，被用来充当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内部的“混乱局势”中转移开来的工具。德意志“反西方的战斗”、反“~~1913~~1913年精神”的“~~1913~~1913年思想”，正是这种真相的表达。^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义务、正义、秩序”来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德意志口号，在帝国内部政治实践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 ~~1913~~1913年愿月全德意志社会的各政治集团之间达成的那个“从感情上克服阶级对立”、“消除党派斗争”、“一致对外”的“城堡和平”。这个在战争初期结成的所谓“民族共同体”，反映出这个正在多元化的社会，唯有在反对异族敌人的战争状态下，才有可能维持“内部一致”了，而且这种“内部一致”，也唯有通过一种与独裁政治直接发生联系的民族主义，才能得以维持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① 沃尔夫·阅·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 ~~1913~~1913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 ~~1913~~1913年版，第 ~~1913~~1913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13~~1913-~~1913~~1913》，汉堡 ~~1913~~1913年版，第 ~~1913~~1913页。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对“瓦根年思想”以及“城堡和平”的回忆中获得灵感的，而且也正是瓦根-瓦根年“战壕意识”的体现。不过这位纳粹“元首”还在其中加上了更为鲜明、更为“激进”的种族主义思想内涵，从而也将这场反现代主义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带来了一场对帝国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超越，而这种超越被他称之为“民族革命”。希特勒这样声称：

在这个共同体内，日耳曼人作为纯洁的雅利安人，是健康、强壮的人，这就是理想；他们朴实、简单、勤劳、忠诚，没有身体上精神上的缺点；在民族伙伴令人愉快的关系中，作为生机勃勃的能动者，他们将时刻听从领袖人物的召唤，去实现古老的人类梦想；他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为整体献身！^①

而希特勒的“这个民族共同体将不停顿地战斗”口号，更反映出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军事民族共同体”，一个由德意志中间等级的政治激进派进行组织，由希特勒个人实行独裁统治，吸收所有社会阶层、教派参加，并以军事化作为永久性冲击方向的社会联盟。在这个联盟内，希特勒推销的是“健康的民族感”、“正常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的秩序”，强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反议会民主制”和“民族的再生”。^② 通过将这个民族抬高到超凡脱俗、直至天庭的无以复加的高度，来获取民族的自我价值感和荣誉感。通过这样的“共同体”来唤起并组织这个民族，固然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的成就，但同时也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

①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瓦根年版，第瓦根页。

② 沃夫冈·米夏尔卡：《纳粹主义的对外政策》，达姆施塔特瓦根年版，第瓦根页。

的苦难。然而，在这个“共同体意识”不断获得市场的社会里，这样一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理想，不仅对中间等级，而且对保守的政治精英们以及容克贵族和大资产者，甚至对相当多的工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个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对于不明军事局势而听信最高军事当局战争宣传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普遍感到意外”的，因为直到1918年上半年，德军还在东部战线上夺取了大量的地盘。而战争的失败，以及以“1919年法兰西思想”为基础的魏玛民主制的建立，使得这个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从未吃过败仗的民族，这个数百年以来一直与王朝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在社会心理上一次性地失去了中心基准点。民族主义的意识 and “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因此，这种与过去时代的普遍精神联系，自然成为了对魏玛民主制的一种潜在威胁。如果这场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头一次尝试，能有一场长期稳定的经济繁荣作保证的话，这种潜在的威胁或许是能够慢慢加以克服的，不少的历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种期待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1918年的民主生涯中就有1920年的经济灾难！因此，当这种社会心理上的损失和经济灾难，与一场西方民主国家，也是战胜国家所强加在头上的“凡尔赛民族耻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满的民族情绪便成为了共和国时代自始至终惟一得到不断发展的东西，而且在大危机中获得了加倍的膨胀。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是得到膨胀，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就变得越是强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纳粹主义的“军事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作为解决严酷的魏玛社会现实与传统的德意志民族精神需求之间巨大冲突的方案设计出来的，而且也是作为建立、巩固、强化纳粹独裁统治的辅助性手段提出来的。

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名称，并没有成为迫切要将自己与工业无产者区别开来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加入这个“民族共同体”的阻力，相反却成为了这个“共同体”召集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具有吸引力的标签，其关键还不在于纳粹党党名向不同阶层的人

各投所好，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人”这两个概念在希特勒绝妙的解释中，是完全与他的“民族”意识划等号的。在这里，他只强调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德意志的“民族共同体”。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标签，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说明：“任何人，只要了解我们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和德国的土地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①在回答党名上为什么要安上“工人”字眼时，他这样说道：“每一个民族同胞都应将自己看作是这个民族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②正是在这里，“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概念，已完全被“民族共同体”意识偷梁换柱了。

当然，也唯有通过对这种带有“社会主义”和“工人”标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希特勒的独裁者地位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克服”了阶级对立的“城堡和平”的秩序下，每一位同胞与作为“民族化身”的“元首”的关系才是一样的，即都是“第一工人——元首”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而且也唯有通过这个“民族共同体”对阶级对立的“克服”，这位“元首”也才能率领这支“一致对外”的德意志队伍去发动一场“夺取空间”的战争。

对这场所谓的“种族革命”，希特勒的忠实信徒罗伯特·列伊作了这种说明：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从 1933 年 1 月就开始了的，因为唯有在战壕里，这个民族才再度聚集在一起了，炮弹与地雷是不会去寻问你出身的高贵与低贱的，你是富人还是穷人的，你属于

①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4 页。

② 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3-1945》第 1 卷，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44 页。

哪个教派、哪个等级的。而今天，唯有跟随元首去进行战斗，也唯有用暴力的方式才能检验这个共同体的意志和精神！^①

如果说在毁灭民主议会制上，希特勒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自由军团的贵族领导们在共和国初期所没有做到的事情，那么这种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的纳粹党恰恰通过它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通过议会外宣传手段的使用，成功地动员起了全民族范围内广泛的民众阶层。自由军团固然属于他最重要的先行者和开路先锋，而且他们之间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甚至希特勒在国内的崛起，若没有前自由军团成员在组织上和军事上所作的贡献，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由军团的领导是与军官团的旧贵族—精英社会传统密切相联的，这种传统本身就妨碍着这场反民主运动向群众性的方向发展。而希特勒这位上等兵，突破了这种军官贵族精英传统的障碍，并将反民主制的运动发展成一场没有精英限制的广泛的大众化运动。总之，希特勒比过去所有的右派都更加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这种“日耳曼种族的成员资格”，比较起那种所谓“出身良第的贵族社会的成员资格”来说，无疑为更多的人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②

第二节 摇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造就

一、寻求“卡里斯玛式”领袖的社会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表明，德国的有限国力与无限野心之间的矛盾，使得它要想再度向世界霸权发起挑战，至少需要对整个德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34—1935年，汉堡 1934年版，第 102页。

② 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 1934年版，第 102页。

意志社会进行更高层次的整合化，为此就需要建立起一种远比威廉传统专制体制严厉得多的独裁统治。这种统治就是将权力和责任完全集中在一个“卡里斯玛式的”（~~悦则非非非非~~），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身上，并由这位独裁人物来对社会实行全面彻底的组织、控制和统治。但是，这样一种专横统治的建立，首先要以放弃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而要使这样一个文明发达程度较高的民族，顺从地接受一种如此专横的独裁者的统治，没有一种社会意识上的反现代主义的广泛基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基础恰恰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困境中被造就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稳定依赖于一种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机构和制度，例如国家、教会、家庭，以及经济、法律上的等级权力规定之类的社会机构或制度。这些机构或制度保证着每一种等级中的个体在这种制度下过着某种固定化的生活，同时也要求个体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向它们屈服，并在忠于职守中作出牺牲。那些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是交到“上帝的彼岸”，宗教的神秘解释之中去的。这种机构或制度一方面掌握着个体的行动决定权，而另一方面也免除了个人在行为决断和责任上的压力。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克洛克科夫在对传统文化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个结论：

传统文化最具体的代表，正是那些特别的公共机构和制度，它们既能减轻主体动机上的负担，又能减轻那种偶尔代表了决断而又使人后悔不已的即兴之作上的负担。当然，由此而带来的这种稳定化，也是一直深入到我们精神位置的正中心的。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作用，就在于它能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精神稳定化的保障。但是，当这些机构或制度在时间的沉积中衰落、碎裂，或是被有意义地毁灭掉的时候，这种保障关系便趋于崩溃，人们就将由于决断上的过分要求马上超

负荷地运转起来，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说自明的。^①

自从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精神已开始从神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它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无神了，并也因此从根本上造就了“此岸”（*阅译*），造就了“世界”，而超感觉的“彼岸”（*裁译*）从这里消失了。与之相联系的是，过去的种种禁戒也随之消失，这些禁戒曾经真实地崇敬着、确保着这些机构或制度，而这些机构或制度原本正是进入“此岸”的超感觉的“彼岸”。^② 自从这些机构或制度的神性逐渐消失以来，不仅人的精神已经能从这些制度或机构中分离出来和解放出来了，而且从原则上讲，任何精神也都是可以进行批评、怀疑和改变的了。因此，这些制度或机构的每一步瓦解都不仅具有自由、解放、平等主义和博爱的倾向，而且也无保留地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变质、崩溃和衰落，从而使个体变得越来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断并承受其后果。这种“个人活动原则”的支配作用，将每一个人都推向一种不安全、不确定、忧虑、孤独的境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关系。

由此可见，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将所有的人都卷入到这场事关个体精神和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变化的漩涡之中。过去那种由更为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所确定的集团交往形式中的传统行为准则，已越来越与它们所代表的事实上的关系不相符合了，而一种另外的准则又是完全需要逐渐地通过许多成功的试验才可能逐步形成的，但这些试验成功的条件，则要靠一种顺利而平稳的社会发展才可能创造。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德意志社会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人们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员*—*员*，汉堡 *员*年版，第 *猿*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员*—*员*，汉堡 *员*年版，第 *猿*页。

经历的正是一种个体的“无保障性”日益增长的时代。如果说德意志人在 19 世纪后半期还能维持一种政治上的安定局面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基督教信仰趋于瓦解的时代中，霍亨索伦皇室的君主制所代表的那种传统的旧国家专制体制，一直还是作为德意志人通向“此岸”的超感觉的“彼岸”的最后残留物来出现的。

但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得到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后混乱的打击下，随着帝国时代的结束，这种传统政治统治已出现了断裂，国民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已陷入全面的瓦解之中，过去那个打有基督教烙印的生活世界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世俗化以快得多的速度发生在越来越广泛的人口集团那里，这个世俗化进程尽管在 19 世纪里早就一再遭到抱怨，但在当时还是能够通过物质上的进步，通过对生活世界中更多幸福、健康和安全的这种可以期盼的经历来补偿的。然而，这种关于世俗化幸福的预言，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的困境中，一步步地丧失了它的内聚力，而 19 世纪中已经提出来的那些解决方案，如教育、拯救、秩序和救济等，由于其对人的物质需求上的非完善性，通过共和国的实践已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了。因此，以基督教为基准的生活世界已“失去了魅力”，这个事实同时也与世俗化进步思想的一场崩溃叠合在一起了，它导致的是，德意志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摇摇摇

与此同时，在帝国时代中形成的那种德国公共社会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碎片化”，因为现代化粗暴而快速的发展，已经使得那些在 19 世纪中最先被开拓出来的各种政治思想，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对各自社会集团的集合化力量大大减弱。这不仅使得公众对这个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适应性进一步增强，而且也使这些集团的边缘力量受到了激进的中间等级政治路线的“创新性”统一继承组织——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更强烈的吸引。这场争取选民的竞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在激进的纳粹党内部，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在其他政治集团内部，甚至

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都出现了对“卡里斯玛式的”强权人物的普遍期待。这种期待，在下层群众希望能出现拯救众生的领袖人物的渴望中，在中间等级对特权重建的寻求中，在大工业家社会政策上“反平均主义化”的努力中，也在容克传统精英建立一个能给混乱的社会局势带来秩序化的期待中，都得到了表达。^① 总之，不仅是激进的纳粹党首先提出了“元首”原则，开展起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运动，而且其他的政治集团也陆续地开始思考对“领袖个性”的建设，并用组织公众的手段来进行尝试。

因此，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整个德意志国民社会已经开始将寻找“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组织井井有条的社会，作为摆脱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性和行为障碍的出路了。在许多领域中，如人文科学、教育学、艺术界直到社会政策，关于现代化的挑战，以及究竟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的激烈争论，是以人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来将这种正在寻找中的领袖人物理想化的。尽管所有的立场都绝不是统一化的，恰恰相反，过去那些再明显不过的政治立场上的区别，甚至还加深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却在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的期待中出现了不约而同的赞同。如果说希特勒在 1933 年夺权后能顺利地、几乎是毫无障碍地开展他的“一体化”攻势的话，那么正是由于这种攻势遇到了如此之多的对“卡里斯玛式”强权人物统治的适应化准备。

为什么这场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抛弃并不能导致一场向威廉体制的复辟，而是导向了纳粹主义独裁的新统治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首先由于传统权力精英们向传统的倾斜，而是首先由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在整个共和国时代发展起来的那种特别具有危机性的活力，才真实地动摇了共和国的。正是这种危机性的活力，才将传统精英们推入到一条反民主的战线上，如果这条战线获得胜利，将意味着威廉体制的复辟。但是，这样的体制对于广大群众来

^① 德特勒夫·允·运·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 1955 年版，第 103 页。

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帝国时代日常生活中受歧视地位的重复，因而无论对中间等级来说，还是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都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因为如此，传统权力精英的反民主路线，恰恰导致的是他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这就使得这些“上流人物”陷入到新一轮的担忧和恐惧之中，他们也在盼望能有一位“真正的强权人物”出来，既能转移这种威胁，又能运用国家力量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危机性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广大群众完全丧失了安全保障感。固然帝制时代受歧视的生活并不令他们向往，但是，民主自由时代的苦难却又不能不勾起他们对过去“秩序化”生活的回忆，对他们来说，那种“秩序化”不仅是古老而令人崇敬的，而且也一直是被他们视作神圣的东西来加以赞扬的，因为它毕竟曾经作为思想、感情稳定化的“家乡”为他们提供过精神和灵魂上安全之所的感觉。而“如今，他们却被推入了普遍的贫困和孤苦之中，被彻底地推进了超负荷运转的深渊，而这种超负荷的能力又是他们本身没有的，这就导致了他们惊慌的反应，去逃避这种自由”^①。

因此，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一方面，1918年传统统治政治合法性的断裂，以及基督教神性“彼岸”的消失所带来的恐慌，已经在危机年代里充分暴露出来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既不能容忍威廉体制的复辟，也不再相信眼前的这个民主制度还有克服危机的能力了。这就使得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既能将他们救出苦海，又能提供政治稳定的另一种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开端”上了，因而也就使得这种对“新开端”的盼望，与对一种能提供精神稳定性的新“彼岸”的寻求叠合在一起了。他们盼望能摆脱那种必须对自身行为作出决断，并得承受其后果的“个人活动原则”的压力，以彻底地减轻负荷。这种盼望不仅是作为一种“幸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48-1918》，汉堡 1918年版，第 100 页。

运”来出现的，而且也是作为一场“解放”来出现的。但是这种盼望，只能与惟一的责任制划等号，只能是对一位能“拯救”他们的“卡里斯玛式”独裁人物的期待，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对于这种社会心理，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茨·纽曼指出了它表面上向前、实际上则向更为远古的时代后退的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原始性质：

不仅是忧虑，而且还有不能理解他们的绝望，他们的苦难，他们遭到贬低的原因，才将人们推进了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迷信的怀抱之中。尤其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发生深刻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危机年代里，一般的人口大众通常又是不能、或是一时不能认识到导致他们眼前的这种局势的发展规律的，这就首先使得那些最少受到理智引导的社会阶层，当然绝不仅仅是他们，转向了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就像原始时代的人们寻找一位拯救者那样，这位拯救者应能解除他们的困境，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因而它也具有了一种全民族意识需求的特点。^①

纽曼还通过对古老的德意志氏族部落文化的分析，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宽的历史视野：

这个民族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远比基督教还要古老的著名宗教。这种宗教本身就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的：早就存在着一个原始时代的怪物巨兽，它就是恶魔和上帝以及部落敌人的化身。而“卡里斯玛式”的，也即“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终于杀死了这个怪兽，因而一时间赐福给了他的人民。当然，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仅是上

^① 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见《德意志民族》，法兰克福 1968年版，第 141页。

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且当他成为这样的英雄时，那么他也就根本不是人，而是神了，或者说，他成为了部落图腾的化身。^①

在所有政治集团的思想体系中，唯有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才最能符合这种古老宗教，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它们之间的对应物：这个怪兽就是“犹太人”，这个部落就是“纯种的日耳曼—雅利安民族”，这个图腾就是种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而这个领袖人物就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一方面能解除个人在判断、决断、行动和经历冲突上“现代文明的负担”和“民主制的苛求”；另一方面又能为个人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即服从、履行义务。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镀金成“理想主义”、“无私性”、“绝对的权力”、“民族的伟大和完整”。因此，当自由被摧毁的时候，却在谈获得了“解放”，当灵魂被掏空了的时候，运动便能不停顿地发展下去。

总之，希特勒从来就不想去复辟帝制时代的那种传统专制独裁，而是要建立他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从根本上讲，德皇帝制的“神圣灵光”本身是依靠了基督教的赋予才存在的，而纳粹主义的崛起，恰恰是依靠了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全面崩溃才成为可能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条社会心理和精神倾向普遍向过去退却的道路上，这个巨大的社会心理缺口的存在，才使这位纳粹党的“元首”终于找到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和“民族同路人”。

二、新宗教的现代化宣传

尽管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属于非理性领域中最为原始的宗教现象，但与之平行发生的政治现象，却恰恰是一

^① 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见《纳粹主义》，法兰克福 1936 年版，第 152 页。

场为谋取、维护和神化权力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有着一种奇特的双向发展：一方面，希特勒在巧妙地利用人们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渴望，充分施展着他个人的“魅力”，并不停地扩大着人民大众的绝望，如果不跟着他走的话；而另一方面，追随者为了达到减轻个人超负荷压力的目的，而涌向了这位“元首”。这种两面性特点，一方面反映出这艘正在加速挣脱传统的德意志航船，已经在具有全面危机性的现代化航程中倾覆了，因而广大民众获救的渴望，导致了对一种新宗教“彼岸”的寻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纳粹主义运动不过是以大危机所导致的普遍贫困化为契机，对德意志社会进行的一场反现代主义的重建。因此，纳粹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场新式的宗教运动，一个造就“军事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一场创造“卡里斯玛式元首”的神话。而且，希特勒越是扮演得像是一位上帝派来的“天使”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救世主”，“共同体”就越是对那些渴望摆脱超负荷压力的人们具有吸引力。

不可否认，希特勒不仅在扮演这种角色上是独具才能的，而且也谙熟现代政治宣传上的技巧。他这样说道：

所有的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宣传上的知识水平必须调整到群众中最有限的智力水平上，因为群众的接受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们的遗忘力却无比巨大。因此，所有的宣传必须口号化，必须朗朗上口，反复唠叨，一旦你不用这个口号，而去采用任何更复杂的语言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效果。^①

这位“能通神的大众化元首”，并没有躲在文件山的背后，而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一场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中，他每每声称自己是“天意的选民”、“人间天堂的元首”、“民族真、

^① 戈尔德登·奥·克莱格：《德意志史》，~~页52-53~~，慕尼黑黑~~页~~年版，第~~页~~页。

善、美圣杯的保卫者”。他斥责着“工业化以来所有制度的堕落”，并发誓“要召回日耳曼人的美德、力量和健康，并将犹太骗子手、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逐出日耳曼民族神圣的庙堂！”^①当然，所有这些被他称为“正常的伦理道德风尚”的东西，都是为那些对现代化的现实性感到愤慨、又在政治上天真烂漫的人们设计的，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的人们设计的，同时也反映出希特勒本人对工业都市化以及在那里发生的“胡作非为的时代精神”的反感。

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得人心的保民官”能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地粉碎听众情绪上的抵抗，驱动着他们的愤怒和兴奋，激发他们去表达出像他一样的意志。希特勒早年的一位追随者奥托·斯特拉塞“怀着钦佩的心情”这样描绘了希特勒的演说场面：

他一走进大厅，先嗅了嗅空气，感受了一下气氛，突然间他发作了，他的语言像一支支射向靶子的利箭，他接触到每个人露出的伤口，让无意识的群众去自由地表达他们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志向，并向他们讲出他们最想听的话。由于听众的愤怒是互不相同的，因此他此时的目的就是将他们指向那些特定的靶子：犹太人、凡尔赛条约、杨格计划，以及容忍这些东西的议会民主制。这种统治、陶醉听众的能力，要归于他出色的直觉，因为他知道如何去论证听众们愤慨的公正性。他告诉他们，真正的德意志人已经被狡猾和无情的敌人包围了，最坏的人就混在他们当中，从外表上装着像德意志人一样，但是真正的德意志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像春天的暴风雨一样不可阻挡！^②

^① 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24-1925》，第4卷，慕尼黑黑 1925年版，第40-41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25年版，第40页。

几乎所有回忆希特勒演说场面的史料都记载了中间等级听众对他产生出的“宗教般的敬畏感”。例如，在 1939 年后担任巴登地区纳粹党头目的罗伯特·瓦格纳这样回忆道：“当我头一次听这个人演说时，我恍然大悟，他所讲的那些东西，正是我想讲而又当时没有能讲出来的东西！”而后来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写道：“是上帝通过他来道出了我们的苦难，他用救世主的语言抓住了我们的痛苦！”^① 这一方面反映出听众意识上的主动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希特勒，这位出身于小官员家庭的流浪汉，具有对他所来自的那个中间等级的自我理解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混乱中，首先从中间等级的广泛困境中，造就出一个普遍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同时，作为纳粹“军事民族共同体”的缔造者，希特勒更懂得如何将德意志社会中由于现实所产生的压抑表现出来，如何将现实中的那种沉默赋予真实的形态。这种沉默是对战败、和平条款的拒绝。他看出现实的和平并没有被确定，从根本上讲，它只是战争用另一种手段在继续着。因此，他将政治斗争的手段建立在军事组织的形态之上，将“元首原则”、“划一的统一”、进行战争的装备、旗帜飘扬的党集会都搬上了政党政治的舞台。而这些东西，从更高的程度上讲，既是超现实的，又恰恰是能形成人们意识的东西。因而他的影响范围就不再只是陷入败落之中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大众了，还包括各阶层中深感“民族压抑”、深感孤苦的意志薄弱者。

要了解希特勒的政治煽动在广大民众中所产生的效果，必须注意到希特勒在人类政治活动中最先、也最好地利用了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而当时的各阶层群众，一般是不熟悉政治家竟会拥有这种操纵技能的。也正是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希特勒才能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政治家更多地将自己兜售给群众，才能像一位“真正

^①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 1974 年版，第 102 页。

的天使”和“救世主”那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声有色，惟妙惟肖的。

这是一个收音机、扩音器、留声机和飞机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时代。正是靠了扩音器，才使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成为了可能，而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对于那些深感孤独的与会者来说，总是显得特别必要的；正是靠了收音机，才将纳粹集会的实况送到了千家万户，因为 1934 年已有 150 万人在听收音机了（而在 1933 年，标价仅 1 马克的“劳动阵线牌”收音机，已是最穷的“民族伙伴”都能买得起的世界上最为廉价的收音机了）；正是靠了飞机，希特勒才能“像天使一般地从天而降”，从一个会场飞赴另一个会场，1934 年 8 月 1 日，希特勒甚至创造了一天飞赴四个城市会场的世界记录；正是利用了留声机，才将希特勒的声音送到了无线电广播有限功率之外的德国城乡的每个角落，“用阶级，阶层，职业，教派分裂这个民族，用断断续续的方式迎接经济幸运的企图，今天终于失败了！”^①

这也是一个由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飞越的时代。“电影院无处不在，然而它面临的是心理上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代人，他们在走进电影院以前，就事先将自己的心交给电影业那些虚幻的作品了。”希特勒深知电影对观众的心理价值，他首创的《新闻周刊》，这种免费的加演片，在一个看电影成瘾的社会里，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广告效应。“当元首出现时，大多数观众一开始就把他当作电影明星来接受。经过他的一番表演，在许多观众那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宗教上的敬畏感。”^②

青年选票的增加，与这种现代化大众传媒新技术的运用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这一代青年人本身就是“迷茫的一代”，他们早就

① 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3-1934》第 1 卷，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7 页。

② 沃夫冈·哈格曼：《第三帝国的新闻学——对操纵群众方法的一种贡献》，汉堡 1935 年版，第 12 页。

在寻找着能使他们贡献自身力量的共同目标了，然而他们又被数目众多的政党以及各式各样的许诺弄糊涂了。希特勒早有所闻，他的演说，可以说是对这些小人物们的“民族共同体心态”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正是通过这些新技术手段来扩散的。这些新技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对青年一代来说，本身就够刺激的了，他们往往事先就作好了接受的准备，更不要说希特勒专为他们设计的那些意识——所谓“民族伙伴关系，忠诚，勇气，牺牲”——对他们“渴望战斗的情绪”所起的催化作用了。据统计，在 1933 年后，18~24 岁的青年人在纳粹党中的比例达到 25%，超过了青年在总人口年龄结构中的 15% 的几乎一倍！与之相比，社会民主党此时就更像一个老龄党了，它内部的年轻人仅占 15%。^① 1933 年 3 月 5 日大选中，也正是由于青年选票的增加，才使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 8 席猛升到了 33 席。而纳粹议员中的 25% 都是 24 岁以下的年轻人的事实，使不少人惊呼：“纳粹运动是一场青年运动，它已无法阻挡了！”^②

将现代化技术手段与老式的国家权威的自我表现物配合起来使用，更是希特勒在争夺民心方面远远胜过其他政党的地方。在战败和革命后的共和国时代里，其他所有政党都没有拿出任何能替代帝国时代豪华、阔气和排场的东西，而在这些东西上所反映出来的国家尊严和体面，对德意志人来说是具有许多意义的。在帝制时代看惯了政治游行、旗帜、制服，并配有定音鼓和小号的进军行列的人们，却在纳粹党集会上再度重逢了这种场面，而且是更加“辉煌”的场面。这里正是希特勒扮演“救世主”的中心舞台，历史学家戈尔德登·克莱格这样描绘了纳粹集会：

① 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 1964 年版，第 107 页。

②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意志的灾难，观察与回忆》，威斯巴登 1964 年版，第 107 页。

在这里，礼仪隆重，行列齐整，旗帜飘扬，音乐满天飞，元首的讲话更是一番宗教的仪式，随后是通过漫长的徒步行军来展现纳粹党徒统一意志和严明纪律的精神面貌……无疑，这既能起到打动人心的作用，又能起到威吓潜在敌手的作用。^①

而在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发起的传统式集会上，表现出来的往往不过是绅士集会的无聊特点。它们在会务上明显的赤字造成了特别灾难性的影响，这种赤字是不能用兴登堡这位八十高寿的“木头巨人”来弥补的，因为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着与西方民主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前提。

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在一场真正的内战中，而是在一场民族主义的狂醉中没落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纳粹主义独裁统治能成为政治安定的德帝国君主制的替代物，本身是有着一种社会心理上的优势的。德皇帝制的崩溃、共和国的瓦解，不过为这位从无名战壕中日益崛起的煽动家打开了道路罢了。希特勒正是充分利用了战后年代中的这种心理优势，才由煽动性的政党领袖变成了德意志“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当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时，不少西方观察家曾预言：“德国的反对派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扫除掉的，会有一场总罢工，他将遇到千百万坚强果敢的人们的反抗。”但是，除了那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良知没有泯灭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外，德意志社会出现的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过去的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巴结讨好，甚至是心甘情愿地“一体化”，充其量不过是听天由命和流亡。^②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每当旧有的制度崩溃

①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 1933年版，第 140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 1933年版，第 140页。

之时，总会出现一种“墙倒众人推”的局势，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们是要去“随大流”的。这些人也往往具有权威主义心态，即深深地崇拜和追随现存的权威，当旧有的权威大权旁落时，他们就去追随新的权威。

其二，希特勒纳粹党的夺权成功并成为惟一合法政党，对大多数人之与纳粹政府的忠诚，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对于德意志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那些刚刚被剥夺了“自由工会”权利的工人来说，最难以承受的事情，莫过于不被一个大的集团所认可。一位德国公民，无论怎样反对纳粹主义的原则，如果他不得不在行将孤立，或是从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感情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多数人将选择后者，正如在 1933 年的“城堡和平”中曾体现过的那样。这种对孤立的恐惧和道德原则上的相对软弱，本身也是有助于任何党派赢得大多数群众的忠诚的，只要这个政党成为了民族惟一合法的政治代表。埃里希·弗罗姆说得好：“宗教与民族主义，以及任何风俗和信仰，不论多么荒诞不经、微不足道，只要能使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就能使人逃避最害怕的一件事：孤独。”^①

三、权力的最后征服

通过兴登堡总统 1933 年 1 月 30 日的“紧急条令”，希特勒出任了总理，这个已经向传统专制独裁统治模式蜕变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国家，从此时起，实际上便开始转而朝着现代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方向发展了。1933 年初的这种发展局势中，首先就存在着一个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传统精英们认识到的“历史性错误”，即这些德国过了时的保守主义传统权力精英与纳粹主义的激进新力量之间，结成了一个短命的联盟。这个“错误”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纳粹主义者所代表的这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本身就与传统精英们所代表的那种保守的反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反民主自由、反马克

^① 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0 页。

思主义的，而且纳粹主义本身也是依靠了德意志社会长期的专制独裁传统，才产生出广泛的社会效果的。因此，当 1933 年 1 月 30 岁的兴登堡总统采纳了巴本的建议，任命希特勒为这个“民族集中”联合政府的总理时，传统权力精英们是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的：这个内阁中的保守主义多数派们（愿个保守派部长比 猿个纳粹部长），“借助兴登堡和副总理巴本的帮助，是能够驯服希特勒纳粹运动的活力的，也是能够将其置入到对国家实行传统保守主义的独裁式或君主式的社会改造目标上来的”①。

要了解这个如意算盘的产生，人们就必须了解纳粹运动与两个旧权力载体——大垄断工业界与容克军官团之间特别复杂的盟友关系。纳粹主义者也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支持，并与他们结成反民主的联盟，才最后走上了夺权的胜利道路，而且这个联盟最初对于两者来说也都是有用的。

人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尽管早在“啤酒馆暴动”以前，个别的大企业家，如蒂森等人，就已在捐助纳粹党了，但就整个德国大工业界而言，他们与容克贵族以及军官团一样，直到 1932 年 11 月和 1 月的两次总统选举时，都是压倒优势地支持兴登堡，而不是支持希特勒的。在 1932 年 7 月和 11 月的两次国会选举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支持那些支撑巴本内阁的右翼政党的。因为自从 1918 年以来，巴本政府是头一个得到这个保守主义的旧权力卡特尔热情支持的政府。在他们看来，如果说金钱能够买到权力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的魏玛民主制以后，应是巴本的传统独裁的“新国家”，而不应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第三帝国”。② 而且事实上，那些正在大危机中不断处于消失状态中的所有右翼保守派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之类的政党，甚至还有中央党，都远比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 1964 年版，第 140 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 1964 年版，第 140 页。

纳粹党更受工业界和容克集团的宠爱。

但是，当纳粹党不断崛起而其他的右派保守政党不断萎缩的时候，大工业家们也在寻求安全的退路，现在有大量史料能够证明，他们当时采取的是“脚踏几只船”的战略，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党可能会立即成为执政党。但是，“工业界的政治捐助并不是仅仅针对纳粹党的。在同一时间内，这同一个经济上层，也同样将他们的捐助分配给了纳粹主义的所有保守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竞争对手”^①。虽然他们也向纳粹党捐助了，但这种财政上的帮助，与他们投给其他那些右翼政党的数量相比，始终都只是很少的款项，因而也不能与纳粹党通过城乡中间等级所得到的大规模资助等量齐观，更难以改变它日益上升的财政上的债务。直到 1933 年的最后几个星期，纳粹党内还仍然被严重的经费不足的阴影所笼罩，就是一个证明。总之，整个大工业界对纳粹党的行为态度，此时仍然是防御性和自保性的，他们首先关心的还并不是纳粹党能不能上台，而是自身地位的未来。他们对纳粹党的捐助，首先是为了给一个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国家政治主人的政党，留下一种友好亲善的印象。摇摇摇摇

大工业界中之所以会出现一种有利于希特勒的思想转变，是由于冯·施莱彻尔将军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成为总理引起的，这一“事件”事实上也标志着大工业界与容克军官团之间关系的紧张化。绝大多数大工业家都是既不信任，也很害怕这位军事实力派人物的。这部分是因为施莱彻尔是通过推倒巴本这位他们所钦佩和信任的魏玛时期的惟一总理，才使自己成为总理的；部分则是因为施莱彻尔一成为总理就声称自己“既不是个资本主义者，也不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国防军与工人阶级的一个同盟来反对大企业主”。尽管施莱彻尔不过是想利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组织，并通过与纳粹党内反希特勒的“斯特拉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64—1965 年，杜塞尔多夫 1964 年版，第 108 页。

塞派”相勾结，来达到瓦解纳粹党、建立军人独裁专政的目的。但是，“他毕竟已经向大工业家们描绘了一幅在工会战线支持下的、也是具有无法估量的国家资本主义种种特点的军事独裁的可怕图画，因而迅速地在大工业家中引起了严重的惊慌失措”^①。

大工业家们担心施莱彻尔将军会是一位“穿军装的社会主义者”，而希特勒至少自1934年夏秋以来，通过对鲁尔工业家发表的演说，通过对纳粹党经济纲领的修改，已经不断地向大工业家们表白，他绝不是一个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大企业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他的“空间计划”是有利于德意志民族垄断资本的。因此，“反自由民主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逻辑，已将这些工业界中的保守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了。这两者首先在“一个强大国家”的要求中，继而在“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的愿望中，取得了基本一致。因此，希特勒也就至少变得比施莱彻尔更能为他们所接受了。德国历史学家亨利·阿希比·图尔勒指出：

这本身就说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多价性特点，使得它本身也是能够去适应每一种抛弃了对它表达公开敌意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②

然而，整个大工业界在1933年1月对“希特勒—巴本联合内阁”的欢迎，仍然更少是出自于对希特勒的热情，更多还是出自于赶走施莱彻尔的愿望，以及对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人——巴本——又重新回到政府中来的喜悦。尽管巴本这次出任的仅仅是这个“联合内阁”中的副总理，但是对他们来说，1933年1月30日也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独裁的“第三帝国”就开始了，他们倒是认

^① 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纳粹主义，1934~1935》，波恩1935年版，第105页。

^② 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纳粹主义，1934~1935》，波恩1935年版，第104页。

为：“我们不过是在用权力的影子，而不是在用权力的实质搪塞了他（希特勒），我们正处于俘虏希特勒运动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位置上。”^① 唯有对于像蒂森这类自称为“纳粹主义者”的大企业家来说，这一点才是例外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绝不能推脱整个德国大工业界支持希特勒上台的历史罪责。

无论对于容克贵族们来说，还是对于大工业垄断巨头们来说，想将希特勒作为工具来使用，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算。因为纳粹主义者的政权首先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大资本和容克的利益。具有无限野心的希特勒，决不甘心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纳粹运动的冲击力本身也必然会导致对全面统治权的索取，这不仅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瓦尔特年初的整个德国政治局势所决定的。尽管纳粹主义者是将瓦尔特年元月三日作为他们“夺权”的日子来欢庆的，但是，希特勒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局势，他并不是通过选票才获得总理职位的，这个职位是被委托的，或者说任命给他的，而这一点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改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委托的一方可能出现的变卦；二是根据《魏玛宪法》，国会仍然有可能要求废除每一项总统颁布的“紧急条令”，只要它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希特勒与他的同党是不愿再度交出权力的。对于他们来说，要维持这种权力就必须将这种由总统任命得来的权力，继而迅速扩展成一种全面彻底的统治，并加以巩固。这就首先要求充分利用那位“老眼昏花的”兴登堡总统的独裁权力所能带来的一连串“紧急条令”，铲除法律上现代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力，并迫使公众永久性地屈服于国家“全面的紧急状态”。而且，这个联合内阁中的权力分配，也并非完全对希特勒不利，因为纳粹主义者尽管在这个联合内阁中只占少数，但是，他们占据的是三个最为关键的岗

^① 戈尔德·粤·克莱格：《德意志史，瓦尔特-瓦尔特》，慕尼黑黑瓦尔特年版，第源页。

位：总理、内政部长、不管部长兼普鲁士（该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内政部长和警察总监。同时，他们也懂得如何迅速实施建立全面独裁统治的计划，这些计划现在已经既能通过一系列部分是表面合法化的、部分是暴力式的手段来实现了，也能通过“民族崛起”的口号来掩盖了。因此，一种政治运动的内在强制出现了，或者说一个广泛的对权力的全面征服过程开始了，它持续了八个月左右。^① 而那支保守主义的权力卡特尔队伍中的成员，如此之快地由“盟友”转变成“跑龙套的角色”，正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独裁统治建立过程的征兆。

事实上，希特勒还在他宣誓就职总理以前，就已经智胜了“联合内阁”中他的两个主要的保守主义对手——副总理巴本和经济与农业部长胡根伯格。解散国会并进行新的国会选举，本身就是希特勒接受在一个与保守主义传统权力精英们组成的“联合内阁”中出任总理的条件。而这一次，他已经能够利用总理职位所固有的权威和总统的支持，来取得更大的利益了。也就是说，他不仅能够充分使用恰恰是由这些“联盟伙伴”所提供的有力工具，而且也能够在充分使用由这个党自己组织起来的压力工具，来达到他建立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目标了。连胡根伯格也看出了这一点：“在这场选举中，希特勒的群众性政党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的最大得利者。”^②

围绕着 1933 年 3 月 5 日的国会选举斗争，很快就证明了胡根伯格预言的准确性。作为执政党，纳粹党不仅得到了来自大工业界前所未有的经济资助，而且它的宣传已经可以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来开展了；纳粹主义者在街头的恐怖活动，由于拥有对国家内政部和普鲁士警察力量的支配权，已经能够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地顺利进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沃尔夫冈·骚尔、克努特·舒尔茨：《纳粹主义的夺权》，科隆 1964 年版，第 194 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8-1933》，慕尼黑 1963 年版，第 194 页。

行了；希特勒的冲锋队现在也能够破坏左派政党的集会，而不受到任何惩罚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的报纸也已经能够通过总统独裁的“紧急条令”来进行查封和限制了。通过制造圆月缘日的“国会纵火案”，并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共产党暴乱的信号”，希特勒在第二天就轻而易举地从惊恐不安的兴登堡总统手中得到了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法》的“紧急条令”，宣布他最为仇恨的政治对手——共产党为“非法”。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或是被迫潜入地下的时候，《魏玛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事实上也是永远地失效了。这种在虚假“合法道路”上所引入的“紧急状态”，已经为希特勒今后的每一种专横暴行敞开了大门，直到第三帝国灭亡。

猿月缘日的选举结果并没有满足希特勒的期望，纳粹党尽管获得了源源不绝的选票和圆万个议席，但是，它仍然得与它的“联盟伙伴”加在一起，才能得到在国会中的一个勉强多数。这位纳粹党的“元首”要想取得全面独裁统治的全权，只能通过使议会民主制的处理秩序失效才有可能，为此就必须修改宪法条款，而这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行得通。

在随后不足三周的时间里，通过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恐怖活动，通过向中间派政党，尤其是天主教中央党的软硬兼施和威胁利诱，通过向大工业界许诺“建立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通过向军官团表白“重振普鲁士精神”，通过精心策划的“新德国运动”与老普鲁士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和解”，也特别通过在所有报纸上刊登猿月缘日兴登堡与希特勒在波茨坦卡里松教堂握手的照片，纳粹的权力攻势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迅速地在那些仍然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口中引起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缩命论。帝国银行家组织的成员开始成批加入与纳粹“冲锋队”并轨的“钢盔团”；“自由工会”也宣布它准备与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并与新政府合作；更多的人加入了纳粹党；潜在的反对派们已经致命性地采取了与纳粹党妥协的方针。甚至连中央党的领导人也认为：“如果希特勒没有通过法律来得到他所要的东西，那他也是会用更讨厌

的手段来获得它的，对他的要求表示赞成，还能希望得到好的回报。”^①

因此，当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向这个新国会提出《授权法》的要求时，拥有 1/3 席位的共产党议员被阻止在会场之外，除了占 1/3 席位的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反对外，只有 1/3 席位弃权，因此这个被正式命名为所谓《解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法案获得了通过，终于使希特勒成为了由民主议会制创造出来的独裁者。该法令宣布：“给予这个政府以这种权力，即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议会参与的情况下，颁布法律的权力。”^②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政治统治权在行政机构上的全面集中和三权分离的废除，议会民主制已被粉碎。从原则上讲，这个结果也是与希特勒的“联盟伙伴们”的设想相一致的，但结果却远非停留在这一点上。因为希特勒现在既能通过一项对大工业界和容克军方“普遍友好的政策”来拉拢他们，又能通过他那行政首脑实实在在的无上权力，来阻止他们串通一气地反对他。同时他也能够将他们的利益与兴趣仅仅限制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局部性领域，以达到将他们完全排斥在最高统治权之外，并将他们作为实现对外侵略野心的工具来使用的目的。因此，《授权法》的通过，同时也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中保守与激进的两大右派集团原本的联合已演变成为一场纳粹主义者的全面夺权，尽管这场夺权直到兴登堡总统于 1934 年 8 月 2 日去世之时才最后完成。

作为政府首脑，从现在起，希特勒所颁布的每一道命令都已具有了法律效能。随着这种国会的自我排除，随着希特勒独裁专政的合法化，这场取缔所有其他独立政党和组织的全面夺权，便以一种连意大利法西斯夺权的样板都黯然失色的速度来进行了。1934 年 8 月 2 日

① 戈尔德登·奥·克莱格：《德意志史》，1934 年，慕尼黑 1934 年版，第 276 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4 年，杜塞尔多夫 1934 年版，第 276 页。

月 圆日，社会民主党被取缔，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除纳粹党以外，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被取缔，自然也包括过去那些希特勒的“保守主义盟友们”的所有政党在内。与此同时，这些昔日的希特勒“盟友们”，便被一个个地排挤出政府，他们的位置自然也迅速地由纳粹党的成员来占据了。苑月 员源日，希特勒通过颁布《反对新政法》，宣布了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正式产生。因此，对于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对于教会人士、民主主义者，最后是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抵抗分子来说，都只剩下一条通向“非法抵抗的道路”了，而这条道路只提供了极小的成功希望。

德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广为接受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希特勒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下的德国，称之为“一个具有双重面貌的国家”：

这个被称之为“第三帝国”的国家，除了体现为一个“准则化的国家”外，同时还体现为一个“措施化的国家”。作为“准则化的国家”，它一般来说是尊重现存的或由它自己制造出来的法律的；但作为“措施化的国家”，它同时又是根据需要来蔑视同样的法律的。^①

从原则上讲，德意志的“法治国家性”不再能得到任何保证了，而“措施国家性”却越来越多地扼制着“法治国家性”，尽管法律上的准则支架仍然普遍存在。这也就是说，尽管有这场全面的夺权，但《魏玛宪法》从未被正式地宣布过无效，而这对于日常生活的外表平静来说，对于这场“民族革命”的虚假合法性来说，对于整个民族社会心理上的发展来说，都恰恰证明是大有好处的。同时，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证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正是采用了形式上合乎宪法的手段，才肃清了这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并建立起

^① 恩斯特·弗兰克尔：《双重面貌的国家》，法兰克福 员940年版，第 员6页。

一个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的。这种国家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一部由纳粹“元首”操纵的宣传、威胁、恐怖机器的扩建，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身也确保了德意志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体制的赞成或畏惧，而这种赞成或畏惧恰恰使得希特勒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这个社会，以达到他的远程目标。

第三节摇暴力的现代化

仅仅用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来评价纳粹运动还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不可忽视，纳粹运动及其道路为了达到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是通过采用最为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手段运用得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不仅使德国在这个时代中的社会“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连这个时代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这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运动，才导入了一场对传统粗暴残忍的破坏。通过这场颠覆式地连根拔除，以及国民在政治上的人人自危和个性上的牺牲，德意志社会也才更为全面地撞进了现代化。因此，纳粹运动本身也体现为一场暴力的现代化进程。”^①

作为整个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场“暴力的现代化”，远比德意志历史中过去的所有阶段，都更为深远地、痛苦而真实地改变了这个社会。它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种不容收回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竟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在经过它所造成的这场对传统的深刻破坏之后，在它所带来的全面毁灭效应中，德意志社会无论是向更近的还是向更远古的传统倒退的企图，都已成为了不可能，因此，也反而使二战后对这个社会所进行的新的现代性改造变得更为容易了。这正是我们理解纳粹主义“暴力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2 年版，第 195 页。

一、反传统的“一体化”运动

对希特勒来说，通过纳粹主义独裁的统治方式，将这个社会改造成一个“一致对外”的“军事民族共同体”，本身是为了向外夺取“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个远程目标服务的。《授权法》的通过与民主议会制的废除，仅仅完成了实现这个总目标的第一步。当这一步完成后，希特勒的下一步就是对隐藏在魏玛民主处理程序背后的传统社会结构实施激进的改造，这倒并不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是支持民主制的，而是因为它本身天然地抗拒着纳粹主义全面独裁的极权主义（~~魏玛共和主义~~）统治要求。

事实上，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德意志传统专制独裁主义（~~魏玛共和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反民主自由的抵抗基础，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结构，人们才被固定在那些非社会统一化的联系之中，而这种联系本身又阻止了人们对政治的全面参与。对于传统独裁权力精英的政治领导集团来说，那些仅仅具有半自治独立水平并彼此并立的中、小独立性机构和制度，如传统的地方主义势力、宗教分裂的组织、分门别类的社团、“相对自由”的大学、“国中之国”的国防军、坚持传统观念的家庭，等等，恰恰正是他们施展家长式“仁慈加严厉”的传统权威的可能性条件，因为唯有当这些机构和制度彼此并立或争执，才使得这种传统独裁权威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但是，要使人口大众对政治的不参与加以忍受，无论怎样，在社会孤立化的“前工业化”关系之下，总是比在工业化时代中更有可能的。或者说，这个社会越是现代化，这种不参与就越是变得难以容忍，尤其当“社会问题”已经迫使着越来越多的人为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利益去参与政治的时候。

那场极不彻底的 ~~魏玛共和主义~~ 1918年 11月革命，尽管带来了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带来了议会政党制，却没有对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有意识的改造，或者说，魏玛共和制恰恰是对这种结构采取和解姿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甚至也能够说，魏玛政党们的社会改革思想，也只是在以共和主义的表达方式，为过去那种独裁主义福利

国家的另一种变形体服务。现代化的进程在共和国时代粗暴而快速的发展，不仅未能真实地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反而带来了过去那些社会环境的“碎片化”发展趋势。这种“碎片化”是不可能给这个社会带来高度的现代性统一化的，只能带来这个社会更为严重和复杂的分裂化。在这里，仅举一例就足够了：一个在战前曾拥有百万之众的国防军（且不谈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膨胀到四百万人的特别膨胀），在战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在它的平民因素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成为了只有五十万“出身最为良第者”的组织。因此，当帝制时代传统专制国家的挣扎手段丧失掉的时候，千百万因战争而脱离原有社会环境联系的人们，已经难以找到退回的归路了，而战后所有的经济灾难都使得这种对原有环境丧失的“风暴潮”不断上涨。

总之，正是在共和国时代，制造出更多无环境依托者、无根基者、失业者和社会边缘者，而共和国本身又无力承受这种社会不正常发展中的现代化所积压起来的矛盾、潜力和冲动。共和国的捍卫者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少的吸引力，恰恰是因为他们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未受真实触动的传统社会联系，而传统结构的种种力量能再度死里逃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满，本身就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这样，在共和国时代，一方面，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从法律上给予了公民以民主权利；而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经济上的长期危机局势，实际上在阻止着民主权利的实施。从理论上讲，通过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争论来履行《魏玛宪法》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却处处禁止或阻止着这种争论。从表象上看来，公民权利的全面提高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是，魏玛的议会政党们对那种继续有着影响力的传统联系完全保持了沉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党的地位，又恰恰由于民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是无保障性的，因此，它们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意识地在促进着对传统式的独裁政治的渴望。一位完全是传统独裁权威的老派代表人物——兴登堡元帅——竟然会成为共和国总统的

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与传统专制独裁政治复辟倾向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这样，无论是德皇帝制，还是魏玛民主制，由于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造成了一种双向性的结果：一方面，人口大众对政治不参与的忍受被积压起来，并聚集着更大的喷发能量；另一方面，人口大众的不满矛头也因此对准了民主制。希特勒“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战略之所以能够奏效，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局势。因此，在这场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当希特勒以“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将这种积压起来的人口大众的能量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能量的喷发方向对准他要对准的任何一个现存目标的。当他摧毁了议会民主制以后，便将他的攻击矛头对准了这种传统结构。

不错，希特勒也总是在谈论着要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例如，在上台后的第三天，~~1933年~~1933年1月30日，他这样说道：

从家庭开始，包括荣誉与忠诚，民族与祖国，文化与经济的所有概念，直到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信仰的永恒基础，都将不受任何否定式的干扰。对于这个在过去 ~~1918年~~1918年被马克思主义所毁坏的我们民族力量的基础，对于作为我们整个道德基础的宗教，对于作为我们民族和国家机体细胞的家庭，民族政府都将坚决地加以保护和捍卫。^①

在以后的多次演说中，他也曾这样宣称：“操持家务的事是留给那些年龄更大的女儿们的，帝国青年义务劳动是要交给那些娇生惯养的市民子弟们的，服兵役是民族的学校。”他不时地警告青年人“不要过多地饮啤酒，而要时刻保持健康的体魄”，甚至也经常破口大骂那些“来自知识界的牢骚”。他亲自动手清除了“博物馆中

^① 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在它的时代中》，慕尼黑黑 ~~1965年~~1965年版，第 ~~100页~~100页。

蜕化堕落的艺术作品”，而且一有机会，也总少不了对“健康的农民阶层”的强调，对“伟大母亲角色”的赞扬。^①

这一场对传统观念忠诚的表白，对于刚刚与希特勒结成反民主同盟的传统精英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当他能够借助《授权法》来随心所欲地改造这个社会的时候，他走的恰恰是一条与之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破坏传统的道路，或者说是“一条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来摧毁传统的道路”。希特勒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并不在于他想要对这个社会来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改造，而恰恰在于他还嫌这种传统结构给予人们太多的社会自由了。为了他个人全面独裁统治权力的需要，也为了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调动这个民族的整体力量，去发动一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希特勒恰恰需要一场具有现代性风格的“群众运动”，一场不停顿的运动来作为手段和工具。因为他知道：

唯有让群众不断地处于运动的兴奋状态之中，才是可能对他们全面加以控制的时候，也才是可能对他们实行彻底统治的时候。^②

因此，他是不能允许任何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地方性的力量，置身于政治之外来摆脱他的统治的，就连私人的传统美德，以及那种对地方、宗教、家庭和社团的传统忠诚，对他都是一种抵抗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希特勒全面独裁统治的贯彻，不仅仅是以摧毁议会政党制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粉碎人们对任何非中央性的独立和半独立机构的传统式忠诚为前提的，即使对纳粹党内罗姆领导的“冲锋队”的独立性也毫不容情！而且当所有这些传统式的忠诚被

^① 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慕尼黑 1945 年版，第 104 页。

^②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 1948 年版，第 27 页。

粉碎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将运动引向对外冲击的目标。

因此，尽管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绝然反现代主义的，但也正是由于纳粹主义者如此激进地反现代主义，反而导致了对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如果说这种方法和手段的导入，带来了一种反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结合的扭曲面貌的话，那么它体现为一场破坏传统的斗争。这场斗争也被希特勒堂而皇之地称之为“褐色革命”，在这里，他是急于要将这场“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红色革命”区别开来的。^① 它的开端，存在于被希特勒称之为“一体化”（~~德意志精神运动~~）运动的进程之中。

“一体化”这个概念，如同“极权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一样，并不是解释学上的一种发明，而是由纳粹党人自己在实行它的专横统治的开端年代里制造出来的。它意味着扫除政治和社会范围内所有不受控制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所有那些还处于自身封闭或独立状态之中的机构或组织，都必须屈从于一个冲击方向，一种瞄准了国家目标的、也是在“元首”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冲击方向。然而，通过这场“一体化”，人们也恰恰最后被痛苦地从传统的、自身特别狭窄的和亲密的联系中强拉了出来，并彼此变得具有某种相似性了。也就是说，每一位“民族同胞”与那位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关系，都是一种同样的屈从关系了。当人们说，纳粹政权到处致力于用机械性的结构，来取代有机的社会结构的时候，那么这是很清楚的：它所需要的，不是许多具有自身明确性的、能独立生活的、拥有自身历史范围的机构制度的相互交错连接，而是将所有的机构制度都同样地投入到一个目的中去。正是在希特勒手中，取代过去那些种类众多、具有各自权力和自身分量的局部性精英位置的，是一个具有全面垄断权力的政治寡头集团；取代过去那种受到束缚的、因而也只具有局部社会角色的人口大众位置的，是那些聚

^① 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在它的时代中》，慕尼黑黑 1965 年版，第 140 页。

集在纳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光谱上的所谓“民族伙伴”（~~民族伙伴~~）^{（灾祸）}。

在德意志传统的意识形态中，那种被人们理解为“有机体”的国家观念，不仅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也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传统独裁主义思想意识。它允许社会各组成部分长久地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只要这种独立生活不触及到最高领导阶层明确的权力要求。由于这种传统的领导阶层要求的仅仅是最后的决断性权力，由于它的合法性首先是以被统治者对政治的不参与为基础的，因此，这种社会独立生活的领域仍然是相当宽的，因而也提供了某种相对的社会自由。在家庭、学校、教会、乡镇和地方，部分也在军队、司法、官僚部门，自发性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一种很平常的产物，只要这种自发性组织不威胁到这个统治阶级的传统专制独裁的权力地位，那么保守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对它们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这种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构”并不能满足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强权要求。相反的是，这种法西斯统治是将这些机构和制度的每一种独立生活都作为严重的威胁来感受的。作为非传统性的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希特勒为了建立他个人的全面独裁统治和对外政策上的需要，是要扫除所有传统的、具体的独立生活基础的那些联系的，是要摧毁所有与国家无关的忠诚，并无限制扩大这种所谓“民族伙伴”的社会角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体化”就是一场彻底的“排除化”，一场严厉的“纪律化”。

与这场“一体化”进程相比，扫除议会民主制，只带来了相当微不足道的社会效果，而其他的效果是通过希特勒对《授权法》头一年的运用才产生出来的。例如，希特勒的全面独裁统治先是限制、后是连根拔除了邦国的地方独立权利。人们必须承认，这种邦国结构的保留，本身是俾斯麦在创立“小德意志”统一帝国之初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这个社会存在形式中的那种既有民族统一、又有地方分裂的特别混合

的特征。无论是在威廉二世时代还是在魏玛时代，对于这种现代要求与传统关联的混合形式，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摧毁它。而希特勒早在 1904 年所写的《我的奋斗》中，就表示要铲除这种邦国的地方独立权利了，因为“维持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只会“使它没有统一的政府，而这仅仅是法国的一种宿愿，因为它想把莱茵河左岸据为己有”^①。因此，希特勒通过 1934 年 1 月 30 日的《各邦国与帝国一体化法》以及 1935 年 1 月 30 日的《帝国新建设法》，便迅速而残忍地摧毁了这种对地方性传统的忠诚。各邦国议会均被解散，它的权力现在全部划归帝国中央。这意味着自 1871 年以来由俾斯麦和他的共和国继任者们建立或维持的帝国联邦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全面独裁的体制。^②

普鲁士国家官僚机器和司法机器，从代表代理性主义的管理方法上看，从它在 1918 年以前所体现的“现代法制国家性”上来看，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的。但是，从它维护传统专制独裁主义的现实功能上看，它恰恰又是具有反自由民主性质的，因而也是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性质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它们也一再证明了自己决不具有民主思想来源。历史学家们也一再指出，这些机器部分是无意识地，但通常是有意识地继续着阻碍民主、发挥传统独裁统治方式的影响作用的。但是，在 1933 年革命后的共和国时代，就连那些民主政党的执政者们也丝毫不敢去触动它们，而是依靠它们。而希特勒在这里表现得毫不犹豫，在他实行专横统治的头一个季度里，他就通过所谓 1934 年 1 月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实行了对文官和司法系统的“一体化”，毫不留情地清除了所有“政治上不可靠的”，“没有纯雅利安血统证明的”文官和法官。这种行动目的在于要向人们宣布：“这些机器必须完全属于权力的新主

①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4 页。

②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871-1933》，慕尼黑黑 1965 年版，第 241 页。

人！”^① 这种对具有传统独立性和自律性机构的无情改造，这种对与之相应的道德和习俗的彻底干预，竟达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于这些机构的传统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体化”运动也迅速蔓延到其他机构和制度上。它使总统的职务不起作用了，而且在兴登堡去世后干脆取消了这个职务。在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时，他是将自己称之为“国家元首兼总理”的。与此同时，“一体化”闯入了国防军这个“国中之国”，迫使着国防军全体官兵对希特勒个人效忠；它扫除了经济界所有机构的独立性，甚至像大企业家的“德意志工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不例外，并通过一种由纳粹国家进行统一监控的“帝国劳工阵线”来将所有的资本家与工人组织在一起；在农业领域中，它用一个类似的“帝国食品战线”组织，取代了过去所有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独立性组织；它剥夺了新闻出版界的任何独立性，并使它们完全听命于这个纳粹独裁国家。随后，这场“一体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严厉的措施，在所有那些与国家保持距离和疏远的社会机构中开始了，在教会、私人组织以及各类联合会中开始了，也通过一场野蛮的“焚书运动”，在大学、文化界、艺术界开始了。所有的社会自由都被剥夺，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被置于纳粹中央主管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

长期以来，在德意志社会中，社会阶层团体、职业联合社团、宗教组织的忠诚，是被人们作为神圣的东西来加以赞扬的。尽管魏玛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侵蚀这种忠诚了，纳粹党作为一个“全民党”也已经在破坏这种忠诚了，但是，希特勒在夺权道路上并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票这一点，说明这种忠诚还具有相当的牢固性。因此，当希特勒大权独揽的时候，为了他内外政治的需要，他必须全面粉碎这种具有独立性的团体与组织在成员资格属性上的捆

^① 戈尔德·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65 年版，第 200 页。

扎力。在这场反对传统忠诚的斗争中，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工会”、天主教、基督教的工会组织，以及大学生联合会组织，便迅速地成为了牺牲品。因为希特勒认为：

这些社团和组织，使个人的部分公共活动逃避了普遍的透明性和国家监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对一体化运动的瓦解。而这场运动，对于贯彻统治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必须对这些组织迅速采取措施化的行动。^①

这也同样有效于对教会的“一体化”。对希特勒来说，教会还远远不止是眼中钉，尤其是天主教的教会。在整个魏玛时代，一直起着政治平衡作用的中央党选票的发展，本身就体现出教会力量是比其他所有政治力量都更具稳定性的。在此，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像纳粹独裁统治那样，有能力在社会上公开充当教会的敌人。“不信教者”过去也仅仅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亚文化”中才得到承认的，“信教者”总是被国家统治者加以鼓励的。而在这个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纳粹主义才是高于一切的信仰，它迫使所有的教会组织向它屈服、向它效忠。希特勒利用这种“一体化”的方法，不止是对教会施加了直接的影响力，而且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脱离了教会的束缚，因而也使得这个社会沿着纳粹主义的道路彻底地世俗化了。尽管希特勒战术性地保留了教会形式，但他无疑已经在这场反教会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

在这场反传统联系和忠诚的斗争中，纳粹运动带来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对家庭地位的改变。在纳粹主义的宣传中，并不缺乏对家庭以及它的中心性社会意义的信奉，然而，当人们观察它的实践时就会发现，纳粹的家庭政策导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55 年版，第 194 页。

致的是将家庭的功能系统化地降低到人口再生产这个最为原始的任务上。希特勒声称：“妇女的任务，就是成为未来民族勇敢士兵的母亲！”^①因此，在家庭问题上，凡是不能充分按照纳粹统治者的意图来理解这项任务的人，都会合乎逻辑地遭到纳粹统治者和国家机构的冷淡；凡是在“繁衍血统纯洁的日耳曼人口”的任务面前“耽误了义务”的家庭，也就是不能生产足够多孩子的家庭，国家所规定的“家庭权利”便立即遭到剥夺。

这种所谓的“义务”，对家庭本身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它与家庭内在的牢固性不仅毫不相干，而且也丝毫谈不上个人的幸福，因为它是从增强民族军事力量的侵略性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与此同时，为了促进这种“义务”的贯彻，纳粹统治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剥夺了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加入“少年队”、“少女队”、“希特勒青年团”，并强制性地接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对家庭权利和任务的明确限制，意味着对人口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是以必须尽可能多地使个人摆脱私人活动领域为前提的，连同“今天的少女，明天的母亲们”也绝不例外！

“民族伙伴”的社会角色，便这样年复一年地发展起来，而其他的许多社会角色，如家庭成员、具体的社团成员角色，都被这种相同的和公共性的角色吞吃掉了。如果说纳粹运动的活力取决于这位“元首”能否组织起群众“划一化”地对政治的参与的话，那么这些“民族伙伴”对公共性政治事件的参与，也只是在不对这些公共事件的性质产生真实影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他们的到场，充其量也不过具有一种示威性效果。然而，他们之所以必须参与，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受到纳粹政权严密监控的。这种监控仅仅意味着学生联合会的会友，工作中的同事，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徒，儿子或父亲作为“民族伙伴”都必须退出他们私人圈子的领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18》，慕尼黑黑 1965 年版，第 221 页。

域。虽然这促进了一种公共性活动，但它是“划一化”的队列、亲近者之间的告密、不加思考的行动积极性这样一些公共性的恶习为形式的。

总之，通过这场激进的“一体化”运动，希特勒已经将减轻现代化压力的要求与打破传统限制的要求联合起来了，将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的愤慨与“青年一代”反对“老一代人”传统僵化世界的社会抗议联合起来了，将对日益丧失传统联系的抱怨与反叛式地砸开传统联系的愿望联合起来了，将乡村、地方、行省对“罪恶的工业化大都会”的反叛与民族集合化运动中的地方特点的匀质化联合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法西斯独裁统治能够将群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最终引向那个“一致对外”的“夺取生存空间”的侵略性目标上去，因而也极大地增强了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毁灭力。

二、暴力的现代化

希特勒曾在 1935 年 9 月的纽伦堡全国党代会上这样宣称：“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 世纪以来神经紧张的时代已与我们告别！”^①但是，这个“民族共同体”通过它“民族伙伴”角色给人印象深刻的和谐表象，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假象，因为这个“共同体”是以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元首原则”为基础的。在一种思想意识向远古倒退的道路上，在一种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原始性的狂热崇拜中，希特勒全面独裁的要求和对外侵略的野心，与一种高度现代化的手段结合了起来，因而形成了一种德意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面貌。由于所有有关民族、国家、阶层、教派、家庭的组织形态都在这个独裁者的手中被全盘工具化了，因而在“共同体”表象的背后，开展着一场从未停息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场对整个人口大众的

^①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45 页。

全面征服。

通过 1935 年对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的改组，“一体化”运动也最后完成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权力已经能够用这样的法律语言在 1933 年的《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公开表达出来：

元首系帝国的整个主权于一身，公众的所有权利，正如运动一样，来源于元首的权力。我们必须讲元首的权力，而不是国家和党的权力。因为元首是全体人民意志的最高执行者，元首的权力是全面而完整的，它统一了所有的政治组织，它扩展到人民生活的所有特别领域，所有共同体成员都有义务忠于并服从元首。元首的权力是不受条件限制的，是自由的，独立的，绝对的和不受任何抑制的。^①

这是德意志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无论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帝国的皇帝，都无法想象和要求的权力。的确，作为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已经成为了一切权力的来源与创造者，他无需像第一帝国的皇帝那样，唯有通过寻求罗马教廷的承认，才能使自己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只消通过他亲手签署的“元首命令”，他就能像当年的皇帝安排封土那样，分配巨大的势力范围，而丝毫不考虑官僚体制结构上的要求。与过去的皇帝不同的还有以下一点：在希特勒所统治的这个新帝国里，任何下属都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要想从他那里获得哪怕是一点点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是幻想。那些新的大小“封臣们”既不是对国家，也不是对纳粹党效忠，而是对这位权力的独裁者个人效忠。他的权威也正是通过下级领导之间的对抗来保证的，而他又正是要通过自己的独裁者地位来防止官僚体制上的僵化状态，来将这个纳粹帝国的车轮始终保持在“希特勒运动”的轨迹之中。总之，他决定着最后的手段，决定着

^① 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年，法兰克福 1933年版，第 15 页。

是战争还是和平，而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们看来，正是唯有这位“元首”才应该拥有的特权。

不仅这种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贯彻的“元首原则”体现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而且希特勒用所谓的“日耳曼—雅利安民族东方殖民化”来替代当地原有居民的“生存空间”理论和“大空间理论”，同样也体现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种“空间理论”是对远古时代德意志氏族部落向东殖民化，建立“马尔克”模式的有意识的再接受。在希特勒看来，“这个东方是‘未开发的西方’，那里不存在着任何法律和公正上的问题，因此可以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①。由此可见，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其性质是不同于各列强曾在1914年进行过的那场为资本主义商业性海外竞争利益服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它涉及的只是一场铲草除根式的种族灭绝！

同时，用这种野蛮的殖民方式来占领土地，本身也是为造就一个“新的宝剑贵族”服务的。这位中间等级出身的“元首”，在对未来理想的表述中这样声称：

未来的等级是不能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的，因为这种通过教育得来的知识，使人能不经过前线的经历就成为了少尉（这是希特勒过去从未得到过的军衔）；也是不能建立在令人厌恶的大学专门知识上的，因为这种专门知识，竟使法学家们能在后方安心地写作（希特勒从来没有成为过一名大学生）；更不能建立在钱袋的基础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一直是在流浪和贫困中挣扎的），因为一个以钱袋为基础的、以精明商人的投机活动为基础的等级秩序的民主思想，是一种荒唐透顶的东西！^②

① 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57年版，第105页。

② 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1954年版，第105页。

因此，他这样宣布：

未来的等级秩序，就是要用战斗的等级秩序来反对、取代那个过去的世界，取代那些退化了的贵族和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资产阶级的，应是一个新的优等阶层，一个新的、在战场上挥舞宝剑的贵族，这个宝剑贵族是不能用世袭权力来取得优先权的。^①

当然，也就像远古时代的北方蛮族，在通过摧毁罗马帝国而由原始状态猛然闯入封建时代那样，要成为这个“新贵族社会”中的一员，除了在这场战争中经受考验和对这位“元首”忠诚不二以外，没有别的前提。

希特勒明确规定：“各地区行政长官在十年后必须向我汇报他们‘封土’上的日耳曼化的完成情况。”但由于害怕这些长官们可能变成“帝国诸侯”，他宣布：“他们随时可能被撤换，也绝不允许世袭他们的权力。”^②同时作为加强控制的手段，“这个巨大的帝国应用交通技术上最为现代化的手段联系起来，用四米宽的铁轨所组成的铁路线，和一条由柏林射向四面八方的五米宽的帝国高速公路网铺设开来”^③。由此可见，纳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想在政治上全面推行，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技术的投入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里人们能够发现，希特勒法西斯极权主义独裁与传统专制主义独裁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利用了一切现代化

① 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 灵苑年版，第 105 页。

② 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 灵苑年版，第 105 页。

③ 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 灵苑年版，第 105 页。

技术手段和方法来进行统治的独裁。昔日的独裁者们需要非常合格的助手，即使在最低的岗位上，也需要能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人。而在现代化技术时代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可以无需这样的助手。单凭先进的通讯工具，便能使下级领导全盘机械化，单凭现代化的交通手段，便可以对全国进行广泛的监督，更不要说对罪行所进行的高度保密了。其结果自然是出现新的盲从，而这正是希特勒这位独裁者所需要的。就像“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一样，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也是必须求助于现代化的经济、军事、技术手段的。这种“暴力的现代化”，不仅反映在对“共同体”的管理上，更反映在“生存空间”的夺取上。

尽管容克贵族与工业垄断巨头们在希特勒上台之际曾经打过“将盗猎者变成守林人”的如意算盘，并洋洋得意地宣称：“我们雇佣了他！”但是，纳粹主义“一体化”运动的结果所证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恰恰是他们才成为了希特勒这位独裁者手中的真正工具。^①

那个被希特勒所鄙视的“退化的”容克贵族及其军官团，之所以还在这个“共同体”中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他认识到了德军现代化的组织能力、战斗力以及士兵质量的结果。希特勒深知：

要完成重整军备和夺取生存空间计划，只能在军事专家的协助下才能实现。因为军官团有它的人才、军事传统以及对最高权力服从的传统，只要我们取消了布尔乔亚式的国民价值观，代之以命令和服从，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今天的乌托邦就会成为明天的现实！^②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德意志独裁，纳粹主义的形成，结构，后果》，科隆 1964年版，第 123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慕尼黑—莱比锡，杜塞尔多夫 1964年版，第 152页。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宁愿拿“冲锋队”及其头目罗姆等人的性命作为代价，来换取军官团对他的忠诚，因为罗姆领导的“冲锋队”只能进行街头破坏性的斗殴，不能进行征服世界的战争，却竟敢向他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绝对忠于元首的“党卫军”，立即成为了能对军官团进行权力控制的力量。特别当 1934 年“罗姆 1 月 30 日密谋事件”发生之后，他更是毫不犹豫地肃清了容克贵族以及军官团中所有不愿与他一起走进坟墓的分子。

希特勒没有让“冲锋队”和“党卫军”去染指工业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懂得：“没有垄断企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方面的组织才干，我们就无法夺取生存空间。”在他的思考中，“经济不过是政治的仆人，通货膨胀也只是一个纪律的问题”^①。希特勒甚至也对大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首创精神”表示赞赏：

为了战争的准备，我们必须用市场来保证效率，用计划管制来保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界对我们的空间目标来说，是一种远比那种官僚化的、被一群奥地利式的拿保险金的官僚和职员们统治的经济有效得多的工具，当一切生杀予夺之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企业界由于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只会是一种更加顺从的工具。^②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保留，不是从政治权力对企业家们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导出来的，而是从政治强权的基本利益中，从这种权力的自身发展的功能性条件的需求中，首先也是从对战争进行经济动员的需求中导出来的。

① 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 1954 年版，第 154 页。

②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苏黎士—慕尼黑，杜塞尔多夫 1954 年版，第 154 页。

而且在希特勒看来，德国的大工业家从来就是一种传统的效忠力量，对最高的国家独裁统治者过去也并无反叛的记录，充其量不过是逃亡罢了。这方面最为出名的例子，恰恰发生在“钢铁大王”蒂森的身上。这位最先支持纳粹党上台，又最先对纳粹严格的经济管制制度不堪忍受的德国工业巨头，在 1933 年大战前夕出逃到美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暴政真是太可怕了。”而德国大工业界的另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金融专家沙赫特，最后竟然也加入到了“范月 10 日密谋事件”之中。

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与纳粹极权统治的结合中，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真正的工具。如果说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在纳粹时代得到了某种保存，甚至是某种发展，那也仅仅是因为它是希特勒手中进行暴力征服不可缺少的工具。这同时也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家们的“首创精神”和经济效率已经越来越无法脱离一种能可靠发挥效能的国家干预的框架了。当然，希特勒对工业界也自有宽慰之语：“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要使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要使人国有化！”^①

要想在不改变工人真正的不平等地位的条件下，实现“民族共同体成员意识的一体化”，希特勒光靠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头一手分工的平等意义”，以及组织诸如“大众旅游”之类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集体活动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还必须在德意志社会树立起一个有可能为各阶层、教派所共同接受的对立物，于是，反犹太主义发挥了它又一个妙用。正是在这个第三帝国的社会生活中，也正是在希特勒的手中，反犹斗争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替代物。

在这个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中，反犹运动成为了克服所有社会和经济实际利益分歧者们的“一体化因素”。希特勒声称：“反犹太主义是日耳曼民族一体化的粘固剂，在仇恨犹太世仇

^① 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3-1934》第 1 卷，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03 页。

上，日耳曼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共同体才能得到证实。”^①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更为这场反犹运动提供了所谓“生物学上纯科学的证明”：

元首与追随者之间的同类性是生活的必要前提，而同类性是一种从发源于情绪上最深奥的无意识冲动到最小的脑细胞活动的自然现象。同类意识和共同体成员首先体现出这种能力：一眼就能识别不同种类，一眼就能区别朋友和敌人，这个敌人就是犹太世仇！^②

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个新的等级制度的轮廓终于被全部勾画出来。这种新等级制，固然不是依靠血缘世袭的传统地位来决定的，而是依靠一种国民军事化的体制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则要比帝制时代严格得多。在这种新等级制中，每个人都有在他之上必须服从的人，最高的权力统治者是希特勒，同时每个人都有在他之下有权支配的人，那么，那些被压在权力金字塔最低层、又拥有“日耳曼成员资格”的一般“民族伙伴们”能去支配谁呢？——“犹太人”！被开除出“共同体”之外的犹太人，是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个德意志“民族伙伴”都可以任意施虐的对象，每个德意志“民族伙伴”又都是能从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中，索取他必须服从上司时所受压抑的补偿的。尽管屠杀犹太人的“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犹太人”这个敌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永远都不允许消失的，因为所有的仇恨，所有的种族主义情绪，所有的苦难，包括这个社会体系中出现的所有罪恶，都必须由这个“犹太敌人”来承担，更不要说在对外政治方面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说成是“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

① 伊罗洛勒·斯特林：《有缺陷的国家，对独裁与民主的研究》，法兰克福福克出版社1934年版，第187页。

② 恩斯特·福尔斯特霍夫：《极权的国家》，汉堡福克出版社1934年版，第187页。

谋”，对这个“共同体”所产生的内聚力了。只要那个“世界帝国”的美梦还没有实现，只要这个敌对的“种族”还没有被消灭，纳粹主义的信徒们便始终都在行动！

任何对这种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提出疑问的人，都将与作为“民族敌人”的“犹太人”一样，交由盖世太保、党卫军处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集中营、死亡和焚尸炉，更不要说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抵抗运动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了！纳粹主义独裁的“暴力现代化”恐怖统治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三、传统权力精英们的“抵抗运动”

传统权力精英们对纳粹政权的抵抗，是作为纳粹极权独裁统治下的一种社会伴随现象而出现的。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最困难、也最可悲的一章。如果说纳粹政权从建立它极权独裁统治和“夺取生存空间”远程目标的需要出发，导引了一场对传统社会的激进破坏的话，那么来自传统精英们的这场抵抗，只能作为一场非民主性的“传统的起义”来表达。当纳粹政权以魔鬼般的形象向他们袭来时，他们的抵抗却又采取了如此“人道主义”的形式，因而才使这场抵抗成为了纳粹德国社会中反希特勒法西斯运动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事实上，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与“激进”的纳粹主义者之间，为扫除魏玛共和国而结成联盟的那场“历史性的错误”，很早就被传统精英中少数头脑最为清醒的人们所认识到了。在新权力主人统治下发生的某些事情，对盲目的群众来说，是作为“解放”来发挥影响的。不停顿地运动，大刀阔斧地破坏现状，在这里事实上也是在破坏传统。而群众从中看到了好处，因为这至少能为他们提供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这种感觉恰恰是他们在魏玛时代的其他政党身上所没有找到的。但是，对于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来说，这种由于纳粹极权独裁统治的需要所导入的运动手段的现代性，则意味着对他们原有独立权力痛苦的放弃。因此，尽管纳粹主义的法学家们将这个国家称之为“新型的法制国家”，但是，这种显而易

见的诡辩，并不能平息这些传统的“法制国家”追随者们的愤慨。在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身上，在那些被“一体化”运动抛弃的旧机构和制度的载体们身上，正是恢复原有传统社会状况的兴趣和利益，才促成了他们道义上的抵抗。因此，道义上的“起义”与反对危害传统利益的抵抗，这两者是压倒优势地来自于这些保守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集团的。

但是，对于贵族集团中的更多人来说，当他们认识到纳粹极权独裁权力的贯彻必然会毁灭他们的传统主义路线这一点时，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至少在 1935 年以前，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团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们，对希特勒是普遍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希特勒帮他们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他们重建一支强大军队的梦寐以求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他们对纳粹统治的热情，只是在 1936 年 1 月怀疑希特勒很可能会将德国引向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去的时候，才开始逐渐消失的。这种怀疑也带来了希特勒在 1935 年对容克军官团和外交部更严厉的“一体化”。所有这些都使得贵族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过来。前驻意大利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 1935 年“1 月 10 日密谋事件”以前谈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纳粹当初是故意将我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和这个有教养的阶级逐出他们的岗位的，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我们。”^①

事实上，还在纳粹极权统治开始之时，希特勒就已经有这种打算了。如希特勒当时所云：“这些人早就应该被消灭掉。不过，很可惜，人们一时还需要他们。”^② 需要他们作什么呢？需要他们作为夺取“生存空间”、实现最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远程目标的有效工具。当他们不能充当这种有效工具时，他们也就完全成为多

①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 1935 年版，第 106 页。

② 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 1936 年版，第 22 页。

余的了。因此，这个曾经为摧毁民主共和国而与纳粹结盟的集团，当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便开始反过来将新权力的主人视为真正的对手了。

这是一个由各个单独采取行动的保守知识分子、文官、外交官，以及容克军官团成员组成的各类集团的集合体，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协调行动的抵抗运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著名的容克贵族世家，因而也使这场运动具有了容克贵族集团及其中坚力量——军官团反抗希特勒暴政的特点。但是，由于他们的行动是与当时纳粹德国人口大众中普遍蔓延的种族情绪截然对立的，又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别条件下，因此，这种反抗纳粹暴政的行动，又是被人口大众斥之为“叛国”和“卖国”的。^①

总的来说，这场抵抗运动是由三个集团的行动组成的。第一个集团是以普鲁士容克贵族中最为著名的毛奇家族和瓦尔登堡家族为核心的“克莱骚集团”，它以老毛奇家族在西里西亚的庄园而命名。早在 1918 年初，它就组织起大量容克贵族子弟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也联络了原天主教中央党内的一批天主教贵族成员，这些人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德国战败后如何重建贵族统治新秩序的讨论上。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奥托玛·冯·阿勒汀指出：“这些人同样不是以坚持民主设想为方向的，而是坚持等级国家的理想，以及与之相应的保守主义传统秩序观念的。”^②

第二个集团是由第三帝国的前部长们和外交家们所组成的集团。它的成员同样绝大多数来自于容克世家，例如前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前驻苏大使冯·舒伦堡，前外交部长冯·牛赖特，以及中央银行总裁兼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他们准备在希特勒垮台后，重新出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但这种治理方案，也大多

① 克劳斯—于尔根·米勒：《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帕德波恩 1982 年版，第 104 页。

② 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 1982 年版，第 104 页。

是以过去的传统体制为方向的。例如，在关于未来地方管理的设计方案上，他们一再表达了要恢复传统地方主义的愿望。冯·舒伦堡就做过这样的设想：“比地方行政区域的均衡性重要得多的是在行政区域中人们的共同属性，这种共同属性只有通过一种共同的历史才可能形成。因此，与纳粹主义的平均主义与平整主义相反，我们是要坚持传统的。”^①

第三个集团，也是纳粹德国中最为重要的抵抗集团，一个以前参谋总长冯·贝克上将为领导，以容克贵族军官团的高级将领为核心的集团。三位最著名的陆军元帅冯·隆美尔、冯·克鲁格、冯·维茨勒本，以及前参谋总长冯·哈尔德上将、海军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国内驻防军司令弗罗姆上将都参与其中。那些没有参与的元帅和将军们，也大多是“知情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人去向盖世太保告密。与他们发生联系的还有以埃尔温·普朗克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以及老保皇党人、魏玛时期的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此人后来成为了这个集团中的一位政治核心人物。在 1935 年以前，由卡尔·戈台勒起草的关于未来国家的设计中，还曾打过将流亡在外的威廉二世重新请回来复辟帝制的算盘，这个计划仅仅由于威廉二世客死他乡，才最后作罢。^② 总之，这是一个真正在采取具体行动行刺希特勒、密谋发动军人政变的集团，自 1933 年以来，仅行刺希特勒的行动，他们就采取了 10 次之多！而在那场由著名的冯·斯道芬堡上校具体指挥，并亲自深入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刺杀希特勒的 1944 年“菀月 14 日密谋事件”行动中，他们几乎得手。

传统精英们的抵抗，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扫除纳粹统治和结束战争”，但是，他们的目标仍然主要在于恢复旧有统治秩序与传

① 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 1989 年版，第 104 页。

② 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 1989 年版，第 104 页。

统的价值观。他们选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采取行动是有着他们政治上的特别打算的。因为此时苏联红军已开始攻入德国本土，而他们希望在推翻希特勒之后，与西方迅速媾和，并借助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与东方布尔什维克抗衡，从而为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

这场“传统起义”的失败有许多原因。首先，从真实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没有士兵的运动”，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是得到承认的，在大多数群众那里，也是得到了远非只是沉默无声式的赞成的。就连在“苑月 圆日密谋事件”中举事的容克贵族军官团密谋者们也承认：“希特勒是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的惟一的人。”^①因而他们不敢通过发动群众来反对这个独裁统治。

军官团的优柔寡断、怯弱，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这要归因于他们与这个暴政之间的基本牵连。在他们看来，没有希特勒的夺权和对共和国的摧毁，就不会有德国的迅速强大和重新崛起，就不会有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初期胜利，少尉就不会发迹成上校，上校就不会晋升为元帅，也不会有十字勋章和橡树叶勋章。而且全世界都清楚，正是通过军官团的军事智慧和技艺，通过国防军的皮靴，纳粹暴政才扩展到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作为效忠的工具，他们助纣为虐，已经为这个暴政犯下了太多的罪行，在大势已去的关头发动政变，他们本身又有会被人们指责为“背后捅刀子”的心理障碍。

在这里，“民族紧急状态”的长久性呼唤，本身就能导致所有内部对立的暂时性中止，以至于连最私下的敌意一时也能被“社会内部的一致性”所掩盖。响亮的民族主义口号，更确切地讲，种族主义口号，在这方面给纳粹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民族共同体”集团心理上的动机，本身也以极为深刻的程度统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代。正因为如此，纳粹主义的“一体化”运动才先是接受、后是贯彻了法西斯极权独裁的统治形式，

^① 戈尔德·粤·克莱格：《德意志史》，慕尼黑黑 版，第 页。

在这里，就连那种传统上流人士们“内心流亡”的孤岛也受到了威胁。抵抗运动之所以过去一直没有发展到充分激烈的程度，也是由于每一种民族对外战争中的领导者，总能具有统治合法性上的优先地位。但是，这场贵族们的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还是发展到了“起义”，恰恰说明希特勒独裁者的权力地位正在发生动摇。

当然，这场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起义”，即使能获得成功，也绝不是德意志社会向政治民主化道路迈进的一步。正如原定的新总统一人选贝克在“苑月 园日密谋事件”以前所讲的那样：“如果时间退到 员愿年的话，这个国家会更好一些。”而原定的新总理人选戈台勒这样写道：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的社会，而不是改变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未来，将要建立在职业、地方法人团体的模式上，而不是建立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它将通过一个复杂的选举体系来对直接投票权进行抑制，它将赋予军方以特别的监督功能，并以一个拥有君主式权力和威望的首领人物，来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这将是一个独裁主义（~~粤国独裁主义~~）的福利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公民将再也不用害怕无法无天的专横和极权主义（~~裁国极权主义~~）的恐怖，但是它将否定政治选择上的自由。^①

由此可见，这场抵抗运动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想恢复 员愿年以前的那种传统专制独裁体制的。凡是这场以最为丑恶的形式和面貌出现的纳粹主义“褐色革命”违愿地带来了现代性的地方，这些抵抗者们也都是致力于恢复家庭、阶层、地方与宗教的传统联系的。因此，这场由传统权力精英们领导的反希特勒极权独裁统治的抵抗运动，尽管是以“社会道义上的公正”名义来登场的，但即使它

^① 戈尔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员愿-员源》，慕尼黑 员愿年，第 缘页。

获得成功，也只能为传统专制独裁统治重新提供一个基础，而不是为民主制度提供一个新基础。或许在当时的世界里，再没有哪个国家的抵抗运动，像纳粹德国的这场抵抗运动那样，道德上的正义性与民主的现代性竟如此明显地发生分离了。

但是，~~灵~~1933年的“~~瓦~~1933年密谋事件”，也同时勾画出纳粹主义“褐色革命”的终点。因为随着这场政变的失败，带来的是德意志传统政治精英们的末日。希特勒通过他残酷无情的镇压措施，将三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上百名将军以及七千多名贵族精英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当大量年轻的容克贵族子弟在战争的头几年中丧命后，这个传统的贵族阶级又在“~~瓦~~1933年密谋事件”后失去了它最优秀、最理性的代表。因此，在这场政变失败以及随之而进行的迫害之后，实现以“普鲁士名义”为象征的那种理想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普鲁士的纪律”、“普鲁士的法制性”、“普鲁士的道德”、普鲁士的非自由民主性，当然还有普鲁士传统中的那种“人性”与“博爱”，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瓦~~1933年密谋事件”中达到了它最后的高潮，也发出了它最为惨淡的光芒。这个过去在德国传统政治中一直起着重要支配作用的贵族军官团，这朵“容克之花”终于在希特勒的手中成为了一朵“死亡之花”，从而也使得这个社会向传统专制独裁的德皇帝制的退却之路实际上已被完全封死了。容克贵族们向往的那种旧式传统政权统治下的社会，在道德上可能会是一个比纳粹政权下人道得多的社会，但是，它的“起义”失败了，因此，德意志社会通向现代性的这条更为扭曲、更为野蛮残忍、更为冷酷无情的“暴力现代化”道路，也就不可抑制地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失败中走向一个全面毁灭的终点。

第四节 对纳粹运动的总结

纳粹运动作为德意志社会中那场由来已久的反启蒙主义、反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体现了一场激进性的新高潮和一场大

众化运动的新开端，它首先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间层，对一场猛烈的、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承受不起的现代化危机后果的激进反叛。德意志的中间等级正是这场运动真实的社会基础。

纳粹运动具有毁灭力的“军事民族共同体”理想，就是企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精神和秩序——“~~民族~~源年精神”和“城堡和平”——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来推行。这种制度强调的是通过“克服”阶级对立，来达到极权独裁和“一致对外”。在经历了魏玛时代的那场现代化全面危机后，这种“共同体”理想，本身也反映了德意志社会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识和精神上的需要，希特勒不过向人们提供了这种需要的“合理证明”罢了。

作为纳粹运动的“元首”，希特勒惟一的“魅力”仅在于他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愿保持沉默，因而在政治行动上发出清晰声响的社会心理状态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在政治实践中那种极不健康的“不容异端的民族感”的代表人物。尽管并不是每一位追随者都因为首先赞同希特勒的所有反动纲领，然后才成为这场运动的追随者的，但是希特勒所鼓吹的“健康的民族感”，无疑正是他与追随者之间联系的真正醇酶！

从意识形态上讲，纳粹运动是一场反现代主义运动。在纳粹主义者看来，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共戴天之敌。他们鼓吹的是：用“共同体”来“克服”阶级对立，用“本能”来反对“理智”，用“有组织的划一化”来对抗“反差”，用“种族”来反对“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他们是将现代艺术、现代音乐、现代文学、现代教育、妇女解放以及犹太人等，都作为现代化的体现物来加以坚决反对的。

这种反现代主义与传统权力精英们对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批评相比，则是更为激进的。它强调的是个体必须对超级权力绝对屈从，同时也是以消灭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为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它追求的绝不是一种对传统专制权威统治的威廉帝制简单的复辟，而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它涉及的是一场向史前远古时代的彻底

倒退，涉及的是对“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元首”的狂热崇拜，种族化的暴力与战争，铲草除根式的灭绝，“生存空间”的夺取，“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民族主义的生物化理论和反基督传统。总之，它意味着一场激进的毁灭与灾难。所有这些，正是通过希特勒第三帝国法西斯极权独裁恐怖专政的建立，通过暴力扩张走向毁灭的道路来证实的。

但是，纳粹运动从它的动力源、它的风格、它所选择的手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上讲，同时也体现为一场似非而是的“超现代化运动”。生机勃勃的年轻人、雷厉风行的行动主义、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都属于它的现代化风格。对技术、生产率、行动效率无止境的追求，垄断资本的高效运用，直到最高的“闪电式”战争手段，从效果上讲，都在使这个社会不断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纳粹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思想意识中反现代主义的远古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偏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却在这个时代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了。

人们必须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魏玛共和国向世界市场冲击的失败，因而在那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年代里，德意志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不能真实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工业化社会。那种与现实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称的反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通过来自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者悲观主义的“文化批评”，通过陷入破产之中的经济中间层对未来的绝望情绪，通过乡村居民对那种带有严重负面效应的社会进步的敌意来标志的。他们反对“都市化”，反对“出生率下降”，反对他们认为是“过分的、应对一切灾难负责的工业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最后才会相信纳粹运动是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它才可以控制正在改变一切、摧毁一切的技术和结构变化的力量。然而，小资产者群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渴望稳定与和谐的心情，与纳粹暴政之下的日常经济现实并不一致。

希特勒总是大谈“用乡村来反对大城市”，大谈造就一个“农夫与武士”的“理想社会”，大谈妇女们“不仅要为帝国而死，而且要为帝国而生”，而且这种典型的向远古倒退的反现代主义口

号，本身就是乡镇、地方居民群众受到纳粹主义吸引的原因之一。但恰恰相反的是，在过去的德意志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时代，其经济增长之快和结构变化之大，超过了纳粹统治的 14 年年代的。如果人们用“经济奇迹”的字眼，来形容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复兴阶段”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纳粹统治下也曾出现过一场“经济奇迹”，只不过这场“经济奇迹”是与一场“暴力现代化”进程的毁灭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却给纳粹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多重复杂的社会效果。

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实现最终夺取世界霸权的远程目标，希特勒将整个国民经济全面转入了战争经济轨道。这种战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战场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从战场上掠夺别国财富，才是这种经济不断增长和发展的真正推动力。但是，生产杀人武器的过程，作为一种工业生产过程，不仅对生产者个人来说，而且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说，本身是与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一样的。因而在这场“军事工业化”浪潮中，军火工业的繁荣，很快就使纳粹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并感到了劳动力的奇缺。这不仅导致了大量战俘和“外籍劳工”的残酷使用，而且也导致了德意志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因此，这个时代并没有使德意志更加乡村化，而是使更多的农村居民成为了城市居民，更多的农田变成了工厂，更多的乡村成为了城市。总之，它带来了更加的大都市化和高工业化。

纳粹党尽管是一个以中间等级为核心的政党，但是，它并没有真实地照顾到中间等级的利益，相反，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了。也就是说，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尽管是作为政权工具出现的，但他们通过与纳粹新权力的勾结，通过为战争目标的服务，不仅使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法西斯极权独裁体制中找到了一种继续维持下去的形式，而且也使之暂时获得了发展。独立经营者的数量倒是变得更少了，因为独立经营者的弱小资本，不可能承担起军火工业生产的重担，因而也必须让道。但是，由于这种战争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从独立经营者地位中沉沦下去的人，还是从乡

村流入城市的人，都因为这些掠夺来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一时使他们个人因经济结构变化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反而变小了，因而也普遍地变得更容易理解工业化社会了。

纳粹政权为了人口政策上的目标，在意识形态上是坚决反对妇女解放的。但是，劳动力的缺乏使得仅仅从 1938 年至 1945 年妇女就业人数就增加了 1500 万，更不要说在战争末期，当壮年的男性都被驱向战场时，这个政权只能将更多的妇女赶到男性留下的工作岗位上了。因此，也正是在纳粹时代，更多的德意志妇女成为了有熟练技能、也是能操作最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劳动力。由此可见，纳粹侵略战争在经济上的需要，恰恰带来了与意识形态目标完全相反的效应。

与此同时，纳粹主义的远古精英意识和概念，首先是针对传统和现实中的精英们的。在那场“一体化”的运动中，德意志传统的机构，如邦国结构与地方势力、司法系统与文官机构、大学与教会都遭到了破坏、削弱和瓦解，所有旧式的传统精英和当权人物，如贵族军官团、垄断资本家、技术专家、教授、神职人员都受到了遏制。他们都只能作为纳粹政权有用的工具，而不能像共和国时代那样作为完全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力量而继续存在了。他们那种通过与希特勒联盟来保全自身原有独立地位的希望，证明是虚幻的。事实上，他们早在《授权法》通过以后，就开始遭到罢免了。这是因为希特勒若不扫除这些传统和现实中的障碍，就无法贯彻他个人实行全面独裁的法西斯极权统治，也就无法使这个民族达到真正的整体性战争动员去夺取“生存空间”。

在这样一场工具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希特勒之流是从不想要什么现代公民的平等权力的，但是，群众司法中的“人民法庭”，平民百姓的“大众汽车”，社会崛起者在政党和军队中的“新地位”，“人民之声电台”，“大众旅游”，“普遍的国家青年运动”，所有这些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在实践中对“人民”、“民族伙伴”角色概念的拔高，都使这个社会的能动性和流动性猛然增大了。因而正是在对这位高高在上的“卡里斯玛式的元首”狂热崇拜与迷信的前

提之下，这个社会进行着一场“民族同种性”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平整化。总之，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时代中的哪场运动，能像纳粹运动那样，对传统的等级秩序和结构发动如此猛烈的直接冲击和残酷无情的公开破坏了。

不可否认，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一场向远古倒退的反民主、同时也是反传统的“褐色”的“激进”反革命。这场反革命，并不是反对革命方式（~~运动或革命~~）的反革命，不是对革命进程只起阻碍作用的反革命（~~运动或革命~~），而是利用所谓“革命”方式进行的发展方位上完全相反的反革命（~~运动或革命~~）。也就是说，尽管这场反革命本身是反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所有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成果的，但它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暴力方式，来达到这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

在这里，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手段上的现代化与“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之间的特别联系，而且也正是这种联系，才给德意志社会带来了一种极为扭曲的现代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当纳粹主义者要想从传统的抑制之下挣脱出来，要想征服工业化时代的民众以及国内外一切对手，并在 20 世纪里向远古倒退的时候，是必须使用最现实主义的、最现代化的 20 世纪手段的。这种手段上的现代化与目标上的反现代主义尽管是相矛盾的，但手段赢得了优先权！这样，由手段所带来的这种最激进的现代化效果，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反而变得可以被这个社会容忍了。正因为如此，这场反现代主义的反革命目标与手段的现代化“革命”，达成了它们奇特而反常的结合。正因为如此，纳粹法西斯主义动员起来的所有力量，以及它所贯彻的极权独裁的“一体化”意志，必然摧垮传统的抵抗，并由此而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更为扭曲发展的、似非而是的现代性。

在这种现代性中，固然这个社会离传统更加遥远了，在组织与技术方面也更为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社会也恰恰因此而变得更为反动了。因为这场纳粹运动的生命力，本身得依赖于这个反现代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在空间上不停顿地向外作暴力式扩展，而这

恰恰反映出这个社会内部已无力平衡地发展现代化的绝望，因而在时间上，只能导致这个民族在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对抗中命中注定的失败。因此，它也只能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终带来一种致命性的异化效果，一种痛苦不堪的毁灭性效果。

三个因素——反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激进”化，以及这种似非而是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讲，是有助于解释纳粹主义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毁灭性总体效应的。纳粹主义是对那种陷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回答。纳粹政权及其运动一方面许诺了在变化、冲突、异化面前的虚伪保障；另一方面，也公开表达了对现代化的生产、效率、科技手段，以及战争“闪电式”效果的社会赞扬。它用民族主义的恶性变种——种族主义——与世纪式的德意志小市民的“社会主义”，去糅合、弥补、调和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去促成它自身意志的合法性。它是德国科学、技术、管理、组织现代化的成功与政治、社会现代化失败的混合物，一场真正的“暴力现代化”。纳粹政权正是用这场“暴力现代化”作为克服工业化所引发的全面危机的手段。当然，这不仅不可能解决德国的危机，反而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转变成一场威胁全人类的战争灾难，并最终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惟一值得安慰的是，纳粹暴政所带来的全面毁灭效应，反而使二战后对这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变得更为容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人，的确得到了一个远比自俾斯麦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好的走向现代性的新选择机会。这个新选择机会首先是由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提供的。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权力生涯丝毫没有提高，恰恰相反而是极大地降低了人类文明的条件。在 12 年极权独裁的统治中，他窒息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非纳粹主义思想，也导致了一场对传统不加区别的、粗暴野蛮的破坏，并痛苦而真实地改变了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由于希特勒破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没有给战后的德意志人民留下任何可以加以修补和建筑的东西。因此，从建立未来的政

治制度上讲，这个“暴力现代化”的帝国，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政治上的抵押品，未来的德意志人将从“零”开始。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个民族的政治家们能像二战后的德意志政治家们那样，能够在几乎没有什么传统政治制度残留物的情况下去建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

当然，二战后的德意志人是以民族分裂为代价，来换取这种现代性的新建机会的，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冷酷、灰色的黎明时分，带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和失败的重负，再度踏上了现代化征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失去指导的，因为希特勒帝国的毁灭，不仅给德意志人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而且也留给了帮助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恐怖性回忆。或许，这正是德意志过去 20 年的民族统一史留给整个德意志民族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第六章

现代化进程的新起步

第一节 摇从“非纳粹化”到“民主化”

一、新起步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给这个世界以及它自身所带来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当纳粹德国于 1939 年 9 月点燃的战争之火燃烧了六年之后熄灭时，仅在欧洲就已有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 1000 万士兵和 1000 万平民遭到了屠杀。这场战争不仅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片废墟，而且也给战后德意志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纵火者”自身的报复是彻底的，第三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宣告了普鲁士—德意志大国时代的结束。这个普鲁士—德意志大国是由容克贵族的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于 1871 年通过王朝统一战争建立起来的。正是这个大国的出现，才实现了欧洲大陆霸权从法国到德国的转移，并在 1918 年

年以前的帝国主义时代中一直维持着“小德意志统一”。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俾斯麦的后继者们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尔后又发动了新的世界大战。在第二次冒险失败之后，这个遗留下来的民族国家，现在已在希特勒的“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大国，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中毁灭了。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德国解体了：它东部领土的一部分划归苏联，一部分划归波兰，剩余的版图被苏、美、英、法四大国占领，连首都柏林也处于四大国的共管之下。

第三帝国的灭亡也给德意志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后果，这个社会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已荡然无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普鲁士容克贵族集团一直是德意志社会传统的统治力量，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产是他们牢固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集团在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在政治统治中顽固地维护着传统的等级特权。正是这个集团垄断着德国国防军输送军官的权力，并操纵了威廉时代的政治。也正是这个集团尽一切可能缩短魏玛民主制的寿命，并将希特勒法西斯扶上了台。但是，两场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在 1918—1933 年的魏玛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这个传统的权力精英集团，以及它的文官、司法系统，连同它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都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而在纳粹时代，这个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已在希特勒对“苑月 14 日密谋事件”的血腥报复中丧了命，所剩的少数成员，最后也在 1945 年战争炮火的荡涤之下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如果说希特勒“毁灭性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在民主德国和波兰人民民主政权没收容克大地产的运动中，容克贵族在易北河以东的物质基础也丧失殆尽。逃往西部的少数幸存下来的容克贵族成员，已失去了庄园，贫困潦倒，在社会上毫无势力了。

与容克势力的毁灭联系在一起，是德国军国主义的瓦解。自 1871 年俾斯麦立国以来，德国统治阶级一直鼓吹着“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以至于德国成为了一个军事强权国家。军队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皇帝的宫廷排列中，连少尉

也是排在议员前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手中仍拥有武器的德国军队撤回到国内时，曾受到老百姓兴高采烈的欢迎，就好像他们是从战场上凯旋一样。这为兴登堡、鲁登道夫以及希特勒之流关于德军的失败是由于所谓“背后有人捅刀子”的理论提供了市场。将军事失败的责任推到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身上，来安慰德意志受到挫伤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了魏玛时代反民主主义势力有效的阴谋诡计。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再也不可能重演了。德军无条件投降，缘因万士兵阵亡，缘因万士兵被关进战俘营，军火工业全面瘫痪，现代化武器尽数落到盟军手中，所有的军事设施全被摧毁。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里，德意志民族就已接连挑起、又连连打输了两场世界大战，彻底的失败迫使这个民族不能不去进行深刻的反省。统治阶级长期向整个民族灌输的那种“靠发动战争来谋生和证明他们有理由以此作为德国人存在于世”的传统思想顷刻瓦解了。“在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以穿军装而自豪的人了”^①。

与此同时，希特勒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希特勒曾向德国人民许下过无数诺言，只有这一条是兑现了的：“如果我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便拖着德国人民一起跳进失败的深渊！”^②当盟国军队占领德国时，在战争留下的瓦砾中，只有千百万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的男女。他们在二战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位，只不过是剥夺了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利，同时也几乎失去了一切财产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罢了。随着希特勒的自杀，再也没有人相信什么“条顿种族高人一等，命中注定要主宰欧洲”的“超人种族理论”了。纳粹国家给德国人民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从而也永久性地失去了它旧日的权威。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这样写道：“使希特勒万劫不复的是他

① 马丁·布罗斯查特、克劳斯—迪特玛·亨克尔、汉斯·沃勒尔：《从斯大林格勒到货币改革》，慕尼黑 1963 年版，第 125 页。

②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5 页。

使本国人民陷入的境地。凡是能迅速地宣布同他的遗产不发生关系的人都这样做了，那些细看起来无法这样做的人也这样做了。”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冯·克洛克科夫则这样讲道：“在这个时刻，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就是：仿佛除了希特勒以外，过去谁都不是纳粹主义者一样。”^①

当德意志社会上最为反动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这块土地不仅变得更为肥沃，而且也随之埋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种子。但是，变革的种子要破土而出，是需要特定的国际环境的，而这样的国际环境，恰恰由于这场世界大战的结果而造就了。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结束了德国的旧时代，而且也迎来了欧洲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作为国际政治上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欧洲的主宰地位，以及它内部的国家体系已经崩溃。自 15 世纪以来，欧洲的这种统治地位是由西欧各列强国家在向全球进行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上建立起来的。而它的内部冲突，过去一直是依靠它的列强成员的“现代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霸权倾向构成的平衡，也是依靠欧洲自身的力量来避免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旧有的欧洲国家体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它的结果，已经无情地粉碎了维持旧体系的一切幻想，并最终证明了这种旧体系正是体系自身毁灭的重要根源。

在旧欧洲主宰地位丧失和旧国家体系崩溃的同时，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国与欧洲—亚洲的苏联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旧欧洲崩溃留下的废墟已成为苏、美两个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竞争以及强权政治角逐的场所。正如斯大林于 1945 年春所讲的那样：“这场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了一块地方，谁就有义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制度，不可能有别的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06—1918》，汉堡 1920 年版，第 122 页。

作法。”^① 随着东、西方“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友关系演变成“冷战”对手关系，新的世界均势形成了。苏、美两大阵营的对峙，取代了旧有的欧洲国家体系和世界格局，国际政治集团化的倾向，取代了欧洲的民族化倾向。在苏、美对抗时代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都不可能脱离这个新的苏、美两极世界体系而各行其是。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德意志人将如何克服它的过去呢？他们将如何回答关于政治民主这个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老问题呢？他们将遵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原则来作为这个社会的支撑点呢？他们又将如何开始这个民族的第二次工业化呢？对这些问题，由于苏、美两极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德国的分裂，在当时是有两种答案的，即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两个既有共同基础、又是不同道路的答案。由于 1990 年以后的德国重新统一是在联邦德国的基础上获得的，因此，我们将对德意志现代化新进程的注意力集中到西德意志地区的战后新建上。^②

二、盟国的对德改造政策

德国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里就接连发动两场世界大战，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使得防止德意志向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归，保证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世界和平不再受到可能的威胁变得十分必要。因此，在战争胜利在望的 1945 年 6 月，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一致认为，至少在一个过

① 米洛凡·迪基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法兰克福 1952 年版，第 307 页。

② 西德意志地区于 1945 年 5 月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此时统称为“西部占领区”。1946 年 12 月美、英占领区合并为联合经济区，也称为“双占区”，1948 年 1 月法国占领区也加入进来，在此基础上，1949 年 9 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在“东部占领区”也即苏联占领区，1949 年 10 月成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1990 年 10 月两个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渡时期里，对德国实行占领式的国际管制是绝对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公报宣称：

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意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意志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生活以及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希望。^①

显然，彻底铲除纳粹主义，防止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成为战胜国一致的对德政策的核心。

在欧战结束后的 1945 年 7 月至 8 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尽管苏、美、英三大国在关于战后安排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但他们仍然进一步确立了盟国一致的对德国进行改造的“四化方针”，即著名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② 这同时也成为战胜国在各自占领区内推行所有措施的基础点和政策框架。

“非军事化”随着德军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实际上已大体实现了。因此，在对德意志社会进行政治改造方面，“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自然成为占领国家必须贯彻的主要方针。尽管在“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盟国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它们还是达成了一致，即在没有任何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种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它们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魏玛民主制

① 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04 页。

② 恩斯特·多伊尔莱因：《波茨坦，1945 年》，慕尼黑 1959 年版，第 10 页。

度，最后是如何“选”出了希特勒这个法西斯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同时，由于纳粹统治并不是依靠德意志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而仅仅是靠了盟国的军事成就才被推翻的，因此，东、西方盟国一致认为，对旧政权的清算不能由德意志人自己而只能由盟国占领当局来进行。

但是，在组织一个统一的管制德国的中央政府问题上，苏、美、英、法四大国无法达成真正的一致，这里除了有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因素外，还因为西方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歧，因此，事实上有影响的决策职能，也就转移到各占领区军政府的头上了。这不仅导致了占领区的地区化，从而使德国的东、西部分裂势所难免，而且也影响到“非纳粹化”在西部各占领区的实际贯彻措施和程度迥然有别。

法国认为，“非纳粹化”就是非普鲁士化。“普鲁士，它最危险地体现在希特勒身上，在丧失了它的领土基础之后，也就再也不能施加同样的精神和影响了。”^① 法国支持肢解东普鲁士，以及要求对普鲁士的莱茵省鲁尔区实行国际管制，都出于这种理解。同时，法国认为对人的清洗仅仅具有辅助性的作用，因此，英国在清洗上，将目标一般只对准罪大恶极者。

英国认为：“非纳粹化”实质上是一项司法程序。^② 因此，英国寻找和惩办的是那些法律上公认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并在对这些罪犯起诉和定罪时，总是尽可能地运用德国的刑事法。总之，英国设法审讯的不是所有的纳粹官员，而是那些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以及领导核心集团成员。

在西方占领国中，最彻底贯彻“非纳粹化”的，是战后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早在战争还在进行的 1945 年 1 月，罗斯

① 尤斯图斯·菲尔斯滕瑙：《非纳粹化》，弗赖堡 1953 年版，第 155 页。

②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6 页。

福就在一份关于美国战争目标的备忘录中指出：“必须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记住，这整个民族卷入了一场狂放不羁的反对现代文明法规的阴谋。”^①而且美国公众舆论中出现了这种倾向：“不仅仅是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还有那些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要对侵略战争，非人道的暴行和世界的苦难负责。”^②但在关于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以财政部长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民族—自由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德意志人的本质特点。由于大部分的德意志人都参与了纳粹暴行，因此应该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德意志人”。他们主张将占领部队的责任限制在纯粹消极的管理上，主张“将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他们认为：“在它的政治和经济潜力丧失之后，德国，作为一个由大国集体保证的国际秩序中的和平破坏者，应被抹掉，因为根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德国。”^③在这种设计中，未来的法国，应成为美国稳定政策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应在为美国战前的国际经济关系开拓新发展余地的总方向上，来解决德国问题。为达此目的，他们在将纳粹主义解释为一种“集体犯罪现象”的同时，没有忘记将一个“极权主义独裁式的犯罪领导层”与“另一个德国”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这‘另一个德国’能够在魏玛民主传统和这个民族的‘民主人士’中得到体现。如果将纳粹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者这些‘篡权因素’从德意志上层中扫除掉，其余的德意志人应能被免于惩罚。为了欧洲未来的权力新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稳定化，德国仍可以被作为反苏势力的桥头堡而被保存下来，并使之从

①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尔：《魏玛共和国以来的德国历史》，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94 页。

②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 1954 年版，第 154 页。

③ 恩斯特·多伊尔莱因：《现代德意志史，从俾斯麦下台到现在》第 3 卷（1918—1933），康斯坦茨 1954 年版，第 154 页。

政治上与西方合为一体”。^①

由于摩根索与罗斯福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更由于罗斯福对未来抱有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维持世界和平的打算，因此，在对这两种计划的妥协方案中，罗斯福是偏重摩根索方案的。在1945年9月14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在最后粉碎日本的顽抗上，美国仍盼望苏联的合作；另一方面，在欧战结束之际，美、苏之间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必然发生的对立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杜鲁门政府仍在贯彻罗斯福的意图。这样一来，主张严惩德国的摩根索方案的思想便体现在1945年9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给美国占领部队的《1号指令》中。这份指令的开头这样宣布：摇摇摇

必须使德意志人明白，对德国的占领不是为了解放它的目的，而是为了征服这个被打败的敌国才进行的。^②

尽管德意志的反纳粹人士在盟国攻入德国之际就已开始组织、重建自己的政党，并开展起反纳粹的自发行动，但是，根据《1号指令》，美国占领当局从一开始就是禁止占领部队与任何德意志人进行合作的，同时也是禁止任何德意志政党活动的，这也影响到了英、法占领部队的态度。因此，“非纳粹化”运动，在盟国实施对德占领时，是带着摩根索方案的特点开始的。

三、“非纳粹化”运动及其意义

“非纳粹化”运动第一阶段的高潮是1945年11月14日开始的

①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66年版，第137页。

②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66年版，第137页。

“纽伦堡审判”。作为对纳粹旧政权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清算，国际军事法庭对犯有“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和“反和平阴谋罪行”的 22 名被告进行了公审。他们是首批被逮捕的第三帝国政府成员，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成员，纳粹党政治领导集团成员，地方组织的骨干分子，盖世太保、党卫队、冲锋队上层人员，纳粹任命的市长，以及在工业、贸易、农业、财政方面的所有领导人。其中 10 人被判处死刑，12 人立即执行。同时，“纽伦堡审判”决定性地影响到了“非纳粹化”的进程，它强调了这种现代法治思想：“个人必须对他在尽职中和执行命令过程中造成的对法律的违反负个人责任。犯罪是个人的事，对集体的惩办应该避免。”^①

但是，为了贯彻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要将 800 万纳粹党员作为犯罪嫌疑犯逐个进行审理，是一项十分棘手而又十分繁重的工作，因为这种嫌疑犯仅在美占区的 1 亿 4 千万人口中就占 10%，即 1400 万人！这自然远远超出了美占领当局所能胜任的审理能力，因为单就美军中懂德文的人数量极少这一点，就使仅靠占领当局来完成这种审理程序得花 10 年时间！美国占领当局终于认识到：“必须将由胜利者来进行的对德意志人的个人清洗，变成一种德意志人自我清洗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非纳粹化”问题上，应允许与德意志抵抗运动成员、有流亡经历的民主人士、“历史清白者”、政治上“无负担者”进行合作。正因为如此，德意志人才不再仅仅被作为清洗对象来看待了。1945 年 12 月 16 日，美占领区颁布了《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脱出来的法律》，并成立了有德意志民主人士参加的“解脱局”，这标志着“非纳粹化”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为了处理 1400 万案例，仅美占领区就设立了 1000 多个法庭，招聘“信得过”的德意志人达 100 万人，并将嫌疑犯分为五类，即主犯、

^①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 1956 年版，第 100 页。

罪犯、从犯、追随者、无罪者进行审理。占领当局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唯有无罪者才能获得食品供应卡和正当的就业机会。由于美国在战后的政治影响，这种处理方式也迅速推广到英、法占领区。当1946年10月第二阶段结束时，西部三个占领区中有150万人被定为主犯，150万人被定为罪犯，150万人被定为从犯，150万人被定为追随者，150万人被定为无罪者。^①

第二阶段的结束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东、西方冲突的加剧，美国战略的转变所导致的。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相联系，美、苏之间在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反希特勒大同盟”彻底瓦解。1946年10月，杜鲁门“遏制共产主义政策”，即“冷战”政策的出笼，12月“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宣布，标志着欧洲大陆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趋势已成定局。美国决心推行一项大规模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社会政治稳定化的纲领，这里面也包括了要对德国西部进行经济和政治重建的方案。因此，1946年12月，以“史汀生计划”为基础的《1946年12月指令》取代了《1946年10月指令》，从而使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获得了比单纯的“非纳粹化”更多的优先权。美国现在的目标就是将德国西部纳入自己对抗东方阵营的战略轨道，使它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得力帮手。

因此，到了1946年10月，西方占领国已决定将“非纳粹化”的任务完全交由德意志人自己来处理，这标志着“非纳粹化”运动第三阶段的开始。在惩办了罪大恶极的罪犯后，德意志“解脱局”负责人并不想对剩下的那些“小党员”和“追随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希特勒极权独裁完全是强制性地个人本身与纳粹国家和政党牵连在一起的，这些小人物对纳粹政治的依从，在那个时代里是一种“正常现象”，因此，他们采取了宽大政策。结果，这场“非纳粹化”运动最后经联邦德国议会于1951年10月15日

^① 尤斯图斯·菲尔斯滕瑙：《非纳粹化》，弗赖堡1953年版，第100页。

所通过的法律，宣布在整个西部地区结束。

西部占领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是战后铲除德国纳粹主义完全必要的尝试，它对西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新起步，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这场运动中贯彻的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精神，相对于希特勒极权独裁、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鲜明的现代性毋庸置疑，它在推动德意志政治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上的进步性，也同样毋庸置疑。如果说，在战争结束之际，广大德意志民众还只是因为希特勒政权给他们造成了困境，因而才使纳粹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权威的话，那么，通过这场对旧政权的清算，通过对罪犯的确认和惩办，通过对纳粹屠杀近四百万犹太人以及邻国数千万无辜者的令人毛骨悚然之罪行的揭露与控诉，迫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自我反思，迫使他们在西方国家强制实行的“再教育”的道路上，不能不为所有这些以整个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赎罪。这种整个民族自我批判式的反思运动，恰恰是日本——这个过去的东方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所从来都没有彻底进行过的。

通过对法西斯极权独裁政府仇视人类的极其反动本质的揭露，“非纳粹化”运动也第一次真正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统治阶级一再向这个民族的人民灌输的那种所谓“独裁国家是人类最高成就”的反动思想，使这个民族的人民终于认识到，德国历代专制、独裁国家的虚假面纱，都不过是将它们自身打扮成合法政府的一种装饰。因此，“非纳粹化”运动为在德意志社会和政治思想上扫除专制、独裁主义，扫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作出了贡献。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民主制度是难以在西德意志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来的。

“非纳粹化”运动取缔了纳粹党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部门和组织，废除了一切纳粹法律，逮捕法办了纳粹头目和战争罪犯以及支持纳粹的得力人物，并将一切罪大恶极的纳粹党徒从社会各级部门中清除了出去。这样，他们在西德意志社会各领域中留下的位置，只能由德意志的民主力量来填充，否则占领统治的机器就无法正常

运转。因此，从允许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参与“非纳粹化”运动开始，占领国家便加快了西部占领区的民主建设，并允许各民主政党正式建立和公开活动了。这样，到 1947 年 4 月第二阶段结束时，西德意志地区的乡、镇、县、市、邦，直到各占领区的各级议会选举已经完成，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各占领区政府也建立起来了。这就为英、美“双占区”，最后是英、美、法“三占区”的合并作好了准备。因此，“非纳粹化”运动实际上为西部占领区的民主政党逐渐接管国家权力创造了机会。

“非纳粹化”的原则也贯彻到战后西部占领区民主制度设计的工作之中。鉴于魏玛时代曾出现过希特勒式的“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教训，西德意志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政治上的明智措施来防止纳粹主义的复辟，必须用更为周密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制的有效而正常的运转，这正是 1949 年 9 月 20 日为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通过的《基本法》与过去的《魏玛宪法》的重要区别。《基本法》宣布了永远取缔纳粹党，剥夺它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通过议会竞选夺权的合法性。同时，该法废除了国家大事通过“公民投票表决原则”，从而也剥夺了纳粹复辟势力利用这一原则来进行反民主煽动和示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基本法》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曾授予总统的独裁式的潜在权力，这种权力设置上的漏洞，曾允许总统在“非常时期”，在没有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任命总理来维持统治。^① 1933 年，并没有赢得议会绝对多数支持的希特勒纳粹党，正是靠容克贵族、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兴登堡总统根据这项法律扶上台的。而在《基本法》中，总统只有荣誉上的意义，同时也规定了必须由议会多数选出并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内阁制”。这样，西方民主议会制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德意志历史上终于第一次真正确立了。

因此，通过这场“非纳粹化”运动，这个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① 戈尔德·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33》，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4 页。

进程再也不可阻挡了。联邦德国不仅完全承认了“国家公民”的法律地位，而且对所有国民平等的基本法定地位的贯彻也是真实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性，也不再像魏玛时代那样仅仅具有纯粹的信条和教义上的意义了。通过《基本法》所肯定的“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形式，“国家公民”已取代了纳粹时代“民族伙伴”的地位。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正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德国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崩溃，战后西方盟国进行的“非纳粹化”政治清洗运动，以及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替代了德意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从魏玛年那场德意志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独裁传统的任务，在迟到了整整 16 年后，在 1949 年终于完成了。

第二节 摇从纳粹“统制经济体制” 摇摇摇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意志的经济形势一团糟。工业总生产能力的 30% 以上已被战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已倒退到 1913 年的 1/3 的水平。^① 最重要的铁路、隧道和桥梁都被炸毁，食品的日常消费已降到人均每日不足 1500 卡路里的水平。寒冷比饥饿的影响更为严重，可供给德意志人的家用燃料——煤——下降到战前大约 1/3 的水平。住房的三分之一已被完全摧毁，还有 1/3 遭到了严重破坏。上千万东德意志难民涌入西部，占了西德意志人口的 1/3。^② 总之，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① 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 1953 年版，第 105 页。

② 吕迪格尔·冯·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100 页。

在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工业化”计划中，不仅规定了要对未遭战火摧毁的德国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拆除以充赔款，而且还规定德国未来的钢铁生产不得超过 1000 万吨，工业应降到 1918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最低谷的水平。其中汽车工业要降至 10%，机械制造要降至 15%，重型机床要降至 10%，不仅禁止任何武器生产，而且连滚珠、轴承、拖拉机、铝、镁、无线电通讯器材、远洋船只和民用飞机的生产，都在禁止之列。^①说到底，所谓“非工业化”计划，就是要将德国变成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要特点的国家。由于这一计划，德意志人的确是食不裹腹，疲惫不堪，前景暗淡。摇摇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社会混乱和物品短缺，占领国保持了纳粹政权的“统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本身是专门为战争设计的，它的特点就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前提下，食品、衣物凭票供应，全部原料和生产资料实行管制，生产有规定，销售有义务，冻结价格和工资，以及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管理。由于纳粹国家是靠债务来支撑战争的，滥发纸币已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帝国马克已形同废纸。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以战养战”的经济体制早已完全失灵，它的继续保留，也就逼着人们无视它的规章。黑市和腐败不断滋生，并吞没了伦理道德。美国香烟成为了商品的媒介物，而这种“香烟经济”对劳动成果与报酬之间关系的扭曲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着 1945 年“冷战”的爆发，从经济上确保政治伙伴的地位，成为了美国对抗东方阵营新战略的必然措施。1947 年 4 月，为实施《欧洲复兴纲领》，美国国会批准了在四年半时间里向西欧提供 130 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由于德国在和平时代曾向欧洲提供过高质量的工业品，更由于一道正在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分界线，正是从它的领土的正中央划开来的，甚至是从它的老首都柏林的正中央划开来的，因此，西部占领区就成为了欧洲战后经济重

^① 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 1953 年汉文版，第 103 页。

建的关键性角色。这样,美国将被战胜的敌国变成未来盟友的工作开始了。

美国依靠它未受损伤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早已获得了西方盟国对西部占领统治中在经济政策上的决定权,而美国新的世界战略,也更为迅速地改变了西部各占领区的独立化倾向。1945年 12月,美、英占区合并为联合经济区,即“双占区”(法占区在 1946年 1月最后加入进来)。1945年 12月,以“史汀生计划”为基础的《1945年 12月指令》宣称:“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快地建设一种能养活自己的德意志经济为目标。”这是允许废止纳粹“统制经济体制”的信号。但同时它也声称:“直到对德意志的中央政府的形成和权力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德意志人不得赞成涉及到一种公共财产权力方面的措施。”^①这实际上是美国凭借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首先否定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在德国西部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就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的经济改造方案的实施开辟了道路。

“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统治的灾难后,又面临着东方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之下,为维护西方民主制和私人财产占有制才产生出来的。这些“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看出,“如果西方的民主主义者不想在面临共产主义的挑战面前再失去他们的地盘,就必须整顿他们的世界”^②。同时,他们在对 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纳粹主义上台的关系的回顾中认识到:“巩固民主制度必须有发达的经济来作保证,魏玛民主制的历史已证明了贫穷、失败只会是纳粹主义的滋生地。要防止纳粹主义的复活,仅有一种法律上的民主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制度必须与大

^①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 1945年版,第 152页。

^② 海因茨·迪特利希·奥尔特利布:《社会主义的变化》,汉堡 1945年版,第 120页。

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相联系。”^①而且，他们对酿成 1929 年代大危机并在魏玛时代充分实施过的“古典式的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将它称为“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

这种资本主义，先是听任各个市场的参加者围绕着竞争原则去彼此斗争，后又通过私人卡特化，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经济上具有垄断性的专权。特别是当这些私人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勾结在一起时，也就彻底破坏了竞争原则并造成了市场自动机制的失效，从而形成了经济和社会上强烈的依附关系，造成了大众财产上的丧失和无产阶级化，最后导致的就是纳粹主义的极权统治以及自由民主结构的解体。^②

因此，在由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结构的转变中，这些“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抛弃魏玛时代的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代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力图在国家干预的控制性经济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妥协。在这里，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仍是这一制度的原则，但同时也赋予了国家一种强烈的作用，即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作出决策，而国家则可通过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整体。国家对市场中的获利者实行严格的累进税制，并通过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国民个人收入的再分配，以期达到一种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的结合，从而为战后德国西部的民主制

① 海因茨·迪特利希·奥尔特利布：《社会主义的变化》，汉堡 1957 年版，第 207 页。

② 恩斯特·沃尔拉姆·迪尔：《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与目标》，温特图尔 1957 年版，第 207 页。

度寻找一条出路。可见，“社会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前提下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

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变成一种具体的经济制度，是在路德维希·艾哈德于 1949 年 9 月出任“双占区”经济部长，继而在 1951 年 1 月出任联邦德国国家首任经济部长的漫长任期内完成的。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给联邦德国带来了经济制度方面的新面貌，而这些新面貌在德国过去 100 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从 1948 年 8 月 1 日的货币改革开始的。货币改革不仅一夜之间使“新德国马克”在整个西部地区成为了惟一有力的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对西部社会的贫富差别产生了巨大的缓解作用，而这种缓解作用本身就是战后西部社会发展的一个条件。

众所周知，在战后初期，占人口总数 1/3 的上千万东德意志难民，在向西部的艰难迁徙中已经两手空空，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的界限已相当模糊了。而西部的工业设施也被盟国飞机摧毁了一半以上，已经导致了大量企业家的破产，剩下的工厂中也有很大部分，或是作为大垄断巨头的财产被盟国没收和分解，或是由于“非工业化”计划而被拆除。因此，西部的贫富差别所产生的对立也得到了相应缓解。但是，仍有许多资本家通过战争还保存着巨大的纸面财富。而货币改革的头一个步骤，就是西占区每个公民头一个月只能领取 10 马克的“人头钱”，第二个月再加 10 马克，其余所有的债券、存款以后均按 1 旧帝国马克比 1 新马克的比率兑换，这就将这笔纸面财富的 99%，即价值 100 亿帝国马克的财产剥夺殆尽。^① 因此，“也使得 1948 年以后，每个西德意志人所有的相同出发条件的单一状况，进一步地固定下来了，每个人都不得

^① 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 1955 年版，第 100 页。

不以 100 马克（两个月后就是 200 马克）的‘赏格’着手经营”^①。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防止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个社会在面临战后这场经济新建的挑战与机遇时，它恰恰弥补了自从 1806 年普鲁士改革以来德意志社会所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这场 1949 年后开展的“新经济革命”，其进步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在无需照顾传统的特权阶层的前提下，在一种近乎于人人平等的相同出发局势下，通过采取既有国家严格规定和保障，又是更为自由的竞争原则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分化和多元化，是在完全排除了旧有的世袭等级地位，以及政治上的专横权势对特权阶层有意扶植的条件下，通过一种近乎于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机会”上的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即使是竞争中的失败者，国家贯彻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仍然给他们提供了再次的机会。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局势上的差别，连同现代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利益上的差别，都变得既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被接受了。而经济活动中落后的封建传统因素和反动的纳粹因素被彻底扫除，正是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战后社会经济改革混合效应的结果。

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对战后西德意志地区生产力的启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货币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变革措施如价格、工资制度的改革，一举改变了西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形势，从而为完全取代在战后已证明是效率低下的纳粹统治残留下来的“统制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后来所描绘的那样：

黑市突然消失，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工厂的烟囱青烟缭绕，公路上载重卡车川流不息，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一个景象，死一般沉寂的废墟已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这种

^①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63》，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54 页。

复兴的规模本身就已使人吃惊，然而更令人愕然的，则是它那么突如其来，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随着货币改革之日的一声钟响而启动的。^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资产者的经济特权进行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也来源于艾哈德的“凡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国家的干预就是合适的”理论。因此，当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新的集中势头开始出现时，艾哈德便于 1957 年着手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并成立了联邦、各邦的“反卡特尔局”，以保护竞争自由，并铲除私人经济强权全面垄断市场的局面。该法的核心是禁止“卡特尔化”，它明确规定：

任何企业和企业集团原则上不得通过就价格、数量和瓜分销售领地达成协议来限制相互的竞争。违反禁令者，“反卡特尔局”可以处罚 500 万马克以下的罚款，此外还可判处相当于违法所得 3 倍以上的罚金。^②

同时，国家控制着企业的兼并。“当一个企业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销售额，并在销售量达到 1 亿马克后所进行的任何兼并，联邦反卡特尔局都将禁止。”^③ 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已不再能毫无顾忌、毫无困难地立即转变为社会上或政治上有意义的行动了。

同时，根据《基本法》中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私有财产要尽社会义务的原则”^④，资本占有者必须为每个雇员缴纳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的一半，以及工伤

① 维利·克劳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恩 1959 年中文版，第 185 页。

② 维利·克劳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恩 1959 年中文版，第 185 页。

③ 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 1959 年版，第 104 页。

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波恩 1959 年版，第 105 页。

事故发生后的一切善后处理费用。通过累进税制，资本占有者必须为国库提供用于补助多子女家庭的一切费用，用于全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免费教育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用于社会救济方面的一切费用。累进税率的严厉程度也实为世界少有。“对于年收入达到十万马克的经理人员的薪金，要征收所得税四万八千六百马克。这样高的、最高达 25% 的累进税率使得经理人员的薪金实际上有了一个限额。向企业公司征收的所得税的税率也很高，规定的最低税率为利润的 15%。”^① 这是对资产者经济特权的削弱，过去魏玛时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纳粹时代“统制经济”中资本野蛮剥削的特点有所改变。它使市场分配的部分结果极为广泛地转移到个人的社会收入份额中去成为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战后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联邦德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是最小的，因而也使它成为了工人罢工现象最少的现代化工业国。

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改善了德国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首先在劳动保护政策方面，国家法律规定：禁止招收童工，禁止让 16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上夜班，禁止休息日和节假日上班，不得让孕妇产前 4 周和产后 6 周工作，除了每周休息 1 天外，每个工人每年享受 4 周假期，其间工资照发。当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时，一概由国家支付。

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成立了由工会、雇主协会和国家委派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各级劳动局。它们负责向工人介绍劳动岗位，提供职业咨询，促进职工教育，组织进修和改行培训。在此期间，劳动局还要为进修和改行培训的工人提供无偿补助、信贷和生活费，以及分居补助、路费和搬迁补助费。^②

在工人对企业决策的参与权方面，将 1951 年公布的《煤钢参与法》推广到所有经济部门。根据 1974 年的《企业组织法》规

①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4 页。

② 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 1983 年中文版，第 124 页。

定，凡超过 缘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应成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凡超过 圆名雇员的的企业应成立企业监事会，该会由劳资双方数量平等的代表组成。《煤钢参与法》还规定设立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具有平等地位的“劳动经理”。没有监事会内部职工代表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任免这位“劳动经理”。尽管这种监事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因为监事会的主席一般是由股东的代表来担任的，但不能不看到，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同时也反映了资本占有者对工人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让步。在这种让步中，“录用、解雇工人的人事上的决定，已经不再能完全由资本家来支配了，而是必须与工人代表共同商议来解决。而在工人工资的改动上，只能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①。

与此同时，一个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了起来。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事故、失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甚至包括死亡在内的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也使联邦德国成为了战后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

在失业保险方面，凡在失业前三年里缴纳过至少 猿园天义务保险费的工作者（他只需缴纳该费的一半，另一半由雇主缴纳），便可领取失业保险金。若需抚养子女者，可领最后净工资的 远豫，其他人为 远豫，但最多不得超过 愿园天，其间无需纳税。

在失业救济方面，凡无权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领取最后净工资的 缘豫，无时间限制。

在工伤事故方面，雇员无需缴纳保险费，一旦发生事故，保险机构便负责提供全部的医疗伤残金、伤残养老金；发生死亡时，提供抚恤金、遗属养老金，该金额为死者年劳动收入的 源豫。

在医疗保险方面，雇员也只需缴纳一半的保险费，其配偶和子女便均有权免费享受这种保险。

在养老保险方面，凡年满 远缘周岁的男人和 远园周岁的妇女，只

① 维利·克劳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恩 员怨愿年中文版，第 远圆页。

需在 15 岁年中缴纳过一半保险费者，便有权享受这种“正常养老金”，其金额相当于最后净工资的三分之二。

在鼓励家庭人口发展方面，每个有子女的家庭不管收入状况如何，可享受每月为第一个子女领取的 150 马克的补助费的权利。从第二个子女开始，这种补助费上升到 180 马克，第三个子女上升为 200 马克……这种费用一直支付到该子女年满 18 周岁。

在鼓励教育方面，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应使所有的青年人，不管其出身和父母收入如何，都能得到适当的教育，中、小学生可得到补助，大学生可得到贷款，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都是免费的。”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兰佩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教育、等级、职业和收入的特权受到了削弱。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即变成一个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再以等级和出身为标准的社会，而是由每个人自己创造的、并为社会所承认的成绩所决定的社会。^①

通过这张社会保障网，每个联邦德国公民无论出身于什么家庭，在“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在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已得到了国家法律的全面保护。它消除了在职者一旦丧失工作机会和超过工作年龄后经济上无依无靠的恐惧，甚至也为没有工作过的人们，包括孤儿寡母们在内，提供了一种超过生存最低限度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救济性生活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的保险体系不仅规定了一个在职的受雇者必须缴纳保险金的另一半，而且也规定了各种保险、救济等级金额上的差别，从而也使受雇者在职期间的工作努力状况与随之生效的享受社会保险权利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将全民免费教育（包括职业进修、培训期间所提供的一切免费）也纳入这个社会保险体系之内，这就使这种体系

^① 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 1985 年中文版，第 204 页。

具有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培植生产力的功能。

因此，不同于英国、瑞典以及其他北欧福利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惜大举国债来操办纯消耗性、纯救济性保险的，而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由于它的全民性、广泛性、严密性，使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利于这个民主国家社会安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全民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的运转，不仅打破了俾斯麦于1884年创立福利制度以来的所有传统限制，而且也提供了更宽的社会福利面和更程度的救济水平。当然，这同时也使得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总支出由1900年的1.9亿马克，上升到1913年的14.9亿马克，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即等于社会保险福利每年对每人支出了1.5马克”^①。

当人们要去回答为什么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梦想会破灭，而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梦想却成为了现实这个问题时，就必须注意到，后者的成功是有着一场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来作为它的背景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与政治、社会体制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化，才使它没有违背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内在矛盾的客观规律，因此，这场经济繁荣正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个民主共和国获得巩固的关键性原因。

第三节 摇从“军事工业化”到“和平工业化”

一、“第二次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之后，作为旧德国一部分的西德意志地区，有一点并没有毁灭，那就是它在1913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工业潜力。正是在这种潜力的基础上，第

^①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结果，最终结束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工业化”道路，并开辟了一个“和平工业化”的新进程，这同时也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化”。

从1945年经济改革所开辟的“和平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在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零点”上起步的，而是在纳粹时代“暴力现代化”遗留下来的所有结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军事工业化”的纳粹时代，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政权将所有力量都纳入了战争经济轨道。因此，纳粹德国不仅很快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还造成了工业劳动力的奇缺。同时，纳粹的农业政策，导致了大片小农的土地被容克地主兼并，加之工业上又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民大量从田野流向工厂。到1943年，农民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剩下10.4%，这是自从1913年农业人口下降为19.1%以来的最大的一次下降。^①在战争的中期与后期，当壮年男子都被驱上战场时，与此平行发生的则是大量妇女从家庭被赶到了现代化的机器旁。因此，纳粹时代，就其对德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上讲，恰恰是一个工业化规模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彻底埋葬了纳粹德国的这条“军事工业化”道路，并给德国留下了一片战争废墟，但它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这场战争使这个民族中更多的人成为了拥有工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熟练劳动力。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场敌对双方的高科技竞赛。由于对侵略战争“闪电式”进攻效率的追求，德国在各国中率先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军，率先修筑起高速公路，率先进行了军用卡车、摩托车的大批量生产，一场现代交通运输业上的革命和一场现代电子通讯业的革命已在进行。而且，由于希特勒害怕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遭到一战式的英国“大陆封锁政策”的威胁，因此，他早在1939年就下令对战争原料代用品进行研究和生产。

^① 埃克·亨里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84年版，第146页。

由于德国盛产煤，而代用品的生产出路也在于煤，因此，通过煤聚化和氢化合，德国在世界上最先取得了在合成燃料、人造橡胶、人造脂肪、人造皮革、人造纤维、塑料工艺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从而也首先开始了一场化学工业革命，并在导弹、原子弹研究方面一时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一点也正是迫使美国加快原子弹生产的原因）。^① 战争无情地摧毁了这座“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但是，德意志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熟练工人所掌握的高科技生产水平，则成为他们在一个“和平工业化”时代所拥有的潜在优势。

战后盟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置，以及 1945 年后美国战略的转变，也出人意外地为西部占领区从“军事工业化”向“和平工业化”的加速转变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波茨坦协议》，东、西方盟国在各自占领区贯彻了对没有被战火摧毁的、与军工有关的一切工业设施进行拆除以充赔款的“非工业化”政策。由于战后西部占领区经济的崩溃，已迫使美国自己必须每年拿出 20 亿美元的救济品才能在西部占领区防止大批人口的挨饿和政治动荡，因此，到 1949 年它终于停止了拆除工作，并着手将西部占领区纳入欧洲战后和平重建计划之中。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三个西方占领区内，与军工直接有关的、最大的 100 家企业已被扫除，^② 而这些工厂在一个和平重建时代中恰恰是无用的东西。若是将这一后果与即将开始的和平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看，它恰恰为西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设备更新作好了准备。

在波茨坦，苏、美、英三个大国领导为了防止未来的德国可能再次提出类似于 1938 年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从而吞并东部邻国，因此一致同意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新的西部边界以东的

① 戈尔德登·粤·克莱格：《德意志史，1914—1945》，慕尼黑 1953 年版，第 254 页。

②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4 页。

原第三帝国东部地区所有的德意志居民，全部移向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西。这一决定导致了 1945 年 200 万东德意志人涌入西部占领区。由于西部占领区的战后重建已经开始，而苏联仍在东部占领区内长期坚决彻底地贯彻“非工业化”方针，这又导致了从 1945 年至 1952 年之间 200 万东德意志熟练劳动力涌入西部社会（其中，1945 年至 1948 年间达 100 万人，1948 年至 1952 年“柏林墙”修筑前又达 100 万人）。而在“这些移居者中，从 16 岁至 25 岁者占 1/3，26 岁至 35 岁者占 1/3，而且这些人机动性特别大，一般来说，学业已经结束”^①。因此，这 200 多万难民的涌入，本身就意味着旧帝国劳动力向西部的快速聚集，这种聚集使得这个在 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仅有 1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在当时不足 2000 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竟然成为了欧洲、同时也是世界上熟练劳动力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

这种人力资本的转移和熟练劳动力的聚集，正是战后联邦德国和平工业复兴的一笔最为重要的财富，其关键性的意义仅从以下的计算中就可以看出：“若是按每培养一个熟练劳动力平均投资 1000 马克计算，仅是东德熟练劳动力的涌入，其价值就等于为联邦德国节省了需要花在 200 万熟练劳动力上的 200 亿马克的培养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的 15 亿美元的规模。”^② 因此，这不仅使联邦德国得到的这 15 亿美元能全部用于“和平工业化”的启动，从而使它拥有了欧洲最高的投资水平，而且也使联邦德国在 50 年代还能把它的教育和培训经费限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相对标准之下，而经济增长的机会丝毫没有减少，这种优势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尽管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了 15 亿美元、英国得到了 10 亿

①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52》，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04 页。

②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52》，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04 页。

美元的援助，而这两国为什么都没有取得与联邦德国相应的经济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东德意志的难民，由于其所具有的年轻化和高教育化特点，恰恰支持了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成就。

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承担了联邦德国的战后防务，到 1953 年以前，在“和平工业化”进程中重新起步的联邦德国，是个没有一美元军费开支的国家。^①这就等于将纳粹帝国曾用于武装 100 万军队的庞大开支节省下来，全部用于了和平的经济发展。这种没有军费开支的优越性也只有东方的日本能与之相比。即使在 1953 年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防务联盟”之后，由于西方盟国害怕德国军国主义“重新抬头”，摊派到联邦德国头上的军费开支，一直低于英、法的水平。况且，永远禁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反而使得联邦德国既能坐享安全保证，又能幸运地逃避开支庞大的军备竞赛。而战后的这场军备竞赛，由于核武器以及新式常规武器系统价格日益昂贵，其费用也早已在无止境地盘旋上升，它不仅要耗去大量原材料和资金，而且还要耗去大量的科技生产力。在与英、法等国的比较中，德意志历史在这里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过去人们无法相信的证明：“彻底战败要比勉强战胜强得多！”过去德意志人曾因希特勒的“军事工业化”吃尽了苦头，而今，联邦德国人已能全力以赴，通过和平的经济增长，生产更多的民用产品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去促进国家的繁荣了。

因此，比起所有的西欧国家来，重新起步的联邦德国的确是“轻装上阵”。随着 1948 年货币改革的开始，占据优势的工业潜力在“和平工业化”进程中迅速释放出来，并极为显著地改变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

二、“和平工业化”与“经济奇迹”

“和平工业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联邦德国社会生产力的快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2 页。

速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从 1950 年至 1959 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 10%。^①

在人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 10%，并在 1953 年以后继续保持 10% 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②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 1950 年的 100 亿美元上升到 1960 年后的 200 亿美元，而在 1970 年代后超过了 300 亿美元，1975 年达到 350 亿美元，而 1983 年则达到了 450 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53 年联邦德国已超过美国，达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位的 1000 美元。^③

在年通货膨胀率方面，联邦德国则是西方国家中最低的，仅为 1%。失业率也从 1950 年的 7% 降至 1960 年的 4%，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两番。到 1965 年，平均每个工人年收入为 1000 马克，平均每个职员年收入为 500 马克。^④

国家的黄金储备由 1950 年的 10 亿马克增至 1960 年的 100 亿马克，1965 年上升为 200 亿马克，远远超过当时所有西方国家。^⑤从此，联邦德国的马克成为世界上最为坚挺的货币。

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奇迹”，也对联邦德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50~1960》，汉堡 1960 年版，第 100 页。

②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53~1960》，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7 页。

③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0 页。

④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50~1960》，汉堡 1960 年版，第 100 页。

⑤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53~1960》，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00 页。

“和平工业化”进程导致联邦德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战争结束之初，西部占领区的农村成为比充满废墟的城市更能提供人们住、食的地方，因而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最后总数高达 1500 万的东德意志难民。仅以拥有鲁尔区的英占区这个旧德国工业核心地带为例，其农村居民从 1945 年的 120 万猛升到 1950 年的 150 万，而整个西部的农村居民也普遍回升到 150 万以上，似乎西部在“重新农业化”。

但农村的“人满为患”，反而使西部农村越来越失去了乡村的痕迹。特别是 1945 年到来的那 150 万东德意志人，他们过去大部分是旧帝国的东部居民，当他们离开家乡的土地，并作为“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来到西部，而又无法从当地农民手中获得土地时，他们便与那 150 万东德意志熟练劳工一样，被迫将自身未来的命运与这个工业人口最集中的西部地区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了。特别是他们的到来，又恰逢西部突然被纳入“和平工业化”的进程，于是，“这些东部农村居民也就等于被赶进了工业现代化时代。他们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在 5 年之内都成为了工人”。而且“也正是这 150 万难民要在他们所不熟悉的社会里扎下根来，并生存下去的绝望努力，成为了战后这个时代竞争思想和工业化中极高的职业动员率的诱因”^①。这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农民，从而对就业者从低于平均生产水平的经济领域——农业——向那些对总生产能力能作出更大贡献的经济领域——工业——的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联邦德国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人口流失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 70 年代初，联邦德国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 15%，1970 年进一步减少到 12%，德国重新统一前的 1955 年，农业人口再度下降为 15%。^② 因此，联

^①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 1957 年版，第 150 页。

^② 《德国概况》，波恩 1955 年版，第 150 页。

邦德国继英、美之后，成为了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而在国内产值的比重方面，也成为了农林业比重最低的国家，1956年仅为 1.9%（英、美均为 3.5%）。在工业产值比重方面，联邦德国则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达到了 33.5%（英、美分别为 25.5%和 27.5%），^① 联邦德国已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现代化工业国。

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甚至接近消失，意味着全体国民的经济生活呈普遍城市化的趋势。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依赖性，本身就是商品加速流通的刺激性因素。与此同时，旧德国的高科技熟练劳动力在联邦德国的聚集和储备，使联邦德国的工业资本往往能超越常规地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战争结束之际被中止了的为战争目的服务的交通运输业革命、电子工业革命以及化学工业革命，在改变了“军事工业化”方向之后，迅速向“和平工业化”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德国“钢铁时代”的结束，以及“汽车、家用电器”的“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不同于过去的“钢铁时代”，这种大众消费品能深入千家万户，因而为联邦德国的工业开辟了国内外广阔的群众性消费市场。随着联邦德国的汽车工业给数以百计的生产部门带来滚动性的“增值效应”，随着它的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再度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联邦德国的整个消费工业和投资设备工业中出现了新的生产周期。1950~1954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品销售额比例数字表明，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品的增长率呈现绝对上升趋势，这 5年中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 15.5%、15.5%、15.5%、15.5%和 15.5%，而钢铁产品的增长率却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仅增长 2.5%。^②

①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6》，商务印书馆 1956年版，第 25页。

② 格尔德·哈尔塔赫：《世界经济中的德国，1954~1956》，法兰克福 1956年版，第 25页。

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时代”里，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到 1950 年每 100 户人家中，20 家各有一台电冰箱，20 户各有一台电视机，10 户装有电话。^①而在私人小汽车的占有方面，1924 年每 1000 个联邦共和国居民（包括儿童与老人）中仅为 1 辆，而在 1950 年已上升为 10 辆。在 1950 年，战后西部未被破坏的每段高速公路上，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平均为 100 辆，而到 1950 年，在一个联结整个西部的稠密的高速公路网中的每段高速公路上，平均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已上升为 1000 辆！^②

当汽车和家用电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人们参加文化活动、改善住宿条件、开辟业余生活新领域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扩大了。这导致了大众消费需求向诸如饮食业、旅游业、洗衣业、保健业、科学、教育、艺术、出版业的服务产品异常迅速地转移，从而推动了联邦德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1950 年，联邦德国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 30%，1950 年上升为 35%，而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在 1950 年超过了工业就业人数，1950 年已达 30%。^③ 联邦德国像其他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第三产业服务经济终于占据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导致了德国的分裂，并使联邦德国失去了原帝国东部农业区的食品供应，食品来源只能依赖进口。但是，在苏、美“冷战”的新格局下，德、法世仇和解，英国结束反德战略，联邦德国已被真正接纳进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之中。随着 1950 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向 1950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①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33-1950》，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00 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18-1948》，汉堡 1948 年版，第 100 页。

③ 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33-1950》，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00 页。

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体系给予了联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所没有真正给予德国的东西——世界市场。而战后的联邦德国凭借着它强大的工业潜力、先进的高科技生产水平，确保了它在欧洲和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产品价格优势，因此，从1950年开始，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便第一次出现顺差。随后，它的出口贸易的创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在净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1950年为22.5%，1954年达27.4%，1958年上升为30.8%，1960年达到32.5%，1962年又上升为34.5%。1962年以后，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将日本和美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①它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来自对外贸易，同时，国内每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取决于进口。

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发展规模，不仅在德意志经济史中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它深刻的后果在所有的领域中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并深入到社会结构与人们的行为动机之中。其中，比成就的规模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对“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

在社会福利保险制和反垄断体制的辅助下，“竞争原则”被整个社会所承认，意味着这个社会已完全接受了内部冲突的现代形式。“竞争原则”作为市场理性的原则，过去在德意志历史上一直是不太令人感到舒服的，特别是由于这个社会比别的工业化社会都更早、更快、更彻底的垄断化，因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形成的垄断化，以及垄断企业的“自由放任化”，导致的只是一种“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压制“公平竞争”的，因而才使“竞争原则”的真实贯彻在这个社会中实际上只有一种相当软弱的传统。正因为如此，“竞争原则”在战后1950年中的广泛贯彻，恰恰反映了社会风格上的一种可喜进步。这种风

^① 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1962年版，第103页。

格已经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出现了，它不仅通过竞争所带来的经济成就全面渗入到了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也渗入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之中。人们对于市场，而不是对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偏爱，使所有那些用旧式传统观点来看待德意志社会的人都大吃一惊。

固然对于许多德意志人来说，“纪律”、“服从”之类的“传统美德”，在引起他们对过去光环回顾的共鸣上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已变成了一连串无拘束的词句了。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成就、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更好的汽车，以及更为轻松的远程旅游，扮演着远比过去的“传统美德”大得多的角色。更年轻的人总是更少对权威、“传统美德”之类的东西表示尊重的，这样的东西已经只是他们的父辈们，尤其是他们的祖辈们才会去推崇的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对个性价值表示尊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将个人所经历的幸福置于其他东西之上的。因此，过去那种所谓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中的“整体感”已越来越多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掉了。

当然，由此也引起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一系列能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的问题，例如，尽管这个现代社会已极大地满足了经济上、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了一种极高水平的平等化和民主化，但是，对新的现代性的不适应又有了理智反叛上的新形式。关于财富增长是否或何时会达到极限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和发展现有分配秩序的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官僚化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问题，关于如何保持思想平衡与理智和谐的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虽有物质上的富裕却依然找不到幸福感的问题，关于如何才能真实地贯彻“终极关怀”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才能为这个社会找到它的终极目标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作为现代性的新问题提出来了，它们向未来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得重新解释、改造并求助于基督教传统的努力受到了普遍的新重视。

但是，战后“经济奇迹”给联邦德国社会所带来的那些主要

的变化和倾向，从政治上讲，恰恰又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场“经济奇迹”已经克服了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危机，而且在经历了这场灾难后，后起者的优点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德意志社会今天比法国、英国、意大利社会都更为稳定和更具匀一性；变得富裕起来的人口大众，也不会转而去拥护“新纳粹”政治集团所希望的那种对个人自由权利进行剥夺的权力垄断。在这里，不仅是富裕本身，而且更有对富裕的个性主义参与方式本身，才足以构成对“新纳粹”力量抵抗的源泉，要想将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重新装入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紧身衣中去，已不太可能了。的确，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说的那样：

当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当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新纳粹主义”在这个国家中突破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它的危险性已不再能表现为通过夺权来给人类造成威胁了，而仅在于它有时还能够干扰这个民主国家政策上的制定。^①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能够说德意志民族已经由过去靠战争谋生的世界头号“战争民族”，变成了世界上头号的“商业民族”。

总之，战后联邦德国社会获得的这股猛然得到加速的现代化推动力，恰恰来自于对德意志社会传统的内、外环境结构意义深远的破坏，这种破坏首先要归功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给德意志、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全面性结果，因为正是这种全面性的结果，才对这场破坏产生了最为决定性的正面强化的作用。而联邦德国在战后 1949 年中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又反过来为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① 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见《德意志年鉴》，杜塞尔多夫 1982 年版，第 242 页。

第四节 摇结束语：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它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首先纳入一个民族统一框架内来进行，总是比让这种进程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之中更为有利。这是因为，统一的民族发展框架，比较起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民族存在来说，总是能够为这个民族的整体提供更为直接的信息传播形式、更为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以及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一句话，总是能够提供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来说，民族统一总是作为一个问题、一项任务、一种理想来出现的。但是，民族统一的条件又是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周边国际环境，不能脱离历史给它留下来的遗产继承物的。

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启程以来，特别是当周边大国已经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经在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则由于地处中欧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过去沉重历史的合谋，成为了一个既无明确的民族边界、又处于严重分裂中的世界。这种多达近 猿园 来个大小邦国的分裂化，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势力施展各自野心的竞技场，而且也一再引起了它周边邻居们对维持它的分裂状态的共同兴趣。即使是那个在拿破仑战争后根据“维也纳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同盟”，也仍然是作为欧洲的东、西方力量的“缓冲地”来出现的。这个由 猿园 来个邦国组成的同盟，也只具有邦联的性质，因而德意志世界仍然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地干扰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它使德意志社会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进行。然而，由于这个地处中欧的民族处于周边大国监控之下的特别的国际背景，已经使得它那一再受到历史性延误的民族统一问题，不可能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便利、孤立地解决了。

所有这些对于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来说是

十分清楚的。然而俾斯麦的幸运在于，他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赶上了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由于发生了一种对欧洲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才被作为“机遇”而独具意义地出现的。这种“机遇”，也被后人习惯性地称为“克里米亚效应”。

作为以沙皇俄国为一方，以大英帝国、法国、土耳其、撒丁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的结果，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国政治的协调体系受到了干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沙皇俄国在它的军事失败以后，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内部的现代化改造上去了；而大英帝国则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由于它自身庞大帝国内部的多重问题而耗去了主要的精力。因此，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体系中这两个最为重要的翼侧大国——俄国与英国，由于内部的弱点，确切地讲，由于它们各自在欧洲以外的“义务”，才容忍了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政策，从而也才使得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在 1864年与 1866年~1871年这两场决斗式的战争中，如此孤立地得到了解决。^①

但是，无论是 1849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德意志世界中的普—奥二元性霸权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还是在 1849年~1851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欧洲大陆优势地位的德法对抗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精明的俾斯麦看来，都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统一国家，必须在它的建立过程中既不成为英国的、也不成为俄国的小伙伴的情况下，来取得一种完全独立的、也是半霸权的强国地位。

俾斯麦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尽管主要来自这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斗争的结局，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相适应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满足了他在内部政治上维持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他在对外政治上

^① 安德雷斯·希尔格鲁伯：《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欧洲大地地位的奠基人》，哥廷根 1972年版，第 107页。

维持独立性和半霸权地位的需要。这种后来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半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恰恰采取的是西欧立宪君主制与东欧专制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也使得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成为了西欧与东欧政治体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有一种拥有国家财政审批权的国会，也有一种公民选举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选权”，因而在当时最重要的欧洲翼侧大国英国看来，是与它自身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这种体制同时还保存着一位能真实地决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国家军队只向他效忠的传统专制主义的皇帝，这在另一个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国看来，又是与它自身的东方专制君主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①

尽管在这个时代里，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还远远未表现得像 19 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那样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原则性，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对于英、俄两国最初接受这个在中欧出现的独立的德意志统一国家来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在那场 19 世纪 30 年代的普鲁士“宪法冲突”中，以俾斯麦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失败了，而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们获得了胜利，那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英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也是完全有可能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大英帝国的小伙伴的。反过来讲，如果在“宪法冲突”年代里，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们策划的推翻俾斯麦的国家政变计划获得了成功，那同样也是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德国在宪法政治上和民族政治上向专制的沙皇俄国靠拢，并在对外政治上充当俄国的小伙伴的。这两个大国尽管都希望一个统一的德国能成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当这种希望不能实现时，也是绝不愿意看到它成为另一个翼侧大国的小伙伴的，而这一点恰恰给这个由俾斯麦统一的德帝国留下了在对外政治上采取独立行动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的奠基人，俾斯麦同时

^① 卡尔·哈默尔、彼得·克劳斯·哈尔特曼：《波拿巴主义，历史上的现象与政治神话》，慕尼黑 1976 年版，第 155 页。

还看到了欧洲权力均势格局对这个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组合上的特别要求，一个地处欧洲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长期稳定性的成果，本身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组合形式能否被它周边大国所接受。因为德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它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使它有着比任何国家都多得多的邻国，一旦当这些邻国感到它们将会处于一个过分强大的民族帝国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就会防患于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向它发起攻击，那么，不仅德意志的统一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即使它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也会由于它所处的欧洲中间位置自然而然地处于包围之中，成为众矢之的而朝不保夕。因此，俾斯麦没有采取将所有讲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个民族集合体中去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过去的那个“德意志同盟”中最大的邦国奥地利，连同它的多民族集合体，被排除在未来的新民族统一国家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德意志统一是一种排除了那个最大的、也是多民族邦国奥地利之后的，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此，俾斯麦信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一种“并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民族统一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最彻底最广泛最深刻最纯粹~~）”。他所建立起来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没有真正彻底实现文化民族统一理想的民族国家，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对一个新民族的塑造上，这个新民族并不包括所有讲德语的日耳曼人。^①

当然，这种排除了奥地利的“小德意志统一”的俾斯麦方案，无论从内政上讲，还是从外交上讲，都是建立在一种需要高度艺术性和高度政治操纵性技巧的力量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民族力量聚集上“小德意志统一”的局限性，由于这种政治体制上的东、西方中间性特点，由于在对外政治权力实施上经过俾斯麦谨慎估量的行为界限，由于这个新帝国所作出的“它在这个大陆

^① 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 ~~版~~ 1953年版，第 ~~页~~ 页。

上的领土要求已心满意足”的声明，才使得它的邻居们认为，让这个新独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曾经是东、西方力量缓冲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当欧洲体制中那两个翼侧大国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全神贯注于欧洲中央局势的时候。因此，俾斯麦为建立这个新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尽管是作为对“维也纳体系”的破坏来出现的，但在它的邻居们看来，同时也是可以被作为对这个体系裂缝的补充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的统一国家才被欧洲的权力体系接受了。

然而，在 1871 年俾斯麦首相任期结束之际就已经表明，德意志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多元化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压力，地缘战略上的形势，军事技术上的进步，经济霸权主义的动力，以及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特点，都使得长期确保这个统一帝国内部体制的稳定化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半霸权地位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社会内部和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已经使得一种固定化的国家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由于这个体制自身的成就和缺陷带来的，而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的权力旧体制也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个比谁都发展得更为迅速的现代化民族强国的国际能量了，因此，统一的德帝国的发展成就，是与它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以及它的野心成正比例的，也是与它所面临的危险性成正比例的。于是，对这种能量的喷发进行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打响了。

在这场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中，德国走上的是“世界政治”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这个统一的德国，既不去谋求与英国的、也不去谋求与俄国的同盟保证，那么它就会受到两线战争的威胁，因为法国是它在立国之初就树立起来的“世仇”。但是，如果这个帝国选择英国或是俄国中的任何一个来作为它的盟友，那么它就会成为这两个翼侧大国之一的小伙伴，并因此得抛弃它要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中的大国的梦想。威廉时代的德意志领导层对这两种选择都是拒绝的，他们选择的恰恰是俾斯麦立国之初最先抛弃了的那个选择，即选择了另一个由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多

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作为它真正的盟友，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亲缘性发生了作用。它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且也使历次欧洲战争中从未体现出来的现代民族对抗性开始呈现出来。它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大德意志”的联盟合作，是唯有在讲德语的世界准备与它外部的世界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政治远见的俾斯麦是一位巨人，但他也仅仅是一位在命运逼迫下提心吊胆的巨人，尽管在他的任期内，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压倒了他所预见的厄运。但是，那位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只是现代官僚政治中的一位原始人物，尽管他不知疲劳地修补，并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去避免那种不可避免的沉默无声的绝望，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个统一的德帝国被逐进了一场无边的赌博之中。

在这场赌博失败之后，德国的大量领土和人口被分解出去了，但它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证了它潜在的大国地位。这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比较起来温和得多的惩处，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其一，沙皇俄国在 1917 年的战争中由于自身内部的革命而崩溃了，刚刚新建立起来的那个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局势之中，随后它又面临着大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负。因此，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社会主义的苏俄，至少是暂时性地退出了欧洲大国体系，这就又一次地带来了“克里米亚效应”。其二，在德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崩溃的基础上，东欧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充当了所谓反共产主义的“防疫线”，从而也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俄国从边界上隔绝开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德国与那个东方翼侧大国现在不是邻居了。因此，在一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得到特别强调的时代里，一个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从政治体制上讲，本身是能够被它周围的邻居们所接受的，但是，从经济上讲，它并没有真实地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它得在缴纳巨额战争赔款的条件下过日子；从军事上讲，也不允许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得处于西方的严密看管

之下。而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权力精英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却恰恰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而得到了保留。

在这里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格奥弗雷·巴拉克罗伊夫的一段话是合适的：

如果不是德意志传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十月革命，利用了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崩溃的排泻物，利用了对一场欧洲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恐惧，才维持了这个统一帝国的一种潜在的大国地位的话，那么，那个通过 1918 年普奥战争和 1918~1919 年的德法战争的建立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帝国的决定，不用在 1918 年，而是早在 1915 年就已经被重新修正了。^①

这种潜在的大国地位是能够转变成事实上的大国地位的，但是，这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高超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项在东、西方之间积极的平衡政策。为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基本保持了统一框架的德意志共和国，再度进入了欧洲权力体系中的一种位置上来了，这种位置是与俾斯麦时代德帝国曾进入过的那种位置相当类似的。因为就连那个现在不是德国邻居的苏维埃俄国，在它的对外政策中，也是将这个战败的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同样作为受战胜国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来看待的。而且这个苏维埃俄国由于其自身需要时间来进行它内部的现代化建设，并首先得求助于来自德国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从而也大大增加了魏玛德国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甚至在并没有完全驱走它“世界政治”野心的情况下，斯特莱泽曼开始运用俾斯麦式的、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来逐步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期能为德国重新赢得事实上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在当时也是存在着某种成

^① 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 1957 年版，第 155 页。

功机会的，如果不是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在 1929 年 10 月他去世后不久就到来了的话。

但是，这些机会由于希特勒所实施的野心勃勃的狂妄计划而被毁灭了。这位充分利用魏玛时代德国现代化的全面危机，并通过传统权力精英们扶植上台的纳粹“元首”，企图通过战争来建立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并以此作为最后登上“大德意志世界帝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阶梯。

在为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中，直到 1939 年 9 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都一直是将“民族自决权”作为掩盖其侵略政策的有效工具来使用的。这种使用在遵从原意的表象背后，具有全面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每一项规定的目的，而《凡尔赛条约》本身又是与各民族的“自决权”原则并不一致的。这就为希特勒通过全面砸开《凡尔赛条约》的锁链，来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虚假合法性。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下，希特勒于 1938 年 3 月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表达了自从 1918 年三月革命和欧洲革命以来，从理论上讲可供德意志人想象的一种民族政治的选择。1938 年“小德意志统一”帝国的建立，尽管否定了这种选择，但是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场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讲德语的这个文化民族的头一场现代分裂。这种文化民族分裂的伤口所带来的痛苦，又恰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酷似一场德意志民族与它传统的外部世界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标志着德意志人失败的战争中的共同感受，由于一战后对这两个有着共同民族文化来源的国家所进行的类似的惩处，总之，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相同命运，而变得剧烈起来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具有了普遍的“大德意志统一主义”的倾向。

在 1918 年 11 月，协约国即西方战胜国，出于平衡均势和强权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去满足那个崩溃的奥匈帝国中讲德语的日耳

曼人与魏玛德国合并在一起的要求，而这种合并本身也是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远程目标。但在 1938~1939 年期间，在英、法“绥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过对维也纳政府所施加的压力，通过策划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暴乱，完成了这场“德奥合并”。随后他又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统一了进去，并在 1939 年春，通过最后一次“非战争方式”完成了对默默尔的吞并。这种“不费一枪一弹”的领土获得，正是由于它能够用“民族自决权”以及“大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来辩护，因而也无疑在讲德语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不难想象的欢迎。

希特勒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采取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它的西方邻居，也不同于它的东方邻居的政治体制——法西斯极权独裁的恐怖统治。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此鲜明地与它东、西两边的世界对立的，而且这种恐怖统治体制本身也是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获取它“暴力现代化”的新活力的。它不言而喻的侵略性，是它周围的世界都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在当时，欧洲大陆两边的翼侧大国，无论是西方的英、法，还是东方的苏联，都想利用这股危险的祸水去淹没对方罢了。在这场利用纳粹德国的斗争中，无论是 1938 年 9 月的《慕尼黑协定》，还是 1939 年 8 月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结果都证明，恰恰是这些东、西方大国自己被纳粹德国的外交利用和玩弄了。“攻击一方，就是攻击我们全体”的认识，是在东、西方大国都遭到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攻击之后，才为他们所获得的。与此同时，一个注定令纳粹德国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也就建立起来了。

尽管希特勒一时实现了“大德意志统一”，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停止下来，而是直奔欧洲主宰和世界霸主的权力方向，为此而不惜向整个世界宣战。在希特勒权力的巅峰时期和侵略战争胜利的初期，他也曾短暂地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并占领了部分北非地区。但是，由于他所贯彻的霸权主义空间政策，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从欧洲强权政治与平衡政策的观点看来，已经使德意志民族的“大德意志统一”的

组织形式，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信任和道义上的名誉。因此，当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它自身点燃的战争之火中崩溃后，对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大德意志统一”的方案，作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组织形式被排除掉了。而且自从 19 世纪以来，这种“大德意志统一”方案在欧洲平衡体系中就几乎从未有过和平实现的真实机会，因此，“大德意志统一”作为德意志人的组织形式也就被再度排除掉了。

在德意志为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二次战争失败后，即使想要像 1918 年那样维持旧式的“小德意志统一”，首先从德意志社会内部来讲就已不可能了，因为这个社会已不再具有传统政治的连续性力量了，这支力量已经在纳粹“暴力现代化”年代里被希特勒毁灭掉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欧洲局势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结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能够带来“克里米亚效应”的又一场重复。相反的是，那个被希特勒所毁灭了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东方翼侧大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崩溃，而是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并成为了粉碎纳粹德国统治的主力军。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苏联已成为了这片大陆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以至于这个大陆也只能更多地通过美国对欧洲履行的“义务”，才可能维持平衡了。在一场由反法西斯盟友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手的转化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的东、西方国家“冷战”式的对立，决定了德意志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民族统一体的解体，同时也决定了比历史上最为狭窄的德国统一版图还要狭窄的领域内，东、西两个德国的分裂。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种“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统一，也不可能孤立地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和世界格局均势的缩影。在以“柏林墙”为标志的分界线两边，西欧国家在美国的协助下，保证着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而社

会主义的苏联，同样也保证着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因而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分界线，成为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阵营的分界线和“冷战”前沿。两个德国双双被集合到各自分属的由一个超级大国所维持的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而且分别成为了各自体系内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程度最高、财政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就连民主德国也成为了人均产值高达一万美元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人在“北大西洋体系”内还获得了远比民主德国人在“华沙条约体系”内多得多的对外行动自由。

民族重新统一的理想，无论是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双方也都在担心，民族长期的分裂会使分裂的现实永久化。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在联邦德国推行的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过程中，无论是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的下跪，还是施密特总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表的东、西方和缓的演说，都不外乎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改变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即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德意志人已经洗心革面，不再会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决心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了，他们能够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是，这种民族分裂的稳定性，又是与两大对峙的军事、政治集团各自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德意志重新统一的理想，就仿佛是一只无声的海螺，要想让它再度发出声响，除非欧洲能再次出现一场“克里米亚效应”。

超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样的“效应”竟然再度出现了！苏联在与美国“冷战”式的长期对峙和军备竞赛的消耗中，在向外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在经济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特别是它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作为它力量虚弱的信号，就像过去沙皇俄国在 1914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一样，迫使它再度退缩回去处理它内部的事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连同它的东欧势力范围，陷入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并带来了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的倒塌，因而也给德

国的重新统一带来了过去意想不到的机会。

联邦德国政府立即抓住了这次良机。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声称：

新统一后的德国将绝无其他领土野心，我们将把统一德国的进程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统一的德国将是一个欧洲人的德国。作为欧洲人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人的欧洲人，我们将在 20 年代与我们的东、西方邻居中的朋友们一起共同走向欧洲统一之路。^①

在作出了“促进德国统一，完善欧洲统一，为世界和平服务”的一系列保证后，两个德国通过与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国所进行的“二加四”谈判，并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终于在 1990 年 10 月完成了这场德意志历史上的再次统一。

1990 年 10 月 3 日，一面 300 平方米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国歌声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上。科尔总理声称：“这是本世纪德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日子。”^② 各国元首、总理们或是临场参加观礼，或是拍电报表示祝贺。无论怎样，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重要日子的同时，人们也不免有各种担忧，甚至是恐惧。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里，这种担忧和恐惧成为了西方记者们发布各种耸人听闻新闻的材料产地。在这些记者的笔下，有的实事求是地描述着柏林“新纳粹分子”的一场声势不小的非法游行；有的意味深长地谈论着关于两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合并之后在经济、政治上的国际影响；有的一本正经地公布了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新德国将独占鳌头的详细

① 赫尔穆特·科尔：《德国在欧洲中的未来》，赫尔福德 1989 年版，第 107 页。

② 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918-1989》，汉堡 1989 年版，第 100 页。

指数上的预测；有的煞有介事地描写着 1945 年或是 1945 年后的某一天，波兰不战而降，德军空降巴黎，伦敦坐以待毙，美国束手无策的有声有色的景况。……总之，被中断了 1933 年的“德意志戏剧”在一个全新的、也是更为现代化的开端上又再度开场了。

这场重新开场的“德意志戏剧”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国一次性地对不过 1933 年 10 万平方公里的原东部地区投入了 1933 亿马克，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资，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投资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资。四年后这场投资开始收效了，1937 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 1937 亿马克，人均产值（若按 1937 万人口计算）约为 1937 马克。原东部地区的人均产值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同一时间里，西部地区经济也增长了 1937 ①

经历了近 1937 年之久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才由过去的一个传统、分裂、专制独裁、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民主、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这近 1937 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欧洲局势对德意志统一强烈的制约作用，也一再证明了德意志对欧洲政局经常性地强烈干扰。因此，任何政治家的诺言，任何时事评论家的预言，都不足以使德意志的邻居们相信未来究竟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这个问题答案的肯定性，谁都不敢为这个拥有 1937 万居民、并空前现代化的强大新德国的未来打满包票。对未来良好的愿望与对过去恐怖性回忆中的担忧，在各国政治家思想天平上的分量几乎是同等的，越是靠近这个新德国的国家，对过去的恐惧与对未来的防范就越是显得强烈，而这恰恰又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

对于现今的德意志民族来说，尽管这场重新统一，结束了“民主代表着分裂，专制独裁代表着统一”这个德意志社会的旧时代特征，尽管这个统一的德国与整个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制度头一次变得完全相类似了，尽管这个新德国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加速度发展，但是，从文化民族的统一关系上看，一个民族若是唯有“让

① 《德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杂志》，波恩 1937 年第 1937 期，第 1937 页。

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最后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任务的话，那么 1871 年 1 月完成的这场德意志统一，仍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统一”，而只是西部德意志与老普鲁士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西部分中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为在欧洲，如今至少还有 1 亿以上讲德语的人是生活在奥地利、瑞士以及这个新德国的其他邻国之中的。因此，要想让所有讲德语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看来最为理智的方法，就在于积极地谋求实现联邦主义的“欧洲联盟”的一体化理想。而这种理想，又恰恰是否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这个现代化概念的，因为它同时也得让所有讲德语的人与至少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其他欧洲人一起，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

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所有欧洲民族，都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因而必须用“新欧洲民族”的整体概念来取而代之，否则，未来的欧洲仍将不得安宁。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欧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西欧、中欧与南欧人，早已在作“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伟大尝试了。它的成功将能为所有这些民族提供远远超出各自民族框架范围之外的更好的信息传播形式、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便利的资源配置、更灵活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并能使他们用“统一的声音”与外部世界对话，因而也无疑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在通向统一货币、统一防务、统一外交的 21 世纪“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无疑还有种种无法预料的险阻，但是，这场伟大的尝试代表了欧洲人在面临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压力下，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分裂状态克服的顽强努力，也代表了欧洲人避免自身沉沦的命运，走向统一、民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步伐。这是一场伟大的探险，一次光荣而艰难的航程。它的成功是可能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取决于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决心、智慧与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

- ①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②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③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④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 3 卷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⑤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 3 卷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⑥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下册，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⑦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73~1980，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⑧琼特·法比翁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 ⑨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⑩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 1985 年。

摇摇中文版。

美国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美国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

美国《科技导报》1989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美国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 1987 年版。

美国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美国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美国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 1985 年中文版。

美国《德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杂志》波恩 1987 年第 1 期。

二、英文

美国弗兰克·梯利：《德国历史》第 1 卷，伦敦 1965 年版。
美国卡罗·酝·吉波拉：《工业社会的出现》第 1 卷，伦敦 1966 年版。

美国约翰·肯尼迪：《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 1965 年版。

美国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中的德国与世界政治》，纽约 1963 年版。

美国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伦敦 1951 年版。

美国卡尔·赫尔弗里希：《德国的经济进步与民族富裕》，纽约 1959 年版。

美国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秘密之书》，纽约 1951 年版。

美国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中的德国与世界政治》，纽约 1963 年版。

- 罗伊洛勒·斯特林：《有缺陷的国家，对独裁与民主的研究》，法兰克福 1953年版。
- 亨利·施特鲁韦：《通过社会政策带来的发展》，科隆 1953年版。
- 米夏埃尔·斯图尔姆：《皇帝的德国》，杜尔塞尔多夫 1953年版。
- 米夏埃尔·施图尔默：《帝国建立，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与欧洲平衡》，慕尼黑 1953年版。
- 米夏埃尔·施图尔默：《魏玛共和国》，柯尼施泰因 1953年版。
- 《德国概况》，波恩 1953年版。
- 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希特勒的崛起》，柏林 1953年版。
- 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纳粹主义》，波恩 1953年版。
- 鲁道夫·维尔豪斯：《失败的妥协》，戈斯拉尔 1953年版。
- 伊特·瓦伦丁：《1918-1933年的德意志革命史》第 3 卷，科隆 1953年版。
- 马克斯·韦伯：《科学原理论文集》，蒂宾根 1953年版。
- 《科学原理论文集》，蒂宾根 1953年版。

马克思·韦伯：《政治论文集》，蒂宾根 1965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俾斯麦与帝国主义》，科隆 1924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德意志帝国》，哥廷根 1925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对内政策的优先权》，柏林 1924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皇帝帝国的危机源泉》，哥廷根 1924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科隆 1924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德意志道路》，柏林 1924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魏玛共和国中的重工业家，稳定化与危机之间的利益政策》，乌帕尔塔 1925年版。

亨德里克·威勒尔：《欧洲中部的德国》，慕尼黑 1925年版。

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 1925年版。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新教伦理》，居特斯洛 1925年版。

后摇摇记

本书的设想始于我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留学期间。1955年10月，我来到卡尔·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一天下午，我沿着位于城郊特里尔大学旁的小路向远处的一片密林走去，想到那葱绿静谧的大自然中去清理一下我初来德国的兴奋头脑。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遇见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德国铺路工，他的工作让我着了迷。

我知道中国建筑业中一句有名的行话：“齐不齐，一刀泥。”也就是说，当砖头的形状不符合要求的时候，拿泥刀砍去不需要的部分，若稍差大小，加点水泥将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填起来就行了。然而，眼前的这位德国铺路工却跪在那条从密林中铺出来的蜿蜒曲折的红砖路上，手中拿着一把精巧的钢锯，在锯着一块烧得像陶瓷一样精美光亮的红砖。当沿着红砖上的墨线锯出了他所需要的砖型后，他将这块砖卡在已铺在路基上的三块砖之间。只见他将一只脚踩在这块凸起的砖上，望着我神秘地笑了一笑，并吹起一声口哨，同时也听到“啪”的一声响，那块砖便天衣无缝地牢牢落在铺满细沙的路基上，随后，他又左手拿起一把尺，右手拿起一块砖……整个过

程并不用一丝一点的水泥！

回去我~~回去~~不由得惊呆了：这就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当我问他这条路通向何方时，他的回答更令我吃惊：“~~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的是车辆奔流不息的高速公路。是的，上了那条高速公路，你可以到欧洲共同体的任何地方！

我是来德国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这位德国铺路工给我的启示让我激动不已。望着那段铺好了的从密林中伸延出来的红砖路，再望~~望~~远处那通向四面八方的高速公路，一种闪光的思考猛然间跳进了我的脑海，这不就是一条“德意志道路”吗？一条由自然、传统通向文明、现代化的道路吗？

怀着这份激动，我立即去见我的德国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特里尔大学三院院长库尔特·迪威尔（~~列~~援~~援~~运~~运~~劫~~劫~~阅~~阅~~增~~增~~造~~造~~教授，并将自己打算系统地研究德意志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表示愿为我提供指导和帮助。这样，我今后研究的方向就定下来了。但我当时没有想到，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这本书问世，经过了整整八年困守书斋的艰苦日子。

回国后，我一直继续着这项研究。当~~1984~~年申报“‘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的时候，我将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作为项目申报了上去，并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先生的热情支持，课题论证报告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专家评审组的一致通过。当时我与罗先生并不认识，但罗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通信。~~1985~~年他来汉时，我才见到他，他告诉我，他一直关心着这项研究并期待着这本书能早日问世。不幸的是，罗先生竟于去年（~~1986~~年）与世长辞，他没有能看到这最后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憾事！如今也只能用这本书来告慰罗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在我长达八年的研究工作中，我的德国导师库尔特·迪威尔教授及夫人（现任教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历史系），我的德国友人

日耳曼语言学家、特里尔大学汉斯·彼得·阿尔特豪斯（~~孕~~援
~~阅~~援匀摩译译策粤德志）教授及夫人都源源不断地赠送给我大量有
 关的德文书籍与资料，并在来信中对我提出来的具体问题给予了认
 真的答复和指导；特里尔大学汉学系华裔德籍教授乔伟先生及夫人
 为我校与德意志研究基金会建立了联系，仅该基金会给我校德国研
 究中心的赠书，其价值就已达 10 万马克！没有这些海外的老师与
 朋友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著名历史学
 家、武汉大学历史系刘绪贻教授，慨然为我作序，使本书增辉不
 少。两位先生对我的热情鼓励与殷切希望，令我镂骨铭心，永志难
 忘。

该书今天能作为“‘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的成
 果而问世，也要感激由刘绪贻教授、章开沅教授、胡德坤教授、夏
 诚教授、董正华教授组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专家鉴定组，各
 位专家在认真审定之后，对该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夏诚
 教授，在该书写作过程中提出过不少宝贵的意见，令我受益匪浅。
 此外，还要感谢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
 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它们对本课题的研究和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
 持。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杨小岩先生，王雅红、陶佳珞女士，不辞辛
 劳，冒着酷暑，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的挚友张健柏先生与艾路明先生提供了大
 力帮助，没有他们的慷慨支持，这本书也是难以如期问世的。借此
 机会，谨向所有曾给我关怀、指导和帮助的人们致以深切的谢忱。

由于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现代化发展的观点出发，系统地审视
 德意志历史的著作。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与错误，在此
 恳请学术界先学同仁不吝赐教。

李工真

1992年 苑月 10日于武昌珞珈山